国際金融论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国际金融论坛（IFF）会刊 2022 年总第 12 期

The IFF Magazine www.iff.org.cn

IFF 18th 2003-2021 ANNIVERSARY

GUANGZHOU

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8 届全球年会（F20 峰会）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2021 ANNUAL MEETING (F20 SUMMIT)

特刊

MEETING COLLECTION

全球挑战下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变革、合作

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8 届全球年会围绕“全球挑战下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变革、合作”主题，深入分析疫情、通胀和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下的全球经济格局及其变化趋势，对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最新解读、总结与展望。

国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Since 2003

关于IFF

国际金融论坛 (IFF) 是总部设在中国的非营利、非官方独立国际组织，2003 年 10 月由中国、美国、欧盟等 G20 国家、新兴经济体，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相关国际组织领导人共同发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机制和多边合作机构，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Finance 20）”。

国际金融论坛（IFF）从创立至今，与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50 多家国际和地区组织、200 多位全球财经领袖保持了紧密的联系，共计 2000 多名世界特邀嘉宾，100000 多名全球业界精英参与了 IFF 历届年会和相关活动，在促进国际金融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学术研究中发挥了较好作用，取得了广泛国际影响。

宗旨

自 2003 年创立以来，国际金融论坛(IFF)秉持和遵循“全面可持续发展——新资本、新价值、新世界”的宗旨，致力于打造具有战略远见、国际一流的学术智库和多边对话平台。

目标

国际金融论坛（IFF）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运行机制，确保独立、客观、前瞻和包容性，以促进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通过对全球金融领域的深入研究，促进中国经济、世界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实现以下目标：

1. 全球金融战略对话平台；
2. 全球金融交流合作平台；
3. 全球金融创新实践平台；
4. 全球金融研究智库平台；
5. 全球金融人才培养平台。

本特刊选用文章根据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8 届全球年会现场发言速记整理，部分文章未经本人审核，特此说明。

国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国际金融论坛（IFF）会刊
2022 年总第 12 期
www.iff.org.cn

主办单位 / Host
国际金融论坛 (IFF)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大会主席 / Chair
周小川 ZHOU Xiaochuan

联合主席 / Co-chair
赫尔曼·范龙佩 Herman Van Rompuy
巴罗佐 José Manuel Durão Barroso
韩升洙 Han Seung-soo
肖卡特·阿齐兹 Shaukat Aziz

理事会 / IFF Board of Directors
埃德蒙·阿尔方戴利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让·克洛德·特里谢 苏瓦迪
Edmond Alphandéry,Domenico Siniscalco, Jean-Claude Trichet, Suwaidi,
周汉民 祝宪 林建海 梁锦松 梁维特 洛朗·法比尤斯
ZHOU Hanmin, ZHU Xian, LIN Jianhai, Antony Leung, LIANG Weite, Laurent Fabius
珍妮·希普利 阿罗约 埃内斯托·塞迪略 迈赫迈特·希姆谢克
Jenny Shipley, Arroyo, Ernesto Zedillo, Mehmet Simsek
吉耶尔莫·奥特兹 布莱恩·佩斯科 戴青丽 李纪珠
Guillermo Ortiz, Bryan Pascoe, Deborah Lehr, Dr. Jih-Chu Lee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安雅山 詹姆斯·罗斯柴尔德 钮小鹏
Alessandro Golombiewski Teixeira, Yasser Elnaggar, James Rothschild,Rick Niu
方风雷 李梅 史蒂芬·格罗夫 张红军 弗兰克·里斯伯曼 李彤
FANG Fenglei, LI Mei, Stephen P. Groff, ZHANG Hongjun, Frank Rijsberma,LI Tong

顾问委员会 / IFF Advisory Committee
让·克洛德·特里谢 利奥·梅拉梅德 鸠山由纪夫
Jean-Claude Trichet, Leo Melamed, Yukio Hatoyama
王梦奎 查尔斯·达拉拉 多明戈·卡瓦罗 卡拉·希尔斯
WANG Mengkui, Charles H. Dallara, Domingo Cavallo, Carla Hills
霍斯特·克勒 雅各布·弗兰克 维姆·科克 海梅·卡鲁阿纳 卡雷尔·莱诺
Horst Köhler, Jacob Frenkel,Wim Kok, Jaime Caruana, Karel Lannoo
克里斯托弗·希尔 魏欧林 于洪君 林毅夫
Christopher R. Hill, Olin Wethington, YU Hongjun, Justin Lin

编辑委员会 / Editorial Board
张继中 祝宪 林建海
ZHANG Jizhong, ZHU Xian, LIN Jianhai
宋敏 聂庆平 李正强
SONG Min, NIE Qingping, LI Zhengqiang

编辑部 / Editorial Department
庄珏 申钢 吴立新
Joanna Zhuang, SHEN Gang, WU Lixin

地址 / Address
北京市海淀区阳台山紫云台书院
Ziyuntai Academy (Ziyuntai Shuyuan), Yangtaishan Mountain,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邮编 / Post Code 100095
Email / info@iff.org.cn
www.iff.org.cn

版权声明 / COPYRIGHT STATEMNT
本刊内容由国际金融论坛（IFF）独家拥有，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摘抄
The content of this publication is an exclusive property of the IFF, and may not be reproduced or excerpted without permission

2021 年 12 月 4 日，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8 届全球年会在广州南沙开幕。此次会议以“全球挑战下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变革、合作”为主题，邀请全球财经领袖、业界精英、专家学者，深入分析疫情、通胀和气候变化等多重挑战下的全球经济格局及其变化趋势，对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最新解读、总结与展望。

围绕本次全球年会的主题，国际金融论坛（IFF）共设置了十多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主要包括开幕大会、报告会、政策对话，以及不同主题的夜话、峰会和圆桌会议。

具体议题涉及疫情和气候变化双重挑战下的全球经济格局及其变化趋势，对世界经济新形势和中国经济新形势的解读、展望与总结，对全球通胀、债务、经济风险应对策略的分析，全球税收政策改革及其影响，全球碳定价机制，中美经济形势对话，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和可持续发展，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商机，“一带一路”与中国的减贫经验，以及数字金融、财富管理、科技创新等不同领域全球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

IFF 大会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周小川，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铧，IFF 联合主席、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国前总理韩升洙，IFF 联合主席、欧洲理事会名誉主席、比利时前首相范龙佩，IFF 联合主席、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葡萄牙前总理巴罗佐等国内、国际政要在大会开幕式上致开幕辞。

作为创立于中国，由全球主要经济体和联合国参与发起成立的国际金融对话及学术智库平台，国际金融论坛（IFF）与全球 200 多位财经政要、金融领袖，50 多个国家和地区，50 多家国际和地区组织建立了紧密联系。国际金融论坛（IFF）将进一步发挥国际金融战略对话、交流合作、创新实践、研究智库和人才培养这五大平台功能，致力于打造国际一流的学术研究智库和多边对话平台。

张继中
CEO / 创始秘书长
执行委员会主任
国际金融论坛（IFF）

目录 CONTENTS

05 **大会致辞**

周小川 国际金融论坛 (IFF) 大会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高　燕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边立明 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何厚铧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韩升洙 IFF 联合主席、第 56 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国前总理
范龙佩 IFF 联合主席、欧洲理事会名誉主席、比利时前首相
巴罗佐 IFF 联合主席、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葡萄牙前总理

18 **《IFF 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2021 年）》暨中美绿色金融工作组战略合作发布**

祝　宪 《IFF 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2021 年）》发布致辞
祝　宪 中美绿色金融工作组正式启动
约翰·沃尔德伦 绿色金融工作组助力气候转型

24 **全体大会主旨发言**

42 **IFF 报告会**

P042 世界经济新形势
P059 全球金融新格局暨《IFF 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2021 年）》讨论会
P074 中国经济新形势

90 **IFF 政策对话**

P090 全球通胀、债务和经济风险的影响及应对
P102 全球税收政策的改革和影响
P113 全球碳定价机制对话会

120 **IFF 夜话**

P120 中美经济形势对话会
P133 共同富裕与全面可持续发展

150 **IFF 峰会**

P150 碳中和国际峰会
P162 全球气候投融资峰会：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商机
P176 2021 丝路国际联盟大会：“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减贫经验
P192 数字金融峰会
P207 财富管理峰会
P220 科技创新峰会

236 **IFF 圆桌会议**

P236 企业家圆桌会议
P255 大湾区圆桌会议：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
P282 绿色金融圆桌会议

297 **IFF 学术圆桌峰会**

P297 后疫情下中国与世界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316 **大会闭幕演讲**

IFF 18th 2003-2021 ANNIVERSARY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2021 ANNUAL MEETING (F20 SUMMIT)

国际金融论坛（IFF）第18届全球年会（F20峰会）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UNDER GLOBAL CHALLENGES: COMPETITION, CHANGE AND COOPERATION

全球挑战下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变革、合作

大会致辞

IFF 大会主席、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6
周小川：全球挑战下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变革、合作的思考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7
高燕：发挥金融的支撑保障作用，为全球发展注入更多的正能量

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9
边立明：广州市可持续发展、创新与开放结果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1
何厚铧：IFF 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

IFF 联合主席、第 56 届联合国主席、
韩国前总理 12
韩升洙：全球挑战下的可持续发展

IFF 联合主席、欧洲理事会名誉主席、
比利时前首相 14
范龙佩：后疫情时代全球需要同舟共济

IFF 联合主席、欧盟委员会前主席、
葡萄牙前总理 16
巴罗佐：全球治理需要全球多边合作

全球挑战下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变革、合作的思考

■ 周小川 / IFF大会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2021 年，新冠病毒不断变异演化，对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和生活的影响都是巨大的，最近发现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更是给全球带来了新的威胁。受疫情影响，全球供应链受阻，国际能源、食品和资产价格高企，通胀压力上升，全球经济复苏面临着不确定性。2021 年也是极端气候和自然灾害频发的一年，再一次给人类社会敲响了气候变化的警钟。本届年会以“全球挑战下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变革、合作”为主题，就是为了深入探讨全球面对的共同挑战，促进共识，加快行动。

当前，弥合疫苗接种的鸿沟，推动疫苗作为全球公共品，尽快提升疫苗全球可得性和接种率，是最迫在眉睫的全球性挑战。如何保持全球供应链的畅通和韧性、保证超常规的经济刺激政策平稳推出、保护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复苏，正考验着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经济体和经济政策的制定者。

在全球共同应对的任务清单上，还有诸多项目需要持续加倍努力，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需要全球共同携手，促进绿色低碳转型，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及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在数字转型上要坚持创新驱动，加快数字转型，加强数字治理，保护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维护消费者福利和公共利益。在对外交往上要坚持开放合作，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建立适应新时代的多边贸易规则体系，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和投资自由化。此外，我们还要坚持把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促进金融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加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今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呼吁国际社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优先、普惠包容、创新驱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加快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全球携手务实推进发展合作，是世界跨越和平、气候、贫富差距、性别、数字以及代际六大鸿沟，应对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挑战的正确道路。

周小川

女士们、先生们，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政府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有力举措。广州作为大湾区建设的核心领军城市之一，未来发展机遇无限，本次会议是 IFF 第五次在广州召开全球年会，希望大家继续在这座生机勃勃的城市中激荡智慧、碰撞思想，畅叙合作友谊、共谋发展之策，为世界未来发展提供前瞻思想和创新思路，为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贡献智慧，为世界经济复苏、为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全球携手务实推进发展合作，是世界跨越和平、气候、贫富差距、性别、数字以及代际六大鸿沟，应对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挑战的正确道路。

发挥金融的支撑保障作用，为全球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 高燕 /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

高燕

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8 届全球年会今天隆重开幕。我谨代表中国贸促会，对线上线下参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对国际金融论坛、广州市人民政府为本届年会所作的精心安排，表示诚挚的感谢！

国际金融论坛（IFF）自创建以来，紧扣国际经济形势和全球资本市场变化，开展高端交流、学术研究和战略对话，在推动国际金融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本届年会以“全球挑战下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变革、合作”为主题展开研讨，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延宕蔓延，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全球贸易投资增速放缓，国际形势持续复杂深刻变化。“三高”现象尤为值得关注。一是能源价格居高难下。今年下半年，全球能源供需失衡，不少国家缺煤缺电、油荒气荒，第三季度能源价格环比上涨 16%。二是全球债务水平高企。2020 年全球债务总额飙升至 281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 355%。目前，主要经济体宽松财政货币政策已经接近极限。三是保护主义高涨。大多数国家内顾倾向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贸易摩擦层出不穷，对外资限制与审查趋严。

但是，无论世界形势如何演变，和平与发展的大潮流没有改变，各国谋求开放合作的大趋势没有改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全球经济的大方向没有改变。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的健康平稳发展，也是国家、区域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于进一步发挥金融的支撑保障作用，为全球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我提三点建议。

一是携手应对挑战，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疫情之下，市场主体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要围绕市场主体关切，有效实施财政、就业等宏观政策，保持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助力企业尽快恢复元气，增强经济发展活力。更加注重满足小微企业多元化的金融需求，提升金融服务的适应性、

竞争力和普惠性，促进营商环境和金融生态改善，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二是顺应变革方向，推动金融创新发展。金融与科技创新相互依存、共同促进。要把握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朝着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实现金融与科技创新双向赋能。聚焦碳达峰、碳中和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统筹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兼顾应对气候变化和保障民生，设立碳减排金融支持工具，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三是坚守合作理念，实现各国互利共赢。开放融通是大势所趋，互利共赢是人心所向。要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深化金融领域合作，使更多国家和人民共享金融创新和经济增长成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强健康、绿色、数字等新领域合作，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深化双边、多边、区域合作，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共同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

前不久，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进一步增强了我们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注入强劲动力。

中国贸促会作为全国性贸易投资促进机构，愿同各方一道努力，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相互沟通协作，将国际金融论坛年会办出特色、办出水平、越办越好。同时，我们将充分发挥连接政企、衔接内外、对接供需的独特优势，增进金融机构与行业企业对话，推动金融机构紧贴实体企业国际经营需求，抓住全球市场新趋势、新机遇，不断创新跨境金融服务，帮助市场主体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壮大，助力国际产业链稳定、供应链顺畅、价值链提升，为促进世界经济复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广州市可持续发展、创新与开放成果

■ 边立明 / 广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边立明

尊敬的何厚铧副主席，尊敬的林克庆书记，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非常高兴和大家一道出席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8 届全球年会开幕式，受克庆书记、郭市长的委托，我谨代表广州市委、市政府向各位领导、嘉宾，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新老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广州市金融业发展的各界人士、相关机构、有关单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习近平总书记在第 4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深刻指出，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志。“十三五”期间，广州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高水平建设国际交往中心，稳步推进百城计划，目前已与 61 个国家、91 个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贸易及产能合作不断深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新建企业、机构 156 家，占同期中方协议投资额的近 30%，在《GaWC 世界城市名册》公布的全球城市分级排名中历史性地跨入了第一方阵，城市等级和国际地位明显提升。

南沙区作为承载广州市门户枢纽功能的城市副中心，拥有国家级新区、自贸实验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等多重国家战略功能。近年来相继获批“国家综合保税区”“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国际化人才特区”，位列中国国际化高质量发展环境建设标杆园区榜首，成为全国战略平台最多，开放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日益成为广州参与全球经济融合发展、全球科技创新发展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加快发展的策源地之一。

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2021 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起步之年。今年以来，

广州市委市政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推进高质量发展，前三季度广州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2 万亿元，增长 9.9%，经济稳定恢复的态势持续巩固。今年以来广州市先后获批“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城市”“国家首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等一批国家级政策，战略地位、功能优势进一步夯实。在 2020 年国家营商环境评价中，广州市位列全国前列，18 个指标全部获评全国标杆，展现了营商环境的广州风采。就金融业发展而言，推动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持续取得积极进展，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的基础。其中前三季度实现金融业增加值 1860 亿元，同比增长 6.2%，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增速居一线城市的第一位，保费收入规模排名全国城市第三位，广州期货交易所注册落地并揭牌，实现了广州国家级金融机构设施的历史性跨越，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成效继续名列全国前茅。

下一步，广州将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和广州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双区建设，双城联动”为战略引领，支持两个合作区建设，抓住“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为实现“老城市新活力”和“四个出新出彩”，围绕健全广州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提升广州金融发展能级，推进广州金融改革开放，集聚金融机构和人才，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共同富裕，不断加强跨国跨界金融合作的交流。

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8 届全球年会在当下复杂多变的金融、经济环境下，提出了“全球挑战下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变革、合作”这个紧扣时代的主题。衷心希望各位嘉宾、各位专家畅所欲言，为促进金融业服务经济的复苏和可持续发展出谋划策。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真诚地希望通过本届 IFF 全球年会能同各位嘉宾加强交流、合作，期盼有更多的朋友和企业到广州投资兴业，共建开放性的世界经济。

IFF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

■ 何厚铧 /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何厚铧

各位主席，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出席国际金融论坛（IFF）第 18 届全球年会，在这里我首先向大会致以衷心的祝贺，并向各位致以诚挚的问候。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带来的冲击，令各国经济、社会面临重大危机，更需要携手前行，共克时艰，共同应对危及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各种问题。在此背景下，国际金融论坛（IFF）以“全球挑战下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变革、合作”为主题召开年会，意义重大。

2017 年，国际金融论坛（IFF）积极响应国家战略，落户大湾区，建设具有标志意义的国际金融论坛（IFF）永久会址，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交往合作平台、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平台之一，我对国际金融论坛（IFF）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后疫情时代，国际社会将更加需要像国际金融论坛（IFF）这样的平台发挥联系纽带作用，进一步凝聚发展共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探索新路。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的形成，对生产性服务尤其是现代金融服务的需求愈发强烈，为粤港澳大湾区带来了巨大的跨境资产配置需求。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既是对世界级湾区的有力支撑，也是世界经济与金融发展的必然需求。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金融业贯通产业链全流程、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将更加注重发挥在资源配置和资金交互中的中枢调节作用，更加关注整体谋划和战略先导，更加重视金融要素联动、协同发展。最终通过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辐射带动引领，使粤港澳大湾区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金融竞争和治理格局的重塑优化，提升金融发展竞争力和国际话语权。

最后，希望国际金融论坛（IFF）进一步发挥作用，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合作平台，推动金融服务世界，促进全面可持续发展。

全球挑战下的可持续发展

■ 韩升洙 / IFF联合主席、第56届联合国大会主席、韩国前总理

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着威胁全球稳定和人类安全的诸多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使本已困难重重的全球形势雪上加霜，疫情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造成许多人失去生命，并使我们的日常生活步入了“新常态”。

继2012年“里约+20”峰会探讨可持续发展目标之后，联合国大会于 2015 年 9 月 25 日在纽约通过了 17 项总体目标和 169 项具体目标，作为《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部分。这 17 项全球目标相互联系，是所有人实现更美好和更可持续未来的蓝图。可持续发展目标解决了今天我们所面临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从贫困、不平等，到气候变化、和平与正义。当前，我们正朝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目标努力，距离 2030 年只有 8 年的时间了。

尽管在过去几年里我们付出了很多努力 ，但遗憾的是，要在未来 8 年内实现所有 17 项目标，似乎仍然遥不可及。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当今那些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的主要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框架，可持续发展目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以确保健康生活、应对气候变化。

健康是一项基本人权，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中占据中心地位。此次新冠肺炎疫情表明，各国迫切需要提高卫生保健系统的适应性和恢复力。疫情不仅对人类健康和社会造成严重伤害，导致全球 500 多万人死亡，而且加剧了医疗、劳动、住房、食品、教育和其他关键领域既有的不平等状况。新冠肺炎疫情还凸显了国际社会对加强全球统一领导和多边响应的迫切需要。而这些正是我们在这个关键时刻所缺乏的，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世界领导人团结一致，通过创建 20 国集团（G20），战胜了经济危机。

G20 领导人峰会作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至今仍在发挥作用。但遗憾的是，面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我们看到的却是全球领导力在共同、及时、有效应对疫情上的重大失败。

我相信，如果开展多边合作、加强团结意识，疫情的蔓延及其造成的痛苦和损害就会大大减少。在应对疫情的两年中，国际社会认识到疫情的根源之一是不可持续的发展，它不断破坏着宝贵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由于盲目地追求经济增长，我们忽略了我们的环境、健康以及整个社会福祉的重要性和价值。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确保经济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因此，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采取的经济刺激计划，也应与绿色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途径相一致。

韩升洙

众所周知，气候变化是人类今天以及未来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全球温度正在不断上升，世界各地都在遭受着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气候变化要归咎于人类活动过程中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的积累。如果这些温室气体的浓度无法保持稳定，地球的气候将被进一步扰乱。

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地球的气候稳定是最宝贵的全球公共产品，不仅对我们，对我们的子孙后代也是如此。在这方面，我想对我们在达成共识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表示赞赏，即到 21 世纪中期实现碳中和目标。然而，大多数国家还没有为制定其近期政策措施和国家战略做好充分准备。他们只是采取了严格的政策来迅速减少碳排放。国际社会现在必须履行其领导人商定和通过的这一政治承诺。我们需要加强合作伙伴关系，积极落实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各项行动和倡议，包括大规模的气候适应行动、实质性的气候缓解行动、创新型气候融资，并要以前所未有的努力来发展和推广气候友好型技术。

发达国家应带头加强其气候目标，同时应鼓励发展中国家积极履行其气候责任。我们必须认识到，实现所有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且势在必行，因为可持续发展的各个目标之间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例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系统的维护有助于减缓气候变化，增强气候适应性和环境韧性。因此，可以明确的是，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进行投资，可以有效降低国家和不同人群面对气候风险的脆弱性，同时有效增强其应对不同规模气候变化的韧性和适应力，从而使弱势群体受益，并提高所有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

最后，我想强调私营部门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将发挥关键作用。我们需要一个有能力的私营部门领导人，来推动气候转型和系统性变革，并承诺“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可持续发展目标为私营企业创建其可持续商业模式提供了良好指导。无论企业的意愿如何，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者要求各企业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其商业规划中，并推动其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支持气候投资和 ESG 投资。随着 ESG 和可持续发展投资的不断扩大，企业也应投资于可持续的商业实践，并对标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运营和交付业务，以及调动投资满足各种投资者的期望。

正如我前面强调的，国际合作是解决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的必要途径。单靠一个国家或一个主体的努力是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只有各国、各部门和各行业密切协作，才能够有效应对共同挑战，加速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加强团结意识、合作伙伴关系和多边主义是实现我们七年前在纽约所作承诺的关键。我坚信，建立成功的伙伴关系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对宗旨、优先事项和目标达成共识。新冠肺炎疫情和气候变化是跨国界的，是对人类的共同威胁。它们揭示并加剧了不平等现象。共同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将有助于我们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它们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影响。我们必须牢记，在这个全球性的、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只有补足短板，我们才能真正变得强大。

我谨敦促国际社会和所有国家，努力构建机制、政策框架和结构体系，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我们要分配更多的经济资源来保护我们的生态系统和人类安全，同时确保可持续发展和协同增效，保护全球公共产品。

后疫情时代全球需要同舟共济

■ 范龙佩 / IFF 联合主席、欧洲理事会名誉主席、比利时前首相

范龙佩

这些年来，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比公共预算和金融机构所囊括的范围更广，也更重要。它是指“人的发展”和“发展为人”的可持续性，这一点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得到了很好的概括。

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不同事物之间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气候 - 健康 - 经济 - 社会凝聚力。疫情也告诉我们，最薄弱的环节是最有可能让我们付出高昂代价的地方。

疫情还告诉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是全球性的，必须由全球共同解决。道理虽然简单，却行之有效。极端贫困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大幅减少后，在 2020 年出现反弹，令人痛心。

减少极端贫困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身“千年发展目标”的一项重大成就。因而，全球所有的经济体必须帮助最贫穷的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提供资金支持，并让每个人都接种新冠疫苗。目前，我们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

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除了减少碳排放，我们还必须信守承诺。此外，我们也必须努力消除现有的和新出现的不平等现象。疫情对劳动力市场中最弱势的人群影响最大，最强壮的肩膀应承担最重的负担，因此，社会应该对弱势、贫困人群施予援手。

全球处在同一场风暴中，但境遇却不尽相同。我们不能无所作为，只让自由市场来解决问题。各国政府也应肩负起责任，正如他们在卫生领域肩负的重要责任。

我们必须从全球角度和长远角度进行思考和展开行动。现在，一些人又重拾自我主义和短期主义，我认为必须继续选择经济开放和世界开放。欧盟和中国应该选择真正的多边主义。COP26 尽管不尽如人意，但却证明多边主义是不可或缺的。虽然，在有些人看来，这违背了他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因此，现在是多边主义发挥作用的时候了，要实现抗疫和经济复苏在全球范围的成功，所有国家都必须同舟共济，还要避免不公平的经济竞争。最重要的是，这是扭转整个人类以及我们生活和共有的地球发展趋势的前提。

我想，许多年后人们不会问本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国家是哪一个，而是会问我们是否曾一起面对共同的威胁。有些人可能认为这种想法很天真，但事实将证明他们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解决全球各经济体之间缺乏信任的问题，因为我们需要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即使有时分歧很大，合作也是有可能实现的。

我希望目前正在筹备的欧盟与中国领导人的视频峰会能尽快召开。欧盟始终致力于对话与合作，而且其原则非常明确。现在是变革的时候了，卫生、经济、气候和社会凝聚力方面所需的改革将是渐进的，但渐进绝不是举步不前。在气候应对问题上，我们必须做出更多质的飞跃，而不仅仅是量的积累，每个国家都必须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本届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年会可以传达这一信息。

金融界越来越意识到健康的金融机构的重要性，特别是在 13 年前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 更加意识到健康的世界、绿色金融的重要性。金融界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在这方面，中国和欧盟也在相互学习，例如，在制定共同分类目录中相互借鉴与学习。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 COP26 大会上，世界主要金融机构承诺要实现《巴黎协定》中设定的目标。我注意到发起人说，他们将“毫不留情”地监督签署方，确保他们信守承诺。同样，在这方面，执行是关键。所谓的“国家自主贡献”更是如此，它体现了每个国家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努力。只作承诺和保证的时代已经过去，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

全球处在同一场风暴中，但境遇却不尽相同。我们不能无所作为，只让自由市场来解决问题。各国政府也应肩负起责任，正如他们在卫生领域肩负的重要责任。

全球治理需要全球多边合作

■ 巴罗佐 / IFF 联合主席、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葡萄牙前总理

巴罗佐

众所周知，从联合国国际大家庭的角度出发，我们于 2015 年制定了可持续发展目标。

此项目标的制定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记得这件事，是因为我本人荣幸地参加了 1992 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地球高峰会议”，即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目标。2012 年，同样是在巴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又称“里约 + 20”峰会）对该目标作出了修订。这次会议是继 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及 2002 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后，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举行的又一次大规模、高级别会议，我本人也有幸参加。

因此，我可以就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进展分享一些我个人的、独到的见解。当然，现在的情况比几年前要好，但是挑战依然严峻。可持续发展目标有 17 项之多，我现在更关注与社会相关的目标，以及需要更多全球合作的目标，比如消除贫困、零饥饿、人民健康与福祉、高质量教育、性别平等，等等。

可能有人已经了解到，自 2021 年初，我开始担任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理事会主席。GAVI 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疫苗联盟，成立于 1999 年，在常规免疫接种尤其是针对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儿童的免疫方面，已有超过 20 年的经验。

GAVI 向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提议，与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起，创建了全球多边机制——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旨在推进疫苗采购、分配和交付工作。

我与同事们一直努力在 COVAX 框架下，解决全球新冠肺炎疫苗问题，以应对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可怕的疫情。截至目前我发言的这一刻，已有超过 5.3 亿针剂疫苗分发到世界各地。但现实是，全球疫苗分配仍然存在巨大的不平等。

是什么造成了疫苗分配不均的问题？是因为过去乃至现在仍存在的出口限制，限制疫苗或疫苗成分出口。另外，疫苗供应链及其大规模生产等方面也存在问题。此次新冠肺炎疫苗的生产和分配，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因此面临诸多问题。比如疫苗制造商经验不足，不清楚哪些国家或者有多少人需要疫苗；一些发达国家本身不需要那么多疫苗，却出于自身利益过度囤积；另外，疫苗的监管审批也存在延迟。

我想补充说明一下，我的发言仅代表我个人，不代表欧盟、政府或任何其他组织和机构。我想说的是，我还看到了许多疫苗民族主义案例。在某种程度上，我理解每个国家优先考虑本国国民的做法。但某些国家只给部分国家提供优惠待遇，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疫苗民族主义与真正意义上的多边全球合作是背道而驰的。

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多边合作。当今世界仍存在一些地缘政治冲突，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持续下去，但我相信，我们还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我们至少可以呼吁世界领导人，在全球公共产品，尤其在全球公共健康或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相互合作，共同寻求多边的解决途径。

虽然各国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不同，有时也会因不同的立场产生对抗。但当涉及像疫情、气候变化这类全球公共事项时，我们必须为人类的共同利益而努力。这里的“我们”指的是全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来自北方还是南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大家有理由对目前的形势不那么乐观，因为就我所见，目前全球在部分领域的合作水平，比如说 G20，低于其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表现出来的水平。如果合作水平不高，各国的斗志也不会高。

所以我认为现在必须敦促各国政府，美国、中国以及欧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的各国政府，呼吁世界上所有国家，本着精诚合作的精神，为这些全球公共产品共同努力。我相信，这是可以实现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这方面的突出实例，如科学合作方面的进展。事实上，新冠肺炎疫苗创纪录的研发速度，已充分证明了科学力量的伟大。

我们应继续在这些公共领域保持开放的态度。在抗击疫情方面，我们也感受到了人类的慷慨。捐助者为实现共同目标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物资。也有一些捐助者积极分享新冠疫苗。这些都是值得学习的好榜样，但坦率而言，在此次疫情中，我们还没有展示出最好的一面。

我呼吁在这些榜样的基础上，继续坚定地为落实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不懈奋斗，这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当然，我们都热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但我们也应该放眼世界。现在全球治理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和重要。尽管存在各种分歧，我们还是要确保联合国以及其他合作机制落地见效。

我坚信，大多数人都会赞同我这一呼吁，本着团结的精神去建设一个团结的世界。

《IFF 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2021年）》暨中美绿色金融工作组战略合作发布

IFF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新开发银行原副行长 19
祝宪：《IFF 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2021 年）》发布致辞

IFF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新开发银行原副行长 21
祝宪：中美绿色金融工作组正式启动

美国高盛集团总裁 22
约翰·沃尔德伦：绿色金融工作组助力气候转型

《IFF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2021年）》发布致辞

■ 祝宪 / IFF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新开发银行原副行长

祝宪

首先，我对各位出席今天的《 IFF 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2021 年）》发布会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过去一年中，新冠肺炎疫情继续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国际多边体系面临严峻挑战。为了加强对全球重大问题的持续跟踪和研究，加强金融服务对疫后经济复苏和可持续发展的支持，自 2021 年起，国际金融论坛（IFF）将组织编写《IFF 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IFF Global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Report)(以下简称报告)，并将于每年定期在 IFF 全球年会期间发布。《IFF 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旨在根据跨国数据，分析和预测全球经济趋势和前景，解读金融发展和创新，探讨全球共同关注的长期挑战和政策问题，以促进全球范围的政策讨论。

首期《IFF 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包含三个章节。第一章，全球经济展望，讨论了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新发展、各国经济的最新动态以及对全球经济前景、风险和政策重点的评估。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加快疫苗接种、消除疫苗鸿沟、确保货币政策平稳过渡、结束贸易紧张局势、促进绿色复苏，并加强对低收入国家的支持。

第二章重点介绍了全球绿色金融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政策行动关键一环的发展现状。在这一章中，国际金融论坛（IFF）推出了与中央财经大学联合开发的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指数（GGFDI）以及国别排名。

第三章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国际能源署（IEA）的相关报告，梳理了为

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 2℃和 1.5℃气候目标所需要的全球能源系统和产业部门的转型、能源投资和政策措施。本章还根据现有研究和文献，综述了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技术方案和政策选项。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报告第二章首次发布了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指数（GGFDI），从国家层面对各国绿色金融的发展进行量化评估，并聚焦三个方面：政策和策略、产品和市场以及国际合作。这一章公布了利用 GGFDI 指数对世界 55 个最大经济体绿色金融发展情况进行排名的结果（数据截至 2020 年底）。主要结果总结如下：

• 按照 GGFDI 得分排名，法国在 55 个国家中位列第一。排名前十的其他国家依次为（按排名顺序）：英国、德国、中国、荷兰、日本、瑞典、丹麦、西班牙和美国。除美国外，上述国家在全部三个重点领域，即政策和策略领域、产品和市场领域以及国际合作领域均排名很高。

• 得分排在中位数以上的国家大多为金融体系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但几个新兴市场国家的得分也相当高。例如，中国排名第 4，墨西哥排名第 15，智利排名第 17，巴西排名第 21；也有一些发达国家得分低于中位数，例如，加拿大、新西兰、希腊和澳大利亚。

• GGFDI 得分和三个重点领域排名存在显著差异。在政策和策略领域，前十名（按排名顺序）依次是英国、法国、中国、匈牙利、日本、葡萄牙、巴西、韩国、荷兰和丹麦。在产品和市场领域，前十名是法国、德国、荷兰、美国、丹麦、英国、瑞典、中国、奥地利和西班牙。在国际合作领域，前十名是日本、法国、德国、英国、中国、西班牙、巴西、墨西哥、挪威和加拿大。

• G20 国家中，GGFDI 排名前列的国家有：法国、英国、德国、中国和日本，这些国家在三个重点领域排名不相上下。排名居中的国家有：美国、意大利、墨西哥、韩国、巴西、加拿大和南非，其绿色金融发展策略差异很大。得分较低的国家有：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阿根廷、澳大利亚、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但其中有些国家在政策和策略领域排名较高，如俄罗斯、阿根廷和印度尼西亚。

• 总体而言，GGFDI 结果表明，各国的绿色金融发展非常不均衡。55 个国家的 GGFDI 平均分为 50 分，发达国家为 62.1 分，发展中国家为 39.2 分。就地区而言，欧洲平均分最高，达 63.6 分，然后依次是北美 61.7 分，拉丁美洲 53.8 分，亚洲 47.1 分，非洲 41.4 分，中东 20.6 分。

• 各国在政策和策略领域得分差异最小，在产品和市场领域得分差异最大。这表明，即使 GGFDI 排名较低的国家，其政府也在政策制定方面付出努力，而且这些国家的绿色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欠发达的金融业和资本市场的制约。因此，发展绿色金融不仅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还需要金融和资金市场改革。

衷心希望此报告中的数据和分析，能够有助于全球宏观经济和政策讨论，加快全球绿色经济复苏的步伐，推动气候行动和绿色投资的规模，增强全球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中美绿色金融工作组正式启动

■ 祝宪 / IFF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新开发银行原副行长

国际金融论坛（IFF）与美国高盛集团合作，正式宣布共同组建中美绿色金融工作组。我们肩负共同愿景，支持发展一个强大的绿色金融市场，以促进中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并加强金融在推动落实全球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双方本着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原则，经过友好协商，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并于 2021 年 12 月正式启动中美绿色金融工作组。

中美绿色金融工作组将作为多边国际化、市场化、企业化的合作平台，就如何运用绿色金融实现向低碳经济转型的全球目标，交流变革性意见，同时发挥中国在实现气候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

绿色金融工作组将召集全球领先企业 CEO 级别代表，包括银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汽车制造业、零售业等，以及来自美国、欧盟、英国和中国的专业研究人员，以寻求解决方案为最终导向，就如何最优化地运用绿色金融和资本市场来缓解气候变化及推动低碳经济转型开展对话。

同时，工作组将提供政策建议，以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实现国家及多边项目。工作组将为制定低碳经济转型的具体政策提供经验、见解和观点，也将为解决中国和其他国家所面临的关键挑战建言献策，并对特定主题展开研究。

我们共同认识到：实现高层次目标的关键是确保战略和政策的贯彻落实。中美绿色金融工作组将致力于绿色金融领域的能力建设与计划指导，以及项目和投资的可持续性评估，共同提出有效且有针对性的建议。

鉴于此，我们提议召集来自可持续发展金融领域的企业、专家，充分发挥他们广博的专业知识，并邀请他们与 G20 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以及中美高层领导分享见解并交换意见。

中美绿色金融工作组将通过定期双边和多边会议，研讨问题、分享专业知识、撰写相关研究报告，以及在研讨中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工作组涉及的领域包括：

1. 促进降低碳成本曲线的主要组成部分（即发电 / 工业）；
2. 加快推进气候转型的资本便利化；
3. 推动制定激励绿色金融的政策和监管原则；
4. 推动各方就 ESG 分类法达成共识；
5. 促进发展碳排放交易和碳期货市场。

在此，我谨代表国际金融论坛（IFF）期待与高盛集团及工作组各位成员精诚合作、携手共进，为推进绿色金融，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

绿色金融工作组助力气候转型

■ 约翰·沃尔德伦 / 美国高盛集团总裁

约翰 · 沃尔德伦

感谢大家今天到场助力我们启动绿色金融工作组。成立这个工作组的想法已经在高盛酝酿了一些时日，能够与国际金融论坛（IFF）和其他合作伙伴联手将其付诸实践，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我们的努力植根于这样的信念，那就是尽可能快速有效地将世界经济转型为低碳经济，这就要求公共和私营部门比目前更加有效地利用绿色金融创新。

我们成立这个工作组旨在搭建一个有针对性的平台来交流转型思想，以及我们每个人付诸实际行动的最佳实践。但这个工作组并不是我们凭空建立的。

近年来，我们目睹了公共领域取得的重大进展，全球的气候转型意识不断加强，签署了《巴黎协定》，召开了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各个国家也纷纷发布“净零碳排放”宣言。毋庸置疑，这些进展令人振奋，但还远远不够。

私营部门已经为绿色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其中包括正在推动气候转型的各种消费品，并在各国政府的帮助下，已经设法让这些消费品的价格变得更有竞争力。但现在我们需要从气候变化科学转向气候变化事业，我们需要大规模商业化运用这些技术，让消费者更容易寻找和选择更绿色的能源来作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的能量来源。

这将需要私营部门进行比以往更多的协调。市场竞争是好的，最终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这最多只能帮助应对气候变化等生存威胁。加入我们工作组的许多公司都是一些最重要的投资者和全球能源用户——我们需要他们积极参与并成为未来气候转型的支持者。他们加入这个工作组将为如火如荼的全球气候行动增添动力，并助力这些行动取得更大效果，因为他们在数十年相关业务运营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可以在工作组中得到有效分享和广泛传播。

我们有意使该工作组成为重要的多边私营部门论坛，深入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等复杂但至关重要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当人们想知道私营部门如何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作用时，这个工作组将是他们的首选。启动的这个工作组是因为我们特别重视中国在实现气候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毕竟，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具抱负的绿色金融议程。

除了英国以外，在过去十年间，没有任何主要经济体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方面取得比中国更大的贡献。但与中国过往对全球气候转型做出的贡献相比，中国未来在此领域做出的贡献将被证明更具决定性意义。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承诺了“净零碳排放”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的 83%，而中国碳排放占其中五分之二。中国也将在帮助世界其他地区，实现各自气候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因为中国既是绿色技术和设备的主要生产商和出口商，也是证明新绿色产品经济可行性的市场。

气候转型无国界之分，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全球性问题。面对气候变化，只有全人类都安然无恙，我们每个人才可以独善其身。这意味着，仅仅依靠各国政府联手应对这个无处不在的威胁是远远不够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也需要挺身而出，勇挑重担。

业界专家预测，为了成功实现气候转型，需要超过 100 万亿美元的投入。成本如此高昂，无论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独自承担都显得势单力薄。成功实现气候转型不但耗资巨大，耗时也十分惊人，可能需要花费数十年，而且需要公私领域协调配合，通力合作。

当前，我们启动绿色金融工作组，是为了推动私营部门参与进来，共同助力实现气候转型。我们必须抓住每个机会，否则我们将逐渐走向退无可退的绝境。

我们今天能做出如此宣言，是因为与国际金融论坛（IFF）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IFF 平台高端，历史悠久，2003 年由 20 多个国家金融领袖联合创立，共同研讨金融界重大问题，积极促进各国建立理想伙伴关系。今天的 IFF 全球年会检验了中国合作伙伴的思想影响和领袖风范。凭借 IFF 的专业知识和强大优势，相信该倡议定会大获成功，期待与祝秘书长共同主持绿色金融工作组会议。

我们将与祝秘书长一道召集私营部门 CEO 级别代表，就全球所需的绿色金融倡议展开讨论，建立合作、推动发展，以确保气候转型行稳致远。要通过各种途径践行计划，还要适当聚焦思想交流。基于自身经验和现有研究，交流专业知识，分享独到见解，寻求最佳方案，而且要格外注重加快降低碳成本，并积极筹集、部署更多资金，进一步推动气候转型。既要加大力度进行建设和指导，也要正确践行思想和政策。

我们会为政府制定政策建言献策，积极助力政策有效践行和吸引更多高质量绿色融资，也会制定气候框架，以衡量气候转型的进展，并就发展和监测碳排放交易和碳期货市场作出指导。

最后，绿色金融工作组成员也将有机会参与中国的试点项目，测试绿色金融创新提案，并为其他正进行的中国项目提供咨询，以助力其他国家加快自身气候转型。气候转型道阻且长，但全球各地的决策者们正在同舟共济，以只争朝夕的姿态应对问题，这一点可圈可点。

我们衷心希望以成立“绿色金融工作组”，以及采取其他具体切实的措施支持决策者们，希望与国际金融论坛（IFF）以及与会的所有人开展合作，尽我们的全力寻求绿色金融创新解决方案，资助世界气候转型。

全体大会主旨发言

第 12 任世界银行行长 25
金墉：加强多边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与新冠肺炎疫情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行长 27
金立群：寻求有效的多边主义以应对全球挑战

新开发银行行长 29
马可：世界结构性变化趋势与多边主义

开幕大会特别对话 31
祝宪、金墉、金立群、马可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 35
弗拉基米尔·伊玛莫维奇·诺罗夫：上合组织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多边力量

IFF 理事、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国前总理、COP21 主席 37
洛朗·法比尤斯：抵御气候变化风险，避免“气候宿命论”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总干事 39
李勇：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努力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40
王建军：加强投资者保护，筑牢注册制改革之基

加强多边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与新冠肺炎疫情

■ 金墉 / 第12任世界银行行长

金 墉

当今世界遇到最大的三个问题是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我下面谈一下，它们对可持续发展以及加剧不平等现象产生的影响。

首先讲可持续发展，刚刚在格拉斯哥结束的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主要是围绕着《巴黎协定》和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目标议题进行的。所有缔约方都十分关注每年 1000 亿美金援助资金的落实，这是发达国家在 2009 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曾经作出的承诺。他们承诺到 2020 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十分遗憾，这个承诺并没有兑现。截至 2020 年，每年 1000 亿美元援助资金仅仅达到了 800 亿美金，其中 350 亿还是来自各发展银行。在这种情况下，给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和财务支持的决心必须更加坚定，因为这是所有缔约方都十分关注的问题，而且减排也是一个需要全球共同承担的责任。关于气候韧性方案，我举个简单例子，在很多国家，只要下大雨道路就会被淹没，令人失望的是在这方面至今仍没有多大改善，所以我们还需要在降低气候变化影响方面更加努力。现在每年 800 亿美元的援助资金远远不够，希望到 2030 年能够达到承诺的目标。

在 COP26 大会上，我们欣喜地看到私营部门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更加努力积极了，行动力也更强、更有冲劲了。根据过去几年我在私营部门的工作经验，ESG 已经成为一个大家都非常关注的话题，“E”也就是环境，尤其成为大家关注的重点。我工作交往过的所有机构，每一个资金提供方都会问及 ESG 的安排及其未来目标，那些收入主要来源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也不例外。这说明私营部门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趋势越来越显著，而且私营部门在这方面的工作进展非常大、非常快。对于私营部门来说，这是一个更好的、崭新的激励机制。

其次谈一下新冠肺炎疫情。我曾经在传染病领域工作，也做过这方面的医生，我在美国担任过政府的医学

顾问，也在其他国家提供过专业建议。在这场影响深远的疫情当中，其实能学到很多东西，如中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零容忍政策，韩国、日本和欧盟国家在公共健康方面做出的巨大努力，这些都使疫情传播得到了控制。也有一些国家好像已经恢复到了疫情前的日常生活，可是疫情给这些国家带来的生命损失是巨大的。回头去看一下这段时间，很多国家，比如美国所谓“正常生活”的代价是 80 多万人丧失了生命，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是我们这一代人，甚而是一百年来人类遭遇的最大疫情。令人沉痛的是，有一些国家因没有采取正确的疫情应对措施导致死亡率很高，所以我们必须严阵以待、紧密关注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未来的发展情况。

如果从私营部门的角度出发，或者仅仅从科研的角度出发，我们在新冠疫苗研发方面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惊人的，所有传染病学方面的专家甚至在座的所有人，应该都知道，这次疫情中的疫苗研发速度是空前的。目前，可能会对新冠病毒变异毒株，比如奥密克戎的有效疫苗，已经在生物分子级的实验室中进行研究和开发了。最终，如果奥密克戎毒株对现有的疫苗产生抗药性，那么应该在几个月之内就能够看到新的疫苗被研发出来，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关于疫苗的可获取性，对于世界上很多人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但是全球在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的，因为并没有能够把疫苗送到每一个疫苗需求者手上。众所周知，如果疫苗推广的速度变缓，病毒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产生变异，就会感染更多人。因此，尽量推广疫苗接种，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不平等现象，我们可以看到，极端贫困消除议程因为疫情的冲击被迫减缓了，这个目标最终什么时候才能够达成也未可知。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阻碍，出现的很多情况史无前例，但也正因为如此，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如果全球行动屡遭失败，我们将无法应对全球性的困难和挑战。世界卫生组织举步维艰，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它本应可以协调全球抗疫，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要回过头来看多边主义的行动能够怎样发挥作用。

金立群先生担任亚投行行长之后，做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就是推动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充分加入多边开发银行网络平台当中，以便继续有效协调多方努力，合力解决最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我本人和马可行长在未来都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来源：联合国官网

寻求有效的多边主义以应对全球挑战

■ 金立群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行长

金立群

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么好的机会在线一起讨论存亡攸关的话题，其实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因为我们“还在”。今天大家谈到气候变化、谈到疫情，我想说的是，我们采取多边主义的方式来解决全球困难的成功与否，是由多边合作的效果来决定的。事实上，气候变化与远远没有结束的疫情给我们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甚至是人类存亡攸关的威胁。有人认为国家安全的威胁才是真正的存亡攸关的话题，但事实上，气候变化与疫情，影响的是人类的整体安全，影响所有人更好、更有效的合作。实际上，大家对脱钩、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有很多争议，离彼此距离更远的做法和说法不应该得到鼓励。

关于多边体系，我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多边机构，使我们避免了很多冲突和可怕的战争。过去几十年来，这些多边机构的努力向我们展示了多边主义的力量及其效果。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银行在金墉行长领导之下，做出了很多努力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些多边机构向我们展示了多边机制的优越效果，包括在各国政府之间所发挥的作用。亚投行是一个全球的平台，能够更好地去体现多边主义的优势，很多多边机构都是在二战之后逐渐设立起来的，我所在的亚投行也是。跟其他多边机构一样，亚投行将继续发挥多边主义的优势以应对全球共同的挑战。无论是大型国际机构，如联合国，还是一些比较专业的小型机构，都有自己专注的领域，大家应该把各自的力量集合起来。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之下，在什么样的国家当中，都不应该成为我们彼此合作的障碍，这是我们这些国际机构应坚定的决心。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些很令人不安的情况，保护主

义和狭隘的个人主义正在阻碍多边合作，所以现在需要世界各国共同推动多边主义在全世界崛起，遏制那些可能会腐蚀多边主义、多边机制的言行。我们必须一起对抗单边和保护主义的浪潮，因为我们现在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我们亟需应对全球危机的解决方案。全球合作需要进一步加强，而不是被削弱，在机构和机制方面需要有更加强化的领导力，也需要有更多的协调和合作。如果受到一些意识形态或者政治偏见的局限，我们就要移除这些障碍。

在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之后，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气候变化会给全球带来灭顶之灾，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深受影响。这是一种全球层面的危机，我们必须共同去解决。COP26 大会给未兑现的 1000 亿美元援助资金到位带来了希望的曙光。2020 年只有约 700 亿美金的气候援助资金到位，而剩下的 24% 援助资金本应能够帮助部分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发达国家并没有实际履行其在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上做出的 1000 亿美元的承诺，不管是在投资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所以，剩余部分的气候援助资金需要由多边开发银行来共同补齐，最终提供超过 1500 亿美元的资金。

很多国家目前已经制定了宏大的气候变化应对计划，私营部门也提供了支持。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一个有无足够投资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如何更好地使用投资的问题，两者都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还有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我们考虑。首先，我们的投资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投资可再生能源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应该投资什么样的可再生能源呢？是投资发电领域还是研发领域，尤其是那些重要的技术研发，比如氢能。氢能现在被认为是最具有经济效益的可再生能源，同时，用于生产氢能本身的能源也需要是可再生的。技术的进步是非常快速的，而存在的障碍也在升级，继续投资化石燃料那是不行的，而且同样会有一些挑战。当新的技术出现，老的技术就会过时，比如太阳能、风能也会遇到一些挑战。有一些可再生能源在新的技术出现时会成为搁置资产，有多少人想过这个问题呢？所以我想说的是，投资可再生能源应该在投资现有技术和投资新技术研发之间做好平衡。

关于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问题。对于很多低收入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来讲，现在他们遇到了越来越多气候事件，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所以“适应”气候变化是亚洲国家要面对的最紧迫的问题。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可以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做的更多，而低收入国家需要更多的是“适应”气候变化。因为它们确实有这方面的紧迫需求，而且考虑到其脆弱性，技术转型方面资金支持就显得尤为至关重要。无论如何，发展中国家不能够在经济发展和脱碳化方面进行选择，发展的目标和气候变化的目标应该是共同支持和互相支持的。中国要想实现包容的发展，就应该加大努力实现中国的脱碳化，加强气候的韧性。

最后，关于卫生方面的危机问题。因为资源短缺，以及缺少战略关注从而导致卫生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卫生基础设施投资缺乏问题进一步凸显，而且医疗体系现代化方面也做得不够，因而导致不能够充分应对现在的问题。我认为传统的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以应对当前的挑战，社会的基础设施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是至关重要的，医疗保健也是一种生产要素，只有健康的国家才是有生产力的国家。

来源：联合国官网

世界结构性变化趋势与多边主义

■ 马可 / 新开发银行行长

今天会议的议题包括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不平等现象。我们一定要理解和意识到的一点就是，现在世界上已经发生了很多结构性变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变化对于刚才讲到的三个问题的下一步解决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期间也看到了这一点。新冠肺炎疫情也是一样，突然之间，因为疫情全世界暂停了，今后要进一步加速发展，我认为结构性变化的问题，对于应对未来的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及不平等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马可

第一个结构性的变化。在 2020 年这个充满挑战的一年，有很多关于债务可持续性以及对新兴经济体的担心。新兴经济体在全球 GDP 当中的占比逐年提高。七国集团（G7），包括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以购买力均价来衡量，G7 的综合 GDP 大概是 42 万亿美元；E7，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尼、巴西、墨西哥、土耳其，这几个主要新兴经济体国家在 2020 年底的综合 GDP，以购买力均价衡量是 53 万亿。所以说，E7 的购买力实际上已经超过了 G7。中国、巴西等金砖 5 国，在全球 GDP 当中的占比已经非常高了。在 PPP 模式下，可以通过哪些方案和技术，应对今天会议所列出的三个挑战。与此同时，我们要考虑新兴市场已经变得更加重要这一点，其对于未来全球经济发展将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二个结构性的变化。当讲到全球竞争的时候，离不开它对于全球供应链产生的影响。目前，我们正在见证全球价值链的调整和重塑，已经不仅仅是供给的问题，比如当今巴西的贸易出口，更多是向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而不是向德国、法国、意大利。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贸易合作伙伴，新兴市场也日渐繁荣，这是全球价值链的变化之一。当然，全球价值链也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这个因素确实也很重要。但我认为还有其他更加重要的因素，比如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内的一些变化。现在中国在全球的很多方面都处于引领地位，包括一些高技术领域。所以，我认为新兴经济体对于全球价值链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结构性的变化。要想应对气候变化，要想应对贫穷和不平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如何运用共同的标准，如何通过合作来解决这些挑战和问题。现在有一种风险，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标准之间的冲突。现在，有一些国家希望向其他的国家强加他们关于某些问题的观点和看法，而实际上应该有统一的标准或者是共同的解决方案，因为大家面临的是共同挑战。所以必须进一步加强多边主义，不仅要通过多边主义进行探讨，也要通过多边渠道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所以我强烈呼吁多边主义，尤其是要解决今天会议的三个议题，即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不平等现象，多边主义至关重要。

最后一点，需要考虑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鉴于新冠肺炎疫情、气候变化，以及应对贫穷和不平等方

面的挑战，需要有更多基础设施方面的转变。我们知道基础设施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其具有非常大的乘数效应，可以促进繁荣。但仅靠基础设施也不行，而且不能仅仅把基础设施视为物理的基础设施。所以我非常赞同金行长之前所讲的，社会基础设施、技术密度比较强的基础设施非常重要，学校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物理基础设施了，而是可以通过 Wi-Fi，将学校的教育资源进行线上链接，让更多的人可以进行远程教育。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地方因为疫情，学生现在没办法去学校接受教育，所以必须考虑新的基础设施时代的到来，或者说新时代非常需要有新的基础设施。

因此，不能孤立地看待 ESG、技术与基础设施，而是应该将这些元素都嵌入到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全过程当中，我认为像新开发银行这样的机构是可以在这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因为我们不仅能够帮助构想计划和资源分享，还有一些解决方案可以提供交流。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帮助凝聚共识，帮助各个国家，包括那些大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聚集在一起，让大家能够在全球共同问题上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其实也就是新的多边主义。

开幕大会特别对话

■ 祝　宪 / 国际金融论坛（IFF）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新开发银行原副行长
金　墉 / 第12任世界银行行长
金立群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
马　可 / 新开发银行行长

祝宪：金墉、金立群、马可三位领导刚才都提到了多边主义，以及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怎样在应对气候变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解决贫穷和不平等问题上起到更加关键的作用。接下来，我建议三位能够聚焦一些具体的话题，谈谈三位所代表的机构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所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包括树立榜样，或者动员私有企业参与进来等等。

金墉：我认为过去 100 年来发生的最好事情就是多边主义，我深深地相信多边主义的力量。但是，从多边主义刚刚产生的时候，我们就面对着很多威胁和挑战。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假设，在美国大选之后我们会立即回到此前我们熟悉的多边主义的状态，就像 2003 年非典疫情爆发后，世界卫生组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做了很多非常出色的工作。美国大选结束之后，此前受到很大损害的多边主义并没有被立即扭转，仍然还有很多批评的声音。

我认为有必要反思和回顾 2016 年之前我们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相对来说，那个时候多边主义是有效的，世界各国进行着良好而有效的合作。当然，那时也有竞争、对立的情况，但大都是健康的。现在，多边主义在一些主要国家中遭受批评和质疑，这是我此前没能想到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反思，进行更多的对话和合作。不管是新开发银行、亚投行，还是世界银行，无论大家发展过程当中需要什么，我们都会给予人力、资金的支持，并力促进一步合作。我们不会因为是竞争对手就不给其提供帮助，因为我们现在真的需要多边开发银行能为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提供尽量多的资金支持。所有国家都希望从这些机构获得长期贷款，因为利率和成本相对较低，而且还会同时提供一些技术方面的支持，多边主义真的是非常好的事情。我们要认识到多边主义在过去一段时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损害，我们也需要采取一些果决的措施，尽快回到此前的状态。

我还想讲一下与疫情和基础设施相关的话题。我 1959 年出生在韩国，那时世界银行拒绝给韩国贷款，因为他们认为韩国——朝鲜半岛南部没有复苏的希望。后来，我读到了 1959-1961 年世界银行的相关文件，里面讲

到韩国太贫穷了，没有工业基础、没有发展前景，不会给韩国提供任何贷款。但韩国当时的经济复苏是令人惊叹的，后来中国的经济复苏也是史无前例的。我们需要交通、水、电和道路，现在又需要数字基础设施，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向教育和卫生进行投资，所以在那个时期我们在人力资源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投资。那些发展最快、最好的国家在卫生和教育方面的成果也是最显著的。我们究竟应该做哪些工作才能带来发展机会，才能让更多国家实现像韩国和中国那样的经济发展？

如果我们在社会基础设施上提供充分的投资，每个人都能够从中受益。多边机构能够为此提供很多的支持，紧迫的需求让多边主义机制能够更紧密地与私营部门进行合作。现在有这样的需求，需要多边机构游说、鼓励更多人加入和更深层次地参与。尽管现在我已经不在世界银行工作，但我仍然认为世界银行值得很高的期待。我十分赞赏金立群行长为亚投行这一全新多边银行的建立和发展所做的努力。目前，世界上还没有足够的多边开发银行，所以白手起家建立一个多边开发银行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就。同时，我们也要通过努力尽量修复多边主义，使之在未来继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祝宪：非常感谢金墉行长，在您的讲话中我们感受到了您对多边开发银行和多边主义抱有的热情。接下来请金立群行长发言，金立群行长已经引领亚投行 5 年了，获得了初步的成功。您对全球公共产品和服务在应对气候变化、不平等现象和疫情带来的全球挑战方面有什么看法？比如，不仅仅提供金融方面的支持，包括更好地鼓励私营部门参与应对挑战，以及提高全球对这些关键挑战的注意力等等。

金立群：我完全赞同金墉行长的观点，我一贯认为多边主义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多边主义旨在使不同国家形成紧密合作。世界银行有 180 多个成员国，亚投行现在有 104 个成员国，这些国家和经济体有着不同的政治体制。很显然，我们不应该讨论所谓文化之间的冲突，这是没有必要的。我们甚至也许不应该把它叫做冲突，但的确有一些差异。我们需要尝试、试错，这是非常重要的，什么事情可以现在做，什么事情现在做不了但未来可以做。每一个不同的多边银行都需要尝试、适应不同的情境，这是因为他们的成员国有着非常强的多元性。新冠肺炎疫情和在格拉斯哥举行的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让我们看到多边主义工作的重要性，同时我们现在取得的成功也是由多边主义带来的。

世界银行和亚投行都属于比较新兴的平台。在 21 世纪创造一个新事物的时候肯定有不同的地方，亚投行和世界银行集团都有不同。世界银行是在 70 多年前建立的，现在社会环境已经有很大变化，亚投行开展一些新业务时，已经不能再依赖布雷顿森林体系。并不是说你们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而是说当时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来源：联合国官网

来源：联合国官网

已无法反映当前的现实。我们彼此之间有着 70 年的历史差距，所以要尽可能看到世界银行最大的优势和现存机构最大的优势，取长补短。在过去的 6 年当中，世界银行集团与我们亚投行之间的合作，以及新开发银行与亚投行的合作也都非常顺利。有的时候，我们在同一个国家的存在感有所区别，可能世界银行不见得能够提供那么多的资源，至少不是成员国想要的资源，亚投行在这里就可以补足，我们有着大量成功的合作案例。此前我也跟金墉行长提到过这一点，你继续做你的指挥家，指挥这个巨大的交响乐团，给我一个乐手的位置就可以，我可以吹长笛、拉小提琴，都没有关系，给我一把椅子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合作共同演奏出优美的乐章。其实，所谓的竞争说是毫无根据的，我们需要合作。

与此同时，当我们讲到开发方式的时候，如何能够向发展投资、向人投资，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话题。举例来说，医疗、卫生非常重要，马可·特罗约也提到教育非常重要。前不久，我们有一个印度的教育项目获得了投资，在讨论投资协议时，从经验当中看到，在这方面有一个非常小的空间让我们能够从此前存在的教育体制转向西方的教育体制。新开发银行在这个时候受到很大的影响，当时他们产生这种困惑，应该做些什么才能够调整现有的机制。从这个经验当中我们学到了一些东西，所以现在我们的使命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我们要在有生产力的产业和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投资。有人会问我们，到底什么行业才是有生产力的？有生产力的产业意味着能够产出价值，4 年之后我们发现卫生医疗是我们必须要关注的一个领域，教育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行业。我并不是说普通的教育，而是说有新方式、新体系的，基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新教育。他们的目标应该是提供技能给年轻一代，使得他们能够适应这个新的时代，新的 IT 时代，新的人工智能时代。如果没有这些技能，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困难，很多年轻人没有办法适应这个新的市场。这个市场日渐取代人力的工作，用机器人来代替人，这是一个社会稳定的问题，对于很多国家来说，都是如此。我并不需要去提醒各位，当前的发展速度、变革速度，以及正在进行的零排放、低碳转型，对于那些传统的出口化石燃料的国家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如何帮助这些国家使他们经济变得更为多元？如何更好地教育青年人让他们能够在新的环境当中生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我也把这个看作是我们多边开发银行的职责之一。

祝宪：谢谢金行长，接下来请马可行长谈一下，在合作中如何展现新开发银行在提供服务方面的优势和吸引力，同时，在服务一些新的发展领域时可以起到什么样新颖的作用，以及在下一个阶段新开发银行将起到哪些更加重要的作用？

马可：就像刚才金墉行长讲到的多边主义的重要性，还有多边开发银行的重要性，我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形

势更加凸显了这种重要性。如果以前没有多边开发银行，现在我们就必须建立这样的多边开发银行，因为它是一种重要机制。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机制来解决目前缺少国际合作的问题，可以进一步推动共识的产生，同时也可以促进现有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源用于基础设施或者是其他发展所需要的领域，从而进一步改善人们的生活。此外，历史上原有的银行与新的开发性银行，比如新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间并没有冲突和竞争，越多的银行就越好，要考虑现在基础设施的需求，尤其是新兴世界的需求和现在可供使用的资源之间的差距。一些新的银行可以对几十年前建立的这些机构进行补充。

我想讲的第二点是现在或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如果想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重视新技能的培养，这也是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的一个重要领域。今天两位同事也已经强调了我们在探讨 ESG 的时候，大家非常关注“E”也就是环境，而没有过多关注社会和治理。我认为有一些多边的会议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到 1992 年，再到现在，包括刚结束的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大家都关注环境，这很正常，因为气候变化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鉴于目前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之下，我们需要有新的教育和新的人力资源培养，这需要很多的资源，我们不能够在传统的基础设施框架之下来思考。这是社会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多边开发银行可以做到的，否则今后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向清洁能源转型，我们也有更多的技术密集型的行动来促进 2.0 版本的经济发展，但是我们却没有人力资源。没有那些有着充足和适当技能的人力资源来弥补传统的经济和新的经济之间的差距，这就会有非常多的风险。有很多人会失业，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没有特殊的技能来发挥建设性作用，也不能够在 21 世纪新的经济体当中起到作用。所以物理基础设施和新的社会基础设施，包括技术密集型的基础设施的差距一定要弥合，这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的，需要在制定发展政策的时候考虑到这一点。

祝宪：谢谢马可行长，真的非常希望继续这样的探讨，感谢三位抽出宝贵的时间，并且感谢你们所做的非常具有价值的分享以及对本次会议的支持。我认为这个环节的讨论非常丰富，我们进行了思想的交流，国际金融论坛（IFF）会记录所有的分享。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有机会面对面地与大家就这些重要的发展议程进行交流。

上合组织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多边力量

■ 弗拉基米尔·伊玛莫维奇·诺罗夫 / 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

弗拉基米尔 · 伊玛莫维奇 · 诺罗夫

今年年会的主题非常适合当前所处的时代，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和社会出现了众多的挑战，而且也给下一步的国际贸易和全球金融市场发展带来了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气候变化、贫穷、失业、疫苗分配等问题，使当前的全球形势更加严峻，总体上导致了世界各国之间出现了缺少信任的危机。现在全球各国之间的关系和全球治理体系需要完善，现有的国际金融和贸易秩序、机制方面的改革进展缓慢，都使后疫情时代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重重挑战。再加上世界主要的经济体之间在克服疫情等挑战方面缺少合作，各国之间在货币政策方面也缺少协调，导致现在的形势非常严峻。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在考验上海合作组织这一模式的可行性，我们将 21 个国家、几乎占到了世界一半的人口团结在一起，在金融、贸易和经济合作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也推出共同项目，这些项目覆盖经济的方方面面。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但我们的成员秉持上合组织的团结精神，一直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渡难关，积极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根据 IMF 的预测，上合组织成员国的 GDP 平均将会有 5.3% 的增长，这是 2021 年年底可能实现的目标。

现在数字经济、电商以及信息通讯技术在社会经济各个领域的应用，对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很明显，数字技术会对金融服务市场产生巨大的影响，区块链技术现在已对整个金融行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开发也将推动新一轮金融行业的变革。

在这个背景之下，我想提醒大家关注中国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中国是上合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中国的发展促进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资本市场又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中国市场拥抱创新性技术，这也使得中国的证券更加值得投资。2020 年，彼得森机构研究显示，中国金融服务市场的规模约 47 万亿美元，中国进一步开放其金融体系，以更高质量进行开放，这将进一步吸引来自世界各地投资人的关注。2021 年中国吸收外资规模预计超过 1600 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 2.1 万亿美元。2020 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在世界排名第一，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的 20%，一直到 2030 年，这个趋势都不会有所变化。

2019 年 6 月，在亚信杜尚别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的发言，提到“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成为一个主要的平台，促进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同时也希望能够更好地帮助各上合成员国克服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经济复苏。中国将继续分享市场机遇，力争未来 5 年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实现累计贸易额 2.3 万亿美元的目标，这将是 2019 年中国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总额的近 10 倍。

未来要完成这一目标，需要进一步优化我们的贸易结构，促进贸易平衡。中国政府支持在青岛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这是 2018 年习近平主席在青岛峰会上提出的。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的建设有力促进了中国与上合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在这个建议基础之上，俄罗斯提出建立一个中程民用航空器项目，目前在进行规划和讨论，要由政府和私营部门共同

合作，中国和俄国、乌兹别克斯坦合作，共同生产制造 235 ~ 1200 架航空器。

我在广州访问过程中，尤其是参与这次 IFF 年会期间，我们也向广东省和广州市的领导建议，在广州建立一个工业合作中心，旨在为中国与上合成员国之间搭建一个平台。这是因为广东省尤其是广州市在工业发展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不仅仅是在中国，在上合组织区域也是如此。

乌兹别克斯坦将于 2021-2022 年担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乌兹别克斯坦提议希望能够进一步促进上合成员国之间的工业合作，并建议在他们的首府塔什干建立一个工业合作中心。我建议在广州或者在广东也同样设立一个中心，这将有利促进中国成为上合组织工业合作的主要枢纽。这样在“一带一路”倡议当中，广东省和广州市也能够继续发挥非常重要的枢纽作用，更好地去连接东南亚国家和东盟成员国。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案，能够帮助这些相关的国家应对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疫情期间网络安全受到了更多的威胁，这成为金融机构的主要风险之一，这里包括黑客的袭击，也包括对关键基础设施的袭击。到 2022 年，预计这个数字将会提升到 8 万亿美金的价值，到 2030 年，网络犯罪带来的损失，以及网络安全成本将达到 120 万亿美金。因此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需求，必须更好地在这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尤其是更好地促进和保障全球的信息安全。这需要使用多边的工作方式，更好地去阻止犯罪分子使用互联网进行犯罪活动。在这方面，需要进行更多的行动，进行更多的国际合作，共同打击国际犯罪，同时强化信息安全。

各位参会人员，上合组织将会继续致力于促进开放式经济发展，强化多边机制，对抗可持续发展进程中所面对的种种阻碍和困难。我预祝国际金融论坛（IFF）成为一个重要的平台，助力我们寻求创新的解决方案，帮助所有国家克服疫情的影响。

抵御气候变化风险，避免“气候宿命论”

■ 洛朗·法比尤斯 / IFF理事、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法国前总理、COP21主席

洛朗·法比尤斯

气候变化问题是我们面临的主要全球挑战之一，应对气候变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气候变化带来了跨学科和跨代际的国际问题，需要地区和国际层面的合作。

2015 年，我很荣幸地担任了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1 次缔约方大会（COP21）的主席，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缔约方会议。今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COP26）被大家期待为“行动的缔约方会议”。会议结束已经三周，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一方面格拉斯哥会议在几个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比如国家自主贡献（NDC）和长期目标，一些关于砍伐森林以及煤炭和汽车等方面的协议，承诺减少甲烷气体排放的缔约方计划（甲烷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更为显著）。

《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制定也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些进展相对来说是技术性的，但也非常重要，因为它完善了《巴黎协定》，对碳市场透明度和报告规则也都非常重要，是确保各方能够遵守承诺的关键。中国和美国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这份声明非常有用，但是如果欧盟能够加入的话，影响力可能会更大。

但另一方面，格拉斯哥 COP26 会议距离实现重要目标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融资目标尚未实现，12 年前在哥本哈根，发达国家承诺在 2020 年前每年筹集 1000 亿美元，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承担减缓气候变化的高昂成本，并为合作投入大量资金。这一承诺，连同补偿气候影响对这些国家造成的损失，是基于公正原则，按照受影响的严重程度制定的。事实上，尽管这一承诺多次得到确认，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实际履行。目前融资仍然低于 1000 亿美元，尽管最近各国又追加了承诺，但这令人失望，尤其是对非洲贫穷的国家而言。

相信大家还记得 2015 年《巴黎协定》制定的目标，缔约方承诺限制排放，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2℃以下，努力控制在 1.5℃以下，但这一承诺没有实现，这是一个巨大的遗憾，甚至是灾难。后果就在我们眼前：大火、干旱、大规模移民和许多灾难。最脆弱的人口和地区最先受到影响，这是我们所有人正在面临的情况，不是遥远的 30 年后，就是现在。这些挫折令人失望。

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我们要避免“气候宿命论”。展望未来，我们至少应该关注三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要重视接下来的缔约方大会，尤其是明年将在埃及举行的第 27 次缔约方大会（COP27）。该会议的优先事项是在今年 COP26 会议基础上更进一步，为格拉斯哥（COP26）会议的决议融资，以增强实现目标的信心。格拉斯哥会议是在之前目标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它规定各缔约方在明年提交已获批准的、更新了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在这一进程中，透明且准确的报告对评估这些承诺及其执行情况至关重要。我还想说的是，要重视明年春天将在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科学表明，对抗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昆

明会议的成功也将是应对气候问题的成功，考虑到生物多样性的复原力，这一点显得尤其重要。只要采取正确的行动，生态系统就有望在几年内迅速恢复，反过来也将加速推进我们的气候行动。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看，对环境问题的全面了解，不应仅局限于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偶然事件，而应关注其对我们日常生活带来的切实影响。

许多人想知道召开缔约方大会的方式是否仍然有效，显然这一方面还有待完善，但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缔约方大会体系旨在联合国的框架下，汇聚国家和非国家行为的力量，不仅仅是那些积极参与的，而是全球范围内的所有行为体。尽管它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这一体系的建立仍是十分必要的。

第二个目标是制定碳定价机制，这将起到决定性作用。限制排放所需的成本往往比温室气体排放成本还要高得多。碳定价是一个应对机制，该机制鼓励采取行动减少污染，以低廉的成本推动绿色创新。通过该机制，我们可以测量碳排放量，并推动消费者采取有利于气候的行动。国际金融论坛（IFF）与欧洲碳定价工作组的合作，对推进这一强大的减排工具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要使这些措施得到有效落实，转变思维模式和合作尤其重要。在各类解决方案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根据世界不同地区制定一个或几个不同的最低碳价门槛的想法十分有趣。社会和地区公平也是一个核心问题，法国所经历的“黄背心”运动说明，要想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采取强有力措施推动社会公正，并提供有关资金使用的信息。

第三个目标是要集全体之力。2015 年《巴黎协定》取得的历史性成功离不开三股力量的合力：即科学、社会与国家，这在今天仍然是行之有效的。“科学”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哪里存在风险。接下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计划于 2 月和 3 月发布的报告将为我们提供新的重要见解。科学发展以更低成本推动绿色技术研究，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技术创新，比如碳捕获和碳存储技术，不该成为碳减排进程的阻力。我们必须大力推动能源节约，促进经济实惠的可再生能源发展。

关于“社会”，即非政府组织、城市、地区、大学和许多企业等都采取了行动，这是一件好事。公众的气候意识也在逐渐加强，新一代的年轻人为我们指引了前进的方向。私人银行、开发银行，以及金融机构经常采取一些有效的绿色金融行动，包括投资绿色行动以及减少对高污染行业的投资，我们应该采取更多类似的具体措施。关于合作，许多合作项目近期也展现出了较高的志向，但我们也必须避免将绿色行动和绿色言论混为一谈。为避免这种混淆，必须定期进行精确、高度可信的评估。

“国家”是关键。许多国家加强了他们的气候承诺，这是好事，长期承诺至关重要，但只有当短期承诺和行动与其保持一致时，长期承诺才是可靠的。然而，部分国家目前仍然不愿意为之付出足够的努力。“如何做”与“做了多少”都很重要。为了促进气候行动、加强信任，多边主义措施是关键，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协调国际合作。国家主权、短期和长期需求，以及权利和义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坚持捍卫全球合作和国际对话。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巨大挑战，要求我们深化转型。这一进程的核心在于宏伟的目标、有效落实以及合作。IFF 全球年会为我们共同讨论这些挑战和确定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平台。

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努力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 李勇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总干事

李勇

我们的地球家园正处在关键时刻，这是一个成败攸关的时刻，我们现在采取的行动将决定留给后代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将继续对全球各国构成巨大挑战。欧洲确诊人数不断攀升、发展中国家疫苗分配不平等说明疫情远未结束。国际社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国际组织、企业、民间团体和学术界必须在“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战略”的基础上团结合作。

第二，不同国家为应对疫情危机而投入的资源水平再次暴露了国家之间巨大的财政差距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最近强调的那样，发达经济体正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近 28% 投资于经济复苏，而中等收入国家只投入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6.5%，最不发达国家的投入则不到 2%。国际合作和全球协调行动将在弥合差距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第三，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公约》，将气候变化认定为全球紧急情况。《公约》表明迄今为止人类活动已造成 1.1℃全球气温上升。这一形势令人震惊，全球所有区域都将深受影响。因此，加强全球行动迫在眉睫，包括需要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适应提供资金。调动额外资源方面，国际金融机构、开发银行在商业领域的作用对实现气候目标至关重要。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联合国其他机构、基金会和官署合作，随时准备与成员国一道应对气候挑战，因为这些挑战超越国界，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解决。《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明确反映了人类消除贫困、拯救地球和创造和平世界的共同愿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要加强动员，推动开展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行动十年”计划，用可持续的方式加速解决全球重大的挑战。

中国在推进《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自 2015 年通过可持续发展议程以来，中国一直是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坚定倡导者，中国在降低国内极端贫困发生率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同时，中国也在其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包括污染治理、资源效率、能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国际上总价值为 31 亿美元的南南合作基金，以及 400 亿美元的丝路基金都为发展中国家落实《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大力支持。这是发展中国家之间实现合作共赢的成功案例。习近平主席在第 76 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各项系统化的行动措施，推动实现更加强劲、更加绿色，以及更加健康的全球发展，建立全球发展共同体。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经验和专业技术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有着宝贵的借鉴意义，今天召开的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年会将有助于我们评估最佳实践，并在国际上进行推广。因此，我非常感谢主办方召开本次会议。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期待能与中国和其他成员国展开密切合作，同时我们将继续携手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以实现《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加强投资者保护，筑牢注册制改革之基

■ 王建军 /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王建军

近年来，中国证监会始终坚持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主席关于资本市场的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和国务院金融委的统一指挥下，坚持“建制度、不干预、零容忍”的方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持续推进以注册制改革为龙头的资本市场全面深化改革，努力构建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全球挑战下的可持续发展”。投资者是资本市场可持续发展之本。中国证监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投资者摆在最突出的位置，努力提升投资者的获得感和安全感。借此机会，我想围绕注册制下的投资者保护与大家做个交流。

加强投资者保护，是注册制改革的基础。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永恒的主题，没有投资者对市场的信任和信心，就没有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兴旺发达。注册制改革必须全面坚持“尊重注册制基本内涵、借鉴国际最佳实践、体现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特征”三个原则。从注册制基本内涵看，注册制改革以信息披露为核心，要求发行人以投资者需求为导向，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信息。在做好事前审核、把好入口关的同时，更加注重事中监管与事后查处，既要督促市场主体归位尽责，又要保障投资者依法行权、维权。从国际最佳实践看，境外市场注册制的实施都伴有一系列投资者保护制度和机制，如美国的集团诉讼、公平基金制度，香港的责令回购制度等，形成了对财务造假等资本市场“毒瘤”的有力震慑。从中国特色和发展阶段特征看，我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交易最活跃的投资者群体，目前已超过1.9 亿，其中 97% 为持股市值 50 万元以下的中小投资者。能否保护好广大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衡量注册制改革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标准。

加强投资者保护，是注册制改革的基础。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资本市场永恒的主题，没有投资者对市场的信任和信心，就没有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兴旺发达。

没有严格的投资者保护，就没有注册制改革的行稳致远。中国证监会积极探索建立健全适应注册制改革的投资者保护基础制度体系，推动资本市场法治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先后推动在新《证券法》中增设“投资者保护”专章、推动出台《刑法修正案（十一）》和《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的意见》等。特别是投资者保护机构参加的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重要基础性制度创新。2021 年 11 月 12 日，广州中院一审判决，康美药业及相关责任人赔偿 5.2 万名投资者 24.59 亿元，标志着我国资本市场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成功落地实施。

康美特别代表人诉讼案的判决具有重大标志性意义。社会各方一致认为，这是落实新《证券法》和《关于依法从严打击证券违法活动意见》的开创性举措，是我国资本市场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事件。一是宣告了欺诈发行违法成本过低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弥补了我国证券民事赔偿救济乏力的基础制度短板，与行政、刑事责任机制形成立体化的制度合力，大幅提高了违法成本，为全面推行注册制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二是昭示了对上市公司、中介机构的责任追究是动真招的。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及其责任人员要汲取教训、规范经营、提升质量，给投资者一个真实、透明、合规的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要坚定地站在投资者一边，各司其职、勤勉尽责，充分发挥“看门人”的作用，不断提升资本市场诚信水平。三是彰显了监管的人民性，彰显了我们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是严肃的、认真的。通过公益机构代表、专业力量支持以及诉讼费用减免等制度，破解了中小投资者起诉难、维权贵的困境，大幅降低维权成本，帮助投资者公平、高效获赔，也是妥善快速化解群体性纠纷、提升市场治理效能的有益探索。

康美案也引发市场各方对独立董事制度的讨论。针对判决独立董事承担 5% 或 10% 的连带赔偿责任，有意见认为，这一判决对净化独立董事执业环境、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具有重大意义，将促进独立董事更加勤勉尽责，实现优胜劣汰。也有意见提出，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虚假陈述承担连带责任，存在收入与责任不匹配、独立董事“不独不懂”等问题，建议完善相关制度安排。对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应全面、客观看待。上市公司董事会主要是负责公司经营战略等重大事项。上市公司设独立董事是《公司法》规定的治理要求。自 2001 年中国证监会发布《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来，独立董事已成为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促进规范运作、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的重要一环，大部分独立董事都能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对提升公司治理效能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成为上市公司治理区别于非上市公司的显著标志。对市场各方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的意见建议，中国证监会高度重视，已组织专门力量进行研究，将充分倾听各方意见，与相关部门积极沟通、推动系统完善，进一步明晰独立董事权责边界，加强履职保障、完善责任机制，支持和督促独立董事切实履行诚信勤勉义务，努力形成各方归位尽责、市场约束有效的制度环境和良好生态。

下一步，中国证监会将深入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坚持敬畏市场、敬畏法治、敬畏专业、敬畏风险、发挥合力的监管理念，把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作为监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积极推进代表人诉讼常态化，不断完善适当性管理、公开征集股东权利、纠纷在线诉调对接等各项投资者保护制度，切实增强投资者的获得感和安全感，为全面推行注册制改革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努力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

世界经济新形势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 43
阿尔米达·阿里沙赫巴纳：携手推进亚太地区经济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 45
吉塔·戈皮纳特：经济复苏的下行风险与应对策略

哈萨克斯坦前副总理、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主席 47
凯拉特·克林贝托夫：有关全球经济复苏的几个要点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前主席 48
吉姆·奥尼尔勋爵：加强合作，应对挑战

世界经济新形势学术讨论 50

携手推进亚太地区经济发展

■ 阿尔米达·阿里沙赫巴纳 /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

两年以来，我们的世界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坏性经济危机。除了新冠肺炎疫情外，亚太地区还持续遭受着因气候变化而加剧的自然灾害的威胁。这些灾难让我们认识到在经济危机和非经济危机面前，我们是多么脆弱。

2020 年亚太地区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收缩了约 0.6%，这是几十年来该地区最糟糕的经济表现。尽管今年该地区预期将恢复经济增长 6.7%，但各国的复苏情况并不均衡。根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简称亚太经社会）的数据估计，该地区有 8900 万人可能重新陷入极端贫困之中。由于疫情对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造成伤害更大，以及获得新冠疫苗的机会不均等，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已经十分严重且仍在不断加剧的经济不平等。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建设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亚太经社会在《2021 年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和社会概览》（Economic and Social Survey of Asia and Pacific 2021）中提出了一揽子计划，旨在提供普遍的社会服务，缩小数字鸿沟以及加强气候和清洁能源行动。据我们估计，这些一揽子计划可以帮助该地区减少近 1.8 亿的贫困人口，减少约 30% 的碳排放，并促进该地区的发展。从长远来看，有希望提高该地区经济增长 10% 以上。然而，鉴于这些计划的高成本和政府收入的萎缩，实施这些计划可能会破坏该地区一些发展中国家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

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情况是，融资逐渐远离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融资方向。而融资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履行《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所必需的。亚太国家还应进一步强化自己的财政政策，以期尽快克服不断延迟的经济复苏，并带来长期的繁荣。

从长期来看，很有可能会严重地影响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和达成，这要求政府必须要执行强有力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遏制和调整非发展性支出，进行税收改革，向直接累进税、财富税和财产税倾斜，

阿尔米达·阿里沙赫巴纳

提高公共债务的效率，以及使用创新的债券工具，如离岸公共债券。其他有效的方法还包括绿色债券、债务转换促进发展，这些方法特别有价值，因为它们不仅可以提供额外的融资，而且还可以直接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联合国秘书长强调，有必要制定一项战略计划，使更多的国际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联合国秘书长的建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发行的 6500 亿美元特别提款权。问题是这类资金支持很多流向了并不亟需的国家，因为国家配额分配是由发达国家主导

的。因此，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将未使用的特别提款权，大量重新分配给有实际需要的脆弱国家，包括中等收入国家。

二是继续暂停债务和实际减免债务。有必要将 20 国集团（G20）的“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DSSI）延长到 2022 年。此外，DSSI 应该扩展到低收入国家和政府双边债务之外，并考虑减少债务存量的方案。在这方面，全球经济委员会宣布的“债务处理共同框架”在某些方面超越了 G20 的 DSSI，因为它允许实际的债务减免。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些倡议是不够的，因为有许多不符合“低收入”条件而受疫情冲击严重的国家，没有资格获得援助。

为了支持这些建议的实施，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债务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建议设立一个主权债务论坛，让不同的债权人、债务人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尽早参与其中。应根据及时、有序、有效和公平的解决原则分担责任，恢复公共债务的可持续性，以提高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作为既不是债务人也不是债权人的开放、包容性平台，亚太经社会等区域经济委员会可以支持成员国之间的讨论，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这场疫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让我们有机会重新审视、思考我们的政策和战略，并将财政和金融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相结合，这将给未来带来巨大的红利。

经济复苏的下行风险与应对策略

■ 吉塔·戈皮纳特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

吉塔·戈皮纳特

2021 年全球复苏仍在继续，但面临的阻力越来越大，一些严重的断层依然存在。10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 2021 年全球经济增长 5.9%，2022 年全球经济增长 4.9%。总体而言，我们看到了下行的风险。

世界各国复苏的差异在这个中间图表中可以看到。如果把发达经济体作为一个群体来看，也就是蓝线显示的，你会看到一个非常快速恢复到疫情前的趋势。然而，对于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我们看到中期会有明显的发展迟缓，这意味着他们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增长预期，甚至到 2024、2025 年也无法达成这一点，所以差异非常明显，正如我所说，风险总体上是下行的。

在全球复苏的进程中有各种变量，如出现危害更大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阻碍复苏。最近，在南非检测到新冠病毒的新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各国在积极应对疫情风险外，也在努力应对另一个重要风险——通货膨胀。如果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情况持续下去，通胀的风险将持续更长时间。但是，现在最紧迫的任务首先是加快推进全球的疫苗接种，其次是校准、完善政策措施。各国的复苏速度不同，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包括健康、经济条件，以及政策空间等也不同。所以，应该根据各国具体国情来制定政策措施。中央银行如果看到通货膨胀锚定的实际风险，应该迅速采取行动。而各国需要在数字、教育、气候等领域进行长期投资。

一直以来，经济发展前景由于疫情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前几天奥密克戎新毒株的出现，使疫情的不确定性急剧上升。从全球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数字上看，目前处在整体确诊病例上升的阶段。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接种疫苗。好消息是，虽然确诊病例数在上升，并保持高位，但是住院率在下降，尤其是在疫苗接种率比较高的地区。现在众所周知的问题是疫苗接种鸿沟，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富裕国家，当然还有几个新兴市场的疫苗覆盖率很高，而且正在努力推进疫苗的全员接种。但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疫苗接种率依然非常低，而这将给全球复苏带来问题。

关于疫苗的有效性，在所有年龄组中，疫苗能有效降低住院率和死亡率，但是有迹象表明疫苗对老年人的功效有所减弱，特别是在接种第二针剂疫苗 6 ~ 9 个月之后。 所以，各国在推进疫苗加强针剂的注射，并普及到所有成年人。而奥密克戎新毒株的出现，又对世界上的疫苗公平性提出了进一步挑战。

最近看到另一个主要趋势，就是供需不匹配问题。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最近几个月运输成本急剧上升，货物交付延迟频繁发生，特别是运往美国和欧洲的货物。

设备短缺的情况依然存在。供需不匹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一开始主要是因为需求比较高，但是现在主要是因为供给侧受到疫情冲击而导致的。因此，疫情和供应链中断重叠正在对经济前景造成影响。特别是在制造业生产方面。服务业的情况更加复杂，但仍然可以看到疫情对其发展的抑制，特别是国际出行仍然受到严重打击。

另外，在过去一个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通胀率的上升，发达经济体及一些新兴市场，通胀上升明显，这主要是因为燃油价格和食品价格的上涨，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核心通胀也在上升，虽然核心通胀在很多地方是不一样的，它在美国上涨得非常严重，超过了其他发达国家。

中国通胀目前依然不高，这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因素。一个是需求非常强劲。这个需求强劲是因为大量的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支持而导致的，同时也反映了需求已经从服务的需求转变为对物品的需求。几乎所有国家，商品的通胀超过了服务的通胀，这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一般来讲是相反的。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对物品的需求加上供给侧受到冲击。此外，食品和粮食价格上涨也是原因之一。非常遗憾，低收入国家本来就没有粮食安全，现在食品价格进一步上涨，更使这些国家的粮食安全雪上加霜。

接下来讲讲美国的通胀。美国的通胀在 10 月份上涨速度又进一步加快，非常令人吃惊。另外，现在美国的通胀已经不仅仅是在某些领域，而是非常广泛的现象。目前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是工资也在上涨，尤其在休闲和接待这个领域。其他的商业服务、专业服务还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依然可以看到工资的压力。

美国目前的经济是这样子：经济复苏非常强劲，几乎接近疫情前的水平；劳动力市场比较紧张；通胀严重而且范围比较广泛。预计今后一段时期内，通胀还会保持上涨，当然在接下来的几年通胀会慢慢下降。比如通过采取一些中长期的抑制通胀的措施，用 5 ~ 10 年的时间降下来，哪怕是美国现在这样高的通胀率程度也没有太大问题的。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权衡，就是有一些国家通胀超过了预期，但同时它们的 GDP 却没有完全恢复。目前全球有 1/4 的国家通胀超过了目标水平，但是这些国家的 GDP 却恢复得不太好。非常重要的是，这样的情况主要出现在新兴市场。不仅货币政策，还有财政政策，在新兴国家现在很多宽松的政策将要退出。

我们再看一下政策的重点，首先就是要保持较高的疫苗接种率。今年年底疫苗接种的覆盖范围会怎样？目前有些地方的疫苗接种率低于 40%，而大部分的这些国家都是在非洲。我们需要不遗余力解决这个问题，尽可能快地扩大疫苗的覆盖率，而这就要求 2021 年底达到 15 亿剂疫苗的目标。

第二个政策重点就是应对通胀和通胀带来的恐慌，在明年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政策决策者要非常谨慎，一定要关注未来几个月供需之间的平衡。在美国和英国，通胀有可能会进一步上涨，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会进一步收紧，这有可能对新兴市场产生负面影响，尤其是对那些容易受到外汇借贷影响的国家。

最后一点，非常有必要投资气候行动，这也是另外一个当前需要面对的非常紧迫的危机。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现在已经实现了很多成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COP26）大会上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还需要做更多努力。

虽然现在全球经济在复苏，但依然很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新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毒株带来了不确定性，在未来几个星期我们将会更清楚地知道这个新的变异毒株到底会不会对经济复苏产生严重的影响。

通过接种疫苗和核酸检测，世界是有能力应对疫情的，起码可以比去年做得更好。需要强调的是全球应作为一个共同体携手努力，要让世界各地都能够接种疫苗。现在每个国家复苏的速度不一样，有些国家复苏非常快，有些国家复苏比较慢。原油和食品价格的上涨助推了通胀，现在很多国家都出现了通胀的压力。但是具体到每个国家情况是不一样的，像美国等一些国家通胀的范围比较广泛，这也意味着货币政策必须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制定。

根据国家具体情况制定政策是十分必要的，而且要保证财政货币政策的公信力，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在当前复苏还不是特别稳定的情况下，还要保持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各国央行也需要在政策方面保持沟通，要向其他国家的央行解释自己的政策，不然会导致市场的恐慌。总体来讲现在世界经济充满了不确定性。

我们正在经历，而且已经经历了两年的危机。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复苏已经开始，而且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而且有很多科学发现正在帮助我们应对这场疫情，所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经济还是可以复苏的。

有关全球经济复苏的几个要点

■ 凯拉特·克林贝托夫 / 哈萨克斯坦前副总理、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主席

近年来在谈论经济和政策趋势时，气候变化议程是绕不开的话题。在我看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 26）是全球决策者们经历的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各国不仅承诺了具体的绩效目标，而且整个气候变化议程已经从相对小众的环保主义者所关注的话题上升到国家和企业战略的核心地位。

很明显，我们在设计社会经济政策时必须考虑气候变化议程以及更广泛的 ESG 原则。但是首先，国家自主贡献（NDCs）远非一个完善的机制。它没有防止“搭便车”，而且对于不同国家可能缺乏公平性。第二，它缺乏公平性还因为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经济结构。更发达的经济体已经成功进入后工业阶段，而新兴市场需要获得稳定、负担得起的能源来发展其他产业。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解决这种异质性，这需要集体行动和超国家政策。例如欧盟的“Fit for 55”一揽子计划或“绿色新政(New Green Deal）”等，但全球层面能否进行类似的合作仍是未知数。

基于上述考虑，我想谈一下日益加重的全球和地方不平等问题。不平等现象在疫情发生前已经逐渐增加，而疫情和封城加剧了这一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抗击疫情方面的能力存在差异，体现在疫苗接种率和获得疫苗的机会，获得技术的机会，包括从高速宽带到在线教育、远程医疗和远程办公等技术，还有财政空间和借贷成本——所有这些方面都有利于发达国家。虽然去年几乎所有经济体都陷入了衰退，但在资本市场上，大型科技公司表现异常出色，奢侈品行业也超常发挥。自 2020 年 3 月以来，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 Moet Chandon）股价上涨 120%，特斯拉（Tesla）股价可以说飞上火星。

因此我认为，在 2022 年，各国将继续实施其国家战略。在哈萨克斯坦，我们有足够的财政空间在封城期间支持人民的生活。现在，我们希望将工作重点放在包容性增长上。政府工作已经从各行业各自为战的方式转向重点完成十大国家项目。我们还面临通货膨胀加剧的挑战，但是随着总统直属最高改革委员会的成立，我们努力在最高层面上建立起金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一致性。我们正在制定新版《社会法典》，以解决日益严重的不平等问题，并弥合疫情造成的教育和医疗差距。

凯拉特·克林贝托夫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总的来说，我相信哈萨克斯坦有足够的资源来实施这些政策。尽管如此，我还是被全球范围内缺乏协调性所困扰。在过去的 18 个到 20 个月里，我参加了许多场网络研讨会，听到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就在本周三，我听了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国际发展中心里卡多 • 豪斯曼教授主持的一场对话会，他批评多边机构和开发银行的现状，认为它们没有为新兴市场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与 IMF 在上次危机中救助欧洲国家的措施形成反差），这实际上增强了较贫穷国家财政政策的顺周期性。

我无法立即给出答案，但是答案应该来自区域组织和多边银行，它们可能需要资金重组。

最后，我想说更重要的一点是：连通性，包括硬基础设施、数字基础设施、软基础设施的连通性。在国际层面上，至少我们可以搭建桥梁，以保持我们之间的互联互通并支持供应链。

加强合作，应对挑战

■ 吉姆·奥尼尔勋爵 /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前主席

吉姆·奥尼尔勋爵

我想再次强调，美国、欧盟和中国是推动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三个重要引擎。这些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必须持续加强国际政策合作，以更好地应对上述问题。

毋庸置疑的是，近两年来我们可谓是见证了人生中最为戏剧化的事件。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其严重程度至少是三倍于 2008-2009 年的金融危机。这是令人感到非常震惊的。健康危机居然可以对经济造成如此毁灭性的影响，使原本就存在的各种问题雪上加霜。未来，我们需要确保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具体来说，展望 2022 年和更久远的未来，我们是否有充分的信心，确保不再发生突如其来的健康危机？以前，很多西方国家都乐观地判断，认为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但是就在我发言的这个时刻，欧洲很多国家仍然正在经历新冠肺炎感染率的又一波上升。接下来我想重点探讨三个紧密相关的领域。

首先是全球复苏，近期有大量的证据显示，世界经济已经出现了众多经济学家形容的“V”形经济复苏。众所周知，2020 年经济活动大幅减少，中国首当其冲。然后全球许多国家也受到影响，众多新兴经济体遭到重创，也包括一些西方国家。比如我所在的英国。但随着 2020 年结束和 2021 年过半，全球经济显著复苏。事实上大多数经济体目前的经济水平高于疫情爆发前的水平。当然这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即使在我自己的国家——英国也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水平。

随着新一年的到来，经济复苏的步伐将有所放缓，因为我们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其中之一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确地知道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支持，在推动经济复苏方面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又或者说，经济复苏是否更多地依赖于人们所说的“动物精神”，尤其是在旅行限制逐渐放宽的情况下。坦白地讲，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等到推出部分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全球各地区能够各担其责、共同缓解疫情的时候。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经济规模，在这里，我想再次强调，美国、欧盟和中国是推动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推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三个重要引擎。这些不确定性要求我们必须持续加强国际政策合作，以更好地应对上述问题。

虽然上述问题已经够棘手了，但是我还要指出第二个问题，那就是通货膨胀带来的挑战。通胀是我们从去年到今年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今年所剩的时间已越来越少，这一年即将结束，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世界上许多地区都存在着通胀的压力。没有人能确定这种通胀压力是暂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可以理解的是很多政策制定者似乎希望并且相信通胀是暂时性的，但是他们没有什么把握。坦率地讲，他们也不能断定通胀是暂时的，除非他们在货币和财政政策方面做出一些关键决策，但目前一切都不好说。因此我们只能观察这些行动带来的后果，观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至关重要的是，这需要谨慎的国际政策协调，以确保任何政策的改变不会产生超出激励目的的不良后果。

除了我所说的这种周期性的影响以外，还存在着非常重大的战略结构性挑战，比如说气候变化问题、未来全球健康疾病预防问题，很多问题都跟国际安全和贸易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强国际政策协调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就在此次年会前一周，恰逢金砖国家的概念提出 20 周年。 20 年前提出此概念，它代表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崛起。回首过去 20 年，世界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包括 G20 机制的发展，它能够合力解决金融危机，同时将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纳入全球决策意志。与此同时，金融稳定理事会不断地发展，新兴经济体在 IMF 和世界银行的份额和投票权也在增加。当时我认为这是全球治理永久改善的开始，但很遗憾十一二年后的今天，回望过去，当初的乐观局面非常的短暂。正如我们所见，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明晰的、令人满意的政策协调。

随着意大利将 G20 轮值主席的职位交给印度尼西亚，尽管各国在价值观、思想和文化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我们希望所有的 G20 成员都能够展现更强的合作精神，应对各种问题，不管是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协调，还是气候变化，抑或是更好地管理新冠疫苗的分配，乃至未来应对不可避免的健康挑战，希望能够交出远远超过这次危机应对的更好答卷。

这是我对国际金融论坛（IFF）和所有与会嘉宾的恳切期望，这是我们出席这次年会的关键意义，我们要努力地向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传递这一信息。

世界经济新形势学术讨论

主持人：王　冠，CGTN《全球财经》主持人
嘉　宾：凯拉特·克林贝托夫，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主席、哈萨克斯坦前副总理
迈赫迈特·希姆谢克，IFF理事、土耳其前副总理
史蒂芬·格罗夫，IFF理事、沙特国家发展基金首席执行官
彭文生，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王冠：目前全球复苏状况是什么样的？2022 年的前进方向是什么？我们如何去平衡短期和长期的政策挑战？您觉得在 2022 年全球经济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我们的讨论从希姆谢克副总理开始，您觉得 2022 年全球经济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迈赫迈特·希姆谢克：我认为短期来看最大的挑战是确保央行不要落后于通胀曲线太多做出决策，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美国的央行并不仅仅只为美国设定利率，对于其他很多国家和经济体也有重大的影响，这里面的风险就是如果央行的决策比通胀曲线的发展滞后太多，很有可能调整的措施、收紧的措施就会变得太快、太紧张。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措施是没有办法长期延续的。在我看来，这是短期内最大的一个挑战。

除此之外，是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发展的挑战。除非我们能够携手合作来达成更合理的、更平等的全球疫苗的分配，尤其是在那些发展中国家和那些明显处于贫困的国家，否则很难摆脱疫情的威胁。我们无法忽视新的变异病毒株对疫苗有效性的挑战，疫情持续的时间有可能继续延长下去，这会给所有经济体的经济复苏都带来影响。

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要去封锁经济，然后再重新打开经济之门，实际上是要付出很大成本的，为了避免付出这一成本，就必须要去分享、要去合作、要协调我们的努力。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在这方面其实并没有做得很好。

发达国家的疫苗接种率现在已经超过 70%，而相对贫困的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的还不到 5% 的接种率。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个地球大家庭中，都在地球村中生活，所以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此前并没有一本规则可以让我们遵循去按部就班地应对疫情，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在这方面其实做得还是不错的。在突如其来的疫情和经济萧条面前，他们做得还是很好的，复苏相对来说虽然不平衡，但仍然是比较可观的，这其中的挑战就是需要确保能够延续这种复苏。

风险就是如果不控制通胀，如果不进行疫苗的分享，如果不能够保证其他国家更好地获得疫苗，疫情后的复苏可能会像金融危机之后的那种比较疲软的复苏，这也是现在的一个风险。

王冠：我们肯定不希望出现金融危机后“疲软的十年”，因为这导致了所谓的“失去的一代”，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将会失去机会，非常感谢您！通胀确实是您关注的，而且疫苗鸿沟也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 IMF 的代表也提到过这点，您也讲到了这点，希望我们能够探讨一下如何弥补全球的疫苗鸿沟，因为早些时候我也讲到，确实非常令人心碎，看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有这么大的疫苗鸿沟。

史蒂芬·格罗夫先生，您觉得 2022 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以及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些挑战？

史蒂芬·格罗夫：全球的合作，包括在经济复苏方面的合作，或者是疫苗分配方面的合作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想稍微多地解释一下，如何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思考疫情及其造成的影响，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在持续，虽然现在的速度稍微有所放缓，但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才是真正面临着严峻挑战。

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贫穷现象因疫情变得更加严重，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大概有 1 ~ 1.1 亿的人口预计会因为疫情再次陷入贫困，这非常令人揪心。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怎样做才能够真正地实现复苏？首先要思考一下，到底有哪些改革能够促进中长期的经济增长、结构性的改革，以及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治理的透明、金融的包容等等，这些都非常关键。还有税收方面的问题，其实这些国家是通过税收以及发达国家的援助来促进其经济发展的，因而税收非常重要，提高开支的效率也非常关键。另外，促进私有企业投资，也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必须要进行这些改革，即使没有疫情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很困难，现在加上疫情，更是难上加难，因而发展中国家需要进一步加大努力。

在疫情的背景之下，发达国家主要关注本国的复苏和给本国老百姓提供疫苗，我也理解这点。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新变异毒株的出现正是因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缺少疫苗而导致的。所以如果再不关注如何保证新兴市场的复苏，那么不仅仅会出现疫情相关的挑战，一些经济方面的挑战也会出现。所以发达国家需进一步加大努力，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和资源的支持力度，这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

另外，还要考虑一下财政政策在卫生方面的开支。在当前这个时代，货币政策、金融市场的政策，以及结构性改革，这些都非常重要，可以保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能够继续应对疫情这场暴风雨，并最终走出疫情，避免造成太长久的伤害和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接下来的挑战。

王冠：非常感谢史蒂芬·格罗夫先生，我想快速地补充一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新冠肺炎方面已经花了很多钱，所以他们都有预算方面的赤字，您觉得他们现在还能够进行您刚才提到的那些结构性的挑战吗？

史蒂芬·格罗夫：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确实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所以我刚才强调了发达国家有必要加大努力，需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其他渠道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持，我认为不能将所有的责任都由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来承担，我们都有共同的责任，来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走出疫情。

这不是短期的卫生方面的问题，这是长期的经济问题。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因为这次疫情，这些国家今后可能会有一些长期的变化，进而会对全球产生影响，甚至会导致全球经济体系出现一些弱点，并在未来产生进一步的风险。所以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应该通过 IMF、通过特别提款权等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快走出疫情并在之后进一步增强其经济韧性。

王冠：是的，我们已经看到了经济复苏方面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这会产生长期的影响。彭先生，我想请您展望一下接下来全球经济的情况。

彭文生：在我看来，2022 年最大的风险依然是供给侧的问题，还有通胀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应注意这次疫情导致的经济波动性或者周期性，不同于一般的商业周期。一般的商业周期所展现的经济下滑或波动是需求侧的问题，但是这次的问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供给侧的问题。每年都会有很多供给侧的问题，但是这次情况不一样，这次是全球同步的供给侧问题。所以这是此次的商业周期和之前的商业周期一个关键的差别。

除了之前嘉宾提到的供应链问题，我们也可以看到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在有些地方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劳动力短缺现象，所有这些问题导致了对供给侧的冲击，这种供给侧冲击是当前这个周期的特点，它并不是长线的，可能很多年才会出现一次。

第二点是关于需求侧的，有这么多的货币、财政

刺激政策出台，尤其在美国。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元是全球经济的储备货币。去年美国的 M2 增长了 25%，最新的数据显示， M2 又增长 10% 以上，这远高于正常的增长水平。按照我们的分析，美国 M2 增长主要是因为财政的刺激政策和美联储国债购买计划，也就是量化宽松政策加上财政政策的刺激，导致了财政赤字的上涨，而这将直接对消费者需求和通胀产生影响。

根据历史经验，大概需要八个月的时间，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影响才能够充分地在 CPI 上得到体现。在我看来，美国的通胀估计在 2023 年之前都会保持较高的水平，这对美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美国的通胀在上涨，美国的货币供给在扩大，可是美元却在升值。美元作为全球的储备货币，最近在升值，这实际上也是将美国的货币宽松以及通胀传导到其他国家。美联储怎么样来应对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还有一点，中国和美国有所不同，在美国，控制疫情方面做得不太好，所以美国的供给侧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是美国政府在支持私有企业以及私有需求方面做得很好，所以美国经济出现了通胀；而中国政府在防控疫情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中国的供给侧受到的影响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因为中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没有像美国的那么强劲，所以在中国面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即经济的增长在下降，需求在下降，所以对中国来讲，明年面临挑战是如何放松宏观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去支持中国的国内市场。

最后再讲一点，假设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原因，疫情突然在 2022 年不再是一个问题了，我们回到疫情前的正常生活，到那个时候，通胀还会不会是个问题呢？有些人说供给侧的振动不再会有了，通胀也就不会有了，我并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如果疫情不再是个问题，就将会看到一个同步发生的资本支出、投资的增长，而在疫情期间由于不确定性，这种投资在过去一两年当中是受到压制的。如果疫情不再存在，将会看到全球在资本支出方面的一个巨大提升，长期看来也许它会提高供给，但短期它会刺激需求，尤其是在原材料和大宗商品方面，所以明年不管疫情的状况是怎么样，对全球经济来说，通胀仍然还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王冠：非常感谢彭博士，我觉得您讲到的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我读到所有的报告都说一旦供给侧的压力减小之后，通胀就会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平，但是您说即使回到疫情前的正常化，通胀也还会继续增长，我认为也非常有道理。如果按您所说美国的通胀一直保持高水平到 2023 年，那您觉得通胀会不会造成美国中短期动荡？

彭文生：正常情况之下，也就是情况都很稳定的时候，会从现在的状态预期未来的发展，所有的市场价格，包括股票的价格、不动产的价格、国债的价格都会有比较可靠的指标，或者说预期值可能是有用的，是可以去参考的。但是如果目前的情况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在经济当中就会有不断变化的框架，在这种情况下通常会让大家不要太重视这些所谓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预期，因为现在的环境之下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因此预期值变得非常的不可靠。

去年的下半年，我们开始讨论美国的通胀风险。那时，我跟我的客户们讨论这件事，很多人都不相信会通胀。他们都说经济发展得又不快，复苏得也不快，怎么会有通胀呢？我们不用去考虑这件事情。在今年早些的时候，在我仍然不断强调通胀风险的时候，人们说好吧，有一点通胀，但它背后是有原因的，它是暂时的，它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但现在呢？人们开始说可能不是暂时性的了，就是因为疫情的原因，疫情没有了之后通胀也就会没有了，我对此感到非常地怀疑。

总而言之，在这种环境之下，所谓的经济未来发展的预期，不管它是基于市场的价格，还是基于什么，都是不可靠的。

王冠：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想再问一下彭博士，您刚才讲到供给侧的冲击，您觉得这种供给侧的冲击到 2022 年会有所减缓吗？现在出现了新的变异毒株，那么供给侧的局限性在明年下半年或者上半年会有一些缓和吗？

彭文生：如果讲财政，在某些地方可能会看到一些宽松的状况，但是需要记住一点，有一些中长期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在未来很多年都会发挥作用。其中一个就是人口结构，在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中都出现了人口的老龄化；另外一个就是绿色转型，绿色转型是全球为了尽量降低碳排放的努力，这在中短期将会使生产成本提高，在全球经济当中都是如此；还有一点是供给侧的冲击和影响，这次疫情让人们重新思考效率与韧性之间的平衡，我觉得可能还会有这方面重整的努力，在全球供应链方面会出现新的重整。

我的观点是供给侧的压力和缺憾会继续延续下去，在未来很多年当中都会如此，尽管可能会有一些短期的或暂时的缓和，也许在明年会看到这种暂时的缓和。

王冠：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回答。彭博士的见解的确非常引人深思。我们知道除非将疫苗的接种率提升以应对目前公共卫生方面的危机，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因为一个地方有疫情就等于全球都有疫情，除了提供更多的疫苗给不太发达的国家，到底还能做些什么才能够真正弥合疫苗的鸿沟呢？

迈赫迈特·希姆谢克：在这方面我们正在做一些努力，举例来说，G20 在支持全球的 COVAX 计划，投入 100 亿美元，希望能够带来 6 亿剂捐助疫苗。现在的问题在于，第一，G20 必须要信守承诺。第二，现在的情况是发达国家不仅在囤积疫苗，而且有 1 亿剂疫苗很快就要过期失效了。必须要意识到我们彼此之间的联系紧密，所有的事情彼此依存度非常高，政策并不仅仅是贸易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人与人之间通过出行互相联系。因此，除非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平等的疫苗获取机会，否则难以摆脱疫情。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种疫苗，其中很大一部分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的手中，需要找到一种最安全的方式，给疫苗的生产商提供财政方面的支持。在这方面中国做得非常好，并不是因为本次会议在中国举行，我就赞赏中方，事实是中国正在努力使包括土耳其在内的更多发展中国家，能够获得疫苗。中国在供应疫苗方面也做得很好，而且价格非常合理。所以目前到了这样一个时刻，疫苗的生产应该可以很容易提升产量，不需要去囤积疫苗，这样我们才能够让每一剂疫苗都派上用场，而不会让它们被浪费掉。

在未来，透明度将非常重要，因为疫苗的生产商通常喜欢签订双边协议，如果有一个框架，在框架中能够保证透明的进程，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分配的方案也将更平等、更透明。另外，经费也非常关键，从投资回报率来讲这也将会是最好的一项投资。在 IMF 和世界银行所做的咨询报告中讲到，向疫苗投资 500 亿美元，如果投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当中，可以节约 9 万亿美元，这是一个极大、极丰厚的回报。此外《经济学人》的经济信息报告中也提到，如果没有达成疫苗接种的目标，截至 2025 年，其代价可能是 2.3 万亿美元的损失。持续在疫情上包括防疫、疫苗上投资，其回报是非常丰厚的。让所有人都能够接种到疫苗，这将是我们人类能够做得最好的一项投资。

王冠：好的，您说的很对，中国在抗疫方面正努力发挥自己的作用，中国也是疫苗最大的提供国，习近平主席也宣布要将另外的 10 亿剂疫苗提供给非洲国家，通过这样一些支持，现在非洲疫苗的接种率已经提升到 6%。有一个问题，您觉得本地化疫苗生产有什么样的前景？要进行疫苗本地生产，目前这种情况不管在物流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有没有一个好的环境？

迈赫迈特·希姆谢克：这当然是可以做到的。有一些中国企业已经在进行土耳其本地化疫苗生产的探索，这是令人感到鼓舞的。西方的药企要么是上市企业，要么是私营企业，他们可能要对自己的股价负责，这是可以理解的。

疫苗不是一个普通的产品，它是必需品，有它人类才能恢复正常生活，才有可能避免使用高成本的防疫封锁措施。疫苗本地生产对于未来的供应链和通胀也会有极大的影响，这也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

我不想转移话题，但是现在有超过 30 个国家的通胀已非常严重，很多地方的通胀率甚至达到了两位数，食

品的价格也在不断上升。在贫困国家，不平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都会带来显而易见的问题。如果疫苗能够在世界上更多地方生产，就会有更多的国家因此获得疫苗，并且能够有更加公平的机会获得疫苗的接种，我不知道政府除了支持还能做些什么。他们应该大力支持鼓励这一努力，当然在这方面中国企业所作出的努力是非常值得赞赏的，也是未来前进的一个方向。

王冠：我们知道现在需要做什么，而需要做的这些事情到底能不能做到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您觉得发达经济体会不会采取这些措施去弥合疫苗的鸿沟？此前听到，如果 500 亿美元的投资能够带来 9 万亿的回报，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买卖，对吗？

史蒂芬·格罗夫：我们很容易对发达国家的意愿产生怀疑，但是我希望奥密克戎新变异毒株的出现能够让大家觉醒，让大家意识到其实我们都是坐在一条船上的。

全球疫苗鸿沟问题将对所有国家的复苏产生影响，IMF 的报告其实也提到了这一点，所以我希望高传染性新变异毒株的出现，能够足以唤醒大家，让大家意识到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之后就会出现长期的不确定性。

大家都以为在今年夏天就能够慢慢恢复正常，后来出现了德尔塔变异毒株，现在又出现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今后会不会出现别的变异毒株呢？只要疫苗鸿沟还存在，人类就要应对不断出现的新变异毒株。希望今后新的变异毒株传染性不会那么高，但是世事难料。所以这次的教训就是，如果不想世界出现之前的那种难以承担的高成本疫情封锁，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保证疫苗的可得性，要保证全球的老百姓都能够接种疫苗。要保证获得的疫苗能够确实被老百姓使用，这也是一个挑战，这涉及物流方面的挑战，非常昂贵而且困难，甚至比把疫苗送到这些国家更困难。希望那些有充足资金的国家也要承担这个责任。

总之，我希望奥密克戎新变异毒株能够唤醒大家，让我们不要沾沾自喜，让我们继续推进疫苗的接种。

王冠：确实是这样，疫苗抵达一个国家之后，保证老百姓能够接种也是一个问题。有报道称，疫苗抵达非洲的一个国家，但是快要过期了还没有被接种上，这种物流方面的挑战也是非常大的。您在政府也做过很多工作，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可以促进政策的协调和实施？感觉这次疫情世界的合作相比于全球金融危机时的合作要少一些。

迈赫迈特·希姆谢克：我认为除非尽一切努力阻止当前的经济下滑变成经济衰退，否则肯定会出现问题。所以现在政策的协调至关重要。非常遗憾，在这次应对疫情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所谓的民粹主义，除了在疫苗方面有表现，在合作方面也同样，当然有好的例子，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

现在面临的挑战，只有合作、只有协调、只有团结、只有共担责任才能够解决，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应对疫情。所以我认为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知识、最佳实践的分享，并不需要什么太高的成本。如果不想经济增长在未来十年陷入疲软陷阱，就需要采取行动。现在有很多地方的利率是零，资源也没有被分配到正确的领域，所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现在需要提高生产力，需要

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大投入，需要在提高生产力方面加大投资，应该给予他们资金的支持。所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基础设施是关键。当然高品质的教育、人力资源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基础设施更重要，因为它可以提高生产力。

我认为应该把钱更多地分配在真正需要的地方，而这就需要合作，不仅仅在政策上，在其他方面也需要协调合作，现在做得很不够。以前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时做的还是不错的，现在面对疫情应该更好地通过多边合作等方式给所有人提供疫苗，提供发展的资金支持，同时还要通过合作减少压力。我非常担心新兴市场，担心其在贫困、不平等以及稳定性方面出现问题，当然还有食品价格上涨带来的问题。

王冠：彭先生，我想再问您一下关于通胀的问题，您如何评估政策收紧，如果是速度加快，那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对全球的经济复苏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像您所说，如果通胀在美国一直持续到 2023 年，那么美联储别无选择，只能更加快速地收紧政策、提高利息。

彭文生：是的，很明显美联储要应对持续的通胀问题，但是已经可以看到一些迹象，就是美联储和央行对于通胀的容忍性在提高，从去年到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趋势。

我们观察到一开始美联储否认会出现大的通胀问题，但是之后美联储又说这个通胀是暂时性的，现在美联储说疫情控制之后通胀也会得到解决，不会再是一个问题。

现在美联储有一个所谓的平均通胀目标新政策，也就是他们希望容忍更高的短期通胀，所以美联储确实会采取应对措施，但是不会像所预期的或者是之前出现的那么强硬。这有可能是因为政治形势，也就是说他们现在更加注重的是就业问题，或者说是在就业、经济增长和通胀之间谋求平衡。所以我认为之后会看到更高的美国平均通胀，而这又是因为市场力量和美联储对于通胀的容忍度增加而导致的。这是需要密切关注的，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美国持续通胀肯定会对美国以及全球市场产生长期的影响。

王冠：今天我们的嘉宾有来自中国的，有来自沙特的，有来自土耳其的，还有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来自欧亚各个国家，彭先生，您作为中国参会嘉宾觉得“一带一路”倡议怎样促进这个区域供应链的韧性呢？

彭文生：我认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有市场驱动力，但是也有政策驱动力。“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中国和沿线国家的贸易，在过去几年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现在的问题或者说挑战就是疫情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一带一路”和全球经济都一样，也就是都会受到疫情的影响，只有在疫情被控制或者结束之后我们才能够回到相对比较正常的情况。当然了，在恢复正常之后，全球供应链重组依然是会对“一带一路”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产品和商品生产国和出口国，因为疫情，有一些国家尤其发达国家开始担心他们太过于依赖中国供给的产品。举例来说，在这次疫情当中，中国是极少数的医疗设备供应国之一，也许有些国家因此想要在未来，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多元化自己的供应来源。另外一方面，中国也在做更多的研发和技术创新。

所以展望未来将会有更大的空间进行国际合作，在贸易方面、在投资方面都是如此。“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这样的合作，中国作为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能够为“一带一路”沿线的所有国家带来好处，也能为全球经济来带来好处。

王冠：史蒂芬·格罗夫先生，您对在后疫情时代进行投资有些什么想法？在气候领域面临诸多不确定性的背景下，在创新和生产力提升方面进行投资，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早些时候我们讨论过这种平衡、妥协和挑战，尤其是在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当中，应对疫情时所需要的一些妥协，以及长期投资的重要性。

史蒂芬·格罗夫：在任何一个领域，如果经济能够付出一些努力，使得社会得到支持，经济将变得更为可持续。我们现在通过不同的视角来看同样的一个问题，很显然基础设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全球都是如此，我们把它看作是一个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所面对的挑战，但事实上在美国，在其他发达国家也有这方面的政治意愿。也就是说，建造和维护基础设施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也是同样的重要，对他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来说也是一个核心的基础，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亟需找到一些不同的方式，找到足够的投资人，包括私人投资者，这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看到流动性其实并不缺乏，全球很多市场的流动性是充足的。我们的挑战是如何把这种流动性投入到资产当中，投资到基础设施当中，来促进经济发展，并且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最近，沙特与贝莱德基金管理公司共同建立了一个基础设施基金，进一步向基础设施进行投资。我们在 PPP 这方面的经历是不错的，成绩也是不错的，我们希望找到一些创新的方式来更多地吸引投资，而不是给央行带来更大的压力和负担。目前央行在担保方面已经有不少负担，我们希望进一步分散这些项目的风险。事实上，如果这个项目有足够的吸引力，私营部门将会更加愿意向其进行投资，所以这就是我们目前在做的一些融资方面的努力。

世界各地还有很多这类的例子。在那些建立了开发基金的国家中，他们都有各自的机制来促进和协助基础设施的投资。这并不是说它能完全替代政府投资，政府投资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公共产品在未来仍然还会是政府主要的责任，所以不是在所有的政府投资领域，私营部门都能够取代政府资金。但政府可以使用一些资金和政策来鼓励私营部门投资。沙特在努力创建一种模式，一种能够在世界其他的地方被复制和借鉴的模式，我们期待未来有一个好成果。

王冠：彭博士，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您。现在疫情对生产力有些什么样的主要影响，你前面讨论到了供给侧和需求侧的一些影响，技术也是不断在进步，这一点你也提到了。

彭文生：是的，的确如此。我们看到在不同行业当中的分流，也就是说我们目前实际上看到的并不仅仅是经济的复苏，我们还看到经济的重塑、重组。绿色转型显然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方面，但并不仅仅是在这个方面。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我认为也是由于疫情带来的，那就是人们越来越注意到或者说越来越重视科学和技术创新。我们在不断地斗争，不断地努力用科学技术控制疫情，包括疫苗和其他医学方面的技术发展。我们意识到绿色转型如果没有技术创新就很难实现，会付出很大代价，对全球经济来说有大量的负面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对于弱势群体即使是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也会受到巨大的负面影响。

实现绿色转型真正需要的是在绿色技术、绿色生产及制造方面的大量投资。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在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方面是市场的力量。我们需要有很多私营部门的投资，通过绿色融资、绿色金融来支持。实际上从疫情开始到现在，从 MSCI（全球股票市场指数）的指数来看，我们看到绿色技术、绿色指数的表现超越了其他股票指数，甚至是明显的超越。很多人可能说这是一个泡沫经济，是不是泡沫，我们需要拭目以待，看它是否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动荡。但是为了减少经济重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奖励机制以及更多的资金投入到绿色领域。这就意味着在股票市场、证券市场当中的绿色领域，绿色股票的估价、估值必须要比较高，要超越普通股票的水平，这样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分流到这个领域。我们现在确实也看到了这样的趋势。

当前缺乏的是全球的协调性。现在是有一些全球协调的，但是这种协调的程度还不够。绿色转型就像疫情一样，是需要公共产品的。为什么说它是公共产品呢？因为有的个体是需要为了公益而做一些牺牲的，这就意味着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必须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需要有更多的协调。当然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是因为我们在国际的层面缺乏公共财政的领导机构，所以这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国际协调和合作，从而进一步去提供和提倡我们早前提到的生产力。

说到底，我想表达的是，我们正在见证大规模的、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重组。在某些层面来说它是痛苦的，可能会抑制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其他领域，包括新兴领域、新技术领域，我们看到的是生产力的提升。所以问题就在于，我们如何能够让这个重组过程更加缓和、更加顺畅，让这种资金的重新分配、资源的重新分配更为充分，只有规模足够充分，才能提升总体的生产力。

王冠：我想再问一下希姆谢克副总理，您是否觉得全球的技术发展是令人关注的？举例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技术的加速发展事实上是由于疫情导致的，这样一来，发达经济体和发展比较缓慢的经济体之间的差异变得更大，对这一点您怎么看？

迈赫迈特·希姆谢克：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未来长期一段时间也会如此。在发达国家，居家办公很容易能够达成。很多在自动化、数字化方面领先的大公司，对于他们的发展来说这是一个关键的驱动力，长期会提升他们的生产力。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比较贫困的国家，他们没有办法获得快速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也不够，包括铁路、公路、网络建设都不够。他们的信息高速公路显然也是落后于其他国家的，这也是这些国家未来发展滞后的一个主要因素。不仅是在高质量的教育方面，包括研发和创新，都需要有完善的基础设施，而这些国家没有，因此他们会丧失很多机会。

在比较贫困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足够的财政空间进行生产力提升方面的投资，而这正是企业应该介入的领域，他们的投资能支持这些国家在这些领域进一步提升。要进行国际合作，有很多国家是有这种资源的，而且这种资源的成本并不高。如果说我们能把这些资源部署到真正需要的地方，不仅仅产生的回报会更高，同时也可以促进全球的生产力。

在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的生产力也因为资本开支减少而受到影响，尽管利率比较低。所以有很多发展中国家需要改善投资的环境，需要改善可预测性。这些国家需要做的还有很多，而不是花太多的资源来吸引外来投资，虽然外来的投资可以帮助他们提高生产力。总之，现在在技术、基础设施方面，还有疫苗的获取等方面，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获得方面还存在鸿沟。

王冠：接下来我们讲一讲劳动力市场，因为劳动力对于生产力的提高至关重要。我想了解一下现在劳动力市场的复苏情况是怎么样的？在中东、沙特、土耳其是什么样的情况？在中国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希姆谢克副总理，您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复苏在您的国家和您的国家所在区域是怎样的？

迈赫迈特·希姆谢克：土耳其的形势有点复杂，但是去年土耳其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帮助恢复就业，给公司提供支持。我们在很多地方也看到了类似的举措，土耳其这样的新兴市场，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但这还不是最大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要进行充足的投资，要提供就业给越来越多处于工作年龄的群体。

土耳其现在的失业率依然不低，有两位数。当然还有通胀问题，目前通胀已超过了 20%。另外，还有货币政策的公信力问题，这也是导致很多问题的源头。在发达国家，最大的挑战就是找到工人，他们现在有很多空置的工作岗位。而在很多新兴市场，比如在中东，我们的挑战是要创造越来越多的岗位，因为工作年龄的人群数量在增加，所以这是不同的挑战。

我们在疫情初期采取的措施是不错的，疫苗接种也比较成功，经济的复苏也非常强劲，但是因为政策缺少公信力等原因，现在和将来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王冠：是的。史蒂芬·格罗夫先生，沙特就业市场的恢复情况怎么样？

史蒂芬·格罗夫：在沙特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复杂的，因为我们非常依赖外国的劳动力。疫情带来的挑战就是人员进出国境变得非常困难，沙特现在的失业率相对较高，尤其是女性的失业率比较高。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努力推动女性参加工作，现在女性就业的比例显著提高，很多工作岗位和领域也已经开始向女性开放。在几年前，很多不会有女性参加的行业，现在也都有女性参与。同时男性的就业状况也在改善，因为疫情封城确实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个在短期内也是很明显的，但是现在已经恢复了很多。

经济增长和 2020 年相比，反弹也比较强劲。但是展望未来，疫情之后，外国劳动力进入我国，对包括建筑行业在内的其他行业的就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不好说。最近政府也采取了一些举措，包括针对劳动力的来源国，我们已经开放了边境，希望能够继续。

王冠：彭先生，您觉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在 2022 年这方面肯定也是有需求的。

彭文生：中国的形势不一样，我们的人口也不一样，实际上，我们现在工作年龄人群的增长应该是负的，也就是劳动力的供给并没有增加，这是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大背景。

自从疫情发生以来，很多行业受到了影响，尤其出行、餐饮、服务行业，但是总体来讲，我们在控制疫情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在就业方面，有非常好的复苏，失业率在中国已经下降了很多，但是依然还是有一些挑战。因为疫情经常有小规模的爆发，就像今年，基本每三个月就会有一次。而这又会导致保持社交距离的政策。因为中国采取的是“零容忍”“动态清零”的疫情防控政策，这肯定会对某些行业产生影响。我认为下一步，我们需要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支持中小型企业和小微企业，比如在减税方面要有支持政策来改善他们的财务状况，这样这些小型企业才能够雇佣更多的人。

王冠：IMF 预测中国 2022 年会有 5.6% 的增长，彭先生，您的观点是怎样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对中国经济的展望是怎样的？

彭文生：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预计 2022 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大概有 5.5%，也有可能稍低于 5.5%。中国的挑战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不一样。因为现在对我们而言，压力在于需求侧，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等方面的压力。

我们之前主要靠出口来支持经济增长，今年也是这样，随着全球形势的改变，我希望明年全球的疫情形势有所好转，这样一来，外部的需求有可能就不会像今年这样的强劲。因此，决策者必须要提供政策支持来促进国内的消费。

王冠：最后，我想再问一个问题，也就是政府和企业怎么样更好地合作来进行长期的投资。希姆谢克副总理先生，有请您先说。

迈赫迈特·希姆谢克：首先我们需要有合适的框架，不管是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还是其他的一些倡议，我们需要有好的激励机制，要有合适的机构或者机制性的平台，要在一个国家内部进行合作。同时，还需要吸引来自其他国家的私有企业的投资。但是其实需求是差不多的，我们要提供一个可预测的、稳定的环境，一些可以获得银行支持的项目。这样，项目融资可以以比较合适的条款来获得。另外，就是监管上的可预测性。总之，法治、规则非常重要。

我们要合作，必须要有这样的良好机制，政府和企业是不可或缺的，它们是在投资和应对灾害方面的两个重要元素，包括现在所遇到的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挑战。所以，一些最基本的条件必须到位，这样才能够鼓励政企合作，才能够给社会带来好处，同时投入了资金或者投入了资源的人也能够获得回报。我们也需要激励，土耳其在 PPP 方面，包括在医疗保健、基础设施方面的 PPP 是做得不错的，这也是为什么相比很多其他的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我们在应对疫情方面做得还不错。因为我们进行了大量的城市医院的投资，这些都是通过 PPP 来进行的，医院的容量和能力得到了提升。

王冠：谢谢副总理，谢谢彭先生，谢谢史蒂芬，我们就讲这么多，今天的讨论非常精彩。希望 2022 年有更强的全球协调，希望疫苗的鸿沟能够尽快被弥合。我们现在面临着诸多挑战，有疫情、气候、政策方面的问题，也有数字鸿沟、基础设施、高通胀等方面的问题。要战胜这些挑战，决策者必须要真正地携起手来加强协调与合作，才能实现更加可持续、更加包容、更加绿色的全球经济复苏。

感谢彭文生先生、史蒂芬·格罗夫先生、迈赫迈特·希姆谢克先生还有凯拉特·克林贝托夫先生，以及通过视频方式发言的各位嘉宾。希望我们今天的讨论能给大家带来思考。感谢大家！

全球金融新格局 暨《IFF 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2021 年）》讨论会

IFF 学术委员、亚洲开发银行前副首席经济学家 60
庄巨忠：《IFF 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2021 年）》解读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ICMA) 总裁 64
马丁·谢克：全球可持续金融发展的现状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ICMA) 的努力

IFF 学术委员、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66
聂庆平：重视全球贸易和全球金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完善我国的绿色发展体系

IFF 学术委员、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68
宋敏：积极推进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创新

中国银行规划研究中心总经理 70
刘世伟：中国银行的绿色金融实践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72
王遥：构建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助力绿色发展

《IFF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2021年)》解读

■ 庄巨忠 / IFF 学术委员、亚洲开发银行前副首席经济学家

庄巨忠

《IFF 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2021 年）》旨在分析和预测全球经济趋势和前景，解读金融发展和创新，探讨全球共同关注的长期挑战。今年首期报告包括三章，第一章讨论全球经济展望，第二章报告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和国别排名。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指数是 IFF 与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王遥老师的团队共同开发的，王遥老师是报告写作组的核心成员。第三章综述全球碳中和路线图和中国的气候行动。

第一章 全球经济展望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全球经济展望几个要点：2021 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强劲反弹，占世界经济 80% 的 20 国集团 GDP 总和同比增长 7.7%，但下半年由于德尔塔变异病毒的流行和供应链瓶颈制约，全球增长势头有所减弱。

2021 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长 5.9%，其中发达国家增长 5.2%，发展中国家增长 6.4%，中国增长 8.2%。2022 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长 4.7%，其中发达国家增长 4.2%，发展中国家增长 5%，中国增长 5.6%。

经济复苏导致许多国家物价上涨。2021 年全球消费价格指数预计将增长 4.5%。随着供需缺口的缩小，2022 年全球通胀预计将回落至 3.8%。

上述展望存在几个下行风险。最大的风险来自疫情，包括病毒出现新的变异，比如最近出现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以及疫苗接种进展缓慢，从而导致疫情的反复；还有通胀加剧，导致宏观经济不稳；再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这些情况的出现都会影响经济复苏。

为了应对全球经济挑战，报告呼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加快疫苗接种的推进，消除疫苗鸿沟，确保货币政策的平稳过渡，结束贸易紧张局势，促进绿色复苏，加强对低收入国家的支持力度。

第二章 全球绿色金融的发展指数和国别排名

首先看一下全球绿色金融的发展近况。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的气候目标，各国需要迅速过渡到绿色增长道路，大量投资于绿色基础设施和科技。大规模的绿色投资需要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本的共同参与。预计 2015 年到 2030 年，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资金为每年 3.9 万亿美元，占发展中国家预计 GDP 总和的 11%。在《巴黎协定》1.5 摄氏度气温升幅目标下，2016 年到 2050 年，全球能源投资需求预计每年为 3.26 万亿美元。如此大规模的绿色投资需求，需要公共资金和私人资本的共同参与。

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私人和公共资金流向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保护环境、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以及高效利用资源的活动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这是报告对绿色金融的定义。

为什么要发展绿色金融？绿色投资需要长期融资，具有高风险、高社会收益和低财务回报的特点，但传统金融往往过于关注短期财务收益，导致绿色投资不足。而通过政策干预，绿色金融可促进私人资本流向绿色投资。

近几十年来绿色金融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前，绿色金融以社会责任投资为主。第二阶段：90 年代开始，气候融资被纳入国际政策讨论议题，推动了多个多边气候融资机制的建立。社会责任投资也进一步扩大到环境、社会和治理等领域。第三阶段：2015 年以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黎协定》的通过，带动了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

现在绿色金融规模有多大？由于尚无涵盖所有绿色金融产品的数据，很难估计全球范围内的总体规模。但已有的数据表明，绿色投资需求远超绿色金融规模。比如，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的数据，2014 年以来，尽管全球绿色债券发行量每年增长 46%，截至 2020 年底累计也只有 1.047 万亿美元。

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和国别排名的目的是：绿色金融的发展受多重因素影响，并且受到信息、分析能力以及政策和监管不确定性的制约。提供有关绿色金融发展连续和可比的信息有助于促进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更多行动。

国际金融论坛（IFF）和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联合开发这个指数，目的是要用客观的国别数据衡量国家层面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和差距，希望为政策制定、金融服务和研究提供有用的信息。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指数（GGFDI）用客观的国别数据，对全球前 55 大经济体的绿色金融发展状况进行定量评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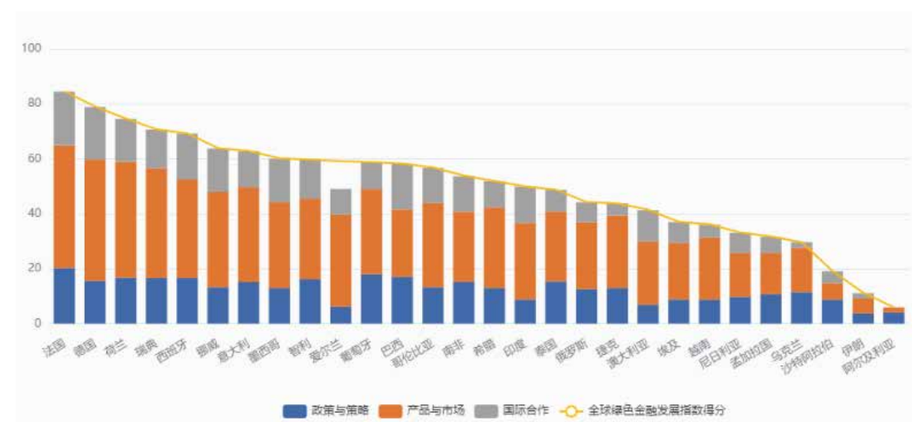
指标体系和方法：GGFDI 由四级指标组成。一级指标有三个，分别衡量绿色金融发展的三个关键方面：政策与策略、产品与市场、国际合作。每个一级指标由两个二级指标构成，每个二级指标由若干个三级指标构成，每个三级指标又由若干个四级指标构成。

四级指标总数为 53 个：14 个定量指标，5 个半定量指标，34 个定性指标。每个四级指标的权重均为 0.01887（即 1/53），用的是等权重。指标选定的原则：数据透明、客观、可比、逻辑严谨，同时兼顾数据可得性。数据截止时间：2020 年 12 月 31 日。

政策与策略的两个二级指标分别是绿色发展政策与绿色金融发展政策，其三级指标有绿色发展战略、气候减缓承诺、绿色金融总体政策、绿色金融产品相关政策和绿色金融风险管理相关政策。这些大多数都是定性的指标。产品和市场的两个二级指标是绿色金融产品和绿色金融市场机制发展，前者的三级指标包括各种绿色金融产品，绿色债券是定量指标，其他一些绿色金融产品，比如绿色贷款、绿色保险都是定性指标。绿色金融市场机制发展主要是衡量各种金融机构对绿色金融的支持和服务。国际合作主要是衡量监管部门，如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及市场主体参与国际绿色金融网络和倡议的程度，如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赤道原则等，部分是定性，部分是定量指标。

这是 55 个经济体指数得分与排名结果。图中蓝色是政策与策略得分，中间橙色是产品与市场得分，上面灰色是国际合作得分，黄色是总得分。根据指数总得分，排名前十的国家依次分别为：法国、英国、德国、中国、荷兰、日本、瑞典、丹麦、西班牙和美国。排在中位数

2020年各国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指数(GGFDI)得分与排名



之上的国家大多数是金融体系相对成熟的发达国家，但也有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得分较高。如中国排名第 4，墨西哥排名第 15，智利排名第 17，巴西排名第 21。部分发达国家的排名低于中位数，例如加拿大、新西兰、希腊和澳大利亚。

在 G20 国家中，总得分最高的是法国、英国、德国、中国和日本，得分在 70 分以上。这些国家三项一级指标排名也大致相当。中间组为美国、意大利、墨西哥、韩国、巴西、加拿大和南非，总得分在 54 ~ 66 之间。得分较低的第三组有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阿根廷、澳大利亚、土耳其和沙特，总得分在 20 ~ 50 之间。

总体上说，各国绿色金融发展很不均衡，55 个国家的平均分为 50，发达国家平均分为 62，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平均分为 39。从地区来看，欧洲平均得分最高为 64，其他依次为北美、拉美、亚太、非洲和中东。政策与策略的国别差异最小，产品与市场的国别差异最大。这表明即使 GGFDI 排名较低的国家，政府也在政策方面做出了努力。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绿色金融的发展也受到欠发达的金融业和资本市场的制约。

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全球绿色金融指数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首先，我们利用公开数据确保了指数的透明度，但是缩小了信息的覆盖面，可能对结果造成偏差。比如有些国家得分低，可能是信息没有披露。其次，用于衡量政策和战略的大多数指标都是定性的，只能衡量国家是否出台了特定的政策，但不能衡量这些政策的实施情况。在衡量产品和市场的指标方面，不同国家绿色金融的定义存在差异，这反映了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但也会影响到 GGFDI 的准确性。最后，无论其金融体系的成熟度如何，GGFDI 对所有国家都采用了统一的标准；在评估绿色发展政策时，也没有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同责任。由于这些局限性，指数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本章的结论是，全球绿色金融发展虽然取得了可喜进展，但仍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包括各国发展不平衡，产品和服务的多样性不足，绿色金融定义和披露标准的不统一，新冠肺炎疫情对绿色金融的负面影响等。应对上述问题和挑战需要持续的政策行动。本报告强调了以下政策重点：建立支持绿色金融的有效政策框架；推动金融创新，发展更加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推动绿色金融定义和信息披露标准的统一；加强绿色金融国际合作。

第三章 全球碳中和路线图与中国的气候行动

中国宣布将力争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即“双碳”目标）。近几十年来，中国采取了各种气候行动，包括节能降耗、投资可再生能源和开展碳市场试点等，最近还启动了全国碳市场。

2005 年到 2020 年之间，中国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下降 48.4%，超过对外承诺的 40% ~ 45%。2020 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 15.9%，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发电比重合计超过 32%，中国目前在太阳能和风能装机容量以及植树造林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中国如何实现“双碳”目标？根据现有研究，我们收集了 5 个关于中国碳中和路线图的最新研究，包括清华大学、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国家电网、国金证券、国际能源署。根据这些研究，中国实现“双碳”目标，能源系统需要深度转型，比如在电力部门，非化石能源发电的比重目前是 32%，2030 年要增加到 49% ~ 56% 之间，2060 年要增加到 90% 以上。燃煤发电的比重现在是 61%，2030 年要减少至 40% ~ 50%，2060 年要减少至 5%。

实现如此深度的转型需要政策的强力支持和全民的参与。报告对这些政策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包括促进经济结构持续转型，加强绿色投资，加强排放监管，充分发挥碳定价和排放权交易的作用，发展绿色金融，加强公众绿色转型意识，加强国际合作。

扫码下载完整报告
Scan the code for the whole report

全球可持续金融发展的现状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的努力

■ 马丁·谢克 /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总裁

今天我想讨论的主题是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可持续金融的发展趋势，及其在全球金融市场促进落实《巴黎协定》起到的作用，以及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在推动可持续金融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为获得实现碳中和目标所需的资金，以及实现 COP26 会议和国际金融论坛（IFF）报告中提出的指标，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机制来调动各方资金，以共同实现我们的环保目标。很明显，资本市场在实现金融可持续性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自 2014 年以来，ICMA 与全球数百家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合作，通过制定一系列自愿原则，不断扩大绿色债券、社会责任债券和可持续发展债券的发行规模。这些原则规定了债券收益必须用于推动落实环境和社会责任目标的项目或活动。这些原则还就项目的选择、收益管理以及如何加强资金使用等方面的信息披露方式做出了进一步规定，同时建议开展外部审查，就相关基础项目或活动的申报进行审批。这一细分债券市场每年呈指数型增长，现已成为一个公认的主要融资渠道。全球约 95% 的绿色、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债券的发行都符合 ICMA 提出的原则，这些原则已日渐成为一种全球标准。2021 年 6 月，ICMA 对这些规则进行新一轮更新。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早已处于世界领先地位。2021 年 11 月，中国发布了可持续发展债券的指导原则，标志着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债券概念在中国市场的正式启用。

今天我想重点讨论三个方面：气候转型、监管和信息披露面临的挑战，以及“漂绿”这一高频概念。首先是气候转型，如前所述，目前市场上有关债券收益的使用已经相当成熟，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主流趋势。但这还不够。要想在落实《巴黎协定》目标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就必须在资本市场引入一种新机制，将难以实现减排行业的债券发行纳入明确的转型路径中。在这方面，ICMA 已经发布了两份旨在促进气候转型融资的指导文件，即 2020 年 6 月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原则》以及在 2020 年 12 月发布的《气候转型融资手册》。前

马丁·谢克

者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视角来看待整体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允许企业使用关键的绩效指标来设定可衡量、可持续发展目标，并根据这些指标进行评估，如果未能达到目标，将会受到经济处罚，例如更高的利率等。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该类债券的发行规模高达 1000 亿美元，成为债券发行商和投资者们推动气候转型的热门途径之一。同时，ICMA 还发布了《气候转型融资手册》，为发行商在气候转型战略方面的信息披露提供明确的指导方针。日本正是在此基础上，对标《气候转型融资手册》，制定并发布了其气候转型融资的基本指导方针。ICMA 关于气候转型方面的指导方针希望能够促进更多的发行商参与到可持续金融市场中来，并为促进全球经济向气候友好型经济转型做出贡献。

第二是监管和信息披露。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是大多数国家目前一项紧迫的政策目标。许多国家，包括欧盟、英国、日本和中国都正在制定其分类法，即根据绿色转型的定义来制定一个分类体系。这项工作正在持续推进，且十分繁复。更重要的是，它通常带有一定的政治性，因为制定过程中还需将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需求也纳入考量。然而，不同分类法的存在给市场参与者造成了困惑。ICMA 在 5 月发表了一篇有关分类法的文章，对现有的分类法进行了比较，提出了关键的评价标准，并对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建议，尤其希望将目前现有的分类法进行整合统一。2021 年 11 月，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发布了第一版《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报告》，试图在欧盟分类法和中国分类法的基础上促进现阶段各主要分类法的兼容发展。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分类法在国际层面上的统一将是大势所趋。除分类法外，目前还有大量有关信息披露的新法规正在制定当中，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项工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它要求债券发行人、中介机构和资产管理公司寻求大量的新投资，并进行数据创建和收集。

最后，我想简要地谈论一下“漂绿”这个高频概念。毋庸置疑，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强健且有诚信的市场。这对于保障市场参与者的高度信心以及确保市场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引导资金流向对环境和社会有益的领域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我想应该没有人会反驳，“漂绿”是一项应该避免的糟糕行为。但问题在于，许多政客、监管者、立法者、媒体人以及一些市场参与者对于“漂绿”的概念、发生范围以及普遍性缺少清晰的认知。我认为，随着相关法规的制定和出台，我们必须更好地了解“漂绿”的性质和范围。是发生在绿色债券市场内，仍未实现环境目标的项目，还是在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市场内，环保目标不够远大或是违规处罚力度过轻的领域？因此，我认为这一主题目前仍然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阐述，以便为每个市场和行业制定最适当的监管法规。我们迫切需要就“漂绿”概念制定一个监管框架和标准定义，而非一些约束性条款，从而推动可持续债券市场的持续增长。

重视全球贸易和全球金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完善我国的绿色发展体系

■ 聂庆平 / IFF学术委员、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聂庆平

我主要谈三点。

第一，《IFF 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2021 年）》写得非常好。尤其是框架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对全球经济进行了回顾和展望，对绿色经济的发展国别情况进行了研究，同时对于绿色指数也进行了探讨，这个报告还可以继续发展下去。

第二，谈谈对全球经济的看法。现在讨论全球经济主要是回顾过去一年经济发展指标和指数，预测未来发展的指数。如果报告想做得更有深度，可以对一些专题进行补充。就全球经济来看，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全球贸易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另一个方面是全球金融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从预测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长情况来看，我觉得这两个因素——贸易和金融因素如何演变，对经济的影响会比较大。

现在，全球经济当中贸易占比已经接近 60% 的水平，全球贸易的萎缩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会比较大。同样，中美贸易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近 20 年来，在全球贸易当中，中国的顺差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对全球贸易的逆差部分。中美之间的贸易，中国的贸易结构是比较均衡化的，美国是主要的贸易伙伴而不是第一大，中国和东盟、欧洲都是比较大的贸易伙伴，这个关系决定了全球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

去年各种产业链的问题、供给的瓶颈问题、存量货币问题等，都和全球贸易的关系紧张有关。所以在这个变化当中，中美关系无疑是起到主要的作用。很显然，中美贸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有可能带来全球贸易平衡和供应链平衡双瓶颈问题。从美国来讲，主要是对美国出口中低端产品和消费品，这个瓶颈可能会造成美国通货膨胀，甚至整个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在这个问题上怎么应对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当然也会倒过来，美国或者西方国家围堵中国，在技术上卡脖子，这也会导致全球产业链的断裂和供应链出现问题。这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是必须面对的贸易政策上的挑战，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方面——对全球经济的预测。

第二个方面，全球金融也是很重要的。这个问题已经客观存在，从 2008 年美国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应对的策略是很简单的，就是用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这个量化宽松政策一直延续到现在。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简单地采用财政和货币双扩张的政策来应对危机。到了拜登政府之后，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大的改变，仍然是采用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很显然全球目前很大的担忧就是美国或者与美国相关的西方国家怎么看待货币供应量增长的问题。

有人用现代货币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但是现代货币理论我认为可能还要回归传统，不一定是解决这个问题有效的理论。至少从现在来看，货币理论最简单，货币的超发一定要取决于商品的价格变化。过去美联储认为 2% 的通胀目标是暂时性的，不是长期性的，现在已经开始改变这个观点，也就是说超发的货币在西方世界产生的通货膨胀压力会是很大的，这个也将会影响到 2022 年的全球经济增长。

所以，随着美国在未来一年需求的逐步恢复，存量存货的增加逐步得到缓解，供应链的瓶颈得到一定的松解，预计美国经济可能由 4.5% 的经济增长下降到 2023 年的 3.9%，这个预测的前提是贸易保持良好关系和金融市场的稳定基础。我比较担心，美国资本市场上存在的泡沫不采用刺破的方法，而是用延缓的方法，在 2022 年能不能继续维系下去，这是影响全球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谈一谈和绿色金融相关的问题。我们国家对绿色金融是非常重视的。从目前情况来看，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宣布了中国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之后，全国各个方面都在行动，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政策和策略。中国的绿色金融已经达到 14 万亿，绿色贷款所占比重接近 12 万亿。绿色债券方面发展得比较快，从 2016 年 1 月浦发银行发行第一个绿色金融产品，就标志着我们国家绿色债券已经开始启航，我们国家绿色债券一直保持以每年超 2000 亿的发行规模在增长。所以到 2020 年我国的绿色债券达到 2692 亿元，占到整个信用债市场规模的 1.1%，银行和债券市场规模发行达到 1276 亿，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规模也达到 1416 个亿。目前中国累计绿色债券发行有 368 个，累计发行的金额达到 4531.06 亿元，分别增长 104.77% 和 135.73%。根据 2021 年 10 月底的统计数据，中国的绿色债券总额是 1.15 万亿元，存量规模在全世界排名第二。这是中国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基本情况，总体情况令人鼓舞，当然也还存在一些挑战和问题，比如有一些激励问题，以及标准、信息披露不健全等问题。

在绿色债券发展和市场活跃度方面，中国有比较大的潜力。我对绿色债券的理解，就是如何在现有的制度、机制和评价体系以及现有的传统资本市场的融资机制基础上，怎么去科学地加入绿色的概念和绿色的评价指标，并把它具体化。我认为在继续完善我国绿色债券市场发展机制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我们的债券管理办法、交易所的上市规则大多是沿用过去的市场理论、资本市场基本要素、信息披露的规则来进行。绿色金融是一个很大的专业性领域，怎么把过去的管理办法和规则等加进去，就需要完善我国的绿色发展体系和绿色债券市场。资本市场如何支持绿色经济和绿色融资，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积极推进绿色发展理念和绿色创新

■ 宋敏 / IFF学术委员、武汉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宋敏

不管是绿色发展的问题，还是绿色理念的问题，现在全球各个国家在这些方面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一些国际性的金融机构、联合国组织。绿色的理念主要是基于同一个家园的概念，值得去推广直至真正地深入人心。我们都是地球人，所谓的绿色就是要关注资源、环境、气候这些影响全人类的要素。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有一个共同的地球家园。这个共同点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所以大家需要做到的是求同存异，这个“同”就是同一个家园。但现在仍存在全球治理体系与各个国家具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是因为大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求同存异的理念，就像大家都在谈绿色，但真正落实到政策上、落实到经济中或者落实到个人的行为上，做得还是不够的。

从学术界的角度来说，所谓的绿色经济或者绿色发展，它是具有外部性的，而且这个外部性是非常强大的，它包括时间的外部性和空间的外部性。所谓时间的外部性，指同一个家园，如果损害了家园的美好环境，或者是消耗了资源，抑或是造成了气候的危机，不仅给我们自己这一代人带来危机，而且将给未来的子孙后代带来危机，这就是时间上的外部性。空间的外部性是指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气候等问题，会传导到其他的地方去。理论上来说这是时空两维度的外部性。

因为绿色发展具有外部性特征，所以单靠市场或单靠国家政府都解决不了绿色发展的问题，一定要靠全球携手，要建立全球治理机制，要有求同存异的理念。但是现在看来，全球绿色发展没有按照这样一个基本的理念在运行，这就需要像 IFF 这样的论坛，不断推动这个理念深入人心。

现在大家从产业和经济的角度谈得比较多。比如从产业来说，能源、交通、建筑是环境污染、碳排放比较严重的产业，这方面已经谈得很多。但是我们每个人作为消费者有没有真正把绿色的理念深入内心、落实到行动上？目前是远远不够的。拿美国、欧洲和中国这三大经济体来说，美国的家庭消费模式，大家可能都知道，住着大房子，是汽车上的王国，其资源、能源的浪费众所周知。中国现在也有很多人以住大房子、开大排量汽车和奢侈消费甚至食品上的巨大浪费为荣。欧洲的绿色理念相比较而言更加深入人心，体现在个人消费等各个方面。

在个人消费方面，很多人当面说要绿色、要环保，但是开的车是大排量的，住的是很大的房子，甚至有些超级富豪乘坐私家飞机去国际会议讨论全球的绿色问题，很具有讽刺意味。我认为目前绿色理念并没有深入人心，并没有落实到大家的行动中，大家说得多，做得少。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绿色和发展的关系。《IFF2021 年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的第一部分是以 GDP 总量来讲全球经济的。以 GDP 指标来衡量全球经济发展是约定俗成的常规做法。但我们一定要清楚 GDP 不是我们追求的唯一目标，

所谓的绿色就是要关注资源、环境、气候这些影响全人类的要素。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有一个共同的地球家园。这个共同点必须要清晰地认识到，所以大家需要做到的是求同存异，这个“同”就是同一个家园。但现在仍存在全球治理体系与各个国家具体利益之间的冲突，是因为大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求同存异的理念，就像大家都在谈绿色，但真正落实到政策上、落实到经济中或者落实到个人的行为上，做得还是不够的。

我们曾经试图去讨论绿色 GDP，这在度量上有很大的困难。但是在理念上要知道 GDP 应该在绿色经济理念的指导下，应该有绿色 GDP 的概念。具体它的指数怎么去构造，怎么去度量，那是基础性的问题，但是理念上应该让大家有很清晰的认识和理解。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谈 GDP，或者简而言之绿色 GDP。在新的绿色发展理念下去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现在对绿色有更大的需求，所以 TFP 也有可能出现下降。传统的 GDP、TFP 指标，我们一定要清楚都可能会下降，但是下降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因为我们现在追求的是绿水青山，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

在绿色的背景下如果还要达到原来 GDP、TFP 的增长率和增长水平，我觉得非常值得提倡的是绿色创新。只有在绿色创新的基础上，我们才可能维持原来的 GDP 增长率。绿色发展理念会指导和促进绿色创新，而绿色创新可以推动经济增长。

绿色创新很多时候是由监管驱动的，或者说是监管政策推动了企业的创新。如果不创新，在新的监管政策环境下企业将无法生存，生存的压力推动或者说逼迫很多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当然，也有很多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倒闭或转移到其他一些监管不严格的地区去了。绿色创新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我们不能忽视。

最后一点，绿色金融。《IFF 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2021 年）》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绿色金融。任何理念、目标要落地都离不开资金，这是最现实的问题。有再多的办法，如果没有资金支持，一切都是虚的。现有的金融体系是否能够支持绿色发展？如果我们有统一的理念，认为经济发展应该是绿色发展，绿色是我们共同追求的目标，那么现有的金融体系是不是适合这样的目标，怎样在现有的金融体系基础上去进行绿色金融方面的创新。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绿色保险，还有融资租赁等等，怎么样在新的绿色发展理念下去创新，这是特别值得大家深思的。

中国央行已经率先做了货币政策方面的创新，即正在通过货币政策支持绿色发展。最近央行提出，绿色贷款发放相当于央行债券，就是商业银行的绿色贷款以后可以到央行进行拆借，这是一个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创新。现在在美国和欧洲的货币政策里头好像还没有看到这一点。在这个基础上，商业银行、资本市场、保险和其他的金融体系、金融机构应该去思考。

除了长期资金以外，很重要的就是金融创新。包括央行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创新，这有可能带来风险和效率的损失，所以要综合考虑。创新后面隐含的成本和效率损失，这方面的风险，大家谈得比较少，但是非常重要。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界定什么是绿色。比如大家都讲绿色贷款，绿色如何准确界定？现在新能源或者是绿色交通之类的，就把它当成绿色贷款。但是如果有些企业按照绿色贷款的名目拿到了钱，然后做其他的投资，怎么避免？或者是假的绿色投资，不是真绿，而是假绿，怎么区别？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监管部门解决。

下一步，通过数字技术、工业物联网，甚至是将来的万物互联网等新技术让我们更加准确地知道什么是绿色，什么是真绿，什么是假绿，这样全球绿色发展才可以走向比较正确的方向。

总结一下就是，绿色理念我们还要推广，要深入人心，还要落实到行动上。绿色和发展的关系，我们要意识到它可能有一个 Trade-off，这个 Trade-off 的解决方法是通过绿色创新。绿色金融怎么样发展，还是要基于我们对绿色的准确判断。

中国银行的绿色金融实践

■ 刘世伟 / 中国银行规划研究中心总经理

在支持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方面，金融机构应精诚合作，共同开发本国及第三方市场，特别是加大对“一带一路”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关注与支持，因为这些国家能源转型市场空间巨大，对外部资金的需求更高。

刘世伟

近年来，绿色金融已经成为全球共识，《IFF 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2021 年）》聚焦全球绿色金融发展和国际合作，相信必将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借此机会，我结合中国银行的实践经验，与大家分享我的几点体会。

第一，加强国际合作是发展绿色金融的必然途径

应对气候变化、防治环境污染、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是全球共同面对的课题，绿色金融同样需要全球各国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

在标准制定方面，我们应致力于努力构建全球通用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在兼顾国际关切和参与方实际的前提下，力争实现绿色金融工作方法和成果的互认互信，建立公平、透明、有序、开放的绿色金融市场。正如庄老师在大会报告及发言中所提到的，目前很多绿色金融产品的全球数据还无法获取。以中国为例，中国已建立明确的绿色信贷统计制度，绿色信贷余额已超过 10 万亿元人民币，但大部分国家还没有建立相关标准，导致金融机构在全球范围的绿色信贷成果难以得到客观量化的评价。

在产品创新方面，金融机构可围绕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资产管理、绿色直投等加强合作，共同推动产业减污降碳。例如中国银行今年在市场上创新发行了全球首只可持续发展再挂钩债券，票面利率与底层可持续挂钩贷款的绩效目标完成程度间接挂钩，得到了全球投资人的积极响应，也间接推动了 ESG 挂钩贷款产品的创新和推广。

在支持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方面，金融机构应精诚合作，共同开发本国及第三方市场，特别是加大对“一带一路”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关注与支持，因为这些国家能源转型市场空间巨大，对外部资金的需求更高。近年来，中国银行与金融同业合作支持了世界最大光伏电站——阿布扎比 1.5GW 太阳能光伏电站、世界最大光电综合体——迪拜 950MW 光热光伏一体化电站等项目，实现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风险管理方面，针对环境气候风险的识别、计量、控制、报告，环境气候风险向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及声誉风险转化路径等前沿问题上，全球金融机构应发挥各自特长，加强沟通交流，共同探索建立更为有效的风险管理机制。

在转型发展路径方面，尽管各国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不同，但全球金融机构都共同面对着如何走出传统资产组合舒适区、积极稳妥实施资产结构转型的重要课题。今年以来全球范围能源紧张的局面让我们更为清醒地认识到，在科技进步和产业发展推动人类彻底摆脱传统化石能源之前，我们还需要以清洁高效的方式利用好化石能源，全球金融机构应加强相互理解与包容，以降低单位融资对应的碳强度为目标，研究设计可持续发展的转型路线图，实施既有压力又有可执行性的转型措施。在此方面，中国银行将推动中国境内对公棕色行业信贷余额占比逐年下降，2021 年四季度起不再向中国境外的新建煤炭开采和新建煤电项目提供融资。

第二，支持政策在推动绿色金融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发展绿色金融的长期目标已经形成共识，但由于各国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差异，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的惯性，资产结构调整转型对于任何金融机构而言都是艰难的抉择。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转型的初期，内外部政策支持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以中国为例，目前中国政府制定了《绿色产业指导目录》以及绿色信贷统计、绿色债券管理制度，明确了绿色金融的业务方向；制定了绿色金融考核评价机制，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投资、绿色金融产品创新、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水平等角度对金融机构进行综合评价，并不断扩展评价结果运用场景，指导金融机构了解自身与行业先进水平的差距；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提供低成本资金以支持金融机构对具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项目提供较优惠贷款；先立后破、不搞运动式减碳，逐步明确高能耗、高排放项目的节能减排标准，指导金融机构有序调整对这类项目的授信支持，支持其转型升级。这些政策对正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绿色金融具有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自身也应主动将绿色金融纳入战略规划，加强政策指引和宣导培训。目前，中国银行已颁布了《“十四五”绿色金融规划》和《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行动计划》，配套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有力地促进了绿色金融相关业务发展和风险防控。

第三，加强全球碳市场合作

以往，全球碳抵消市场由于双重计算、标准不一等问题，可信度、认可度不高。在 COP26 大会上，各国就《巴黎协定》第六条规则中的国际碳市场框架技术细节达成共识，将推动国际碳市场建立更为透明的问责机制和报告机制，为国际碳市场合作提供稳定的会计框架，以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方式推动全球碳中和目标。未来，国际碳市场标准化产品将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可，各国政府与私营部门会更多地通过国际碳市场进行自愿减排量交易，相关的碳减排产品将更加具备商品化、贸易化属性。全球金融机构可充分发挥客户、信息、产品、融资、服务渠道等优势，积极参与国际碳市场建设，助推相关产品标准和交易规则的完善，为本国和全球投资者提供更为丰富的碳减排金融产品和交易银行服务。目前，中国银行已对相关碳排放产品交易规则进行了研究，正在积极开发碳现货和衍生金融产品，希望与全球金融机构加强合作，为政府、交易所、客户提供更为完善的一站式碳金融解决方案。

以上是我们在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方面的一些思考。未来中国银行希望与金融同仁、各界朋友携手并肩，坚定不移地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之路，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贡献力量。

尽管发展绿色金融的长期目标已经形成共识，但由于各国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差异，以及金融机构自身的惯性，资产结构调整转型对于任何金融机构而言都是艰难的抉择。在这个过程中，尤其是在转型的初期，内外部政策支持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构建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助力绿色发展

■ 王遥 /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

王遥

在全球绿色金融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经过与专家们展开多次讨论，包括监管部门、业界人士和国际专家，最终从三个层面，确定了 53 个指标。从政策和策略，产品和服务，再从国际合作分别做了一些评价。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我们取得的一些成果，对这个指数的局限性，以及未来可以提升的空间，我们自身感触比较深的。

首先，从全球来看，现在各个国家发展绿色金融模式很不一样，很难用一套标准来衡量天下。有些国家可能是自上而下的，有些国家是自下而上的，当然，更多的国家是两者兼而有之。有政府强力主导的，也有市场推动的，因为国家的发展阶段以及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不同，导致它的绿色金融表现水平都很不一样。

第二，数据的可得性。事实上我们第一稿的全球绿色金融指标是非常完美的，但是后来发现在数据获取方面有很大的困难。我们的报告包括 55 个经济体，从事国际合作的同事在其中很多国家都有合作的智库和实习生，帮助做一些数据收集工作。因为有些数据没办法获得，很遗憾地删去了很多指标。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绿色债券数据，在全球来讲是比较容易获得。虽然在绿色的判断标准上略有不一致，但不管怎么样，还是可以获得全球的数据。但从绿色信贷上来讲，可能只有中国才有。因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从 2013 年开始就有绿色信贷的统计，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是全球绿色信贷最大的国家，但事实上是因为只有中国有这个数据。

数据的可得性就决定了在设置指标体系过程之中，只能够根据这些可能获得的数据来设置。比如说绿色债券，可以获得中国很多数据，总量的、相对的、累积的，还有每年新增的数据。所以我们就会把这个指标设计得多一些，而其他的信贷、保险、证券、基金、碳金融等方面，有些可能就没办法有足够多的数据。

我们相信，随着《巴黎协定》各个国家提出自己的碳中和国家自主贡献目标之后，金融支持碳中和，相信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数据。从金融视角进行统计监测，未来的数据也会更完整，这样也会不断地优化。

至于是不是披露第四级数据，我们做了很多挣扎。我们团队做的过程中非常不愿意披露第四级，因为我们觉得还有太多要完善的方面，但唐丁丁司长说勇敢披露出来，让大家看到我们不是最完美的，但已经是在目前为止尽了最大的可能性的数据。

第三，关于绿色金融未来的发展。从今年 IFF 的报告中，很显然把绿色金融作为其中最主要的议题。同时也可以看到，它已经是全球金融发展的一个主流趋势，这个趋势可能是表现在金融支持经济做绿色低碳转型上。另一方面，从金融体系自身来说，也面临着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这两个方面问题。从绿色金融的发展来讲，不管是从支持经济还是从自身发展来讲，都是它的应有之意。我们应该从多个方面去发展，包括政策和标准、产品和服务、地方的实践、国际的合作、科技的赋能等方面，都是未来需要发展的。

不管是从全球还是从中国的角度，特别是对中国来说，我们目前发现的问题集中在以下三点。

1. 抓手不够，依然有叫好不叫座的现象。绿色金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人类可持续发展、绿色低碳，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它真正地为经济、或者说促进经济转型带来的效益，到底有多少，事实上抓手还是有一些不够的。从 2020 年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以来，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在经济体系自身转型过程之中，金融是越来越多地找到绿色发展的抓手。

2. 意识不够。我们经历过绿色金融非常边缘化的阶段，到成为绿色金融圈的阶段，再到现在甚至跳出了绿色金融圈。大家都在讨论绿色金融，其实却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所以这中间面临着很多能力建设提高等方面的问题。

3. 创新不够。现在不管是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金，都是传统金融工具的使用，只不过是因为它的金融工具、金融基金用在绿色低碳领域。我们经常讨论的就是绿色到底是什么。除了信贷、保险、基金，我个人认为保险是一个远没有发挥它重要作用的金融工具，我们说的比较多的是信贷和债券，还有信托、融资租赁，各种多样化的金融工具使用，包括资本市场在支持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发展的。

围绕第三个议题讲一下转型金融。庄巨忠首席介绍了碳中和路线图和中国的行动，他说非常核心的是能源转型。在当前，我们要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实现，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高碳密集型行业如何转型升级。但是由于我们在推动过程之中出现了运动式减碳，甚至一刀切地从高碳密集型行业撤资的现象，所以专家都谈到了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可持续发展再挂钩债券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利用转型金融工具去支持高碳密集型行业的低碳转型，它同样是可以把绿色的理念付诸其中的。

中国经济新形势

IFF 学术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75
黄奇帆：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我国经济内外循环发展的新特征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行长 79
郑之杰：中美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合作大有可为

IFF 学术委员、国务院参事 81
汤敏：推进新发展格局的未来产业发展路径

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兼中国新闻网总裁 83
俞岚：从经济周期、结构和体系的视角看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

中国经济新形势学术讨论 85

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我国经济内外循环发展的新特征

■ 黄奇帆 / IFF学术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黄奇帆

很高兴参加国际金融论坛（IFF）第十八届全球年会，结合今天报告会的主题，我想就“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下我国经济内外循环发展的新特征”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党中央提出我国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从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实际需要出发，着眼于实现下一个百年目标提出的重大战略。

我理解这个新发展格局中以内循环为主，至少意味着未来经济运行将会有五个新的特征：

一、我国将形成更具韧性、更有质量效益和更加安全的工业体系

我国现有的工业体系门类齐全，是全要素、全品种的工业体系，但实际上存在着几个问题：1. 许多产品处于低端低质，高端高质层面的关键技术和零部件被人“卡脖子”；2. 同质化竞争严重，产业内分工不足，细分市场的开放严重不足；3. 能源资源及部分粮食产品进口依赖度过高，总体成本居高不下，我们买什么，国际市场什么就贵，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存在隐患。在内循环条件下这些短板都会被一一弥补。

通过扩链、补链、强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在那些条件相对较好的地区如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和成渝双城经济圈，将形成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节约高效、规模达万亿级的具有全球经济力的产业链集群。在这个过程中处于头部的企业不仅要占据产业链供应链的关键环节，还要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与此同时，广大中小企业会致力于专精特新，努力成为嵌入到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不可或缺的隐形冠军。

二、我国经济将从高度依赖外循环国际市场转向更多依赖内循环国内市场、依赖国内经济循环体系

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在 2006 年时达到了高峰（64%）。进入新时代党的十八大以后，通过调整慢慢地降下来，到 2019 年我国进出口贸易占 GDP 总量的比重是 32%，2020 年进一步降低到 31.5%。

未来随着中等收入人群进一步增加，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将进一步凸显。过去靠国际市场外循环来拉动中国经济的格局将逐步转变为由我国自身超大规模市场的多层次、多样性的消费，牵引内循环、促进双循环的新格局，外贸依存度将逐步降到 25% 左右，经济运行将更多地依赖内循环和国内市场，国民经济将更加健康高效。

三、由追求产品市场高效流通为主向追求要素市场更高效率配置转变

在外循环拉动下，经济增长较为粗放，靠的是劳动力和资本的大量投入，但由于重生产、轻消费，订单为王、重商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转向内循环为主，不仅意味着要进一步打通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环节的梗阻，形成更加畅通的经济循环，还要通过推进劳动力、资金、土地、技术和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力。说得简单一点，外循环拉动下

拼的是要素的投入程度，比如说劳动力和土地等足够便宜，外资就来了；内循环驱动下拼的是要素的配置效率，需要有深层次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四、科技自立自强，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产业化的创新链条将更加顺畅

目前，全社会科技创新热情高涨。2020 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总经费的比重首次超过 6%，这一比例在此前十几年一直徘徊在 5% 左右，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这一指标平均为 20% 左右。“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将这一指标逐步提高到 8% 以上，相信未来还会进一步提高，到 2030 年这一指标会达到 15%，2035 年达到 20%，这样就使我们国家在基础开发环节，在核心高科技基本面的技术开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的 20% 左右。

在不断增加 0 到 1 的投入，提高 1 到 100 的转化力，催生 100 到 100 万的生产力释放的基础上，随着一批新型研发机构的快速培育，单方面被人“卡脖子”的情况会有很大改变，同时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开发再到产业化的创新链条也将加速形成。

五、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GDP 的占比将有较大幅度的提升

目前，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为 42% 左右，这个比例是比较低的，未来要形成以消费为主体的需求格局，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在 30 多年以外循环为主体的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利用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努力扩大出口占领国际市场，使得收益向外资出口倾斜，压低了劳动力的收入比重。所以在改革开放 40 年中，最初的 30 多年我们可支配收入占 GDP 比重是逐渐下降的，1980 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比重是 58%，到 2012 年降到了 40%，30 多年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十八大以来该情况得以改善，下降的趋势得到了遏制，并开始有了回升，2020 年回升到了 42%。

在今后以内循环为主、共同富裕的政策推动下，劳动力收入占 GDP 的比重将进一步地提升，到 2030 年预计这个比重可能上升到 50%，2035 年以后达到 52%。在这个过程中，随着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预计到 2035 年现在的中等收入群体将会从 4 亿增加到 8 亿，6 亿的低收入群体会减半，内需消费的能力将大大提高，内循环的第一动力将更加强劲，促进中国经济更好、更高质量的发展。

同时，以内循环为主的新发展格局，不是“内卷”、“躺平”，而是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是要形成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格局。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也会形成新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从引进外资为主转变为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

先看“引进来”，从 2001 年加入 WTO 到现在，20 年累计实际利用外资接近 2 万亿美元，其中近 10 年达 1.2 万亿美元。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投资的第一大国，2020 年在全球投资大幅下降的背景下，我国引进外资规模达到 1493 亿美元，逆势增长 5.7%。

再看“走出去”，从 1980 年到 2012 年，我们国家 30 多年累计走出去投资 5000 亿美元左右，十八大以后到现在不到 10 年的时间，走出去投资已经达到 5000 亿美元。这背后，一方面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国门，由贸易相通逐渐带动中国资本走出去，在当地投资企业满足当地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一些新经济从诞生之初就具备全球化的基因，有走出去的需要，比如说数字经济代表的抖音、腾讯、阿里等，这些企业从一开始就要考虑国际化，不走出去你的竞争力就会天生不足，就等于把市场送给别人，就会在全球竞争中居下风。随着中国经济体量增大，我们对能源资源供给的需求更大，尤其在新发展格局下，需要有更加稳定的产业链、供应链，需要吸收全球的养料，更需要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实际上是将内循环与外循环由过去商品流通的大进大出，升级到资本要素的跨境便利流动。

第二个特点，从扩大出口为主转变为既鼓励出口又鼓励增加进口双向并重。

当今世界，出口大国未必是经济强国，因为出口可能是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来料粗加工产品，而进口大国一般是经济强国，进口所需的外汇可能来自于技术和服务等贸易顺差，也可能来自于人民币国际化的直接支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预计 10 年以后，中国的 GDP 会达到 160 万亿人民币以上，按现行汇率换算约 24 万亿美元。同时对世界来说，中国也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预计未来 10 年累计商品进口量有望超过 22 万亿美元，服务进口总量将达到 5 万亿美元，两者加起来超过 27 万亿美元。这么庞大的市场需求必将对未来世界经济复苏带来直接而持久的拉动作用，进而助推世界经济循环逐渐走出低迷、走向复苏。

第三个特点，从沿海地区开放为主转变为沿海沿边内陆协同开放、整体开放、东中西同步开放。

自 2013 年设立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以来，我国已经分六批设立了 21 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实现了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全覆盖，特别是中欧班列的带动下，沿线通道经济、口岸经济、枢纽经济快速发展，为内陆城市对外开放拓展了新空间。这些尝试因中欧班列物流汇聚功能，带来更多人流、商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汇集，进而带动加工贸易、先进制造、保险物流、金融服务等产业的兴起和集聚，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随着产业的兴旺和人口的集聚，城市经济加快繁荣，形成了内陆地区新的陆港城市，一些重要枢纽城市如成都、重庆、西安、乌鲁木齐、郑州等，由过去的开放末梢变成了开放的前沿。

第四个特点，从关贸总协定和 WTO 框架下的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共同发展。

根据 WTO 统计，从 2012 年到 2019 年，全球跨境服务贸易出口占全球贸易出口的比重已经从 19.5% 提升到 24.5%，预计 2040 年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有望提高到 30% 以上。特别是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中间品贸易的比重现在已经达到 70% 以上，而中间品贸易背后需要大量国际物流、保险、金融结算、工业设计等等。尽管我国已经是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服务贸易第二大国，但是我国的服务贸易结构中存在着逆差大、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比重高，资本密集型、人才密集型比重较低的问题。在外贸结构中我们服务贸易占比从 2012 年的 11.1% 提高到 2020 年的 12.44%，这 8 年里面才提高了一点几个百分点。

为此，党中央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支持发展服务贸易，同时决定每年召开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习近平总书记已连续两年在峰会上致辞，宣布了一系列服务业开放合作重大举措，可以预见未来我国服务贸易的比重将会逐步提升，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将共同支撑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

第五个特点，从融入和适应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为主转变为积极参与甚至引领国际投资与贸易规则的制定修订。

中国加入 WTO 二十多年，全面履行加入承诺，大幅开放市场，接受、适应、融入以 WTO 为核心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进入新发展阶段，针对国际国内新形势变化，党中央提出实施贸易自由区提升战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既是主动应对规则、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大举措，也是更深层次开放，从过去几十年推动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性开放转变，实则是要全面对接国际贸易新规则，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实现国内国际营商环境趋同化。

目前，RCEP 已经签署生效，中欧 CAI 已经完成，中国已经申请加入 CPTPP，中国正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的谈判和制定，推动国际贸易持续朝着更加包容有序、互利共赢的方向演进。

总之，在“三新”背景下，国家经济发展显示的五个新基本特征和对外开放的五个新特点，跟我们过去 40 年的改革开放发展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这些新特征、新特点，将牵引新的发展路径战略，它不仅影响我国每年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规划，也会成为今后 5 ~ 15 年乃至 2050 年这几十年的发展特征和路径。

中美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合作大有可为

■ 郑之杰 /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行长

郑之杰

当前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疫情相互交织的影响下，各国经济社会发展都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本届 IFF 年会以“全球挑战下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变革、合作”为主题，对相关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这对于集众智、汇众力，应对全球挑战，促进全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节分论坛议题主要是围绕中国经济新形势来解读、展望和总结。谈到中国经济形势，一定绕不开中美关系、中美合作，这是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2021 年 11 月 15 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 1.2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这是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规模最大的基础设施扩建和现代化改造计划，将对美国经济的复苏带来积极影响。下面我以中美基建合作的新契机为题，谈谈我的看法。

一、中美基建合作恰逢其时，有利于促进全球经济稳定与繁荣

中国与美国是当今世界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是世界秩序中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当前中美两国发展都处在关键阶段。11 月 16 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举行视频会晤，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地沟通和交流，增进了双方的相互了解，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的正面预期，向中美两国和世界发出了强有力的信号。

在这个背景下，中美基建合作为构建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也为改善中美经贸合作关系提供了一个突破口。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拉动作用，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美国的 GDP 占全世界的 42%，中美开展基建合作将使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促进两国走向深层次的经济融合。可以预见，如果中美在基建领域能够成功地开展合作，必将为中美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同时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和繁荣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二、中美基建合作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

目前，美国能源、公路、桥梁、隧道、管道、电网、铁路等基础设施老化程度严重，急需修护更新，大部分基础设施几乎 30 多年没有修缮。2020 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对美国基础设施总体评级为 C 级，指的是有重大缺陷的平庸水平。过去这些年，由于政党之间的意见不统一，以及体制与制度等方面的原因，美国大规模基建计划一直未能顺利推进，基建资金迟迟不能如期到位。抛开这些因素，美国在基础设施、基础设计、建筑机械设备、建筑材料、供给和建设队伍等方面也存在不足，未来基建法案在实施过程中还需克服很多困难挑战。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较为先进的标准、设计、施工、管理和技术，逐步形成了中国建造的品牌，很多基础设施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比如中国高铁运营里程 3.8 万公里，占全球的 70%，且拥有自主技术和品牌；中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

16.1 万公里，每平方公里有高速公路 149 公里，高于美国的 115 公里。近年来，中国工程机械产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先进的工程机械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由于拥有强大的技术和组织能力，中国基建速度令世界惊叹。因此中国企业直接或间接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对美国加快基础设施更新速度，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效率以及通过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就业，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减轻债务压力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不仅能够分享美国基建投资的机会，也能够进一步熟悉国际规则，适应发达国家严格的商业经营环境，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因此中美基建合作能够实现优势互补，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三、几点建议

（一）深化沟通交流。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未来中美之间务实合作的重点，发挥政府间合作机制和沟通渠道的作用，深入开展对话，积极推动智库合作，围绕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准入、政策等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开展研究和规划，做好中美基建合作的顶层设计，共同描绘操作性强、开放度高、适应性广的基建合作蓝图。充分考虑两国政治体制的特点，加强两国省级政府的合作，推动两国基建领域的企业深化交流，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基建合作格局。

（二）聚焦重点领域。美国基建方案包括重建美国基础设施、加强制造业、创造高新就业机会、发展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内容，涵盖道路、桥梁、客运和货运、铁路、机场、港口和航道、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等交通基础设施，以及电力、宽带、水利、网络和环境的修复，西部水利等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涉及基建的方方面面，中美应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对接，推动重点领域标志性项目尽快落地见效。

（三）创新思路模式。积极探索中美双方都能认可的基础设施领域合作新模式，比如在深入研究当地法律法规、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鼓励支持中国企业通过 PPP、EPC 等模式进入美国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另外，中国企业也可以与实力强大、品牌声誉好的美国本土企业或其他国家的企业合作，通过金融资本组团的方式联合参与美国基础设施建设。

（四）畅通融资渠道。以基建合作为契机，深化中美金融合作，拓展金融合作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丰富金融合作的方式，更好地提供信贷、投资、担保、保险等金融服务，提升跨境综合金融服务水平，深入把握美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特点，项目建成后的运营规律，积极开展与之相匹配的新的金融产品，设计成本合理、风险可控的融资方案，为中美基建合作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中美基建合作具有广阔的空间，相信只要中美双方加强互信，政府、企业、金融机构等各方面共同努力，一定能够推动基建合作取得实质成效，实现互利共赢，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推进新发展格局的未来产业发展路径

■ 汤敏 / IFF 学术委员、国务院参事

汤敏

刚才黄主席已经把中国经济新形势的整个框架讲得很清楚了，我就讲三个具体的路径或者叫抓手。

一、让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产业链、供应链向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

十九届六中全会把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粮食安全和农业安全放在三大安全之中，那么现在谈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谈得比较多的都是芯片、“专精特新”、高科技这些的产业链、供应链，但是从这次疫情我们看得很清楚，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产业链安全和粮食安全一样，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产业链、供应链恰好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现在正在大量地向国外转移。怎么样才能把这些特殊的产业链、供应链留在国内？

大家可能不知道，全世界 70% 的假发都是在中国生产，过去主要在青岛和河南许昌这两大假发基地，但是由于工人工资的上涨，这个产业现在逐渐向孟加拉、印度、非洲等地大量转移。近年来，我带了一批做假发的企业家到贵州、甘肃等西部贫困地区去调研，看看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产业转移到贫困地区去。经过很短时间的努力，现在已经有几十家假发产业在这些地方投资建厂，很多企业甚至直接把车间建到了农民的家门口，贫困地区的妇女在照顾老人、小孩的同时，就可以做假发来补贴家用。我们发现这样不但可以促进生产，还可以促进消费。很多地方的苗族妇女在节日盛装的时候，都要把头发盘在头上，过去用的是真正自己的头发，现在很多年轻妇女都是短发，但是在盛装的时候又需要盘发，因此现在她们也成为需要购买假发的需求方。我国苗族妇女有 900 多万，贵州就有 400 多万，这是一个很大的需求市场。

同时我们还把制鞋业、织袜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到西部欠发达地区去。很多企业家说：“我到柬埔寨、越南好多地方转了一大圈，最后发觉我们西部地区其实

有很好的投资和产业转移的机会。”与其让这些产业转移到国外去，还不如转移到我们西部欠发达地区去。

这样做有什么优势？一是有劳动力优势。现在西部还有一部分劳动力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去东部打工，虽然现在东部劳动力短缺非常严重。把产业建在他们家门口，很多劳动力就可以运用起来。二是可以降低一部分成本。对工人来说，在家门口打工可以省去来回交通费、住宿费以及背井离乡等成本，即便工资稍低一些，工作的意愿也很强。三是西部地区有其独特的优势。从中国西部去美国可能比较远，但是通过中欧班列，可以直接将产品运到中亚，甚至运到欧洲，这反而比较近，从而节省一部分的运输成本。因此我觉得应该在这方面加快产业转移工作，把产业的供应链向西部欠发达地区转移。通过战略规划布局，建议有关部门来规划并落实如何转移这些产业，最好是采用大分散、小集中、一县一品、集约式的方式，不能什么都做，结果什么都做不好。集约式的方式，需要一些税收、培训的支持，具体不多讲了。

二、要充分利用跨境电商和新零售模式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

有人说，现在的供应链都掌握在外国的大公司手里，像美国、日本政府还在补助这些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应对？我想到一个刚听到的小故事，大家可能听说过有一个公司叫希音公司（SHEIN），这个公司是个专门生产女装的大品牌，虽然是传统的服装行业但崛起得非常迅速。我先给几个数据，大家看看这家公司有多牛。第一，在谷歌搜索引擎上，希音仅次于亚马逊，成为美国青少年第二喜欢的电商品牌，大家知道亚马逊上什么都卖，但希音只卖服装。在美国的谷歌上，它的搜索量仅次于亚马逊，排名第二。第二，在全世界 54 个国家的苹果搜索引擎中，该公司排名第一，而在 13 个国家的安卓搜索排名中是第一，但是希音在中国国内基本没有听说过。第三，有报道说中国国内大约三分之一出口服装的产能都被这家公司占了。希音公司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究其原因，第一是因为其服装品牌的上新数。大家都知道 ZARA，ZARA 是全世界服装快消品中最快的，它每年要上 2.5 万个新品，但是希音公司一个星期的新品量就能超过 ZARA 一年上的新品。第二，价格非常便宜。希音的服装平均 5 ~ 20 美元一件，而 ZARA 平均 30 ~ 150 美元一件。更重要的是第三，希音全部采取网上销售的全新销售模式。它在全世界雇了很多网红带货，网红带货从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的发明。网红带货跳出了国外大品牌服装公司的垄断，它可以做到物既美、价又廉。希音的成功也是中国未来打开世界市场的一种新的方向、模式。

传统的销售链、品牌都已经被国外大公司控制了。在这种情况下，希音把生产链、销售链和品牌都掌握在自己手里，特别是充分利用现在新的跨境电商、网红带货这些新零售模式，短短几年在传统的服装业可以打开这么大的市场，让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制造的新希望。

三、我们应该关注 10 亿中低收入人群的大市场

一谈到中国内需市场，大家想到的是 4 亿中等收入群体的市场。是的，4 亿中等收入群体非常重要，但是中国 14 亿人口减去这 4 亿，还剩下 10 亿的中低收入群体市场，这 10 亿中低收入人群的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10 亿人里有 4 亿在未来的 15 年中将变成中等收入群体，这是一个上升的很大市场，剩下的 6 亿人群也是很大的市场。现在的问题是没有好的产品、对的产品。

哈佛大学克里斯坦森教授提出一个新的理论——市场开拓性创新。什么是市场开拓性创新？在现实社会里，有一大批未消费人群，这些人不是不想消费，而是市场上现有的产品和服务太贵或太复杂，这些人消费不起或不会用，所以他们的消费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市场消费开拓性创新，就是要盯住这部分未消费人群，开发出他们所需要的产品，价格要低还要适合他们使用。这样的话，就可以开拓一个很大的市场，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平民化。

怎么才能实现这种产品的平民化？让产品既便宜又好用？主要有两点。

第一，一定要在现有的产品和服务里去掉一些不必要的功能。比如现在智能手机，可能百分之七八十的功能我们从来没有用过，低收入人群更不会用了，把这些功能去掉，就可以大大降低这种产品的成本。

第二，要瞄准低收入人群的痛点和刚需。把低收入人群需要的功能加入产品里，让产品既便宜又好用。这样可以开拓中国未消费人群市场，特别是将近 5 ~ 6 亿人口的农村市场。现在农村市场使用的很多产品都是城市旧款降价产品，应该为农民群体专门设计一些产品。不仅中国有中低收入群体市场，全世界也有大量的中低收入群体市场，我们占据这个市场把产品做好了，一样会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这些就是我们在新的发展格局下，在内外循环下几个非常值得关注、也值得突破的市场。

从经济周期、结构和体系的视角看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

■ 俞岚 / 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兼中国新闻网总裁

俞岚

一、从三个视角——周期视角、结构视角和体系视角看中国经济

第一周期视角。中国经济现在面临新的下行压力，风险问题和安全问题在凸显，发展和安全问题有时会有比较大的矛盾，如何去把握、统筹、协调，关键还是要防范重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如果追求绝对的安全，要绝对没有风险，可能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的安全也是没有意义的安全。无论是防范金融风险，还是防范生产安全的风险，都不能泛泛而谈，而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如果在经济下行的周期，再加上绝对的风险防范，将会加大下行的压力。

第二结构视角。重要的结构是区域结构和产业结构，在结构的比较中，经济越是落后的区域，越是发展的短板，同时也是风险聚集的地区，而且经济风险可以无障碍地传导到社会风险和其他风险上。发展的短板和风险的聚集叠加的部分尤其需要重点关注，因为发展好的地区和发展好的行业其实有非常强大的内生动力。

第三体系视角。新发展格局是要实现国内和国际的互相促进，安全风险也要考虑到国际压力和国际风险的传导。安全是底线，我们在坚持底线的同时，还是要推动国际国内的双循环。疫情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与美国渐行渐远的压力很大，不能因为安全的风险，而加大脱钩的压力，还是要充分发挥经贸这个压舱石的作用。总体来说，安全应该是一个边界，在这个边界里，应该让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成为主导。

二、在不确定性中如何去形成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怎么样看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和基本面？

首先，在疫情冲击后，外部环境的潜在不确定性继续反复，而且在强化，在新冠特效药物的疗效没有得到

经济越是落后的区域，越是发展的短板，同时也是风险聚集的地区，而且经济风险可以无障碍地传导到社会风险和其他风险上。发展的短板和风险的聚集叠加的部分尤其需要重点关注。

完全验证的情况之下，疫情在短期内对宏观经济的间歇性冲击和周期性往复的局面，或许还将延续。

2022 年，经济不会是绝对的衰退，但是复苏或者衰退以及相关程度会有高度不确定性。一方面，海外的通胀可能超预期上行，美国的 CPI 已经连续几个月在高位运行，远远超过了 2% 的目标值，最近好像已达到 6.2%。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近期也表示，新型变异毒株可能会危及美国经济的复苏，并加剧通胀的压力。预计高通胀还会维持很长时间，而一旦通胀超预期上行，美联储会被迫前移加息的时点，提高加息的频率，这会导致全球央行竞争性的加息，使得新兴市场的货币体系和资本流动承压，这对全球的资本流动市场造成明显的冲击。

另一方面，中美博弈可能会日趋激烈。尽管有的机构预计，美国对华的贸易政策会出现边际缓和，但是在科技等领域，美国对中国保持强压的态势还在延续。另外，明年多国会进入政府的换届年，一些国家政局不大稳定，也加剧了我们开展国际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全球化的难度系数会呈几何级上升，当然这种全球化只是被所谓的脱钩阻滞了，它根本的趋势没有改变。

其次，中国正在密集部署一系列的重大改革措施，稳定的宏观经济基本面是可期的。2021 年以来，中央加大了一系列的政策部署，包括碳达峰、碳中和、共同富裕、反垄断、“双减”、房地产治理等一系列长期性的重大政策。在宏观经济短期承压之际，中央未雨绸缪地进行这些跨周期的政策布局，其实还是要进一步加大实体经济的韧性，提升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的竞争力。

从投资层面看，碳中和的推进带动了产业格局的重塑和制造业强链、补链的投资，会让制造业投资增速超过市场预期。随着能源转型带来的制造业乃至工业全面的再造，制造业投资可能会取代基建投资，成为我国投资成长的主力，进而从顺周期增长的带动变量变为跨周期的驱动变量。

在消费层面，因为疫情反复的缘故，消费增速的提高幅度可能会有限，但是随着共同富裕措施的进一步落实和具象化，会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的差距，为消费提供有力的支撑。此外，针对平台经济、课外学科培训、文娱业的反垄断和整顿等措施，旨在消弭消费者价值的不当攫取，比如大数据杀熟，会促进平台企业降低费率，让渡他们的垄断利润，短期可能造成行业的承压，但长期看会改进社会的福利，对社会的拉动作用十分直接。

从出口层面来看，最近的出口增速一直保持高歌猛进的态势。但是从明年看，出口的这种增长态势会受到阻滞，随着各国大部分的财政刺激措施到期，经济预期增速下滑，居民收入下滑，我们的外需可能会呈现一个下降的态势，加上今年高基数的影响，进出口增速将趋于放缓，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方面。

2022 年，中国的宏观调控、宏观经济政策还会保持跨周期设计和逆周期调节双轨驱动。稳增长、调结构、促升级和防风险仍然会是主基调，其中，稳增长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

在货币政策方面，因为跨周期调节决定了央行对短期经济波动的容忍性提升，同时会更加关注预期的管理，因此未来货币政策趋向边际宽松，结构性货币政策继续定向支持制造业、“专精特新”民营企业、绿色金融、高端制造业等领域，也可能通过结构性的再贷款扩容提升基础货币的再贷款，尤其是绿色金融业务。

财政政策方面，年底前的财政后置和明年年初的财政前置将是跨周期调节的核心特征。有别于以往单纯的逆周期调节，跨周期调节着眼于长期均衡高质量的增长，可以把政策的力度和效果平滑到更强的时间维度，进一步去提高政策的持续性、稳定性和有效性。预计财政政策可能会在岁末年初集中发力，而广义的基建投资将会是财政发力的主要工具。

老基建体量大，可以快速形成实物工作量，对经济托底的效果会比较明显；新基建体量比较小，但是成长性比较好，像 5G、轨道交通、特高压、充电桩等领域，可能是未来财政发力的主要方向。

中国经济新形势学术讨论

主持人：章　俊，摩根士丹利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嘉　宾：黄奇帆，IFF 学术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汤　敏，IFF 学术委员、国务院参事
陈兴动，IFF 学术委员、法国巴黎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汪　涛，瑞银全球研究部董事总经理兼亚洲经济研究部主管
俞　岚，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兼中国新闻网总裁

章俊：我想请教黄主席，您如何看待绿色发展对于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意义？

黄奇帆：“双碳”的目标，如果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如期实现的话，对中国的经济会有三个非常积极的意义。

第一，给中国经济能源结构带来革命性的、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去年 100 万亿的 GDP 产生了 100 亿吨的二氧化碳，占全球碳排放总量 29% 左右，单位 GDP 碳排放量是比较高的。中国的能源主要是化石能源，在煤炭生产和发电的过程中产生了 57 亿吨的碳，在把原油生产为汽油、柴油的过程中也贡献了 20 亿吨的碳，所以我们化石能源生产电力的过程中，一次能源转变为二次能源过程中，产生了 80 亿吨的碳。另外，我们的企业和老百姓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除了用电以外，也使用了许多其他能源，产生了 20 亿吨的碳。所以两个方面形成了 100 吨碳排放。

如果 “双碳”目标实现以后，中国用清洁能源替代了化石能源，在电力生产方面减少 80 亿吨碳，同时我们的企业和老百姓生产生活过程中实现去碳化，也就是用电力进行生产生活的能源替代，实现国民经济生产生活电气化。如果做到这两条，整个中国能源结构实现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中国的能源生产将发生革命性、根本性的变化，这具有伟大的意义。

第二，对中国国民经济提高效益、提高质量，对国民经济结构性、根本性改造，也会产生积极的根本性影响。

中国 100 万亿 GDP 这样规模的国民经济，跟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的确有几个问题：

1. 国民经济消耗的原材料、各种物资是世界之最。全世界一年从地下开发的各种矿物质，差不多 50% 是中国消耗的。比如说我们用了全世界煤炭产量的百分之五十几，铁矿石的百分之五十几，水泥的百分之五六十。全世界一年消耗钢材 18 亿吨，中国消耗 10 亿吨。所以，总体上说中国的原材料消耗量是比较大的。怎么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的源头上减少物资消耗，这是一个重大问题。

2. 国民经济的单位能耗，现在中国每一万亿 GDP 所消耗的能源比全世界平均值高 50%，所以国家有一个目标，到 2030 年中国的单位能耗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到 2050 年中国单位能耗能够达到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国民经济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以后，中国的节能减排也会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3. 中国的循环经济水平还不够。目前中国工业品回收率一般不到 10%，世界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回收率超过 40%。节能减排，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实现过程中，提升我国的废品回收水平很重要。

4. 目前，中国国民经济中工业、服务业等流程有许多不合理之处，还有很多浪费资源、能量、增加碳排放的情况。所以当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时候，国民经济的效益会提升，质量会提升，整个结构也会改变。

第三，碳达峰、碳中和实现以后，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特别是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在第三次世界能源革命中的贡献将会是比较大的。

这个比较大的贡献不仅仅是我们把 29% 比重的碳排放量消灭掉，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过程中，不管是供给侧的装备还是需求侧的工具，或是远距离的电流传输，中国目前在世界上都有一定的优势。

比如去年，全世界清洁能源包括风力发电、水力发电、光伏发电，清洁能源装备的 60% ~ 70% 是中国提供的；全世界需求侧的储能装备、各种动力电池，73% 是中国制造提供的，电动车的终端这些装置，老百姓生产生活使用的这些装备，50% 是中国生产提供的，特别是远距

离的超高压直流输变电，目前传统的高压线每 1000 公里电流损耗 20% 左右，超高压的直流输变电每 1000 公里损耗是在 1.5。全球能源互联网，几千公里的远距离，从沙漠戈壁滩到大城市几千公里的远距离传输电流，把清洁能源从沙漠传到大城市，这个远距离传输只有中国的超高压才能解决问题，所以目前 100 万伏以上的超高压直流输变电技术百分之百的专利都是中国形成的，全世界都非常迫切需要。

我讲这一段旨在说明，在“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全球全人类共同需要的三大类技术，不管是供给侧的装备、需求侧的工具，还是远距离的电流传输，中国的技术现在都具有一定的领先程度。在今后几十年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这些技术同样不仅会为中国，而且会为世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发展、永续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章俊：共同富裕是今年的热议话题，习近平主席最近发表了重要文章《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背景是我们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想请教汤敏博士，如何在中国把共同富裕这样一个战略性的目标跟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的增长相结合，有没有一些您认为短期内和长期内的政策可以预期的？

汤敏：首先，共同富裕是一个非常长期的目标。在短期内能够大幅缓解收入差距，我觉得不太现实。但是我们也不能说等到很遥远的将来去做。

哪些地方没有共同富裕？什么是造成收入差距大的因素？很多分析说，中国最大的未共同富裕的因素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过去几十年我们推动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是增加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下一步就得要缩小城乡之间差别，目前总体上农民的收入还是远远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所以加快乡村振兴步伐，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重要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也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

第二个，很多分析认为教育之间的差距也是造成收入差距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怎么样让教育更公平，让教育能够惠及到所有的人，也是需要我们采取各种措施解决的。

还有把中产阶层人数扩大。到底什么是中产阶层？怎么定义？现在有多少了？也是众说纷纭，比较宽泛的说法是现在有 4 亿中产阶层，但是更严格地说可能不到 4 亿，有人甚至定义只有 1 ~ 2 亿左右。暂且认为是 4 亿的话，我们的目标是到 2035 年，使中产阶层的人数扩大一倍到 8 亿左右。这就要求我们的收入分配呈枣核形，而不是现在的金字塔形，即上头很少，中间也不多（4 亿），底下基座有 10 亿。要形成枣核形收入分配模式，第一个要扩大中产阶层的比例，同时也要减少低收入

人群。

收入分配问题不是短期能解决的，短期内我们采取的很多措施都是在逐渐缓解，所以它是一个分阶段性解决的方案，是长期的，大家不能有太高的期望。

其次，我们现在谈的很多都是收入分配问题。一谈共同富裕谈的都是钱，其实党中央讲得很清楚，我们不但是收入上、物质上的共同富裕，同时要有精神上的共同富裕。也不仅是精神物质方面，其他的很多社会福利等都是共同富裕的一部分。在这些方面，我们倒是可以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老百姓现在比较焦虑的问题，教育的问题、医疗的问题、养老的问题、环保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也是共同富裕一部分，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上的共同富裕。

现在有很多的措施可以加强、加速，而且还不一定需要大量的投入，比如说教育公平的问题。很多问题不是投入不够的问题，很多是怎么分配的问题，比如说北京市、深圳市现在开始教师的轮岗制度，并不需要国家投入多少钱，但是它可以大大地缓解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医疗方面，现在很多的资源都堆在三甲医院，如果我们把它同样投入到其他非三甲医院，更公正、更公平地把基层医院做得更好，投入更多，而且对到三甲医院看病有一定的限制，进行一些制度性的改变，就可以大大缓解老百姓觉得不公平、不公正或者说不够共同富裕的一些问题，这些在短期内是可以做很大调整的。但要做得完全公平、完全共同富裕，那也很难。

总的来说，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要做一个长期的准备，现在关键是要把这些问题解决。

章俊：下面请俞岚女士针对这个话题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俞岚：我对共同富裕这个话题没有深入的研究，我非常认同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目标，涉及社会、生态、文明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但这种共同富裕一定不是同步走、齐步走的过程，而是要先要把短板补上。

章俊：俞岚女士，请您分享一下对“双碳”的看法。

俞岚：“双碳”目标的提出，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未遇的大疫情叠加的大背景下提出的，中国展现出了很大的勇气和魄力，我们一直在谈判中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要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提出“双碳”目标，我觉得除了勇气和魄力以外，也是展现一种负责任大国的时代担当。

从“双碳”目标的提出到在格拉斯哥 COP26 上中国提出了一系列的务实举措，我们在世界面前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国际规则的遵守者和全球价值的守护者的形象。

国内对于“双碳”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作为长期的跟踪者，我个人的观点是“双碳”的目标不是一种直线的减法，而应该是一种系统的加减乘除法：加

法就是加新能源；减法是减“两高一资”（高耗能、高污染、资源性）；乘法是用科技创新；除法就是去除使地球增温的所有不合适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集体不自觉行为。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双碳”本身就是一种发展，而且是可持续的更高质量的发展。

第二个观点，“双碳”目标是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时代工程，不加区分的减和降是跟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中短期目标有冲突的，特别是对于不发达国家而言。所以发展经济和逐步提高经济的绿色含量，它不仅仅是一个短期的、现实的选择，也是一种长期的擘画。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一些急救招式，或者是顺其自然的，可能都不是我们实现“双碳”目标的一种可选项，应该是以存量经济的超低排放的转型和增量经济的范式变迁共同来支撑。

国内现在对于“双碳”有很多创新性的实践。央行推出了直达货币工具，它们是减碳和清洁煤炭高效利用的工具，是用结构性和直达的方式，用市场的价格杠杆机制来鼓励银行给企业的“双碳”目标实现助力，这不仅是一种货币政策的创新，而且也是我们“双碳”目标的灵魂。

现在新的经济时代，绿色应该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绿色本身是有价值的，而且它也能创造价值。很多中国有竞争力的行业，未来在这一轮的发展中可能会迎来风口，有些行业和地区可能短期内会经历一些阵痛。但是从长期和整体来看，随着“双碳”目标的最终实现，社会的绿色经济效益一定会实现帕累托改进。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办法总比问题多”，虽然现在办法不够多，但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进展和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办法一定会比问题多。

章俊：我想请教陈博士，您谈到明年的中国经济存在一定的下行压力，明年二十大召开，稳增长可能会成为政策的重心。在货币和财政方面，市场普遍预计明年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可能会有所放宽，比如说 M2 增速、社融增速有所回升，伴随着进一步的降准。但是也要看到外部环境，美联储因为通胀会收紧货币，市场预期明年会有加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在货币政策层面会出现明显的背离。第一您是怎么看待这个情况？第二您觉得这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人民币会重现贬值的压力吗？

陈兴动：谢谢！这是很好的问题，明年中国经济会出现稳增长、保增长的需求，这在政策上已经形成共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在即，估计一两个礼拜之内就能看到具体的政策。直观感觉上，可能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当然不会马上在会议上公布。最近看到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关于目前经济形式的分析文章，有三点值得汲取：

一是宏观政策的各种影响，设计更多、更高水平的政策。

二是政策出来以后，一定要进行评估，是否会对经济产生影响，是否会单独的做出来，各方都是做正确的事情，加在一起，如果没有协调和平衡，它对经济的影响很大。

三是政策执行过程中，要加强和市场的沟通，要充分理解市场，要有一个准备过程，要有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

从 10 月份开始做政策的纠偏，可能会继续加码。因此明年的政策重点，应该着重推动保增长、稳增长，把经济增长的动能恢复到一定水平的合理区间。这样才有比较充裕的条件来做其他的事情。如果基建增长掉到合理区间以下，甚至掉到 3%、4%，各方面就紧张起来了，我们就失去了很多做事的条件。

毫无疑问，货币政策需要围绕着这个主目标来展开。中国的货币政策一直在强调自主、独立，但是否需要一些调整、协调？目前美国鲍威尔对通货膨胀的看法、对就业的看法已经改变，已经丢掉了通货膨胀是短期的观点，现在认为通货膨胀可能会持续时间比较长，而且幅度还比较大。

因此大家都在预期量宽收缩的时间。利率的提高原来预计在 2020 年七月份，现在来看有可能往前提，这些应该说给中国的货币政策的调整构成一定的外部压力，但是我认为这不应该成为主要的阻力。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在强调，需要向市场提供充裕的流动性，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关键的问题是什么是充裕的流动性？比如说货币增长、社会的信贷总规模要和 GDP 增长大体匹配，有时候会让大家认为是鸡和蛋的关系。如果货币政策、贷款条件越收越紧，比如说再贷款或者再融资越来越困难，经济活力必然是下降，社会融资总规模肯定会下降，即双下降，因此有必要去调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现在只是个度的问题。

再来看对人民币的影响。人民币的汇率目前距离市场的运行和大家的分析判断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市场是从多种因素考虑，比如说考虑汇率的变动，首先看官方对人民币汇率的观点是怎么样，政策观点是什么。第二是经济基本面，包括正常的收支平衡和国际收支平衡。第三是市场的紧急状态怎么样，即投资者对它怎么看。目前来看，政府的政策是要保持人民币基本稳定，也允许基本稳定点的基础上有一定程度的波动。

比如，人民币的基本稳定点是 6.5，它在 6.5 上下波动，应该是可以的。国际收支平衡是会变的，目前大家都认为明年的出口增长会下降，而且和今年相比会大幅度下降。今年 1-10 月份出口的增长以美元计，增长 32% ~ 33%，明年的增速大概率会大幅度下降，估计是 5%。尽管有可能由于疫情，西方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仍然旺盛，但是已经在下降，这个下降是国际收支减少，但不足以触发人民币出现大规模的贬值。因此明年的人民币变动，最大影响因素是中国本身的经济增长。

章俊：汪涛博士，刚才您谈到明年中国经济潜在的、下行压力最大的可能是房地产投资，有人在想用基建对冲房地产投资。今年下半年地方政府专项债的发行速度在加快，明年专项债的规模可能依然维持在3.6万亿左右，因此明年的专项债可用资金会大一点。

您觉得在目前的情况下，明年的基建是否真的能够发力，地方政府债务到期还本付息的压力在上升，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也在收紧，大家在担心是否有项目的问题，您怎么看待明年基建是否可以发力对冲房地产下行的压力？

汪涛：我想在讲基建之前，再补充一下关于人民币的问题，很重要的一点，人民币的压力不仅仅看美联储的政策，同时也要看到美联储政策对美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大家认为美联储开始加息，美元一定是走强，但实际上我们预测明年美元会走弱。因为美联储加息和美联储缩减量宽，已经完全是在市场预计之中，而欧洲央行也会开始收紧政策，也会考虑通胀的问题，却没有反映在市场的价格当中，现在欧元是非常弱的。

这样的情况下，美元并不见得明年很强势，人民币可能对美元略有贬值，但是它会顺着美元、跟着美元，对一篮子货币出现比较大的贬值，今年是对一篮子货币升值了 8% 以上，明年可能就是顺势，不用做太多的调整，会自动有调整，因此对人民币的压力不太大。

至于房地产下行的压力，基建能不能完全补上。首先，我认为用基建来补上是不现实的，因为房地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大于基建。在我们的预测里，房地产政策可能会有调整，因此我们预测从房地产新开工和销售环比上来说，明年的二季度开始企稳，甚至有所回升，当然总比还是下降，这当然建立在假设政策会有一些调整上。

其次，明年消费的反弹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二季度之后，国内防疫的措施，尤其是基层地方政府层层加码过度的政策，可能有所调整。消费者很多被动储蓄率很高，因为花不出去钱，政策调整以后，这种被抑制的需求会有反弹。

基建方面，明年的专项债和今年的专项债预期差不多，但实际上在执行过程中，今年的专项债，一是没有花完，二是迟迟没有落地，项目没有落地，钱也没有花出去。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其实在账面上花出去和实际上花出去有很大的空间，表面上看今年的财政好像很积极，实际上很紧。地方有部分钱没有花出去，2020 年地方政府卖地 8 万多亿，2021 年前八个月的卖地收入仍然非常高，其中可能还有一些结余没有花出去。因此如果项目能够加速批准，甚至把未来一些项目提前到一季度来，基建的发力将会相当大。

项目方面，我们确实要集思广益，考虑到今年的能源短缺，要加大新能源的投入，包括电网的改造升级，怎样能够充分地运用新能源，还有公共交通，包括轨道交通这方面，这也是降碳很重要的方式。还有其他的节能环保、水利工程，包括我们讲到共同富裕的一些新一线、四五线城市，甚至农村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我认为都还是有很大的潜力。在这过程中，除了专项债、资金的腾挪之外，还有一点是融资平台方面，可能需要调整一下特别收紧的政策。

全球通胀、债务和经济风险的影响及应对

IFF 联合主席、欧洲理事会名誉主席、比利时前首相 91
范龙佩：通货膨胀催生了新的全球性问题

IFF 理事、墨西哥中央银行前行长 93
吉耶尔莫·奥特兹：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背景下的通胀和新兴市场前景

IFF 副理事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95
周汉民：面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如何稳中发展

IFF 副理事长、摩根士丹利全球副主席、意大利前财长 97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资源的重新配置助力疫后经济复苏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98
埃里克·博格洛夫：全球价值链挑战对新兴市场的影响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前局长 99
郝福满：疫情下货币与财政政策存在哪些瓶颈？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100
黄海洲：如何正确看待通货膨胀和汇率超调风险

通货膨胀催生了新的全球性问题

■ 范龙佩 / IFF联合主席、欧洲理事会名誉主席、比利时前首相

范龙佩

全球化的影响范围已经超出了严格意义上的经济领域，扩展到了多个领域，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气候灾害的爆发就是近期最典型的例子。我们都处在同一场风暴中，尽管境遇不尽相同。以通货膨胀为例，作为全球疫情的衍生物，它正在世界各地滋长，而其起因是疫情导致的全球贸易中断，某一问题的全球化会催生新的全球性问题。

目前，有关“去全球化”的讨论甚嚣尘上，然而从贸易数据上来看，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在欧中贸易取得了 30% 惊人涨幅的背景之下。但另外一个现实是，全球化正在拓展到新的领域，自 2008 年以来，我们经历了一系列的危机，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 30 年来的最高值，而在不久前，我们还在讨论通货紧缩的危害。我们以往的设想已经不具有任何意义了，这是我将提到的诸多悖论之一。

不久前，欧洲央行还计划将通货膨胀率提高到 2%，而今天，目标则是要把它控制在 2% 的水平。在测算核心通货膨胀率时，能源价格是被排除在外的。而能源价格上涨恰恰是目前通胀上升的主要原因。然而，我们必须继续将这些数据控制在合理的区间范围内。据欧盟委员会预计，2021 年通胀率将大幅上升 3.1%，2022 年为 2.2%，2023 年为 1.7%。因此，目前我们还远未达到滞胀，20 世纪 70 年代曾经出现过经济衰退与高通胀并存的滞涨现象。与 1973-1975 年首次石油危机爆发时的情况相比，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比利时，通货膨胀率一度高达 16%。

另一个悖论是货币当局在过去十年中的扩张政策并未对通胀率产生影响，而这让许多古典经济学家感到震惊。即使在疫情爆发之前、低失业率的情况之下，也没有出现违背古典经济规律的工资膨胀。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没能预见到这一波通货膨胀的来临。对许多经济学家

而言，通胀水平的上升只是暂时的，但持续时间或将超过一年，而并非几个月，欧盟委员会的数据就是这样预期的。

通货膨胀是一个复杂的现象，根据成因可以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胀。事实上这两类因素是相互关联的，它们都在能源价格的上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多数国家，有一半的一般性通货膨胀都是由这两个因素造成的。一些原材料和芯片的匮乏，是因为疫情期间投资延迟而造成的产能短缺。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也很紧张，因为在疫情期间，大量人口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或者退出了其中的某些行业，如酒店行业。此外，人口的老龄化也是造成劳动力短缺的原因之一。

许多人担心政府援助措施到期后会出现大规模的失业，但是很少有人考虑到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事实证明，担心出现大规模失业是错误的，物流行业也无法跟上需求的急剧增长，给供应链带来了一定影响。同样，在劳动力这一方面，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然而这种劳动力短缺是暂时性的，尽管它持续的时间将超过我们的预期。

预计在疫情过后，经济将呈“V 型”复苏，这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应验。在欧元区，近三年来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幅接近 12%，消费需求的强劲增长，尤其是对商品的报复性需求，也是通胀上升的原因之一。疫情期间，欧盟和美国居民平均购买力并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出现下滑。因此，在后疫情时代，花费存款将进一步推动需求增长，居民收入来源于政府公共预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较高的财政赤字也是造成通胀上升的原因之一。然而，强劲的经济增长反过来也有助于降低政府的财政赤字。欧元区的财政赤字在 2023 年将降低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2%，这与 2020 年疫情爆发时相比有了明显的下降，2020 年是 7%，而且这一下降是在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紧急措施下实现的。与此同时，欧元区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预计将从 2019 年的 85% 上升到 2023 年的 97%。鉴于目前利率较低，这还不成问题，而美国预计 2023 年公共债务将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130%，比 2019 年高出 20%。以往，由于高通胀率，实际利率会比本已经很低的名义利率更低，然而如果在通胀预期的推动下，名义市场利率上升，自然会对高额的私人和公共债务产生影响，而且是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所幸，欧元区和美国的央行已经宣布将在 2022 年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是以较缓和的形式。疫情打破的另一禁忌是财政平衡。几乎是在疫情刚爆发之后，欧元区放松了原本严格的预算制度。甚至连欧盟的预算也首次出现巨大的实际赤字，这是因为新的复苏基金将支持数字和生态转型投资，其数额将占未来三年欧洲国内生产总值的 3%。在欧元区危机期间（2010-2012 年），政府长期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如今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则秉持坚决的扩张主义。

然而，银行监管依然严格。想要更好地了解一个国家的债务状况，还必须考虑家庭债务和企业债务。但人们对这些数字的关注较少。这是不合理的。我们不该忘记，家庭和企业债务正是 2008 年金融危机的源头。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应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历史决不会以同样的方式重演。对那些背负沉重债务的人来说，高利率可能带来更为沉痛的领悟。但销售额或收入的倒退已经表明，一旦债务超过一定水平，企业和家庭就会变得脆弱。因此，从异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过渡到更“正常”的货币政策，再过渡到正常的利率，是一项非常棘手的任务。重要的是要确保由央行无法控制的因素，例如能源价格和生产限制，造成的短期价格上涨不会转化为永久性的价格和成本上涨。这样才能防止出现超出经济复苏预期的通胀。1979 年，货币贬值带来的巨大冲击，导致世界经济暂时陷入严重衰退。在理想的情况下，各国应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尤其是全球参与者应共同采取行动，同时要尊重各国央行的独立性。

我还想补充一个要考虑的地缘政治问题。能源、某些原材料及产品的短缺，促使全球行为体在战略领域减少依赖，进而增强了自主权。通货膨胀会造成政治后果，因为人们会觉察到自己的购买力和存款价值下降。在许多人眼中，购买力和工作仍然是最重要的，甚至比气候变化更重要。通货膨胀使本已被疫情加剧了的不平等现象雪上加霜，购买力下降还会成为极端主义分子的武器。当然，过于强硬的反通胀措施也不合适，因为会减少就业或造成更高税收。政策制定者必须找到一个有效的平衡点。当前，能源价格飞涨和大家对此表现出的不满，可以预见如果气候政策致使化石材料价格上涨，人们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因此，我们必须加强沟通，让有力者担重任。在某种程度上，通胀率上升是经济复苏政策成功的标志。虽然我们尚未完全摆脱新冠肺炎疫情，但在世界大部分地区，疫苗接种行动迅速、规模庞大。当然并非每个地区都是如此，这很遗憾，但这仍然使经济复苏速度超出了许多政府和企业的预期，需求的增加迫使价格上涨。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明智的政策来保护这一经济成果，与此同时，必须向全球、向全人类大力推行卫生政策。要让智慧之源永不枯竭！

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背景下的通胀和新兴市场前景

■ 吉耶尔莫·奥特兹 / IFF理事、墨西哥中央银行前行长

吉耶尔莫·奥特兹

我想重点谈谈通胀和新兴市场的前景。众所周知，疫情导致全球大量生产活动中断，经济大幅收缩。政府当局则实施非常规的财政和货币刺激，以避免更深和更长时间的衰退。

经济活动开始复苏后，全球经济遭遇一系列供需失衡，再加上其他因素，导致通胀率飙升至意想不到的水平。对通货膨胀的预测出现严重偏差，其原因可能是此次通货膨胀与众不同。此次通货膨胀是由疫情引发的，导致各种供应危机、劳动力市场波动以及对商品和服务的不对称需求同时出现，所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次的通货膨胀是许多央行所说的暂时现象，还是类似 20 世纪 70 年代的通胀？我自己的观点是，我们不太可能经历像 20 世纪 70 年代那样的通胀事件，因为央行拥有独立性和防止通胀的工具。

现在更重要的是，通货膨胀是否会比我们今天预想的持续的时间更长，此外，主要国家央行，如美联储，还有欧洲央行，他们的态度是什么？货币政策被收紧的程度会不会远远超过市场今天的预期？我认为这是一个更关键的问题。

鉴于通货膨胀过程的性质，供应链正常化的时间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对央行和美联储来说，保持平衡十分困难，美联储已经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计划，并表示将在资产购买计划完成时加息，大约是在明年年中。

现在我简单谈谈新兴市场。除了极少数例外，新兴市场正走出疫情的第一或第二阶段。相比于发达市场，新兴市场更贫穷、更不平等、债务水平更高，它们也更容易受到疫情的影响，比如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就是由于疫苗接种水平低导致的。这些因

素预示中长期经济增长前景不容乐观，因此缩小与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更加困难。此外，新兴市场更容易在市场缩减时期受到市场动荡和资本外流的影响。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政府债务比 2013 年增加了 1/3，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多，而在 2013 年占 40%。

如果这一波疫情产生与前几波疫情相似的影响，那么，许多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会推迟偿还债务。通胀率上升促使大多数新兴市场央行提高利率，以维持汇率或遏制资本外流。即便如此，如果发达国家的通胀再继续持续下去，并迫使主要央行 (尤其是美联储) 以更快的速度加息，大多数国家都会受影响。

这一切意味着 2022 年各个层面都将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不仅仅是通胀动态、央行的反应、政治氛围以及许多国家 (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 正在经历的两极分化。我们希望中国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发挥重要作用，不仅讨论疫苗的分配，还讨论国际组织在支持新兴市场和改善困难局面方面的作用。

在结束发言时，我想谈谈我所在的区域，即拉丁美洲。和其他新兴市场一样，拉丁美洲的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其通胀水平超过了央行的目标范围。因此，该地区的央行一直在加息，以遏制资本外流。但总体情况仍然极其复杂，在发达国家通胀过程中看到的不确定性程度，在新兴市场，尤其是在拉丁美洲更加严重，而且呈现出一些特殊的特征。

首先，通胀上升在拉丁美洲不仅反映了供应瓶颈和劳动力中断。极端的天气条件，价格控制和补贴正常化等政治手段，正在侵蚀许多国家的购买力。通胀预期上升也迫使各国央行减少货币刺激。在财政方面，可以采取财政手段的国家，如巴西，无法提供进一步的推动力。因此，收紧外部流动性和降低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进一步缩减可用的财政和货币空间。市场将受到影响，参与率恢复缓慢。此外，整个拉丁美洲都有政治斗争，这些斗争导致分裂，情况十分复杂。

如果大宗商品价格进入另一个上行周期，拉美和其他新兴市场可能会迎来一线曙光。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当务之急已经从寻求更高的增长率转变为更均衡的增长和机会，因此大宗商品价格和美元等的前景仍然非常不确定。

面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如何稳中发展

■ 周汉民 / IFF副理事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周汉民

今天这个题目——全球通胀、债务和经济风险影响及应对，有四个关键词我们必须紧紧抓住。

第一是关于疫情。疫情从发生到现在已两年，WHO 数据显示，全球已经有 2 亿 6520 万人罹患新冠肺炎疫情，死亡超过 525 万人。美国的数据更惊骇，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美国目前罹患新冠肺炎病人 4987 万， 死亡人数超过了 80 万。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全球流行，一周内已有 40 个国家发现新的病例。目前，我们对新变异毒株有三个疑问：第一，传染速度快过以往吗？答案是肯定的，一周已经有 40 个国家。第二，奥密克戎比德尔塔更严重吗？尚不知，还要等 10 天。第三，奥密克戎是否会产生免疫逃逸，我们也要过十天才能听到结果。

第二是关于通胀。当前美国的通胀创 30 年新高，还有两个数据可以补充，2021 年 1-10 月全球有 80 个国家的国内通胀率创 5 年新高；全球通胀水平预测为 4.3%，为 10 年新高。由此可见，通胀的程度很深，扩散很快，时间可能比预期的要长，不能过于乐观。

第三是关于债务问题。我们要高度关注债务问题，2021 年上半年全球新增债务 300 亿美元，此时此刻，全球各个国家的债务总额是全球经济总量 353%。就在昨天，IMF 提出了明确的警告，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中有 60% 的国家会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之中，这一危机可能使国家遭到重创，这一数据比 2015 年整整高出一倍。

第四是关于供应链。多少年不见的一个词汇叫做“短缺经济”又粉墨登场，我们看到海运和空运严重受阻。奥密克戎新变异毒株的出现，使世界供应链再次受到严峻考验。

中国何去何从？从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至今，我调研了 170 个企业，包括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调研后给我的启示就是，面对世界经济如此不确定、不稳定状况，中国有六个部分要稳。

第一要稳就业。今年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是 900 万，明年预计有一千多万大学毕业生。所以稳就业是我们第一位的任务，何况中国正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稳就业尤其重要和严峻。

第二要稳增长。今年我们的经济增长预期是 6%，希望能够达到，明年与此相比可能有一个落差，但不能落差过大，因为国家需要稳定的增长。

第三要稳外贸。今年外贸形势不错，1-10 月份中国出口增长 22.2%。

第四要稳外资。去年我国在利用外资方面居发展中国家首位。

第五要稳投资。就是对外投资。

第六要稳预期。最要紧的是我们不需要意外。

通过调研，我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要特别关注中小微企业，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栋梁所在。我们用“五六七八九”形容中国中小微企业的贡献。2020 年中小微企业上缴的税收占国家税收总量的 50%；占经济总量的 60%，去年中国经济总量是 101.6 万亿元，其中 60 万亿由中小微企业创造；科技知识产权 70% 的拥有者是中小微企业；中国就业岗位的 80% 是中小微企业创造的；中国现在所有企业的 90% 以上是中小微企业。

由此我认为有三件事要做：

第一，一定要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中考虑解决资金的流动性充足问题，所以适时选择降准是必要的，尤其是要对中小微企业给予应有的关注。现在是大数据时代，精准支持就显得特别必要。

第二，为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发展，国家在抗疫期间推行的缓交租金、缓交其他费用等政策是有效的，应该选择性地继续沿用。我调研了很多的企业后，发现这些政策起到了关键作用。

第三，是投资环境。人们认为投资环境主要集中在一个企业从创立到企业破产，我认为不尽然，最要紧的营商环境其实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法治五个方面都得到体现。政治上要清正廉明，要稳定；经济上要做到活跃而有序；文化上要做到包容，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社会上永远强调公平和公正；法治上要做到健全，我们不仅要健全国内法治，还要与国际法进行必要的融合。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会成为 RCEP 的成员，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已经正式提出要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让我们的法治与世界融合是一个关键支点。

资源的重新配置助力疫后经济复苏

■ 多梅尼科·西尼斯卡尔科 / IFF副理事长、摩根士丹利全球副主席、意大利前财长

多梅尼科 · 西尼斯卡尔科

西方在努力厘清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因为目前我们正在经历非常大的结构性变化，所以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思索才能真正了解状况。可以说我们度过了疫情危机，但同时消费萎缩，一些行业的生产力发生了结构性改变，政府和企业债务大幅增加。

面对疫情，欧盟做出了非常好的响应，实施了两类举措。首先是短期措施，欧盟在疫情中建立起沟通桥梁，将企业破产率和民众贫困率降到最低，这方面做得很成功。据估计，如果没有上述措施，欧盟失业人数将增加 100 万人。其次，欧盟设立了高达 7500 亿欧元的“欧盟下一代”复苏基金 (Next Generation EU)，这是一项长期的政策工具，专门用于后疫情时期的资源重新配置，涵盖环境转型、数字转型、基础设施等。我们需要谨记经济不会回到原有结构，需要巨大的资金来进入所谓的“新常态”。根据计划，“欧盟下一代”复苏基金将使用欧洲自有资金，直接进入市场，按照各国的需求或受疫情损害严重程度而不是体量大小进行发放。比如，我的国家意大利虽然经济体量不是最大，但收到了最大份额的资金，大约为 2050 亿到 2100 亿欧元。到目前为止，这方面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效。我们当前处于“V 型”复苏，欧洲经济与美国的情况不同，并没有过热。美国经济从通缩瞬间变为通胀，根源不仅因为供应链短缺，还因为经济过热，但是欧洲的情况并非如此。

其他主要的政策变化包括：首先，财政政策回归；其次，央行已不再是唯一的手段；再次，供给侧发生重大变化，因为企业希望重新稳定收入流；最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侧和供应侧都出现了变化。让人很难理解的是辞职潮，尤其是很多年轻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原因可能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变了，或者想找更好的工作等等。

通胀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通胀接近 5%，欧洲是 4.9%，意大利是 3.9%。西方目前对于通胀最主要的争论是它到底是暂时性的还是长期性的，没有人知道答案。因为目前尚不明朗，推动通胀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是内生的，而非自然状态。至于整体通胀是否会变成核心通胀，也就是长期通胀，取决于预期和预期的稳定性，以及央行会采取什么举措等等。但是我可以分享的是，三天前我见到了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女士，并进行了长谈，在西方 OECD 国家的所有决策者一致认为这次“多比少好”，所以目前可能有超调的风险，没有调整不足的风险，这是深思熟虑后的决策。现在最大的风险就是通胀，正如范龙佩先生提到的，存在许多与购买力下降、财富损失相关的风险。但反过来说，这有利于减少债务，因为债务占 GDP 的比例取决于名义 GDP。未来半年内，美联储可能更倾向于收紧货币政策，而欧洲央行在短期内不急于收紧政策，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我想指出一个有趣的现象，中国、欧洲和美国都在如火如荼地开展去中心化金融、加密货币等等。据我所知，中国正在研发数字人民币，计划在冬奥会之前推出。虽然今天不是加密货币研讨会，但是一旦加密货币开始从投资转为支付使用，就可以用来建立全球货币体系。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它可以用作货币改革的手段，对抗通胀风险，创立新的平行流通体系。当然这么说为时尚早，还需要若干年的发展。但事实上，现在的加密货币体系比新闻描述的更加发达。我们也非常关注中国的数字货币发展。

全球价值链挑战对新兴市场的影响

■ 埃里克·博格洛夫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许多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生产的主要工具，也是它们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式。不仅中国，许多其他国家也逐渐成长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环节。

埃里克·博格洛夫

2020 年召开国际金融论坛（IFF）年会时，全球疫苗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我在当时也强调在今后的很多年里，新冠肺炎疫情将会一直伴随着我们。2020 年，我们对疫苗研发充满希望，那时我们并不担忧通货膨胀问题，我们关心的是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特别是在新兴国家。我们还担心出现不平等问题。但从那以后，我们的增长预期就如同过山车一样起起落落。

近期，我们迎来了新的、十分令人震惊的负面消息。全球的通胀水平达到了惊人的高度。问题在于，这样的通胀水平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持续性的。目前，新兴经济体债台高筑，其内部存在的分歧被进一步扩大。大多数新兴经济体获得疫苗的机会少之又少。尽管这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但情况仍旧没有改善。这也意味着，这些国家将不得不用其几近枯竭的资源储备来抗击新一波变异毒株的冲击。在疫情的冲击下，它们比其他经济体更加脆弱。它们的增长预期也远远低于发达经济体。全球正面临着通货膨胀的压力，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新兴经济体中有很多国家在努力建立自己的基本框架，以对抗长期的通货膨胀。许多新兴国家，包括俄罗斯、土耳其等都高度重视通胀问题。甚至部分国家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提高利率，希望以此来控制国内的通胀上升。新兴经济体相比较而言更加脆弱，所以面临巨大压力时，稍有不慎，几十年的成果很可能在短期内付诸东流。

我最后要讲的一点，也是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已经成为许多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生产的主要工具，也是它们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式。不仅中国，许多其他国家也逐渐成长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环节。而目前，全球价值链面临的重重压力主要来源于气候问题和脱碳化。气候和脱碳将对我们选择在哪里生产、如何生产、使用何种能源、使用何种交通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切都将进一步加剧全球价值链所面临的压力。但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机遇，可以反之利用它们来推动脱碳化进程，并激励有意愿的新兴国家投资于绿色能源、绿色基础设施和数字化。这是新兴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必须努力确保全球价值链的完整性以及其在未来的良好运作。

疫情下货币与财政政策存在哪些瓶颈？

■ 郝福满 /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世界银行中国局前局长

郝福满

当前全球头等大事仍然是疫苗问题。疫苗研发一年以来，疫苗的生产和分配取得了惊人成就。疫苗不仅保障未来，也保护了当下。全球宏观经济政策表现也相当好。2020 年年中 IMF 预测，全球 GDP 将下降 5.5%，但事实上只下降了 3%。而 2021 年预测全球 GDP 将增长 5.9%，创下 1973 年以来最高纪录，比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更强劲。当时和今日的最大区别之一是政策响应力度。全球经济重心无疑在向制造业转移，因为服务业陷入困境，旅行尚未恢复。政府大力支撑需求，促进了世界经济复苏。

供应链与疫情和疫苗问题相互影响，也与各国政策息息相关。当然各国政策不同，但我认为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方面协调性不足，存在明显的瓶颈。一些国家的政策不利于解决这些瓶颈，这一问题很重要，值得进一步讨论。何时以何种方式退出经济刺激计划？

首先，由于 GDP 下滑和重大刺激计划，根据 BIS 数据统计，发达经济体的非金融企业债务 /GDP 从 280% 增长到 305%，新兴市场从 200% 增长到 235%。因此，从 2019 年起到现在，债务占 GDP 比率大幅增加，虽然近期略有下降，但债务水平依然高耸。攀升幅度最大的是政府债务，反映了政府的刺激性支出。例如零息债券，我们不去争论它到底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事实是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债券是由央行大量买入，甚至一些新兴经济体也尝试了零息债券。

值得高兴的是，债息和利息支出没有增加。因为结构性原因导致利率水平极低，所以发达国家的债息没有增加，甚至开始下降。不同的是，在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现有债务的债息增加了，其刺激计划深受债务的限制；根据 IMF 统计数据，其在疫情期间新增的债务远低于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到疫情之前有非常清晰的警示信号，债务快速累积，预示新的债务困境的风险。不过目前的债务水平远不及 20 世纪 80 或 90 年代，例如 80 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90 年代的低收入债务危机和重债穷国减债倡议（HIPC Initiative），当时外债债息远高于现在。当然，现在和过去有很大不同，现在出台了有力的政策，例如 G20 通过债务减缓倡议，已经预防了一些问题，未来会发挥更多作用。疫情算是超级的不可抗力，不管相关国家是否有偿债意愿，好的银行家都会做出延缓债务的决定。

第二，特别提款权。6500 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如果经过重新分配，更多流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将大大缓解一些国家的债务问题。所以，以上是退出刺激计划过程中需要管理的两大问题。

货币政策调整在未来某个时刻注定会发生，美国可能率先行动，其背后的动力与其说是经济因素不如说是政治原因。因为在美国，通胀已经成为政治问题，任何问题都被政治化，2022 年将迎来中期选举，所以我认为货币政策调整会到来，并逐渐在全球展开。

如何正确看待通货膨胀和汇率超调风险

■ 黄海洲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我们现在对通胀的担心是怎么来的？2020 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超出预期。2020 年 3 月，美国股市发生了四次熔断，当时市场上对全球经济的未来有非常大的担忧，有些人认为 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会重现。还有一些人认为全球经济会面临类似于 1929-1933 年大萧条的冲击。以美国为例，美国 1933 年的股指是 1929 年的 1/10，在这三年内美国股指每年掉 30 个点。美国 1933 年的 GDP 是 1929 年的 1/3，美国从 1929 年到 1933 年每年的 GDP 巨幅下滑 20 个点以上，三年加起来下滑接近 70 个点。当然还有其他问题，例如失业率上升得也非常厉害，达到 25% 以上；有 9000 多家金融机构倒闭，其中甚至不乏非常重要的系统性金融机构。

世界会不会出现类似于大萧条那样的风险，当时有一些争论。我的观点是中国和全球都不会发生类似于 1929-1933 年那样的大萧条。一方面，中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措施非常积极有效。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尤其美国的 GDP 增长速度实际上比原来担忧的要好得多，美国全年下滑 3 个点以上，1929-1933 年是一年下滑 20 多个点，连续下滑三年。美国 2021 年 GDP 增长 5% ~ 6%，经济恢复得相当不错，明年美国 GDP 的增长可能还会在 3% 以上，所以，不会出现大萧条这样的风险。

但是这样的结果是怎么来的呢？我认为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美国使用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和非常强力的财政刺激。从货币政策而言，从 2020 年 4 月份到 2021 年 4 月份，美国的 M2 增长速度超过 20%。美国正常时候的 M2 增速大概是 4% ~ 5% 左右，现在的增长速度是正常水平的 4 ~ 5 倍。上一次美国 M2 的增长速度在 20 个点以上是在二战期间，当时美国的 GDP 增长是 15 个点左右。其次，美国的财政刺激幅度是空前的，从 2020 年 4 月份到 2021 年 4 月份，美国政府在一年时间里把财政赤字推高到了 6 万亿美元的水平，相当于美国 20 万亿美元 GDP 的 30%。

实际上，遇到这样的情况可能决策者更愿意面临汇率超调的风险，而不愿意面临汇率低调的风险。所以，

黄海洲

美国明显有汇率超调风险，且现在正在具体化。美国最新的 CPI 通胀达到了 6.2%，而上一次这一数字的出现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这是一个暂时现象还是一个长期现象？我认为是一个暂时现象。

什么叫暂时的？是几个月叫暂时的，还是一年是暂时的，还是两年是暂时的？我认为这是一个时间尺度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此前美联储对暂时的理解是过于乐观的，认为几个月就过去了，现在看来这个时间可能要略长一些。但我认为美国的通胀水平明年会明显下滑，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是一部分市场人士的看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还是暂时的。

为了应对如此高的通胀，美联储 11 月份已经开始缩表，市场也预计美国可能会在明年 7、8 月份开始加息。是否开始加息，我们要等明年才知道，但缩表的过程已经开始了。

美国应对这样大的危机，财政刺激的力度远远超出了市场预期。欧盟在成立之初签订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要求一个国家在进行逆周期调节的时候，其财政赤字不能超过当年 GDP 的 3%。而美国做了什么呢？美国翻了 10 倍，30 个点。通胀是怎么来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

第二，汇率超调风险有多大？我认为意大利财长表达的观点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他说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决策者宁可面临汇率超调风险，而不愿意面临汇率低调的风险。汇率低调的风险就是经济反复拉也拉不起来，最后时不时面临通缩的危险，可能会变成久病难医，在这种前提之下不如一次性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力度打到极限，这个讲法我认为是相当有道理的。

2019 年之前，美国、欧盟、日本最担心的问题是什么？这些国家最担心的问题是美国日本化，欧元区日本化。2012 年以后，欧元区一些国家面临了零利率、负利率、低增长的问题。日本 20 世纪 90 年代出现金融危机以后，有过失去的 10 年、20 年、30 年，30 年期间日本几乎是零增长、零通胀、零利率，其结果是什么呢？虽然今天日本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过得去，但结果对日本经济的伤害很大。原因很简单，大家想想一个国家 30 年没有增长，其他国家还在不停地增长。正常情况下全球 GDP 的增长应该是 3% 以上，而中国增长非常高，日本跟其他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就拉大了。日本 20 世纪 90 年代最好的时候，人均 GDP 是美国的 140%。经过 30 年的零增长之后，日本今天的人均 GDP 是美国的 70%，日本的人均 GDP 掉了 70 个点，这一风险是非常大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中国这样的国家，当然还有其他国家，稳增长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没有实现增长，其他很多问题都难以处理。因此，我认为美国包括欧元区应对通胀的出发点，实际上有一个重要的考量，就是 2019 年之前担心它们日本化，这一风险非常值得关注。

第三，我个人认为欧元区明年不会加息，美国明年是否会加息还有待观察。通胀是不是暂时的，今年没法确定，明年才能知道，今年还没有必要过于担心通胀的问题。

最后，中国政府手里有非常好的政策工具，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实际上中国今年的财政收支比年初时预期要好，从货币政策来看，中国央行也具备货币政策调整的条件。就明年全球增长而言，全球货币政策的周期可能是不同步的，有的国家要面临加息的风险，而另外一些国家可以把货币政策适当调宽松，比如中国。

全球税收政策的改革和影响

IFF 大会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103
周小川：对全球税收问题的几点思考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107
贾康：税收政策在经济调节发展中的作用

安联首席经济学家 109
卢睿德：浅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税收政策改革

全球税收政策的改革和影响学术讨论 110

对全球税收问题的几点思考

■ 周小川 / IFF大会主席、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周小川

2021 年在意大利召开的 G20 峰会，主要注意力都在如何解决疫情以及经济复苏的问题上。会议在全球税收问题上，也达成了一些协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可喜的进展，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因为以往财税问题大都是各国国内的问题，很少在国际上研究讨论，并达成什么共同的行动。但是随着全球化，特别是数字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必须被抬到国际日程上。

首先，这次达成的协议是一个好的开始。各方面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比如说，全球最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协议，是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 BEPS（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项目所取得的一项历史性的成果，对于构建更加公平的国际税收治理体系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些发达国家的新闻报道给予了很高评价，强调是 136 个国家达成了里程碑式的协议。美国重量级人物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最终将为美国的工人和纳税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美国的现任财长耶伦也说，这是 30 年来公司税率逐底竞争的结束，它确保了政府拥有稳定的税收来源。

然而，这只是一个开端，要真正落实还需要加强研究讨论和协调，可谓任重而道远。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税收在各个国家都是要有国内立法的，因此真正走到这一步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第二，现在达成的协议，韧性还是比较大的，有几个杠杆。比如说，企业利润率超过 10% 就应该和市场进行分享，10% 的利润指什么利润，是否能够严格地进行计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有一部分税收收入应该分享给所谓消费市场的话，最后议定的杠杆是 25%，那么 25% 的企业所得税要拿去进行分享。25% 的比例也是讨价还价得出来的，最开始定的是 20%，最后在一番讨论后又变成了 25%。只是说 25% 应该在市场中进行分享，但是市场在多个国家之间应该怎么分，怎么样计算，这些都缺少细节。

因此，我们说其实税收还是需要理论分析的，理论依据如果不够充分的话，道理就不容易说得太清楚，协调起来就困难，讨价还价就会很多。所以，大家也不要过于乐观，这才刚起步，需要做很多工作才能真正有所推进。

第三，纳税和征税依然是一种博弈。新定的东西还没有经过博弈，也没有经过博弈的模拟。所以我们不能轻易地低估纳税方的避税能力，通过多年观察，全球各种各样的公司，还有一些“避税天堂”国家的政府，它们都是非常聪明的，想出了很多避税办法。另外全球还有一些专门为避税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咨询公司，它们都是很有经验的，每出台一个税收规定，它们紧跟着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

刚才提到如果企业利润率超过 10%，利润率是怎么计算的？大家也都知道，像很多吸引外资的国家，除了降低税率以外，它们还可能有像税收返还、在其他方面向企业减让成本等各种各样的方法。对于不同的税基，比如说是销售利润率还是股本利润率，这些税基都有很多手脚是可以做的。

再有，我们缺少很多国际共同的东西，若干年前大家都在说国际会计准则应该慢慢收敛，不同的东西合而为一，但目前也还没有做到。因此，在衡量企业利润以及许多财务指标方面都是依靠会计准则和审计的，我们

是否能够有一致的理解，同时有可信的国际审计，目前也都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因此，我们可以预见未来还是一场像猫捉老鼠一样斗智斗勇的博弈，在这个过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第四，大家也要关注一下这次税收协议的背景。我认为数字经济是背景之一，其实更主要的背景还是因为一些主要发达国家财政收入不足，支出正在加大。支出加大的原因，一个是全球危机，另一个是新冠肺炎疫情。许多国家财政捉襟见肘，因此也都急于要把财政收入搞上去。虽然说口头上多数都在讲公平竞争、税收公平，实际上税收不足、财政赤字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

回顾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一些系统性重要机构不能倒，就要花很多钱去救助。2008 年，美国财政部曾希望国会批准一个 760 亿美元的资产救助计划。当时，英国两家大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劳埃德银行出了问题，英国政府拿出了 5000 亿英镑救助，这个数字是很大的，对英国来讲负担很重。与此同时，荷兰、比利时、法国也都有一些救助活动。

2008 年金融危机时，G20 一方面想办法把税收巩固上去，这样能够尽量满足克服金融危机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大型金融机构不能倒，所以必须增强自己的资本，搞了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银行。之后 G20 又推出了“总损失吸收能力”，意思是说大型金融机构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出了问题要想办法自救，不能躺在财政上。因此，全球税改就开始向增加财政资源方向倾斜。疫情也是这样，大幅增加了公共支出。

现在有很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例大幅加大，很多甚至超过了百分之百，有点类似于 2010 年到 2012 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所讨论的希腊问题。那时候希腊问题很热门，就是因为其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例达到了百分之一百多。这是一个很严肃的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涉及国家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最近的日子之所以还没有像当年希腊那么难过，主要是因为全球的货币政策都相对比较宽松，有很多量化宽松（QE）政策在，所以日子还好过一些。

回顾历史，税收率究竟应该高一点还是低一点，税基应该宽一点还是窄一点，它也像钟摆一样的，它会向左摆，到一定程度向右摆，然后再走回来。美国里根、英国撒切尔执政时期开始强调减税，强调能私有化就私有化，强调“小政府”。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全球性税收改革，增加劳动力市场灵活性。而在全球性税改之前，有些国家，比如说荷兰，最高边际个人所得税税率曾高达 88%。到了经济危机的时候，有很多需要支出的地方，资金不够用了，就往回摆了。要强调是必须保证公共收入在 GDP 的占比。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大幅减税，由于他的做法和支持政府高开支的 MMT（现代货币理论）相配合，使得这个钟摆往回摆的过程中又卡了一点。拜登当选以后，耶伦作为财长，立刻提出有些税收需要增加，需要巩固财政的资源。耶伦财长对这次 G20 协议的评价是巩固了政府财政的税收来源。在这个过程中 OECD 做了很多工作。

第五，OECD 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OECD 还是比较擅长财税的，世界上有很多全球性组织，贸易、金融、扶贫的。在财税方面，OECD 做了很多研究，目前还没有全球性的财税协调机构，OECD 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全球危机刚一发生，OECD 就向 G20 提出了要打击“避税天堂”的提议，并经过 G20 讨论通过，随后又搞了 BEPS（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 包括了很多子课题，也形成了一种巩固财政收入、防止逃税避税的做法。随后又通过自动情报交换，主要不是针对跨国公司的，主要是针对个人的，也就是一些个人通过把存款或资产放到海外来逃避个人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

总体来说，这些努力对于挽救财政资源显然是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在市场上听到，这些做法出来以后，使得全球跨国公司这支力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打击。全球跨国公司过去在全球事务中历来是嗓门很大的，它的声音也是很重要的，在一系列动作之后，跨国公司的声音变弱了，甚至有些国家走过了头，要把跨国公司的业务活动拉回到本国去，生产和就业都要在本国解决，这个也是有点过分的。

这次对最低所得税率的竞争做了终结，将企业最低所得税税率确定为 15%，一方面有促进公平竞争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任何事物都有可能的一定程度的副作用。我要强调的是，OECD 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但是 OECD 也应该站位更高一点，不仅考虑财税的问题，也不仅考虑发达国家国内预算平衡的问题，还要考虑救助危机和救助疫情的需要，同时还应该考虑和其他重要经济现象的关系，特别是和全球化的关系，应注意到有些政策落实完成后有可能使得全球化的趋势，即多边主义的趋势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削弱，这方面应该给予足够的关注。

第六，关于跨国公司的看法。应该说跨国公司既有好的方面，也有出问题的方面。总的来说，跨国公司是全球化一个重要的基石，跨国公司的声音过去也都是立体的、全球化的，如果没有这么多跨国公司，也不会有今天的全球化。

从中国的经验来讲，这么多年中央政府和各个地方政府特别欢迎大型跨国公司落户，在很大程度上也表明它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益处，中国也历来强调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强调要使生产的各个环节能够充分体现比较优势，这些都是对跨国公司的一种支持。

当然跨国公司也会在税收方面做很多文章，避了不少税，也造成了一些扭曲，一方面应该予以纠正，如果是因为有政策漏洞，应该把漏洞堵住，但是要防止过度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情绪利用这点，导致在做这些政策讨论的时候向保护主义倾斜、向民粹主义倾斜。中国维护支持多边主义，支持全球化的力量的态度非常明确，面对当前的形势，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坚持多边主义而且要搞真正的多边主义。最近这些年，出现了去全球化的倾向，特别是美国政府有这种趋向，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应该火上浇油，要更加注意和维护多边主义的力量。

交税纳税，利润转移，各种会计上的手段，这种漏洞历来是宏观与微观之间的博弈。有这种博弈，我们不能只在一方面把它都怪罪于跨国公司，好像跨国公司如何如何不好，确实要像 G20 一样，要看到政策上有哪些漏洞，要改进加以协调。

如何加强研究来完善全球性的税收？ OECD 的主张有几个非常合理的方面，我简单回顾一下 OECD 的主张。首先，要在经济活动发生地来征税，因此跟这个相联系的，也就是说你尽可能要在经济活动发生地来设置子公司，作为独立的纳税人。当然，OECD 也看到，当前在数字经济情况下，确实有些地方不用设子公司，也在那儿开展了不少业务挣了不少钱，因此又提出市场国也应该分享一部分企业所得税，这种企业所得有其他若干种来源，但是很大部分来源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广告收入。这些都是合理的议题，但是要做好并不太容易。

个人觉得，一是要在增值税上下功夫，在哪个经济活动地产生增值，哪个地方就应该交增值税，虽然美国不搞增值税，但世界上多数国家现在都在学习增值税。因此，从增值税的角度来落实 OECD 的精神是一个出发点。当然，如果要想把利得税做好，必须建立在会计准则上，也就是会计准则要保持在一个真实成本，要真实的公平竞争，同时也要防止通过价格、通过补贴产生过度混乱、影响真实成本的现象。如果经济活动发生地在增加价值上做得不好的话，就会过度地把这个眼光、注意力吸引到所得税方面，而所得税方面要想做得好，能够协调得好，其实难度也是很大的。

再一个，也涉及广义的广告收入，它的收益方式究

竟是什么，这个是数字经济带来的非常明显的变化，大家所说的所得税分享内容里，很多是广告收入，这个还需要做很多研究。

再有，税收在各国之间的分配将来会是老大难问题，因为大家都会为自己的利益力争。这个现象在中国中央和地方之间也是存在，地方之间也会抢各种各样的税收收入，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于确实难以划分究竟是给谁合适的这种税收，在中国所实行的是把它放入中央税，反正中央也有很多支出的需要，如果放到中央税就不用争了。在全球来讲，现在没有这样一个机制，也没有这样一个机构去研究或建议执行这样的做法，但是全球公共性支出的需求是确实存在的，特别是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全球疫情出现以后，这种需求就更加明显。

最后，如果强调全球的公平竞争，不管是从贸易投资，从税收，还是从很多方面来讲都是重要的，但是不要想象说税收方面鼓励公平了，事情就都解决了。其实更重要的方面是各个不同的国家、跨国公司、数字平台公司如何争抢市场份额，在价格竞争上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手段，这些必须要解决好，要不解决好的话就会把过度的责任推给了税收方面。

其实，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有些必须从资本利得的角度来加以解决。资本利得的角度，其实也就是说公司也许没有赚多少钱，要从这次 G20 达成的税收协议角度来衡量它，也许你不见得能够从那儿得到多少益处，但是实际上由于公司估值的大幅度增强，变现以后所获得分配上的差异就是非常巨大的。这些问题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21 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特别强调的，还要注意从资本利得税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当然这个事难度也是很大的。

以上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对于全球税收问题需要加强研究的几个方向的几点看法。

税收政策在经济调节发展中的作用

■ 贾康 /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贾康

就今天讨论的议题，我从以下四个角度谈一谈对全球税收机制的看法。

第一个角度，OECD 会议上形成的国际税收协调方面的进步，确实有一定历史性意义。大背景还是全球化，总体来说，全球化作为主潮流仍在推进的过程中，逆全球化的一些因素也不可忽视。但就 OECD 协议本身而言，总体上有助于全球化主潮流的认同和推进。它从税收协调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体现了在全球经济事务中有很大影响力的美国及其盟友，以及相对稳定的 OECD 集群，它们至少从理念、原则到一些重要的规则方面，终于形成了协调框架。税收的协调在经济社会生活中，即使不是能起到巨大的作用，也是非常重要的协调组成部分。一直以其协调的效应渗透、融合于国际社会层面，各种各样的互动、双边、多边、总体的协调，OECD 和外部的，势必要在这方面有扩展的效应。

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直接税概念之下的所得税，当然现在所说的还是企业所得税，有着一个 15% 的底线，这样一个底线也意味着，已经讨论多年的那些避税天堂，在全球经济事务中所产生的作用会得到遏制。在实际生活中，正像周小川行长所说，这还只是一个开端，以后的协调一定是长期的博弈过程。从税收这个概念上介入的协调，它一定还会拉动会计准则、方法、国际协调，以及方方面面需要互相审计的协调，这是对它的一个判断，总体上是要给予肯定的。在全球化的取向上面，有很多标志性的进步意义的税收协议，我们应该给予它足够的认识。

当然对于跨国公司来说，它们的作用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这种制约在全球化的实际效应方面并不完全是正向的，它可能有制约带来的负面影响作用。但是从全面的判断来说，总体看来这样的税收协定在推进过程中，是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下的协调和应有大方向下的进展。

第二个视角，延续着周行长刚才说到的一个重要观察的概念，即在主要经济体税收政策取向上，实际上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一种摇摆和轮回。最典型的是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曾经有 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时期，解决其滞胀难题的是里根经济学概念之下的减税。总体来说，在方方面面对于这一协议都给予高度评价，对于经济、生活有较好的正面效应，在理论方面也引起了供给学派和致力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创新经济学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思考。此后，考虑税收问题时，它具有非常值得肯定的启示意义。

供给学派结合里根的减税政策在学术界影响广泛深远，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时常提起这个基本认识框架。里根经济学减税为主的取向，也受到了客观的制约，它在推高经济生活、经济水平、激励创业、创新活动的同时，也使政府公共管理不得不应对非常棘手的赤字高起、债台高筑的问题。所以，在减税方向上不可能一直走下去，摇摆必将到来。也就是说，每一轮的减税之后，势必会有或多或少弱化减税政策，甚至明确提出加税的轮回或者回调。

特朗普在取得竞选胜利以后，大张旗鼓地减税，确实在一段时间内对美国经济整体态势向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在疫情冲击之下，美国经济面临各种非常严峻的新挑战，而且直到现在，美国仍处于疫情的挑战中。

其实，特朗普减税的逻辑和当年里根的减税是如出一辙。

拜登政府上台之后，除疫情之外，碰到的更突出问题是必须遏制赤字和债务方面的风险，对此拜登政府现在的政策取向已经非常明确就是加税。现在的加税和原来的减税相对比，在摇摆和轮回中间，原来的减税有利于全球化的大潮流，全球生产要素更多地被吸引到美国，这样一个立足减税和打开新局面的经济体。现在的加税必然反过来，对于全球生产要素流动的吸引力下降，但又不得不维持。美国人的务实精神在这一轮新的税收协定里的体现，还是相当积极主动。OECD 经济体达成的税收协议——15% 的企业所得税水平作为底线，至少使美国现在加税造成的要素流动吸引力下降得到了很大的缓冲，更有利于现阶段必须回调的政策，它的正面效应体现出来。美国方面非常务实，对于整个 OECD 国家取得基本共识协议的成果，客观来讲，既有利于美国在摇摆和轮回中间对应一些现实的问题，也有利于以后全球共筑一个地球村经济体，大家要进一步地去认识怎么样做好税收协调这方面的事务。

它对于中国来说也很有启示意义。中国义无反顾地高举全球化的旗帜，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OECD 在全球有重要影响力。所以，对于OECD形成联盟式的关于税收协调的基本协议框架，中国应该充分认识其对未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可能产生的间接或直接的影响和关联作用。从直观角度来看，15% 的所得税底线，在企业所得税这一方面，中国所受到的直接影响算不上大，但我们虽然不是 OECD 国家，可已经在和 OECD 国家加强协调，也会产生间接影响。

客观来讲，对于我们的实际影响比较弱，中国企业所得税实际的税率，最有观察意义的还不是名义税率的 20%，多年以前高科技企业、上市公司就是 15%，正好压在底线上。所以，这次的税收协议对我们没有什么冲击力。实际上，这一段时间中国对于中小企业优惠的税率甚至低于 15%，即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按照减半征收。当然，这是在中国的法律框架之下一个阶段性的权宜处理，可能到期以后再延期，总体上相对灵活。

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要在观察外部世界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协调运转过程的同时，也要积极考虑顺应国际协调的大趋向，做好和国际社会进一步的协调，包括税收，也包括由税收连带的其他方方面面的协调。

第三个角度，中国显然在税制的建设方面是明显有别于 OECD 国家的。我们还在经济社会转轨过程中，在改革的深水期攻坚克难，面对这样的税制改革，中国特别突出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和 OECD 国家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结构大相径庭，中国直接税的比重还相当低，我们最主要的税收来源是间接税。这是在比较低的发展阶段必然发生的，现在中国需要一步步推进现代化，按照“两步走”新战略，“十四五”时期要使中国人均 GDP 达到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

中国的现代化必然要包含着税制的现代化。税制的现代化要求中国必须在改革深水期攻坚克难，贯彻中央所说的提高直接税比重这样一个制度建设的任务。在 OECD 税收协定里，特别着重于直接税形成的税收协调这样一个局面。我们要思考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过程中，更好地同国际社会协调的同时，我们自己的税制改革、制度建设的任务也要跟上。现在中国直接税的建设任务，面对的现实问题非常突出，例如个人所得税怎么样能够进一步地优化。现在大家都关注房地产税这样的直接税的改革，怎么样按中央的部署，双管齐下地往前推进。还有过去文件提到的，但实质进展还微乎其微的研究，如开征遗产税这样的问题，这是第三个角度。

第四个角度，在展望概念时，再简单地做一下其他相关问题的重点探讨。2021 年 7 月在威尼斯召开的 G20 财长会议强调的是更公平、更稳定，除了企业所得税涉及企业利润、全球要素以及流动中间各个国家的税收利益的协调，它后面隐含的势必要讨论的还有，数字经济大发展中数字税到底怎么样处理。

美国作为硅谷的发源地，是引领全球数字经济潮流的国家，它更多地强调要包容、宽松，而欧洲和美国的态度有明显的区别，它们更强调对数字经济的税收要积极一些，它们已经有一些动议。中国在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因为我们自己的进步和现在的短板，也要注意这样的协调。数字经济和数字税的博弈，估计在未来是复杂、长期的。现在已有的经济活动的原则可能应对不了数字经济的实际和特点，很难说数字经济所产生的数字流、效应等的具体发生地，在全球网络中间，很难定位是哪一个特定发生地，它的具体特点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讨。国际社会在这方面，以后也将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由粗到细加强这方面的协调。

还有一个概念也值得注意，这种税收协调也涉及现在绿色低碳发展问题，即以碳排放税或者以实质的碳排放问题作为内容，不论实践上称作什么样的税收，这种税也有协调问题。欧洲方面已经提出了碳边境税，中国提出了“双碳”目标，实际上也是对国际社会关切的重大问题做出了我们的回应和承诺。国际关系里面怎么样处理这类问题，也都有长期性、复杂性。

浅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税收政策改革

■ 卢睿德 / 安联首席经济学家

卢睿德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税收政策改革，有好的和不尽如人意的两个方面。好的方面是，136 个国家和司法管辖区同意进行国际税收制度改革，具有历史性意义，“双支柱”方案旨在实现更高的税收和更加公平的企业征税权的国际分配。

该税务方案解决了国际利润征税中的最大问题。征税权依据公司实体所在地原则成立的前提是增值产生自实体产品生产，但是如果价值存在于无形的服务和知识产权，尤其是像大型科技公司，那么这条原则就被滥用了。据估计，全球 40% 的外国直接投资是为了减少纳税，而非出于真正的商业投资目的。此次改革意义重大，一是所增加的税收将高达几千亿美元；二是制定企业所得税全球最低税率 15%。法国估计在该改革后将增加 60 至 150 亿欧元税收。

不尽如人意的方面是，改革方案解决的问题非常有限，涉及的跨国公司太少，即便是全球最低税率的规定，覆盖的国家也很少；排除内容太多，例如银行和自然资源公司不在范围内。此外，该协定没有解决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税收再分配问题，税收大部分流向了富国。我认为政府错过了简化规则的机会，让税务律师和顾问可以教人们钻新制度的空子，从而赚得盆满钵满，所以这个过程刚刚开始，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金融迭代，给全球公共产品融资带来更多压力。疫情响应举措帮助的主要是公司而不是员工，未来的税收制度需要重新平衡这一关系。因为与流动的资金相比，人是不变的，所以对人征税更容易。

全球税收政策的改革和影响学术讨论

主持人：左小蕾，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嘉　宾：贾　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卢睿德，安联首席经济学家
陈志文，美的集团全球税务总监

左小蕾：陈志文陈总是美的公司的全球税务总监，您的专业跟我们这个话题是非常切合的。我想请问陈总的是，美的是跨国企业，在世界 500 强中居 200 多位，是很靠前的，G20 国际税收框架协议对我国的企业会有什么影响？对跨国企业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成本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带来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影响？

陈志文：美的集团首先是一个跨国企业，这次税收政策出台对跨国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的产品销往世界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采用的方式都是在当地设立子公司进行销售，所以实际上在 BEPS 1.0 的时代就已经在转让定价的范围内，这次税收框架的出台，主要是探讨和解决跨国公司和数字化企业所面临的税收问题，同时去弥补原来的税收洼地的问题。

作为实体经济和传统的制造业，这个方面的变化大大增加了我们的成本。美的配备有相应的人员对税法进行研究，也是第一批参与到对数字经济包括税收方面探讨的跨国公司。

其次，具体实操方面需要先进行数据的收集，再对税收进行缴纳。在原来 BEPS 1.0 的时代就已经可以做到，又重新多出来数字税。如果说在现有的框架上再有一个新的规则，无疑是增加实体经济缴纳成本的负担。

第三，我们需要对这部分的税收和数据进行系统的搭建，这些都是我们显性成本的支出。最低 15% 的部分，在全球的会计准则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现在的会计准则，包括国际的税收，比较擅长于做加法，比较少做减法。纳税人希望看到税收的规则更简单、更容易合规、遵从，如果我们把税收规则搞得太复杂，一些咨询机构、税务所和律师是比较欢迎的。

左小蕾：这是企业层面实实在在面对的挑战和问题，其他的企业也应该有同样的问题。下面一个问题想请教贾所长，刚才周行长已经非常清晰地提出，这个协议只是一个开始，还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要去研究，我相信这是非常深刻的剖析。要把它落地，真正在执行层面上落实，还需要一些新的机制来完成。您作为资深的财政方面的政策研究专家，在政策制定执行方面有非常多的经验，以您的经验来看，建立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这个协议的解决方案非常精准地落地，真正实现公平稳定的税收国际环境，请您在这方面分享您的思想和观点。

贾康：首先要承认，我了解的信息还是有限。我做了几十年财税方面的研究，也是努力把财税和全局的运行放在一起研究，但毕竟研究的重点一直不是国际方面。

据我所知，中国在走向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端就意识到，和外部世界的对接与协调，有一系列的复杂性和挑战性的任务，有些是以急就章形式解决的问题。比如个人所得税，开了国门以后，发现必须有个人所得税的国际协调。所以 20 世纪 80 年代初，以极快速度形成到现在为止也是中国最前沿的个人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方面的立法是急就章式的处理，所以一直到现在还在动态优化不断修订。它解决的燃眉之急是什么呢？开放以后，外部的专家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国际的税收原则就是，在收入的发生地完税以后，通过双边的税收协议，外籍专家回本国后就不必再重复纳税，而如果外籍专家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收入没有被征税的话，他就必须回国去完税。这个国际上已经认同的规则和机制，中国必须接受，既然把专家请来给他们发了薪酬，就应该按照国际规则在中国收取他们的个人所得税。

于是就有了中国的个人所得税法，那时以 800 元为起征点，涉及到的中国国籍的人士，主要是当时的演艺界高薪人员，全国据说只有十几个人，其他全是外国专家。在解决外国专家个人所得税问题中，建立了中国法律对应的机制，中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签订了双边税收协议，并不断扩大到 100 个以上经济体。中国个人所得税的协调，都是一个一个的双边协议。

现在要进一步考虑与外部世界的协调，我们是不是要强化另外一个概念，即 OECD 形式的多边协议。中国其实已经有了经验，最有代表性的是终于加入 WTO，还有现在推进的类似的多边经贸协议框架与进展。但是据我所知，中国确实还没有以国家名义加入税收方面国际多边协议的先例。我们现在可以从 OECD 的协调起步，进一步考虑中国加入全球化体系。推进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未来必然要面对多边协议框架，怎么样去谋划、怎么样得到实际的推进，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现在 OECD 被称为发达经济体的俱乐部，这个多边组织中有中国观察员。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如愿成为发达经济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达到门槛，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升级，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升级到高收入经济体。这势必促进我们积极考虑在类似于 OECD 的框架之下，能够跟着升级，面对多边税收协调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必要性。现在我们在这方面就要做协调的思考和准备，做研究和预案方面的探讨。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五年、六年、七年，都是短暂的一瞬，因为今天讨论的主题也涉及前瞻，那么中国要跟全球有更好的良性互动。税收协调势必要进一步升级到更广泛的多边协调。

左小蕾：2035 年发展目标实现的时候，中国可能会进军发达国家俱乐部。现在我们仍然是新兴市场国家，所以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是以观察员的身份。下面我想请教卢睿德先生，您能不能就刚才我提的问题，谈谈协议后续的执行机制和进一步研究。OECD 作为主导思路的组织，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后续的思考，什么样的机制、什么样的举措、什么样的政策，怎么样的协调合作，能够让它更好的实现落地？

卢睿德：我们要了解碳的社会成本，还有对地球所造成的危害，它的成本有多高。所以我觉得企业基本的所得税税基问题，应该要做更多的工作，对碳的排放做更好的安排，目前全球化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太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从危机里面学到的一个教训是，要重新考虑资本税，一些国家已经在考虑怎么样让富人多交税。这个是很多 OECD 国家在未来几年要探讨的问题，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 OECD 国家的国民收入不平等问题很严重。

左小蕾：您认为如果税收交易得到一定程度的实施，会怎样影响全球跨国公司的投资布局，会不会让全球化

倒退呢？会不会有这种影响呢？

卢睿德：我觉得最低的税率可能会成为一个最大的税率。在很多国家都看到有一些相反的情况，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比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和亚洲的一些国家，他们可能会觉得这个最低税率是他们要交的最高比例。所以对于不同的国家，跨国公司在考虑国际投资的时候，要考虑到这一点。在欧洲，匈牙利和爱尔兰不是很喜欢这个新的税务安排。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是比较负面的，也是比较复杂的。你越富有，你从系统中获得更多，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透明度、更简单的规则，而不能太过于乐观。

左小蕾：我想再问一下陈志文先生，作为一个跨国企业的代表，这些政策的形成都是政府之间在讨论、协调，问题却还是需要企业面对和解决的。刚才您也提到在跨国运营过程中，新协议有新增成本的问题，还有其他一些法律上的问题。从企业的角度，您现在能提出哪些政策上的建议，能够帮助企业缓解或某种程度上过渡，以适应新的税收环境和国际经营的商业环境。

陈志文：站在企业的角度，我们要遵守国际的税收规则以及国内的税法，做到合法合规经营。但是在国际税收方面，我们也有几点希望。第一点是希望税法越简单越好，能够便于企业的实操，当然这个也要建立在公平基础之上，包括行业的公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公平。收入纳入规则，包括低税支付规则，即使从税务专业人员来看也是非常复杂的。这几个规则之间，还有先后的顺序，不利于企业去做遵从，反倒是利于第三方的机构对我们进行指导。

第二，我们希望在现有的规则里面，比如说在 BEPS1.0 时代已经形成国别信息的互换，在国别报告之上做新型的申请和申报，不要再去创造一套国际运行的规则来，这样企业的遵从会更简便。

第三，企业在各个国家经营的时候，也会面临各个国家对于税收的竞争。如果说一个企业对接各个国家，涉及 10% 的超出利润，进行 25% 的征收，再去做分配，如果在每个子公司都这样去操作的话，实际上企业是站在不利的立场上跟多边国家进行沟通。我们建议在总部所在地对超出部分的税赋进行统一的征收，减少企业在各个国家之间的争议，同时也减少已经符合转让定价规则之下的重复征税。税收增加之后，我们还要关心另外一个问题即重复征税的问题，希望在出台相应细则的时候予以考虑的细节。

左小蕾：非常感谢，我觉得自己获益匪浅。我们未来面对的是百年不遇的国际大变局，方方面面的挑战、风险、不确定性是随时随处都会发生的。税收问题，是我们在发展过程中，特别是未来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回避的甚至是首先遇到的挑战。通过今天的讨论，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非常有信心在国际合作的框架下，对多边国家关心的问题，我们只要认真地研究讨论，全球有诚意地去协调，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共赢的结果。

再一次感谢各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工作经历，给我们传递了很多的信息，进行了传道解惑。希望在接下来的机制形成落地的过程中，还得到各位的支持和帮助，谢谢大家！

全球碳定价机制对话会

国际能源署能源与环境部部长 114
Tom Howes: 碳定价机制在碳中和道路上的作用和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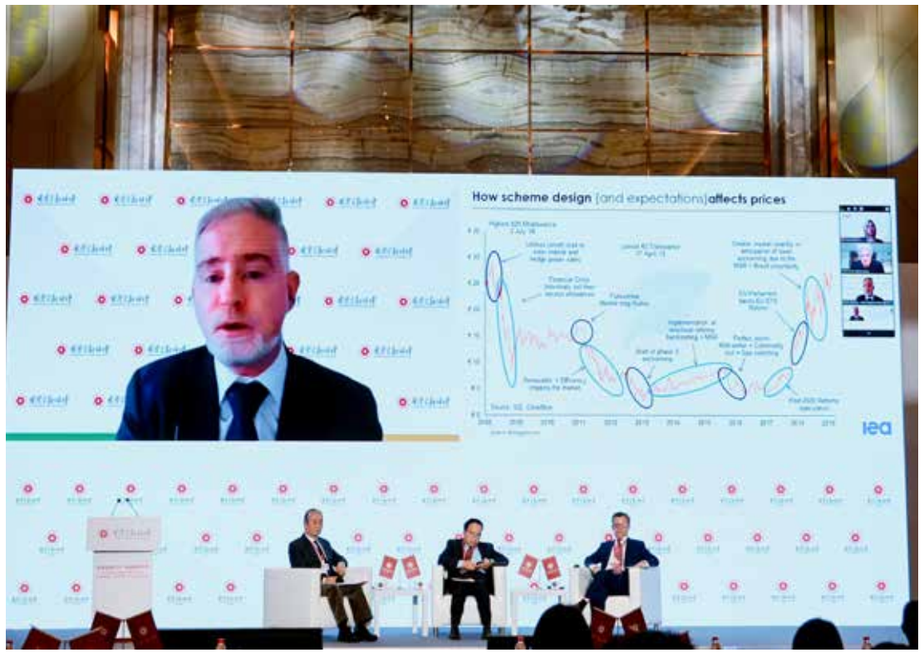
中国科技部原副部长 116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荣誉主任
刘燕华：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问题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 118
张希良：碳中和实现路径和中国碳市场的思考

山东财经大学校长 119
山东财经大学中国国际低碳学院院长
赵忠秀：跨境碳税应结合不同国家发展的实情设计

碳定价机制在碳中和道路上的作用和影响

■ Tom Howes / 国际能源署能源与环境部部长



Tom Howes

我们为什么需要碳定价机制？碳定价在不同经济领域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要实现净零排放，我们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这也是国际能源署在几个月前发布的净零排放路线图中给出的结论。该路线图以十年为一个单位，简要阐述了到 2050 年前将发生的变化，包括化石燃料消耗量的减少，以及终端能源消费中电能比重的补偿性增长。同时，除了电能使用的增长，电力部门的结构也不断变化，其中，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取得了显著增长。国际能源署也在其净零报告中提出了许多里程碑式的事件，来说明如何在不同的领域实现这一目标。值得注意的是，这不再只是一个能源使用的问题，这更是一场变革，涉及了每一个经济领域，包括建筑、交通、工业，以及能源和电力。报告还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不同的监管措施和经济措施。但今天我们将重点讨论碳排放价格。

碳定价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事实上，碳定价扮演着许多角色，它可以帮助电力部门进行燃料转换，也可以向终端能源消费者提供其所购买商品的碳强度信号。同时，碳定价还有助于改善能源供应，淘汰高碳排放工厂，推动向低碳燃料的尽快转换。它还提供了一个长期投资信号。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作为一个收入来源，帮助我们获得经济转型所需的投资。碳定价是一个十分灵活的工具，它不是单一的体系。目前世界上有 65 种不同类型的碳定价或碳排放交易机制，它们涵盖了不同的领域，拥有不同的碳价水平和定价工具。

欧盟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为我们展示了欧盟是如何逐步引入碳定价机制的，如何将其扩大到不同的经济领域，以及如何实施不同的碳价格，并根据现实事件做出调整。比如，2008 年金融危机、2011 年日本福岛核事故以及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均曾导致碳价大幅下挫。而近几个月，欧盟碳价急剧上升，达到 60 ~ 70 欧元每吨。这些都说明，价格信号以及碳定价机制的有效性也会受到许多现实事件和政策事件的影响。

同时，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还引入了免费配额制度。欧盟甚至为某些行业提供超额的免费排放配额，这些行业面临着由世界各地不公平竞争带来的巨大风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盟也在逐渐减少其提供的免费配额额度。部分国家也为其电力行业提供超额的排放配额以鼓励电力行业的现代化改造。例如，波兰正在改造夜间电厂和燃煤电厂，并采取补偿措施来减少排放或提高产电效率行业的免费配额。

以上只是简短地回顾一下我们在碳定价方面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碳定价可以发挥的作用及其提供的价格信号，有助于刺激产生正确的投资信号，并推动投资资金流向去碳化领域。

最后我想谈谈煤炭在世界各地的变化。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煤炭用量呈逐年减少的态势，取而代之的是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和水电。2019 年碳交易价格的上涨，推动了电力部门煤炭用量的大幅减少。这是一个乐观的信号，说明碳定价可以在电力部门发挥减排作用。国际能源署将继续与中国以及世界各国携手合作，共同推动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研发和设计。

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问题

■ 刘燕华 / 中国科技部原副部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荣誉主任

《巴黎协定》签署之后，有许多专家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认为目前在全球范围内落实《巴黎协定》还有三个缺口：

1. 承诺缺口。目前 154 个国家提出了国家自主贡献（NDC），这些 NDC 的目标不能够满足《巴黎协定》的目标。

2. 技术缺口。目前没有任何一个技术可以完全替代化石能源。

3. 资金缺口。今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缺少资金来源。

关于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资金来源问题，我主要谈三点：第一，资金缺口有多大；第二，资金从哪儿来；第三，如何进行碳定价。

第一，资金缺口有多大。许多国际机构都在研究落实《巴黎协定》，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到底需要多少钱。国际可再生能源署预测到 2050 年大致需要 110 万亿美元，而另一些国际机构预测是 96 万亿美元。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资金缺口，相当于每年必须要保证 3 万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中国专家也进行了预测，有的预测是到 2060 年中国实现碳中和需要 100 万亿人民币，也有专家预测需要 300 万亿 ~ 500 万亿人民币（可能数字差距很大），也有专家测算需要落实的资金占 GDP 的 0.5% ~ 2%。预测虽然是不一样的，但总而言之，落实《巴黎协定》实现全球碳中和需要的资金量相当大。

我们再算一下目前有多少资金可以支持这些计划。欧盟提出了绿色复苏计划，十年之内提供 1.6 万亿欧元；美国提出应对气候危机的计划，十年之内要提供 2 万亿美元；中国提出到 2025 年（5 年之内）要提供 10 万亿人民币用于新基建。把欧盟、美国、中国准备的资金和其他国家的资金累计在一起，基本上是每年不到 1 万亿美元，与 3 万亿美元的基本需求还相差很多。所以我得出结论，目前资金的缺口与实际需求差距很大，起码差一半以上。这是第一个结论。

第二，资金从哪儿来。一个是国际的资金，一个是各个国家的资金。关于国际资金，发达国家在 12 年前，2009 年的哥本哈根会议（COP15）就曾提出到 2020 年每年筹备 1000 亿美元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落实。格拉斯哥会议（COP26）明确要将

刘燕华

这 1000 亿美元的落实推迟到 2025 年。再计算一下，每年全球总的需求是 3 万亿美元，发达国家每年提供 1000 亿美元，到 2050 年总计 3 万亿元美元，也就是发达国家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可能是国际总需求的 3%。

中国也对实现碳中和进行了资金的筹备工作，2021 年 10 月 24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资金来源问题已经非常明确，有四个方向。

1. 完善投资政策。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引导作用，构建与碳达峰、碳中和相适应的投融资体系，严控煤电、钢铁、电解铝、水泥、石化等高碳项目投资，加大对节能环保、新能源、低碳交通运输装备和组织方式、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项目的支持力度。完善支持社会资本参与政策，激发市场主体绿色低碳投资活力。国有企业要加大绿色低碳投资，积极开展低碳、零碳、负碳技术的研发应用。

2. 积极发展绿色金融。有序推进绿色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设立碳减排货币政策工具，将绿色信贷纳入宏观审慎评估框架，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为绿色低碳项目提供长期、低成本资金。鼓励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长期稳定融资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用于绿色低碳项目建设运营，扩大绿色债券规模。研究设立国家低碳转型基金。鼓励社会资本设立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基金。建立健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

3. 完善财税价格政策。各级财政要加大对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技术研发等的支持力度。完善政府绿色采购标准，加大绿色低碳产品采购力度。落实环境保护、节能节水、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船税收优惠。研究碳减排相关税收政策。建立健全促进可再生能源规模化发展的价格机制。完善差别化电价、分时电价和居民阶梯电价政策。严禁对高耗能、高排放、资源型行业实施电价优惠。加快推进供热计量改革和按供热量收费。加快形成具有合理约束力的碳价机制。

4. 推进市场化机制建设。依托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加快建设完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逐步扩大市场覆盖范围，丰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完善配额分配管理。将碳汇交易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健全能够体现碳汇价值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健全企业、金融机构等碳排放报告和信息披露制度。完善用能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交易市场。加强电力交易、用能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统筹衔接。发展市场化节能方式，推行合同能源管理，推广节能综合服务。

我们认为绿色投资已经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风向标，绿色投资在今后将非常活跃。

第三，如何进行碳定价。碳定价是相当复杂的，目前来说，全球一共有 65 个经济体开展了有关碳定价的工作，大概有五种形式。

1. 碳交易。碳交易是政府定配额，由市场来定价，所以碳价是不确定的。目前，欧盟的碳价大概是 50 欧元 / 吨上下，中国也开展了碳市场交易，大概的价格是 50 元 / 吨。预计到 2030 年，全球的碳市场交易价格会有大幅度的上升。

2. 碳税。碳税是由政府来定价，市场决定排放量，碳税排放量是不确定的。最近一段时间，欧盟提出了碳边境调节税，这就引出一些新的问题。就是碳边境调节税的生产排放和消费排放如何分担，再有就是实行了碳边境调节税之后，贸易的成本会发生变化，这会对今后的贸易结构产生一些重大影响。

3. 碳信用。我们常谈的 CCER 和碳汇，新能源抵消的化学能源进入碳市场，这也是比较活跃的，对于中国来说，CCER 的碳信用也可以进入碳交易市场。

4. 碳金融。碳金融也是我们要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金融种类相当多，债券、保险、银行等，碳金融的加入能够为推动碳市场的活跃发挥重大作用。从欧盟的经验看，金融机构进入碳市场后能够稳定碳价、提高碳价，对推动和落实应对气候变化有重大影响。

5. 企业内部的碳评价。许多企业出于自愿、长期的考虑，提出了企业内部的碳评价标准，也是督促企业落实应对气候变化。

目前这五种形式都有，今后在国际上如何去推动，如何考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别，还需要认真考虑。

在谈到碳定价的时候，还要考虑几个关键问题，比如，比尔·盖茨提出的绿色溢价。绿色溢价涉及碳锁定问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煤电投资可能会受碳锁定的影响。还有 ESG 的环境、社会、公司治理的问题，也是我们要考虑的。碳市场的发展就是把碳的配额作为一种资源，这种资源可以转化成资产。碳的配额可以像固定资产一样，这种资产又可以转化为资本，碳交易市场是把应对气候变化的资源、资产、资本紧紧联系到一起。

最后谈一下对整个碳交易的理解。碳市场规模和碳定价是解决资金缺口的一个风向标。碳定价跟行业覆盖与配额紧密相关，在制定碳定价的时候要考虑减排的经济成本和减排的社会成本，这两个因素决定了今后的成败。我想强调的是，绿色是用钱买不来的，全球只有合作才有真正的出路。

碳中和实现路径和中国碳市场的思考

■ 张希良 /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

张希良

碳中和是非常热的话题，下面我将结合碳中和与中国碳市场相关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本人和团队也参与了这方面的研究，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是 136 亿吨，其中二氧化碳 112 亿吨，非二氧化碳排放比如甲烷等有 24 亿吨。在二氧化碳排放中，与能源相关的活动排放量最大，约 99 亿吨；工业过程非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大概是 13 亿吨，可以看出能源活动是排放大户。在能源活动二氧化碳排放中，发电、工业行业是大户，分别约占 40% 左右，交通和建筑直接排放约占 10% 左右。中国现在提出碳中和，要实现净零排放，总体来讲难度非常大。

中国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并不是所有的行业同时实现碳中和，实现净零排放，各个行业减排的成本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比如电力行业要实现净零排放，成本相对低一些，机会多一些。但是工业行业要完全实现净零排放，难度就非常大，包括交通行业等等，这为将来行业之间的合作、行业之间互相抵消、互相协同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

中国要在 2060 年实现碳中和，发电行业须首先实现净零排放，2045 年可以做到负排放，抵消一部分比较难减排部门的排放，实现碳中和。中国有 24 亿吨非二氧化碳排放，减排 10 亿吨相对容易，但是再继续减排 14 亿吨将非常困难，有研究估计每减排 1 吨二氧化碳约需花费上千元人民币。

中国实现 2060 年碳中和的轨迹是怎样的？中国提出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从这个承诺可以看出，2030 年以后，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将迅速下降。目前来看，减排成本还相对较低，全国碳市场 7 月份电力行业交易为 50 元 / 吨，相当于 7 美元左右，在一定程度上和减排目标是相协调的。后面边际减排成本高，边际减排成本另外一个方面的含义就是碳定价。碳税、碳定价高，才会推动经济低碳转型，沿着相应的排放轨迹减排。如果碳市场是有效的，碳税价格是有效的，价格应该比边际减排成本高。

下面谈一谈碳市场的作用，这两年我们和 IEA 有合作项目，在中国电力行业引入碳市场，让碳市场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最近提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要避免运动式减排，而与运动式减排相对应的是减排长效机制。碳市场应是长效机制，给企业引入排放的许可，按需排放，真正把碳排放作为企业生产经营的一个硬约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许可和设定结合在一起，碳市场的总量控制排放的总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通过交易形成碳价，碳价会促进低碳技术的创新和投资，也会推动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改变消费者的行为和社会生活方式。

跨境碳税应结合不同国家发展的实情设计

■ 赵忠秀 / 山东财经大学校长、山东财经大学中国国际低碳学院院长

赵忠秀

关于欧盟碳边界调节机制（CBAM），尽管我认为它不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而是环境政策，但是它将对全球的生产、贸易以及公平造成很大的影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了一份报告，是关于碳边界调节税对全球影响的，它用了非常复杂的 CGE 模型模拟了 CBAM 对碳排放的影响，认为 CBAM 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是，全球碳排放总量超过 300 亿吨，而 CBAM 覆盖了 3 亿吨，仅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1% 而已，所以 CBAM 对减排的影响十分有限。

当然这个机制的设置是好的，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我想谈其有效性的问题。中美之间的贸易战，美国给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可是最后结果怎么样？美国出现了通胀，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仍在不断增长，因为在全球生产链中，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生产基地。现在欧盟在全球供应链中处于高端，是清洁生产比较高端的阶段。发展中国家因为没有比较高端的技术，他们需要的是国际援助和国际合作，而不是在他们的生产上再附加额外的成本。

气候政策需要放在多边环境之下来进行讨论。谈到发展议程，作为气候政策也应该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短期内 CBAM 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小，因为中国对欧盟的出口产品中仅有 20% 会被 CBAM 覆盖。长期而言，CBAM 将涵盖 5 个行业，这 5 个行业有非常翔实的数据，而且有比较简单的供应链。所以， CBAM 对中国的长期影响将会变大，因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行业被 CBAM 覆盖。

中国现在已经建立碳交易市场，目前的价格是 40 元 / 吨。欧盟现在的碳价约为中国碳价的 10 倍，这是因为中国碳市场刚起步，参与交易方比较有限。我们希望将来有更多的投资者加入中国碳市场，有更多的金融工具衍生出来支持中国的 ETS。到那时，碳价格会发生更大的变化，跨境碳调节税对中国的影响也会发生变化。

现在中国碳市场的创新非常多，可再生能源增长的速度非常快。可再生能源的普及，以及落实“双碳”目标的行动，都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动力。

关于跨境碳税的设计，以及有可能带来的政策上的反应或者合作。一方面中国对于所有受到跨境碳调节税影响的行业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要求其碳排放严格按照国际标准进行披露，进行更加严格的碳排放核算。另一方面，中国也会进一步加大对低碳技术的研发力度，比如碳封存与捕获，比如钢铁制造技术的升级，中国也可以和欧盟开展更多的技术合作。

对于欧盟，跨境碳税的收入可以用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脱碳化的支持力度，推动发展中国家采用新的低碳技术。低碳技术发展的资金缺口非常大，应多做相关研究，把跨境碳调节税和采用新的低碳技术结合在一起。各国应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大力加强合作，在有些领域，我们对一些事物的看法还有很多不同，因而需要更多的交流。

中美经济形势对话会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121
杜大伟：中美贸易繁荣下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不对称

IFF 学术委员、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123
聂庆平：合作共赢的中美经贸关系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基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125
洪俊杰：中美应加强合作，共同构建全球价值链友好型的国际经贸规则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127
克雷格·艾伦：从不同视角看中美双边经贸关系

中美经济形势学术讨论 128

中美贸易繁荣下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不对称

■ 杜大伟 /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产业链当中的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中国转到了越南、柬埔寨，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由于美国对中国加征了一部分的关税，使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从中国转到东南亚的速度加快了，但中国本身在这种价值链上的位置也越来越高了。

杜大伟

在开始中美经济关系讨论之前，我首先要讲的是中美贸易正在繁荣发展。如果你从另外一个星球来到地球，然后你被告知中美之间正在打贸易战，然而当你看到双方之间的贸易额时，你是无法相信的，而且中美贸易是双向都在蓬勃发展的。此前，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一部分商品加征了高达 25% 的关税，当然像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并没有受到加征关税的影响。

疫情爆发之后，中美双边贸易先是出现了衰退，然后是强劲的反弹，现在美国的消费者还在大量购买中国商品。而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达到了历史新高，比如美国向中国出口大量的农产品，当然美国对中国的服务出口并不多，而且疫情在很大程度上也打击了服务业，但是对制造业的影响较小。我认为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还没有达到双边贸易协议第一阶段文件的要求，而且我认为第一阶段的协议是不够的，它只是一个起步。根据我的计算，2020 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应该增加了高达 40%，2021 年对中国的出口再增加 40% 才能够达到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设定的目标。

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实现了平均每年 30% 的增长，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增长速度，当然这样一个增长数字还未能达到中美第一阶段协议中所设定的目标。

双边投资的形成更加复杂一些，美国对中国的投资仍然在持续之中，但是中国对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有所下降，因为有一些紧张形势的出现。但是总体而言，双方的经济交流在进一步加强（虽然还存在着贸易战），这就为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虽然有一些不利的政策，但是我们的双边贸易和投资还在保持良好的发展。

另外，有很多美国人在讲要把产业链带回美国，但是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产业链已经被带回了美国。

产业链当中的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从中国转到了越南、柬埔寨，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由于美国对中国加征了一部分的关税，使这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从中国转到东南亚的速度加快了，但中国本身在这种价值链上的位置也越来越高了。比如中国在更多地生产高精尖的机械并进行出口，所以这也是整个价值链发展演进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能够将它简单称之为产业链离开了中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中美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是完全不对称的。两国的经济往来非常活跃，当然美国对中国加征了一些关税，而中国有一部分的市场和行业对外商投资还没有彻底开放。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中美双方完全可以通过谈判来达成相关的政策，更好地促进双边的经济来往。现在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还尚未能开展实事求是、务实的谈判。我高兴地看到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举行了视频会晤，虽然在这次视频会晤中并没有建立起一种推进双边经贸关系的新机制。我认为政治因素给双方现在围绕着外贸投资进行谈判设置了一些难度。

在美国，关于贸易特别是美中贸易的问题非常复杂、非常有争议。拜登政府最好的选择是保持现状不变，而中国也有其国内的政治因素，所以在这一点，中国进一步展示改革开放的姿态会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现在中美处在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关口，首先两国的经济关系非常活跃，而且是在持续增长之中，但是两国的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非常不对称。

合作共赢的中美经贸关系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基石

■ 聂庆平 / IFF学术委员、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聂庆平

第一点，我想说中美的经贸关系离不开中美之间的关系，这是非常重要的。从 2018 年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对华关系发生变化以来，舆论上的一些报道，开始说的是新冷战，后来又说是脱钩，最后是打贸易战，到现在又说不脱钩。所以现在的关键性问题是美国对中美之间关系的判断，它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美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义，谈到未来该怎么应对，讲的是：在应该的时候，是呈现竞争性；在可以的时候，是呈现合作性；在必要的时候，是呈现对抗性。这很难统一，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21 世纪的中美关系是一个在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背景下的关系。我很担忧，到底怎么来看待中美关系，是排除意识形态方面对立的合作共赢关系，还是拉圈子围堵的关系。我认为经济发展不能用冷战思维来看待，不能认为不是白的就是黑的，事实上，中美的经贸关系是受政治关系影响的。

最近中概股是比较热议的话题，由于会计师审计不能够进入中国国内，200 多家上市公司都面临着退市的威胁，这明显是政治关系影响到了经贸关系。很早以前我在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工作的时候，是最早和美国的 SEC 谈 MOU 的，当时我们把中国 H 股的企业拿到美国用 ADR 来上市，所以这本来是有利于美国投资者的问题。中概股完全是另外一个故事，现在用政治化来看待，政治的关系就会影响到经贸关系。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中美关系脱不开，尤其中美经贸关系是脱不开的。我看到一些最新数据，美国 2017 年对华出口达到高峰，是 1298 亿美元，2018 年和 2019 年分别下降到 1203 亿和 1050 亿美元，但是在 2020 年出现了明显的回升，又达到了 1246 亿美元。总体来讲，中美经贸关系是脱不开的。在中美经贸关系当中，虽然存在美国对中国贸易的逆差现象，但是这个逆差现象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中国劳动力成本比较低，所以在商品出口上有竞争力；第二，中国有完整的制造业，这对中美贸易的维护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从过去三年所采用的政策来说，没有明显有助于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反而对美国的通货膨胀产生了不利影响。

最近，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多次表示，美国加征对华关税实际上是由美国消费者买单，并且伤害了美国的经济，增大了通胀的压力，甚至降低了全球增速。美中贸易协议不仅未能解决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最紧迫的争端，还伤害了美国的消费者。在中美经济贸易中，中国在出口方面占有两个优势，一个是市场，一个是劳动力成本相对便宜。据我的判断，中美贸易是脱不开的，如果长期脱钩，可能对美国的通货膨胀，对美国现在的货币大量超发所形成的对冲不利，将近三年的贸易战和加征关税的情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中美的经济关系、经贸关系和金融关系脱不开，市场也脱不开。关键是找到合作共赢的点，将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对世界、对全球经济也都有好处。

另外，中国贸易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在中国的贸易关系当中，中美贸易也不是最主要的，现在中国对欧洲的贸易以及对东南亚的贸易也上升到了比较重要的地位，所以中美贸易在整个中国贸易构成当中的比重也不是特别大。互利共赢、合作共赢的中美贸易关系将会是全球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

第三点，美国对中美金融方面的合作一直非常看重，中国的资本市场最近也做了一些重大的改革，包括服务贸易的开放、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和资本流动的开放。

在金融服务业领域，中国与美国关系是比较紧密的。30 年前做 H 股的时候，在香港没有美资的投资银行，只有英资的投资银行，那时候我们听到的名字都是渣打银行、巴克莱银行、桑坦德银行。但是 1990 年以后，美国的投行就来了，摩根士丹利、美林银行等都来了。从这个情况可以看出，中国的金融服务业开放对美国是很有利的。美国在香港的整个投资行业每年都表现不错，中国现在实行全面开放，在金融服务业领域也有比较多的美资投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市场。

最近人民银行和外管局对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进行了调整，取消了额度限制，这是中国资本市场上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当然还有沪港通、深港通，以及和伦敦的沪伦通，和日本的 ETF 通。实质上中国国际资本流动的通道已经全部打开，外国投资者可以进入到中国的市场。

我们不仅在资本流动方面打开，而且在投资范围方面也打开了，不仅可以投资股票，也可以投资债券，还可以投资金融衍生品，中国正在形成整体开放的格局。

作为一个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中国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开放，这种开放对于国际资本的流入也是非常有利的。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到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外资机构中，还是以美国的机构居多，外资流入也还是以美国的机构投资人的流入居多，所以这也会促进构建更紧密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金融关系。但是在监管方面，可能有很多需要思考的地方，比如中概股的问题，本来是有利于美国投资者，但是美国一定要在司法权上，即我们讲的证券监管上进行检查，这明显不是一个国际惯例，涉及到了主权问题，所以对中概股的上市，美国应该有一个法规。

我个人总的看法就是中美的经济关系、经贸关系和金融关系脱不开，市场也脱不开。关键是找到合作共赢的点，将会有利于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对世界、对全球经济也都有好处。

中美应加强合作，共同构建全球价值链友好型的国际经贸规则

■ 洪俊杰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在整个全球价值链当中也是最重要的两大枢纽。我们有一个测算，在全球价值链中，中美都处于核心枢纽地位，中国主要是在东亚的生产网络当中，美国主要是在北美的生产网络当中，处于枢纽地位。中美两个大国，同时也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两国的互动、合作，不仅仅影响中美本身，也将影响全球，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谈谈中美的经贸关系。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全球经贸发展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让各个国家之间的经贸关系变得空前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已经成为各国经济和贸易关系的一个关键特征。但是近十几年来，全球经贸关系，包括经贸合作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应的，国际经贸的相关数据也是跌宕起伏。从 2008 年、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世界贸易总量下降高达 20%，后面经历了两年的恢复性增长，2012 年又重新陷入低迷。2017 年开始，全球贸易出现了复苏迹象，连续两年的增长率接近 10%。但是之后的中美贸易战，以及 WTO 出现了包括争端解决机制等一些问题，导致 2019 年全球货物贸易总量重新陷入负增长，当年是 -2.8%。更为严峻的形势是从 2020 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贸，包括全球产业链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经贸形势发展愈加严峻，我个人的判断是全球化现在已经进入调整期。

在当今新的形势下，中美两国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不仅影响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也会影响全世界。疫情下，我们最忧心的就是全球价值链受到了严重冲击，有一些被迫中断了，有一些受到了很大影响。在 2021 年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习近平主席也谈到了全球价值链的韧性和发展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当前这样一个特殊的形势下，全球价值链的稳定运行对于各个国家，无论是民生还是经济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我今天主要谈一个问题，就是中美双方应加强合作，构建一套全球价值链友好型的国际经贸规则，推进国际分工合作和经济发展有序恢复，增强全球价值链发展的韧性，这应该成为当前中美合作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

洪俊杰

如何构建这样一个全球价值链友好型的国际经贸规则呢？我个人有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要助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小企业的能力提升，让它们能够更进一步地嵌入到全球经贸体系中。世界上绝大部分的企业其实都是中小微企业，数量很大，但其国际贸易的能力和参与度非常有限。因为他们确实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而且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参与国际贸易关系的难度也很大。但是现在数字经济、数字贸易的发展，包括一些平台的发展，为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小企业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一个契机，所以我们应当构建一套普惠型的数字贸易规则。一方面，可以弥合欠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数字鸿沟；另一方面，可以提升中小微企业的能力，让他们能够通过数字贸易和平台进一步参与到全球经贸当中。如果这一举措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小企业的参与，有可能成为全球经贸新一轮发展中的一个新增长点，成

为全球化的一个新动力。

在过去的 20 年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有力地推动了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经贸快速发展。但是现在 20 年已经过去了，中国入世的边际效益正在逐渐减少。如果助力提升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中小企业的能力，将会让更多的国家、地区和企业参与到全球经贸当中，对全球经贸下一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就是推进全球跨境基础设施建设，制定互联互通相关规则。比如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可以先进行试点，看能否探索性地制定一些互联互通的规则，然后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去，包括基础设施的标准对接问题、设施建设的融资问题，以及劳务和设备输出便利化的问题等。制定互联互通的规则有助于全球经济的联动发展，可以降低贸易成本，为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提供新的便利。

第三就是推进包容性的知识产权规则。知识产权规则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不是标准越高越好，我们应该让知识产权，包括技术的发展惠及更多的人，惠及更多的群体，惠及更多的国家。所以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相关规则制定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各个国家发展阶段的差异，允许发展中国家有一定的差别待遇。所以知识产权的制度规则要体现多边贸易体制的包容性，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公平，可以让更多的国家从人类的文明成果、技术发展中受益。我想这对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布局也是非常有益的。

第四就是中美曾经携手促进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的签署，现在两国都在向绿色低碳经济转型，气候变化也可以成为中美合作的亮点。我们应当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下考虑价值链上各方所处位置的客观差异，制定具有一定包容性的绿色发展规则，共同推进环境友好型的全球价值链可持续发展。我研究的一个课题，就是能否基于贸易利得探讨各方应当承担的碳排放责任。因为在国际经贸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是生产者从中受益，消费者也在贸易发展中受益，所以从碳排放责任来说，应该不仅仅让生产者承担碳排放责任。双方能否有一个谈判的机制，基于贸易利得来共担碳排放的责任，这对于全球经贸的下一步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

最后一点就是新冠肺炎疫情让我们进一步意识到人类健康共同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各个国家之间的抗疫合作是最强有力的武器。中美可以探索倡导建立全球公共卫生及传染病防控的跨国合作机制，推动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包括我们现在谈到的疫苗问题。全球共同来推动抗疫，包括帮助那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抗疫，因为这不仅是在帮助他们，其实也是在帮助自己。只要疫情还在世界上存在，各个国家就不能放心完全打开国门。因此，建立一个合作机制，全球共同合作抗疫，包括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疫苗的专利等问题上进行合作，有利于共同推动全球经贸复苏的进程。

综合来说，中美两国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当前都处于发展的关键阶段。美国国内有其自身的问题，中国也在花精力处理国内的问题，但双方应该携手共同合作，从一个更高的、更大的层面上来看待全球经贸发展，这对于下一步中美两国贸易的发展，对于全球经贸的发展，对于维护价值链的稳定和正常运转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不同视角看中美双边经贸关系

■ 克雷格·艾伦 /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克雷格·艾伦

现在中美两国的贸易和经济关系还要分行业来看。美国的农业、粮食和食品产业对中美关系的现状非常满意，因为美国农产品出口中国进行得非常顺利，而且也有进一步扩大投资的意愿。消费品也是一个亮点，美国公司非常注重中国市场，中国有多达 7 亿人口的中产消费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美国非常重视对中国的出口。能源行业，无论是在冶金、石油、天然气还是其他能源领域，中美双方的经贸关系也发展良好。

工业产品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比如化工行业和汽车行业的美国企业感到非常满意，对于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感到非常振奋，特别是汽车行业。但是，美国企业对中国一些工业行业市场的长期可持续前景有所疑虑。

从工业技术的角度来看，和其他一些行业相比更加复杂。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到有一些关键技术中国要自给自足，所以有一些美国企业就问，从长远角度来说中国市场是不是还欢迎我们，这个自给自足的来源是不是也包括活跃在中国市场的外企呢？高技术产业中的情况就更复杂了，中美两国都加大了数据立法的力度，门槛更高、复杂性也更大，而且要求双方企业遵守对方市场的数据法律和数据规则，但双方在数据领域，包括金融服务数据领域的法律和规则又有冲突摩擦之处，这个操作和执行难度就非常大了。

在组合投资方面，像私募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和技术领域的投资者，过去一年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糟糕的，他们的亏损幅度非常大。当中国需要境外资本的时候，中国企业在海外的上市市值会进一步上升，而就组合投资而言，其投资流动的幅度要小得多。所以中美之间组合投资的前景如何，我也密切关注着两国法律法规最新的进展。资本只会流向欢迎投资的地方，如果有关政府的政策让投资者感到资本不再受欢迎，那资本就会投到别的地方去。目前我们提出的疑问也是合理的，特别是组合投资者在问，如果在中国进行投资的话，他们的盈利前景如何，他们的投资利润汇回本国的前景如何，总体来说组合投资这样的外资在中国的前景如何，大家也是在拭目以待。

中美经济形势学术讨论

主持人：林建海，IFF副理事长兼全球中心主任、IMF前秘书长
嘉　宾：杜大伟，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
聂庆平，IFF学术委员、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克雷格·艾伦，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
洪俊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校长

林建海：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在 11 月 16 日进行了视频会晤，中美两国和全世界对此都非常关注，请问在这次视频会晤之后，围绕两国间的经济和贸易，在接下来几周乃至几个月当中，会不会开展进一步具体的谈判？考虑到现在美国的通胀在抬头，而且美国由于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些市场观察家和评论员认为美国有必要缩减或是取消几年前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一些关税，你们如何来看呢？美国是否有可能减少乃至撤销几年前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中国是否也会以同样的措施进行回应？首先请克雷格·艾伦先回答一下。

克雷格·艾伦：在美国也有很多企业和机构呼吁减少或者是取消对中国加征的关税，换取中国政府对美国企业更大的开放，但是实事求是地说，从现在到 2022 年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拜登政府的政策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我希望看到一些有益的信号，不一定是全部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而是免征关税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视频会晤之后，很多中国媒体在夸赞中国没有做任何的让步，但是目前的形势是需要双方都作出让步，遗憾的是现在两国政府都不愿意让步，所以近期不太可能在关税方面看到突破。

林建海：非常感谢克雷格，您的回答非常清楚明确，谢谢！洪校长，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洪俊杰：我个人的看法是，第一双方应该取消惩罚性的关税，因为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上来看，征收这种惩罚性关税对双方的经贸，包括对各自国内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第二点，中方是否取消，取决于美方的态度和措施，所以这个问题的核心和关键是美方能否取消对中国加征的惩罚性关税。

现在美国面临通胀的压力，通胀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而且还在上升，这跟中美贸易战，跟美国对中国征收的惩罚性关税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有研究表明，一部分加征的关税通过定价转移到了美国的消费者头上，所以应该说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美国的通胀。所以中美贸易战之后，美国对中国加征的惩罚性关税其实对美国消费者也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我想在这里强调的一点就是，贸易战以及加征惩罚性关税，解决不了当初特朗普所关心的问题。

林建海：谢谢洪教授。下面我们有请杜大伟分享您的观点。

杜大伟：我觉得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视频会晤是非常重要的。紧张的中美关系需要这样的会见，而且双方军事方面也应该能够避免可能发生的一些误判。美国的通胀事实上已经让人们看到了能源等价格的增长，像汽车价格，尤其是新车的价格都在增长。艾伦说的对，美方降低关税对于价格的下降能够有一定的影响，但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因为现在中国政府要的是豁免系统。中美双方政府都希望能够更好地解决关税问题，但是至少公开而言，美国目前在关税上并没有什么举措，因为一旦有什么降低关税的举措就会受到美国政界的攻击。我们也希望中国有重要的举措，但是现在的谈判想要做到双方互益是非常困难的。

林建海：非常感谢杜大伟研究员精彩的发言，下面请聂庆平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聂庆平：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对中美关系具有非常积极的重要意义，因为习近平主席在这次会晤当中提出了中美应该互相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美要形成共识，积极行动，引领中美关系积极向前发展。当然拜登总统也表示，不再去谈对立、竞争和合作的外交说法，而是表示要通过开诚布公的对话，确保中美两国的竞争是公平的、健康的，而且提到了不会演变成为冲突，所以中美元首视频会晤肯定是积极的、重要的。

关于降低中美关税，时间表很难确定，但是中国有一句古话“解铃还须系铃人”。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是由特朗普总统首先提出的，自 2018 年 3 月起，两年的时间先后四次加征了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关税，其中部分商品加征关税税率达到了 25%，作为回应，中国不得不对美国出口中国的部分商品也实施了加征关税措施。

加征关税无益于解决贸易逆差。截至 2020 年底，美国对华贸易逆差是 3456.2 亿美元，较 2018 年加征关税前有点减少，但没有太大变化。实际上，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对美国的压力更大一些。关税问题关键看美国，只要美国先采取行动，双方就很可能走向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

刚才艾伦先生提到组合投资的问题，这是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理解，我也想做一点回应。

应该说国际投资者（International Investor）对中国的认知往往是有误解的，只要中国政策稍有调整，市场很快就有反应，好像中国的政策变了。其实细想一下就会发现，中国的这些企业是脱离了基本的贸易记录来美国上市的。所以说这几年绕道去美国上市的很多企业，实质上是先有投资，然后用平台经济的方式，通过上市来进行套现。而且这些企业本身是没有盈利业绩的，或者说盈利业绩很少，这本身在上市的国际操作方面就是一个很独特的 Case。所以，如果对这一类投资者有担忧，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本身确实带有一定的疑点。

但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企业是 H 股上市，当然更多是采用 ADR 的方式到美国去，方便美国的投资者，香港市场上 H 股的投资金额占到市值的 70%，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长期投资者。目前中国政府或者中国监管部门所采取的金融政策，是有利于打击投机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应该说很合理也很理性，是有利于国际资本长期流入的。中国的蓝筹市场最近连续 11 个月，外资、北上资金都是净流入，净流入 5000 亿，而且现在外资、国际资本每年是以翻倍的速度流入中国资本市场，流向蓝筹市场，2020 年可能是 2.6 万亿，现在已经超过 3 万亿了。所以整体来看，我觉得外国长期投资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观感应该是积极的、正面的，无论是从数据还是从趋势来看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林建海：非常感谢，您刚才不仅仅谈到了关税问题，比如美国是否能够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而且您也谈到了关于金融服务组合投资方面的一些具体情形。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可能对双方更加重要，必须要加强交流，尤其是金融服务在中国市场当中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今后潜在的市场机会，所有这些都需要加强交流。

洪俊杰教授，刚才您谈到加征关税对于中美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我想请您继续讲一讲。

洪俊杰：我赞成刚才聂庆平董事长的观点。第一点，

从纯经济的、贸易的角度来看，中美双方应该取消惩罚性关税，因为这对双方的贸易、对消费者都有好处，而且加征关税确确实实已经出现了比较大的负面影响。第二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部分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我个人一直觉得这个做法的基础是不存在的。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如果考虑转口贸易、增加值、统计口径等问题，以及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的销售远远大于中国公司在美国市场上的直接销售等问题，中美之间经济合作、利益基本是对等的，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所以贸易逆差的基础，我觉得是不存在的。因为要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而加征关税，是没有道理的。第三点，从历史上看，所有国家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阶段，都保持着一定的顺差，美国也是这样。比如美国从 1874 年到 1970 年，在其工业化快速发展的 97 年时间里，有 93 年是保持顺差的。德国、日本也有相似的经历。所以这是工业化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的现象，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其实主要是承接了过去日本、韩国等其他东亚经济体的贸易顺差。

日本和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占美国总逆差的比重，1990 年是 53.3%，2017 年降为 11%；同期，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占比由 9.4% 上升为 46.3%。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增加，主要是承接了原来韩国和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是因为东亚生产网络结构性变化导致的，并不是新增的贸易顺差。

美国对华贸易逆差的状况，从数字上来看，现在正在逐步改善。从中国的官方统计来看，从 2006 年到 2021 年的 15 年间，中美货物贸易顺差占中国全部货物顺差的比重从 81% 降到了 46%，下降的幅度是非常明显的。所以，中美双方应该取消惩罚性关税，但是实际上是否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主要是取决于美方的态度。

林建海：非常感谢洪俊杰教授！双方之间的交流是如此之重要，在事件不断出现的情况下，中美必须密切联系，以便彼此能够在同一个场景之下沟通。

谈到交流，商业界以及其他的非政府机构能够担当哪些角色，以便帮助中美保持可持续的健康关系，比如像学者、研究专家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是否能够将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集合起来做更有益的工作？欢迎大家发言，非常感谢！

克雷格·艾伦：我觉得我们不应该低估交流方面的问题，中美两国并没有能够足够、清晰、有效地进行良好沟通，这是一个重大的风险。我要向国际金融论坛（IFF）致敬，你们做了大量工作，搭建交流沟通平台，促进商界、政府的对话。相比过去而言，两国政府在交流方面应该是遇到了很大困难，政府之间的交流已经降到了之前的 10% 左右。我希望由政府支持的业界交流能够释放一些压力，并且能真正地实现有效交流。

林建海：非常感谢克雷格·艾伦先生。我完全同意您的说法，像 IFF 这样的论坛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交流平台。可是我觉得要让这种交流有效的话，必须要取得各位的支持，您、与会各位以及观众的参与和互动都是极其有益的，我不知道其他的演讲嘉宾对于这点还有没有其他的补充和想说的话。

聂庆平：经贸关系、政治关系与中美关系是脱不开的，我还是那个看法，如何加强沟通？主要还是在政府层面的沟通，我觉得平等互利、相互尊重是前提。想选择在政治上对立，但在经济上合作，这很难做到。我觉得 IFF 给我们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沟通渠道。我的观点是要建立正常的中美关系，才能有健康的经贸关系。

杜大伟：我也非常同意刚才克雷格·艾伦的话，祝贺国际金融论坛（IFF）能够成功组织这样的活动。我在华盛顿以及上海都参加过世界性的经济论坛。希望疫情过后，开放国际旅行之后，可以现场参加更多国际金融论坛（IFF）组织的活动。我认为 IFF 是一个很好的沟通交流平台，尽管使用 ZOOM 进行网上交流不如面对面，但是至少还可以作为一个替代方案，彼此之间进行沟通。现在政府之间的配合和合作不是特别顺畅，非政府之间的交流就显得格外重要，包括像中国学生到美国学习，美国学生以及商人来到中国。如果疫情得到控制，我特别希望国际旅行能够尽快恢复，所以我也是非常赞赏像 IFF 这样的论坛，这对于增进双方理解有益，对于两国政府朝着正确的方向去发力也会有帮助。

林建海：十分感谢，讲得非常好，洪俊杰先生还有补充的吗？

洪俊杰：我跟刚才几位专家是一样的，首先非常感谢国际金融论坛（IFF）给大家提供这么好的一个交流平台，中美双方的一些专家、一些企业界人士能够坐下来谈一谈肯定是个好事。

在疫情之前，我几乎每年都会去美国，每次去美国之后的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包括在经贸发展上，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叫“全球化没有回头路，只能更上一层楼”。我们现在遇到了很多新问题，但是不可能走回头路，因为无论是从人类的历史还是中国的历史来看，开放意味着发展，封闭意味着落后，这是一个永恒不变的、适合所有国家的道理，所以全球化只能更上一层楼。对中美双方来说，既要各美其美又要美人之美，重要的是要求同存异。双方在很多方面，包括政治制度上、文化上、历史上都有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而中美在各自很多领域都做得很成功，大家各美其美，又应以包容的态度来看到对方的成功，加强合作、美人之美，并由此来实现天下大美，我想这是中美下一步发展的方向。再次感谢建海的邀请，感谢 IFF 这个高端平台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对话机会。

林建海：非常感谢！几位专家都讲到了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能不能请几位再来讲讲气候领域以外的，对两个国家和两个国家的经济都会有利的其他领域的合作？

杜大伟：我觉得有些领域开展合作还是比较容易的。您曾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过，全球金融稳定是一个公共产品，现在有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债务可持续性的问题，虽然两国之间有很多棘手的问题，但是维护全球金融稳定是中美比较容易开展合作的一个领域。如果没有全球金融稳定，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成就会付诸东流。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关注于这些比较容易做的事情，我们也要迎难而上，就像克雷格·艾伦先生说的，现在两国数据管控的体系或者法律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比较难以开展合作的领域，如果能够在这个领域开展合作，对两国都有利。欧盟在数据领域也有新的法律和做法，我们应该促进各方之间的跨境数据流动，如果没有这样的跨境数据流动，就会给太多的行业带来不利的影响，因为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数字化。

林建海：非常感谢杜大伟先生！讲得非常好，数据领域的合作也是非常重要的，从所有角度来说都是如此，特别是考虑到瞬息万变的数字经济的发展。

克雷格·艾伦：我想简单地讲一讲科技合作，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中美科技合作，对全球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国际上开展科技合作，推动创新，是一个简单的道理。所以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应当加大力度制定规则，帮助中美两国的科学界、技术界和技术公司开展合作，在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在可以竞争的时候竞争。制定的规则由谁来执行，这对于两国的科技关系至关重要，而且也没有一个现成的框架，也许 CPTPP 是一个很好的答案。

科技领域的合作是必要的，将有力推进全球范围的创新革命。刚才有嘉宾说 “全球化没有回头路”，但是很多国家的民粹主义是有可能干扰全球化进程的，所以我们要努力地工作来确保全球化继续向前推进。

林建海：谢谢克雷格·艾伦先生！科学技术、信息的交流、知识的交流也将继续在未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聂庆平先生、洪俊杰先生怎么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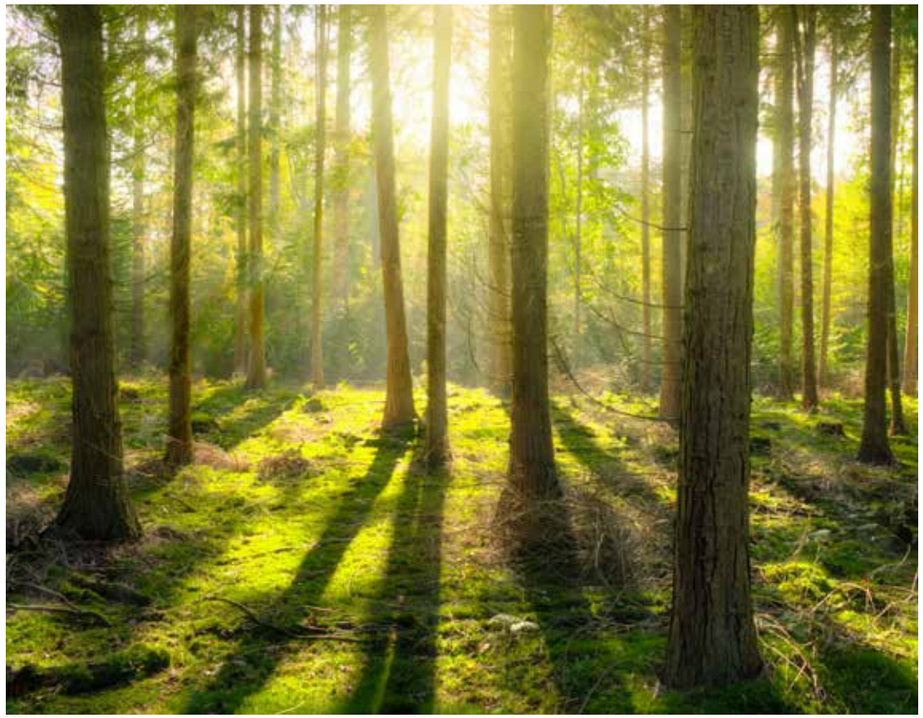
聂庆平：合作的领域，应该来说与其避实就虚、避重就轻，还不如就直接在目前中美关系可能发生比较大冲突的方面，去进行合作和沟通，因为这才是现在开展中美关系的重要领域。所以我很赞同克雷格·艾伦先生的说法，我们不仅应在企业领域合作，在科技方面也要进行合作。但是现在有些因素影响着双方合作，比如美方对中国企业的制裁，会影响到科技合作，应该说中国方面最希望与美国进行合作的领域就是高科技方面。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时期，经过 40 年改革开放的发展，中国的技术和制造业的能力及工艺水平，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比拟和替代，所以中美之间在科技方面的合作将有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技术的发展。从难点做起，从遇到冲突的地方开始进行合作，就有可能实现未来整体的合作。

林建海：谢谢！我们应该在有难点的领域也要寻求合作。

洪俊杰：我简单地说一下，我觉得前面几位专家都讲得非常好，应该在数字领域、科技领域加强合作。我这里还想讲一点，就是中美应该在进一步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方面携手，包括在 WTO 改革这样的重大议题上，中美之间应该更多地加强合作。基于规则的全球经贸体系是非常重要的，WTO 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过去，包括现在也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面临一些问题。所以我想中美有必要携手联合推动必要的和合理的 WTO 改革。另外，应该关注一些发展议题，包括疫苗的问题、渔业补贴的问题、农业的问题等发展议题，也可以共同探讨一些新的议题。我们以前叫 21 世纪新议题，包括国有企业的问题、补贴的问题等，都可以以开放的态度进行探讨，进一步地完善当前的全球治理体系，解决我们赤字规则的问题，我想这对于下一步全球经贸体系的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林建海：非常感谢洪校长深刻的见解！我们的讨论也到了收尾的时候，每一次我们都能够以乐观、积极的基调收尾。我们的四位发言嘉宾都讲得非常好，把当前一些重要的领域都加以归纳，比如气候变化、绿色金融、数据、数字化、科学技术、全球金融稳定、公共卫生和抗击疫情，以及全球治理体系和全球机构机制的改革等。

在我们的会议进入尾声之际，我想提最后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不需要各位嘉宾回答，因为这个问题是提给今天所有线上线下与会人员的，就是大家能不能讲一件事，由于这件事的存在使我们看好中美经济关系在未来若干年的发展，也就是说有哪个因素让你对中美经济关系在未来若干年的前景感到乐观？这个答案放在我们心



中就可以了。有一天当我们再次相聚的时候，再来分享我们的答案。

非常感谢各位发言人，围绕不断演进的中美经济关系提出重要而深刻的见解，带来了丰富详尽的信息，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时间展开进一步讨论，非常期待再有机会和各位一起来探讨。

最后我想强调的一点，也是在我们讨论中一次又一次出现的一个要点，就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想要可持续生存、发展、繁荣，必须携手合作，不只是中美之间，而且是世界上所有国家都要携手合作。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时候，曾经有一年的年会，我制定的主题是“全球的挑战需要全球的解决方案”，我希望它到今天仍然成立！我们必须找到具有实践意义的和行之有效的方式来进行合作，这样才能够打造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并且保护好我们的地球。

最后，我也要感谢今天晚上每一位参会的听众，感谢巴西工业发展与贸易部前部长亚历山德罗·特谢拉大使，他今天一直在线上参会，非常感谢！

再次感谢国际金融论坛（IFF）秘书处的辛勤工作和大力支持，使这次会议能够成功地举办，希望明年年会的时候，我们能线下面对面相见。希望大家继续保重，注意健康，谢谢大家！再见！

共同富裕与全面可持续发展

IFF 学术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134
黄奇帆：共同富裕的内涵与第三次分配的要义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139
刘世锦：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和选择

IFF 学术委员、国务院参事 142
汤敏：第三次分配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IFF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新开发银行原副行长 145
祝宪：缩小机会不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

共同富裕与全面可持续发展学术讨论 147

共同富裕的内涵与第三次分配的要义

■ 黄奇帆 / IFF 学术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黄奇帆

结合会议主题，我就共同富裕的内涵与第三次分配的要义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和要求

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这一重要论述，力透纸背，直指人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体现，是我们党的宗旨。共同富裕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没有共同富裕，社会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和阶层固化。如果贫富差距过大甚至出现两极分化，经济运行会出现消费不足、投资过剩。如果出现阶层固化，整个社会就会停滞、撕裂甚至动荡，整体经济循环就会陷入低效率均衡。共同富裕就是要跳出这种低效率均衡，形成多数人群收入达到中等富裕水平，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了共同富裕，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发生的生产过剩的矛盾，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得到有效解决，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观点。我理解的实现共同富裕，有以下五个方面的路径要求：

一是要统筹好“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这两件事。共同富裕包含了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件事，这两件事不可偏废。一方面，做大蛋糕是分好蛋糕的物质前提。蛋糕不大，分得再好，意义不大。对当下的中国而言，尽管已经实现了全面小康，我们仍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20 年人均 GDP 虽已达 1.13 万美元，但与北欧发达国家人均 5.6 万美元、美国人均 6.4 万美元的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我们仍要聚精会神搞建设，把蛋糕继续做大。如果不继续把蛋糕做大做好，只把蛋糕分来分去，那么蛋糕就会越分越小，最后不会共同富裕只会共同贫穷。所以，不要一说共同富裕，就整天想着分蛋糕的事，却把做蛋糕的事忘记了。另一方面，分好蛋糕也是进一步做大蛋糕的激励基础。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不会自动纠正因各种起点不平等而导致的结果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和增长停滞是必然现象，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无解的。所以我们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兼顾分好蛋糕，通过分好蛋糕进一步做大蛋糕，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二者要动态兼顾，相互兼容。

二是要循序渐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根据每一阶段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经济的基础以及社会的条件来制定标准的。也就是说，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定量、定性的标准，整体来说是分阶段推进，逐步提高，并不是一步到位。现在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实施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共同富裕，在内涵和标准上是不同的。共同富裕的本质意图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不同阶段，表现形式和标准层次会有不同。所以，实现共同富裕不能犯急性子。我们现在刚刚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还有大量人群的相对贫困问题，而且解决相对贫困问题要比解决绝对贫困更加复杂、困难。2019 年我国有 6.1 亿人的年人均收入仅 11485 元，月收入不到 1000 元。有关研究显示，若根据城乡一条线计算相对贫困标准，2020 年后全国相对贫困人口约有 2 亿人，其中农村贫困人口占 80% 以上。因此，实现共同富裕仍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如能在 2035 年左右实现中等收入人群翻番、低收入人群减半、人均 GDP 达到 2.5 万美元，共同富裕就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三是要缩小差别，但不搞平均主义。共同富裕不是指所有人都达到一样的水平。这是错误的认知，也违反了共同富裕的原则。共同富裕的原则并不是消灭差别，变成无差别。我们反对平均主义的共同富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方面我国是吃过亏的。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与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相伴随的是共同贫穷。事实上，我们应该承认，即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存在起点不平等或过程不公平导致结果不平等的情况。实际上，一方面，由于自然禀赋、个人努力、外在条件等起点不平等因素的复杂作用，而导致的收入差别总是存在的；另一方面，由于行业改革不到位，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过大现象陆续扩大，行业差别仍然存在。共同富裕不是把这三大差别归零。我个人认为，区域差别如用不同区域人均 GDP 的差异来衡量，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人均 GDP 倍数应当控制在 2 倍以内比较合理；城乡差别如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来衡量，也应当控制在 2 倍以内；全社会基尼系数控制在 0.3 ~ 0.4 之间比较合理。

四是要体现共同劳动、共同创造。共同富裕是共同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需要全体老百姓共同劳动、共同创造、共同奋斗、共享蛋糕，多劳多得，绝不是仅靠一部分人把蛋糕做出来，然后分给不劳而获的人。比如说，绝不是把东部的人劳动产生的财富简单转移支付给西部，养着西部，而是在东部的支持下靠西部人民发挥自身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主要通过自身的努力与全国人民一起实现共同富裕。同时，需要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为主，意味着多数人要靠劳动致富，劳动是参与分配的主要依据。这个劳动包括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包括了企业家的管理活动的劳动，包括了科学家的创造发明的劳动，也包括了投资者或者投资经理捕捉市场机会配置资本流向的劳动。同时，允许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但要有机会均等的机制。也就是说，要让人民群众通过劳动积累而来的资金、房产等财富能够共同参与经济增长，共同分享经济增长的红利，而不能因为体制机制的障碍仅仅由一小部分人独享财富增长的机会。

五是要以高质量发展为基础。共同富裕应是整个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结果，是体现五大发展理念的共同富裕。要通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做大蛋糕，进一步夯实共同富裕的生产力基础；要把缩小区域差别、城乡差别和行业差别作为重点，着力推动协调发展；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促进绿色发展；要在与世界广泛交往中汲取文明精华、促进开放发展；要平衡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促进共享发展。换言之，共同富裕与新发展理念是内在统一的。在操作上，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要尊重经济规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比如，针对区域差别，要充分挖掘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研究提出一批科技水平高、带动效应强、符合国家战略需要的大项目大举措；针对城乡差别，要着力破解阻碍城乡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在优化资源配置中推动城乡融合；针对行业差别，则要进一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打破行业壁垒和垄断，以有效竞争推动行业收入差距逐步缩小。

二、处理好三大分配之间的关系

习近平主席强调，要“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当影响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协调、城乡统筹、行业均衡的体制机制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后，为了促进共同富裕，我们还要做好分配的工作。其中，一次分配讲效率兼顾公平，二次分配讲公平兼顾效率，三次分配讲自愿、讲道德。这是三个分配的基本格局。这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是：一次分配是基础，二次分配是关键，三次分配是配套和辅助补充。有人说，如今我国前面两次分配都已经做得很完善了，应该将重点放在三次分配上，提倡大家捐款。这种理解是绝对畸形化的歪曲事实的理解。

（一）一次分配讲效率

这里的效率代表的不仅是劳动所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则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关于农民，不能仅凭借农民从事农业活动的勤劳程度决定他的分配，而是要把被征地动迁的土地要素流转带来的收入大部分分配给农民，增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此外，农民对其拥有的土地，比如宅基地和承包地等也同样拥有用益物权，这是一种财产权利。农民可以用这些地做融资抵押，申请到贷款，有了这些贷款，农民就有了靠资金要素来获取收益的可能，其收入就会有所增加。这种因赋予农民土地要素的流转而形成的收入分配，都属于一次分配。所以，一次分配讲效率不仅仅是按劳动来分配，而是包括要素在内的多样化的分配方式。

一个典型的问题是如何利用资本市场做好一次分配。其实，这方面发达国家非常有经验。比如，美国股市总市值中大约 63% 左右由机构投资者持有，其中各类共同基金占了三分之一。而这些共同基金的一大来源就是各种退休金。正是在此类养老基金的参与下（占美国股市市值规模 30 万亿美元的 30%），加上美国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战略投资者等的长期投资（占了股票市场的 40%），美国的资本市场才形成了以长期资本和机构投资为主，散户和短期基金投资为辅的投资格局。这种机制也让美国的普通工人能分享到资本市场增长的红利。所以，在疫情之下，尽管美国失业率连创新高，但由于股市在持续上涨，工人来自资本市场的财产性收入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这一现象启发我们，如果能够进一步拓宽社保资金投资资本市场的渠道，我国资本市场的长期资本就会增多，广大老百姓也可以在股市成长中受益。事实上，除了养老、医疗保障基金外，还有住房公积金和企业年金（补充养老保险金），这些基金也都应该加大在资本市场中的投资比例，而不能仅仅是存银行拿利息。这既是为资本市场提供稳定可靠的长期资金来源的需要，也是这些基金自身保值增值的需要。在未来，这些资金可以通过竞标的方式交给类似社保基金管理机构那样的投资机构来管理，实现 7% 以上的年化收益率，可谓一举多得。

（二）二次分配讲公平

一次分配主要在市场主体端，根据国家的法律和市场的机制来运行；二次分配则由政府主导，是直接由政府推进的分配，讲的是公平，是整个分配关系当中最关键的概念。二次分配包括政府制定的税收、社会保障的五险一金以及转移支付三个方面。

重点谈一谈税收。税收包括直接税与间接税两种。所谓间接税，是指纳税义务人不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纳税义务人能够用提高价格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别人的税种。具体而言，增值税、消费税以及关税等都属于间接税。直接税是指直接向个人或企业开征的税，是指纳税义务人就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具体而言，房产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遗产税等属于直接税。间接税由于可以转嫁，对收入分配调节功能不如直接税。在未来，要逐步降低间接税的比重，提高直接税的比重。

建议进一步降低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七级累进、最高 45% 的所得税税率，在全世界

算是较高的。我国每年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收入的比重为 7%，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20%、发展中国家 15% 的比重，甚至比俄罗斯都要低。之所以这么低，一个重要原因是高边际税率下，很多私营企业主在企业不领工资，而是将收入留在企业转成按 25% 的税率交企业所得税；一些高收入人群要么移民要么将企业迁到香港、新加坡等地以避税。按照国际惯例，个人所得税率应该小于或等于企业所得税率，现在企业所得税降到了 25%，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也应由 45% 降到 25%，相应的级次税率也应下降。此举不仅不会减少税收总量，反而会扩大税基，刺激消费，形成税收总量的增加，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也会逐步提升。

建议进一步稳定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占数量 80% 的小微企业吸纳了 70% 的就业。2018 年 7 月，国家财政部和税务总局针对小微企业出台了持续三年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100 万元（含 100 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 50%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19 年 1 月，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又将该优惠政策进一步放宽：对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并按 20%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100 万 ~ 300 万的部分按 50%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按 20%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2021 年 4 月，两部委再次发布公告，对应纳税所得额低于 1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12.5% 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并按 20%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优惠时间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这些政策将小微企业的实际税负降到了 5%，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为优惠的政策了。建议将这一短期性、临时性政策转变为长远的、基础性制度，上升为法律，以稳定社会预期。

除了所得税外，直接税还包括房地产税、遗产税和馈赠税。这些都是现代国家财税体系中重要的直接税税种。目前，我国正在试点房地产税，未来将逐步推开。今后还要研究推出遗产税和馈赠税。当然，我们还要考虑税源的国际竞争因素，不能孤立地谈提高直接税比重。比如，法国在奥朗德时期推出了一项比较左倾的政策，即收取高达 70% 的遗产税。这项政策一经推出，法国的富翁和企业领袖们纷纷选择离开法国，移民税收较低的英国伦敦，很多企业家也将公司总部也迁到英国。这样一来，英国因此获得了一笔巨大的财富，而法国的资产财富却大量流失。由此可见，想要解决平衡性的问题，还需要统筹国际竞争的考虑，否则可能会适得其反，造成财富流失。

（三）三次分配讲自愿

三次分配主要指自愿性质的捐赠。现在不少人富起来后有回馈社会的愿望，社会责任感很强，但由于我们这方面相关的税收制度不健全，方便老百姓做慈善的通道还不够畅通，相关社会组织和行业监管尚不成熟，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逐步完善。比如，通过免抵税可以有效激励人们从事公益捐赠。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 12% 的部分，准予税前扣除；根据《个人所得税法》，个人将其所得对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进行捐赠，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 30% 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此外，对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实行全额税前扣除。在受赠对象方面，有关部门也出台了一些政策措施，放宽了受赠对象的限制。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表明，我国正在加快形成日益规范、透明、法治化的公益性捐赠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三次分配中捐赠税前扣除若与降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实际税负的有关政策结合起来，不仅可以让一次分配更有效率，还有利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特别是高收入群体和企业加大捐赠的力度，促进三次分配，进而为共同富裕作出更大贡献。

总之，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体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共同富裕面临的挑战和选择

■ 刘世锦 /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刘世锦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很快，但是收入差距确实也在扩大，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 1978 年到 2008 年的 30 年，收入差距总体上是在扩大，中间有一些波动，但是扩大是一个总趋势；第二阶段，2008 年以后，收入差距在高位徘徊，也有人认为有所下降，虽有争议但总的来讲，收入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如何看收入差距的变化？我想提出两组重要的概念：

一组是增长型的收入差距变动和衰退型的收入差距变动。所谓增长型的收入差距变动，就是指收入差距变动与经济增长同时发生，而且这种差距变动推动了经济增长，也就是说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都有增长，只是快慢不一，所以出现了收入差距。衰退型的收入差距是指，收入差距变动与经济衰退同时发生，绝对的经济衰退一般是比较少的，相对的经济衰退是指经济增速虽然维持了正增长，但是显著低于潜在增长率。

另外一组概念是增效型收入差距变动与减效型收入差距变动。增效型收入差距变动有利于提高效率，比如资源由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像过去很多年农民进入非农产业，通过改进激励机制降低成本、增加产出，比如我们搞公司改制，通过创新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等等。而减效型的收入差距变动是指收入差距变动带来效率的下降，比如像腐败、行政性垄断引起的收入差距的变化。当然增效型和减效型收入差距变动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和财富的关系不一样。增效型是在增加社会财富，而减效型只是在分配或者是在转移社会财富。这两者有时候同时发生，有时候甚至很难分清楚，比如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搞的双轨制，一方面提供了市场激励，它是增效的；同时也产生了腐败，它是在减效。

我们再看一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收入差距变动情况。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差距变动大体上属于增效型，经济增长接近潜在增长率水平的收入差距变动。当然减效型的因素也普遍存在，比如像与行政权力相关联的腐败，行政性的行业垄断，不公平的市场准入和市场竞争。增效带动增长，这个还是主体。

经济学上有一个库兹涅茨曲线概念，这个曲线被认为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由低到高，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又由高到低，呈现倒 U 型的变化。这里面有一个暗含的逻辑，在现代经济增长的初期，处在高生产力部门的人群，其收入是率先增长的，在收入差距拉大的同时也带动了经济增长，但是达到一定高度以后，增长将会减缓。如果此后低收入人群生产力提升，带动其收入增长相对加快，就会在收入差距缩小的时候也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

简单地说，第一阶段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拉大了收入差距；第二阶段后富起来的另外一部分人将缩小收入差距。但这两个阶段都具有增效带动增长的特点，这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情况。但是库兹涅茨曲线在国际上是很有争议的。因为它并没有得到一个普遍的证实，这种现象其实并不具有必然性，有可能出现其他多种状况。

中国现在提出共同富裕，我认为面临着三种选择、三个前景。

第一种是递进。在继续保持先富人群积极性、创造性的同时，加快后富人群的前进步伐，从而缩小收入差距，使经济社会继续保持增效带动增长的状况，这是比较理想的状况。

第二种是僵持。第一阶段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增长乏力以后，低收入人群无法提高生产力，难以启动后富

我以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和政策的核心是，着力提升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促进机会均等，缩小不同人群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以增效带动增长的方式缩小收入差距。

起来的第二阶段，这样经济有可能陷入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增长相对衰退的状态。

第三种是后退。全面的压制先富阶层，所谓的劫富济贫，其实是劫富致贫。在劫富的同时，使先富者失去增效的积极性，这样收入差距虽有可能缩小，但是结局很清楚，就是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平均主义加普遍贫穷的状况。

这三种前景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第一种递进，应该是很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但是并不具有必然性，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一系列经济社会条件的配合，难度不容低估。

第二种僵持，社会公众不满意，批评的声音也很大，但是国际经验表明，落入这种陷阱的可能性并不是很低，很多拉美国家都已经落入这个陷阱，而且这个僵持是动态的，不可能长期存在，不进则退。

第三种后退，看起来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民粹主义思潮占了上风，出现这种局面的社会土壤还是存在的，因为不劳而获对一些人还是很有诱惑力的。

所以中国现在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争取第一种递进前景，避免后两种也就是僵持和后退的可能。

经过 40 多年的发展，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共同富裕的第二阶段，即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按照我前面讲的，特别是参照一些国际经验，显而易见第二阶段的难度和不确定性是要大于第一阶段的。

中等收入人群的界定，本身也是一个学术问题，有不同的观点。国家统计局界定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是：三口之家年收入在 10 ~ 50 万元。据此测算，2018 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 28% 左右，约 4 亿人。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以后，目前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目标，就是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也就是用 10 ~ 15 年的时间使中等收入群体增加 4 ~ 5 亿人，达到 8 ~ 9 亿人，占到全国总人口的 60% 左右。

实现这个目标的意义何在？第一，可以扩大消费和投资需求。因为中等收入人群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可以带动消费的增长，同时也可以带动基础投资等等。第二，更重要的是这部分人群并不仅仅是花钱消费，更能创造财富，他们是生产者、创新者，通过人力资本的提升显著增加供给侧高质量就业、创业、创新的动能。第三，中等收入群体占总人口一半以上之后，将有助于形成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以及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

所以提出并且力争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这个目标，将会持续性地加快低收入阶层富起来的步伐，是共同富裕第二阶段的一个重大举措。同时，提出这个目标有利于形成全社会的共识，调动各方面推动共同富裕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实现这个目标有可能性吗？我们的研究团队也做过一些测算，假设从 2009 年到 2013 年，实际 GDP 年均增长 5% 左右，平均通胀率为 2.5%，名义 GDP 年均增长 7.5%，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名义 GDP 增速基本匹配，到 2030 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将会上升到 51%，达到 7.5 亿人，也就是与 2018 年相比增加 3.7 亿人。按照大体相同的变动速度，到 2035 年以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有可能达到 8 ~ 9 亿人，从而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

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怎么实现？我以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战略和政策的核心是，着力提升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促进机会均等，缩小不同人群间的人力资本差距，以增效带动增长的方式缩小收入差距。其中有一个最简单的逻辑，就是社会上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包括财产的差距很大，但是他们之间的能力差距有那么大吗？其实并没有那么大。造成收入和财产巨大差距的原因是他们的发展条件、发展机会的差距巨大。比如一个农村的孩子出生后可能营养不良，上学的时候教育资源差甚至没有机会接受基本教育，求职、就业的时候，也比城里人缺少机会。所以要通过改革来创造条件，把由于社会经济关系造成的这些差距尽可能地缩小。

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提升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要增强体力、增强智力、增加机会。做到机会均等很难，但是可以努力缩小差距。创造一个人力资本公平发展的环境，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就能充分发挥出来。提高人力资本环节的公平性之后，社会效率就会提高，从而推进社会公平的提升，促进经济增长。

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优先顺序，我认为要素提升第一，生产第二，分配第三。提升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增强他们做大蛋糕的能力。让他们参与增长，勤劳就业、创新创业。要他们自己直接去做大蛋糕，做蛋糕的能力增强了，自然分的蛋糕也就多了。

目前中国人均 GDP 才 1 万美元，与发达经济体人均 GDP 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任务还远未完成。

从分配领域来讲，一次分配为主，再次分配为辅，三次分配再次之。一次分配从政策上来讲要增加就业，增加劳动者的素质，这样低收入人群的分配比例自然会上升。二次分配关键是税收制度要改革，要改革税制，调节收入。把钱集中起来后要优先补上低收入人群基本公共服务不足的短板，这是增强人力资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三次分配一定要坚持自愿，如果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做慈善公益事业，应该把这个资金重点放在支持低收入人群提升人力资本上，比如多搞一些扶贫或支教方面的项目。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次分配一定要坚持自愿的原则。要防止把关注点放在三次分配的同时，对真正低收入人群的要素提升关心不够，甚至漠不关心，这样做很可能导致前面讲的收入分配后退的后果。

二次分配，需要防止短期内给低收入人群过多分发货币，搞所谓的福利主义，不重视人力资本的提升，花钱搞消费，不强调勤劳就业、创业创新。包括公共资源在内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一味强调分配是分不了多长时间的，最后会落入僵持甚至后退。

当然不是说分配不重要，但是分配应重在制度建设，要加快由间接税向直接税过渡，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更重要的是要理顺要素生产和分配的关系，增强它们的互补性和可持续性。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具体操作，要特别关注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如果把中等收入群体之下统称为低收入人群，他们占我国总人口的 70% 左右，约 10 亿人。在低收入人群中收入较高的 40%，约 4 亿人，其收入接近中等收入群体的门槛，是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最有可能率先进入中等收入群体，其对应的家庭收入是 4 ~ 10 万元。在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中，城市居民约占 40%，农村居民约占 22%，农民工约占 19%，有农转非经历的城市居民约占 19%。实际上，这个群体有些现在还在农村，有些是在由农村到城市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现在已经进城了，但是收入水平还不高。所以潜在的中等收入群体的 60% 都和农民相关，这可能是下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应关注的重点。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政策要做的事情很多，我认为有三大政策重点：

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提升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要增强体力、增强智力、增加机会。做到机会均等很难，但是可以努力缩小差距。创造一个人力资本公平发展的环境，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就能充分发挥出来。提高人力资本环节的公平性之后，社会效率就会提高，从而推进社会公平的提升，促进经济增长。

一是要打通人员、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双向流动渠道，鼓励农民进城，同时也让城里人能够下乡，城乡人员双向流动，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特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二是要补上低收入群体在教育、医疗、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短板，重点是通过义务教育、职业培训和扩大就业创业，缩小低收入人群的人力资本差距。

三是要促进中小企业民营经济更大规模、更为稳定、更高质量的发展。因为潜在中等收入群体基本上都是在以民营经济为主的中小企业里面就业，如果以民营经济为主的中小企业搞不好，发展得不活跃，水平比较低，收入上不去，那么中等收入群体要扩大，最有可能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那部分人要提高收入就会很困难。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推动以民营经济为主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发展民营经济的意义。

第三次分配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 汤敏 / IFF学术委员、国务院参事

汤敏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加大。2021 年 8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我想从三个角度来讨论共同富裕的问题：第一，中国现在的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第二，推进共同富裕容易产生的误区；第三，如何加强第三次分配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一、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

在经济学里有一个衡量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指标叫“基尼系数”，数值越高意味着收入的差距越大。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我国 1995 年的基尼系数是 0.389，但在 2000 年之后该数值开始快速上升，2008 年最高时曾达到 0.491。之后，随着一系列政策出台，我国基尼系数有所下降，目前在 0.46 左右， 还是高于 0.40 这个国际公认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世界银行按照全球统一标准， 在考虑了城乡之间购买力差距等因素之后，测算出 2016 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 0.38 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基尼系数仅次于美国，比英国、德国、以色列、日本以及东欧、北欧等国家都高。

如果根据财富的基尼系数来评价贫富差距的话，我国的差距程度就更大了。自 2000 年以来，中国的财富基尼系数从 0.599 迅速上升到 2020 年的 0.704。随着近年来房价不断上涨，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越来越大。

上述数据与老百姓的感受是一致的。有人做了一次民意调查，问老百姓觉得目前的收入差距大不大，结果有 38% 的人认为非常大，将近 46% 的人认为比较大，这意味着有 83% 的群众认为我国目前存在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

贫富差距过大的现实凸显了推动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那么应该如何去推动共同富裕呢？中央提出要用三次分配的方式。三次分配的划分是厉以宁教授首先提出的。 第一次分配是指按照市场效率进行的分配，比如说工资、利润等；第二次分配是政府通过税收调节来进行；第三次分配就是通过个人捐献等非强制方式再一次进行分配。目前我国社会捐赠额逐年递增，2019 年是 1509 亿元人民币，其中教育、扶贫、医疗健康三大领域总计占比约 72%。捐款的 44% 给了各个基金会，26% 给了中国慈善会系统，通过他们来推动和执行公益慈善项目。另外，我国的捐赠主要以企业为主，占 61.7%，个人捐赠占 26.4%，而其他国家个人捐赠是慈善捐赠的主要来源。

二、推进共同富裕容易产生的误区

最近社会上的很多讨论把共同富裕的希望寄托在第三次分配上，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2020 年我国的慈善捐赠约为 1600 亿元左右，只相当于 100 万亿元年度 GDP 的 0.16%。相对第一、第二次分配在 GDP 占比 99.84% 的规模来说，第三次分配是一个很小的规模。 因此，想靠第三次分配来主导解决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在慈善捐赠比较发达的美国，捐赠也仅为 GDP 的 2.2%，相对于一次和二次分配来说也仍然是小头。所以在任何一个国家，第三次分配对收入分配都只能起到补充和缓解作用，而不是主导作用。

然而，中国的第三次分配仍有很大的发挥潜力。目前我国的公益捐赠主要来源于企业，而欧美等国家，70% 以上的捐赠则是来自于个人， 特别是老百姓的小额捐赠，企业捐赠只占小头。所以未来中国不但要鼓励企业家加大慈善捐助，同时也要提倡普通个人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公益慈善不仅要关注捐献规模，也要注重群众参与度、帮扶内容和工作效率等问题。

关于第三次分配我想强调几点：

第一，第三次分配是建立在自愿基础上，不是强制性的，不应该“逼捐”。现在社会上有时会出现一种不好的现象，就是“逼捐”，通常的方式是在网络或者媒体上列出捐款排行榜，然后找出其中的“铁公鸡”来，进行谴责和辱骂。也有政府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要求企业家捐助来支持他们的项目， 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国家的政策非常明确，第三次分配一定要遵循自愿原则。

第二，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鼓励企业和个人进行捐助。目前我国已经在税收方面出台了一些鼓励性政策，比如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 12% 以内的部分，以及个人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 30% 的部分，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还有一个税收工具或许能起到很大作用，就是遗产税。一旦开征遗产税，很多人的捐赠意愿会更强一些。此外还可以设立一些精神奖励方面的政策。 因为很多企业家做慈善捐赠并不是为了减税，更多的是要得到社会和政府的承认。所以，有时类似冠名权等精神类激励对企业和个人的捐赠也能起很大作用。我们可以在这些方面加大政策力度。

第三，第三次分配或者说公益慈善的捐献不只是钱，还有时间和能力。 我们还需要扩大群众的公益参与度。到目前为止，中国的注册志愿者有将近两亿人，相对于 14 亿人口的庞大基数来说还是少数，还可以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志愿服务的范围也应该进一步扩大，服务的方式也应该不断创新改进，让志愿服务发挥更大作用。现在国际上提倡一种叫做“专业志愿服务”的方式，就是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提供志愿者服务。要扩大志愿者规模和服务效果，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有优秀的志愿者组织去做好规划和组织工作，有好的基金会来支持志愿者活动。因此，我国需要更开放的公益机构准入机制，在加强监管的同时，要让更多公益机构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在第三次分配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如何加强第三次分配在推动共同富裕中的作用

如何从多维的角度来发挥第三次分配在推动共同富裕上的作用呢？接下来我想通过自己亲身参与的一些项目来抛砖引玉，看看第三次分配与公益慈善如何助力共同富裕。

1. 如何上好学？

众所周知，当下老百姓最大的焦虑之一来自子女的教育。相比之下，农村学校的教育质量更弱一些。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在于师资。为解决这个问题，四年前，我所在的友成基金会等一批公益慈善机构与北京师范大学和很多国内的专家学者一起，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的支持下，开展了一个乡村青年教师社会支持公益计划。我们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青椒计划”。

到目前为止，该计划以西部贫困地区为主，已经在全国范围培训了 1 万多所学校中的 10 万名乡村老师，惠及 500 多万乡村学生。这个以互联网培训为主的教师培训课程，每天都有课，为期一年。我们邀请了北师大最好的教授和在乡村任教的优秀老师来传授他们的教学经验。除了教师培训之外，我们还与一批教育公司合作，将优质的教学资源免费提供给乡村教师。比如清华大学的“爱学堂”和“洋葱数学”等公司，把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所有的科目都做成卡通形式，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同时，使授课过程生动活泼，他们将这些资源免费提供给乡村教师使用。我们还通过互联网，让城市优秀的音乐、美术老师给农村学校上课，解决农村学校音体美教师不足的问题；把计算机编程、航空模型等只有城市优质学校才设置的课程送达贫困地区的学校。

2. 如何看好病？

医疗健康同样是老百姓很关心的问题，而且重点和难点也是在农村。村医在解决农村公共卫生和健康问题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是中国红十字会基金会的理事， 我们正在推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机构开展一个乡村医生在线培训项目。由中华医学会找最好的医生，用最适合村医的教学方式和最契合村医的教学内容开展培训。每天一两个小时的课，可以连续培训几个月。第一批 5000 人已经开始上课。如果培训成功，还准备进一步扩大规模。

3. 如何做好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将是我国推动共同富裕中最重要的内容。除了需要政府、企业的参与，公益机构也可以发挥作用。贵州省黔东南的雷山县龙塘村是我们友成基金会的帮扶点，我们在那里进行了好几年扶贫和乡村振兴的试验。

在美丽苗族山寨，友成基金会派遣员工长期住在村里进行资源对接。利用融创公司提供的一笔捐助，村子里建起了一家“六星级”的民宿，现在已经开业， 据说提前好几个月的房间已经订满。除此之外，我们还协助在村里建起乡村合作社，发展包括稻田养鱼、玫瑰花种植等乡村产业。

现在龙塘村已经脱贫。为推广雷山的扶贫经验，我们还创办了“香橙妈妈学堂”，专门助力农村女性创业培训，到目前为止在西部的几个省已经免费培训将近 2 万名农村妇女。经过线上线下几个月的培训之后，她们有些做电商，有些做农业产业，平均创业成功率达到 65% ~ 70%。

我们正在开展的一个大规模乡村创业培训项目——乡村振兴领头雁计划，是与中国慈善联合会、清华大学、各地的共青团等机构共同发起的农村青年创业培训项目。该项目采取线上为主线下为辅的形式，培训学员全部免费参加，每周 5 次课，为期 5 个月。到 2021 年年底，该项目已经开展了四年，培训了 31 个省市自治区返乡创业青年 8 万余人。

目前，我们正在跟一些大公司合作，积极动员公司员工成为乡村振兴的志愿者。通过互联网，让他们与乡村学校老师、乡村医生、乡村创业青年对接， 利用他们的专业帮助乡村解决一些问题。例如，可以参与帮助农村青年创业辅导，让更多人都能参与到帮助乡村振兴的公益活动中。

缩小机会不平等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

■ 祝宪 / IFF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新开发银行原副行长

祝宪

共同富裕并不只是中国发展中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从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看，公平、效率与平等，以及防止贫富悬殊、防止两极分化的共同富裕话题，是世界性的问题。在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也是一个难题。从国际经验来讲，很难找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因此，中国如果在共同富裕、全面可持续发展方面能够走出一条新路，在下一步的发展过程中能够较好地解决此类问题，将是对全球发展、经济学及其实践做出的一个重要贡献。

世界银行曾提出过两大目标，一是减贫，二是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共同富裕或者是共享富裕。几年之后，中国在减贫问题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然而在共同富裕上有点步履艰难，取得的成绩不是那么显著。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证明了共同富裕的问题，特别是在分配的公平和效率问题上难度更大。我们经常讲中等收入陷阱，一些拉美国家在经济高度起飞之后，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极分化、贫富悬殊，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在经济增长时期，不断加大的收入差距，使低收入人群能得到更多好处；在经济衰退时期，无论是腐败、垄断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收入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使这些国家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失去了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机会。

我们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缩小机会的不平等，在中国，机会的不平等主要存在于农村等低收入阶层中。因此，如果能够为农村低收入阶层及其子女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机会，包括更贴近市场需求的各种培训，使其学到市场所需要的技能，他们的收入水平就可以提高，他们也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就业机会。

其实民粹主义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贫富两极分化。以美国为例，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包括制造业的外移、空心化以后，许多过去的蓝领工人失去了工作。由于没有完善的保障体系，政府也没有提供足够的帮助，他们无法在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时找到新的就业机会、得到好处和完成角色的转换，从而陷入了失业的境地。今天在美国，虽然并未实行应试教育，但是大多数新一代的家长都已认识到，如果孩子没有大学文凭，将来找工作的难度比过去 20 年要难得多。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缩小收入差距，也要看公共服务是否能够缩小机会的不均等。

我们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缩小机会的不平等，在中国，机会的不平等主要存在于农村等低收入阶层中。因此，如果能够为农村低收入阶层及其子女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机会，包括更贴近市场需求的各种培训，使其学到市场所需要的技能，他们的收入水平就可以提高，他们也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就业机会。

除了教育之外，在医疗、社保等方面缩小各种公共服务的城乡差别，能够解决中国现在还没有消失的城乡二元经济的问题，特别是城市和农村之间各方面的不均衡、不平等。

此外，在这一轮的改革中，城乡土地、劳动力和资金各方面要素市场的建立和流动性的增强，也会给不平衡和共同富裕带来良性互动。

因此我们应该从多方面发力，解决中国现有条件下的共同富裕问题。特别是低收入阶层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仅仅把眼光放在第三次分配上。第三次分配是自愿原则，而且从总量上来讲，不可能解决中国现在分配不平等、贫富差距比较大的问题。

最后，我们怎么样在新形势下，在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以后，特别是在产业链可能比过去更短平化的情况下，在创造财富、科技创新已经没有过去的传统制造业那种涓滴效应（Trickle down）的形势下，关注、照顾低收入阶层的利益。

举个例子，20 世纪初汽车刚刚发明出来的时候，福特发明了汽车的生产流水线，不但提高了效率，还使汽车的成本大幅度下降，而且雇用了大量的蓝领工人进行汽车制造和装配。因此一个发明不仅创造了财富，还产生了涓滴效应（Trickle Down）。但是在当今世界，不仅仅是中国，很多发明者只要完成发明，就能获得财富。比如说他的公司 IPO 了，其财富增加并不需要雇用太多低收入阶层的工人。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在我们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应过快地把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因为其可以给低收入阶层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有些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眼前的政策目标搞一些比较高大上的工程，造成一些传统产业过快地迁移，对于就业，尤其是对低收入阶层的就业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共同富裕与全面可持续发展学术讨论

主持人：张　媛，第一财经制作人、双语主持人
嘉　宾：黄奇帆，IFF学术委员会主席、复旦大学特聘教授
祝　宪，IFF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新开发银行原副行长
刘世锦，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汤　敏，IFF学术委员、国务院参事

张媛：接下来请几位嘉宾共同就一些核心的问题进行探讨。我们看到最新的社会消费数据是在下滑的，而且近期频繁的产业政策调整引发了失业。人既是消费者，也是创造者，情况非常复杂。我想请问各位嘉宾，假如我是一个能源密集型产业工人，面对能源转型，一个短期培训就可以让我顺利转行吗？如果我的年龄较大，在时代转换的过程当中，我可能就是那个被时代列车“撞倒”的人。如何解决这一人群的就业问题？中国有央企、国企也有中小企业和外企，企业就像鱼，经济大环境就像水，如何在激活大企业活力的同时也保持中小企业的活力？

汤敏：如果一个人失业是由于其所在行业发生结构性调整造成的，我们就不能仅从个人角度谈失业与就业的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人就业，可能会让更多人失业。例如，如果保障教培行业人员就业，让该行业继续野蛮生长，有可能加剧社会的内卷和焦虑。至于具体到个人能否通过短期培训解决就业问题，要考虑培训班的质量、个人知识基础以及个人努力程度等很多因素，非常复杂。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终身教育或转岗培训体系，产业结构调整却加快前进，结果造成一批人承担了很大时代成本，这与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国企改革有些类似。当年国企改革的时候，我们没有太多经验，造成一批下岗职工面临再就业困境。但是现在我们应该关注转岗、培训或者终身教育这个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我觉得职业教育不能仅限于校内学生的教育，职业教育应该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要实现共同富裕，重点是“扩中提低”，难点在于“提低”，而“提低”的关键是要快速建立起人力资本提升体系。

张媛：谢谢汤敏教授。请教祝宪行长，您对我国的减贫和共同富裕实践，有什么好的建议？我们看到动能的转换，看到高质量发展需要创新来驱动，您觉得怎样的节奏更适宜我们国家？

祝宪：刚才说到世行前些年提出的两个目标，一是减贫，二是共享繁荣或者叫共同富裕。我觉得中国无论是在减贫还是在共同富裕上，都有很多经验可以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尝试。比如说中国在减贫的过程中，不仅重视提供公共服务，也十分注意解决生计问题。比如说近些年实施的搬迁式扶贫，就是帮助那些住在不具备良好生存条件的深山里的农民搬出来，并为他们建房造物提供适于生存的新环境，我觉得这是中国扶贫的创举，其他国家由于种种原因，不一定能够做到。如今我们已经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但相对贫困问题，包括城市里的低收入阶层的贫困问题还需要解决，而且可能难度更大，需要多方努力、多措并举打好“组合拳”。

另外，共同富裕也与老百姓对未来的期望值和自信心有关系。如果一个社会低收入群体的大多数都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机会感到满意，而且对未来充满期待相信生活会越来越好，这个社会就是健康向上的。如果一个社会的低收入群体普遍感到压力很大、困难重重，觉得未来的收入和生活还不如今天，那么这个社会发展堪忧，所以让低收入群体对未来、对向中等收入迈进抱有希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社会的中高收入阶层能够通过国家税收等政策和自愿慈善捐献，把他们的财富反馈给社会，反哺给低收入阶层，对于实现共同富裕也非常重要。

张媛：谢谢。接下来请教黄市长，您刚才讲到三次分配当中不应该只寄希望于企业的捐赠，另外，现在舆论中有一些声音认为“贫富差距加大的原因与市场化改革及民营经济相关”，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黄奇帆：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这里面有两个层面。

第一，在我国最近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也就是“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我国在三大差距即贫富差距、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方面取得了较大进步，这方面国家统计局有准确数据佐证。

1. 区域差距。在 2010 年前后，我国东西部差距大约有两倍多一点，到 2020 年，东部的人均 GDP 达到了 9.33 万元，西部的人均 GDP 是 5.7 万元，东西部差距从 10 年前的两倍多一点缩小到了 1.67 倍。差距虽然还在，但缩小了，这与我国西部大开发取得了重要成就有关。西部大开发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加快发展，这是第一点。

2. 城乡差距。2020 年，我国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4.38 万元，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1.71 万元，两者的差距是 2.56 倍。10 年前也就是 2010 年，我国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2.45 万元，农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 7900 元，差距是 3.1 倍。尽管城乡差距依然很大，但是也在缩小，从十年前的 3.1 倍下降到了 2.56 倍。

3. 贫富差距。10 年前 2010 年的时候，我国的基尼系数达到了 0.485，2020 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是 0.465，基尼系数的缩小意味着贫富差距相对缩小。

这三个数据都是国家统计局近十年公布的，表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三大差距是在逐渐缩小的。缩小的原因当然跟我国全面脱贫，特别是“十三五”期间帮助 5000 多万农民摆脱绝对贫困有关。另外现在社会居民医保普及 13.6 亿人，城乡的养老保险普及 10.4 亿人，这些都是我国在过去 10 年特别是过去五年取得的成就。有些人总是觉得市场经济加剧了我国的三大差距，这是一种模糊的错误观念，我在此用实际数据做一个澄清。

第二，要实现共同富裕，就是进一步缩小三大差距。缩小三大差距，就要努力让中国的城市中等收入人群，到 2035 年时从 4 亿人翻一番变成 8 亿；农村的相对贫困人群从 6 亿人减半变成 3 亿。

10 年以后，我国的 2 亿农民工群体会融入城市成为城市居民，而且会成为城市的中等收入人群，加上他们的小孩，会让城市增加 3 亿左右的中等收入人群。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本地居民也会增加 1 亿多中等收入人群。所以中等收入人群翻番的过程，就是城市居民自我发展和农民工落户的过程。

另一方面，就是要考虑怎么样让民营企业，包括 8000 多万个体户和 4000 多万小微企业变得富裕。如果把中小微企业、个体户的各种扶持政策落实到位，再让他们带动家庭，也会形成几亿人的富裕。所以宏观上讲，把中小微企业发展好，个体经济发展好，是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大企业强国，小企业富民，小企业是共同富裕重要的一个支撑点。

所以我觉得把中等收入群体翻番、低收入群体减半这两件事办好，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基础。

张媛：谢谢黄市长，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区域差距这三大差距非常重要。请教刘主任，把共同富裕作为发展目标大家都是认同的，但是实现的路径还存在较大分歧，您刚才提到的税收调节、推进税制改革、提高税率，都不是很容易能够达成共识，同时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首先要解决的是养老待遇差别的问题，这在短期可能比较难实现。我们现在提出几个节点，比如说“十四五”、2035、本世纪中叶，从这几个不同的时间维度来看，各自的侧重点是什么？如何能够解决由于社会流动性的降低和社会底层代际传递所造成的长期不平等呢？

刘世锦：你这个问题很大，我觉得我不太好回答，别说 10 年、20 年后的事情，甚至就是明年事我也说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在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福祉、改善低收入人群状况方面，我们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比如说鼓励农民进城。目前潜在中等收入群体中 40% 是城市居民的低收入阶层，60% 的人都与农民相关，要么还在农村，要么在从农村到城市的路上，要么已经进城但收入较低。怎么提升这些人的收入，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中国现在的流动人口约有 2.9 亿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在城市里工作十几年了。现在都在讲数字经济、电商平台，疫情期间很多人日子过得也不错，有人送快递，但是谁在送快递呢？基本上都是农民工。他们来城市已经十几年了，他有一个稳定的居所吗？前几年有些城市出台了一些规定，比如地下室不允许出租、不允许群租等，这些规定有其道理，比如群租房安全隐患比较大。但是反过来问一个问题，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有谁愿意去住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或几人甚至十几人吃住睡在一起的群租房？我们的城市领导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有没有想过那些租住在地下室和群租房的人，他们白天在干什么呢？他们也许是穿梭在城市街巷的快递员，也许是为城市上班族解除后顾之忧照顾孩子老人的保姆，也许就是领导所在机关的保洁员或厨师，他们的住房状况，我们的城市领导者能不能考虑一下。

最近两年我一直在提一个建议，就是能不能为城市里面的农民工搞一个安居工程，房子也不用太大，就像现在廉租房之类的，至少让城市里面已经工作了十几年的这些人，让他们有一个安身之处。不要老想着赶他们走，制定各种规定不让他在什么地方住，应该认真考虑他们的安居问题，因为城市发展离不开他们。

我不想说 10 年、20 年后干什么，我就希望今年、明年各个城市能不能出台一个进城农民工的安居房计划，起码为那些在城市已经工作了 10 年以上的农民工解决居住问题。这个出钱也不多，而且现在内需不足，从扩大城市内需来讲，花点钱把内需扩大，不仅有利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也有利于带动经济增长。

张媛：谢谢刘主任非常实在的建议，不说太远的，着重眼下解决实际问题。

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我们看到从个体到行业再到国家，其实创新是一脉相承的，最终我们要实现新阶段的目标，还是要靠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同时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也不断优化分配，最终让每个人实现各自美好的小目标，才能实现我们共同的大目标，实现共同富裕还需要每个人心怀希望的灯，始终坚定向前。

谢谢黄市长，谢谢刘主任，谢谢汤敏教授，谢谢祝行，同时感谢各位观众的守候！

碳中和国际峰会

IFF 联合主席、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葡萄牙前总理 151
巴罗佐：应对气候变化需采取共同行动

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主席、日本政府中央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 152
武内和彦：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十年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哥伦比亚前财长 154
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与 COP26 大会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副行长 155
丹尼·亚历山大爵士：气候变化的承诺必须转变成实实在在的投资

IFF 学术委员、腾讯战略发展部高级顾问、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能源专家 156
翟永平：实现碳中和更需要落实承诺的具体行动

碳中和国际峰会学术讨论 157

应对气候变化需采取共同行动

■ 巴罗佐 / IFF 联合主席、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葡萄牙前总理

巴罗佐

如果一件事本身就是全球性的，那它就需要全球的应对，应对气候变化显然就是这样的议题。目前遭受风险的是整个地球，所以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全球合作的计划和规划才能够形成多边合作。

欧盟一直非常重视气候变化的应对问题，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2004 年到 2014 年，在我担任欧盟委员会主席期间，欧盟委员会就提出了 2020 年欧盟气候计划。该计划旨在采取一系列行动将欧盟 2020 年温室气体排放相比 1990 年减少 20%。1990 年到 2020 年，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不是仅仅减少了 20%，而是减少了将近 30%，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

欧盟成员国曾经达到过 28 个，2020 年欧盟计划是大家共同协商的结果，该计划提出在能源结构中增加 20% 的可再生能源和 20% 的能效。我们是通过欧盟条例的方式完成该计划的，这并不容易，因为有的成员国并不希望在这些问题上通过立法来保证承诺的约束力，所以最终能在欧盟将这样的承诺落实付出了很多努力。这个计划是正向的激励，能够使各国政府明确应该做什么和不做什么。不仅对于政府而言是如此，对于商业界和广大社会都是如此。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更严肃的承诺，在格拉斯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COP26），绝对是一次进步，但并不足够。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高兴，综合考虑达成的所有协议和共识，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现在做出的应对气候变化承诺和以前相比更加严肃、认真和务实。

然而，COP26 大会上做出的很多承诺从法律角度上讲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公约或协议，它只是一个国家宣布了自己道义上的义务。当然，这依然是一个进步，毕竟 COP 26 是在正确的方向上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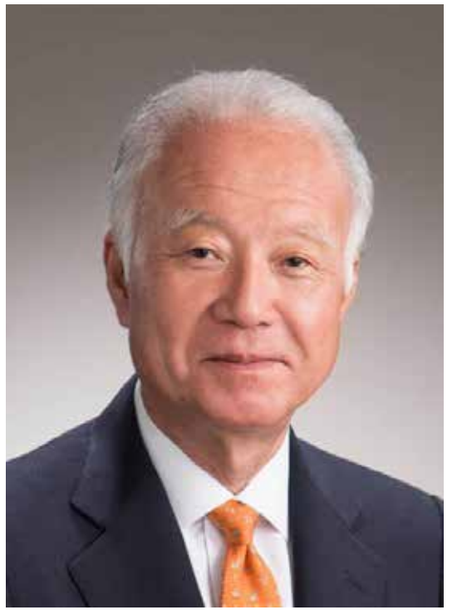
在明年埃及召开的 COP27 大会上，全球将会拭目以待，看各国作出的承诺落实得怎么样。关注格拉斯哥 COP26 大会的同时，也不能忘记非常重要的《巴黎协定》，看一看又取得了哪些具体成果。各个国家实现其承诺所采取的方式不一样，实现气候变化承诺困难重重，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因为他们为了自己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仍然需要排放一定的温室气体。

欧洲在减排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而且人们也意识到绿色经济能创造工作机会，全球创新科技的发展也使绿色经济变成可能。所以，想要落实气候变化承诺、实现碳中和目标，并保护地球家园，既需要配套的法律、科技的发展，也需要与既定目标相匹配的市场，更需要公共部门的大力支持与推动。

当然，私营部门的参与也是极为重要的。全球的年轻一代已经对应对气候变化、保护地球环境有了非常强的意识，也越来越认识到如果想要保护人类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就需要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努力。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改善生活质量、减少极端气候，需要的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行动。

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十年

■ 武内和彦 / 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主席、日本政府中央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



武内和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COP26），以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取得了很多成果。未来十年，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十年”，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采取“综合治理办法”是很重要的。

近年来，各国一直在进行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谈判， 2030 年是一个关键里程碑。2030 年后，应进一步加快措施，争取在本世纪中叶实现我们期望的目标。在气候变化方面，我们希望温室气体排放在 2030 年达到峰值，并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在 2050 至 2070 年实现“净零”排放。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我们希望到 2030 年实现“净零”损失，到 2050 年实现“净获益”。

那么目前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进展情况如何？首先，在 COP26 会议上，各国领导人明确必须守住 1.5℃的温控目标，并就《巴黎协定》第 6 条的具体实施细则进行谈判。在 COP26 文件中首次规定“减煤”，并规定要“逐步减少”燃煤发电。展望未来，我们将会看到讨论与谈判将转向具体的加强实施措施，限制化石燃料的使用，包括石油和天然气。

然而，已经很清楚的是，仅凭目前各国做出的承诺，将全球变暖限制在 1.5℃的温控目标无法实现。为了不使 1.5℃的温控目标落空，预计各国将在 2022 年重新评估其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同时，在COP26大会上，有超过120个国家签署了《格拉斯哥领导人森林和土地利用宣言》，同意加强合作努力，保护森林和其他陆地生态系统并加速其恢复。这些国家森林覆盖率的总和超过了全球森林覆盖率的 90%。

在生物多样性方面，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于 2021 年 10 月中旬在中国昆明举行；第二阶段会议将于 2022 年春季在昆明继续举行，主要是商定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

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将为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未来开辟一条新道路。特别是各国正在讨论的“30×30”目标 -——到 2030 年至少保护地球上 30% 的土地和水。然而，我们能够扩大的保护区域必定是有限的。在这方面，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即所谓的“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s），是非常重要的。其中一个例子是日本的传统农业景观（Satoyama），该景观支持植物和动物物种的多样性，使人们更能以环境友好的方式生活。

新冠肺炎疫情迫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健康基于全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已被广泛接受并成为共识。生物多样性框架应有助于促进这种综合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迫使我们重新考虑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人类的健康基于全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已被广泛接受并成为共识。生物多样性框架应有助于促进这种综合治理。

以综合治理的方式应对人类面临的多种挑战是至关重要的。在年度勘查地球化学国际会议（IGES）上，我们讨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问题，那就是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国境线，很多问题需要有全球的解决方案，比如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但不幸的是，目前大都是各自为政进行解决。

20 年前，人们开始有了全球意识，并希望用科学的方法解决问题，于是我开始在日本倡导重视全球气候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并创办了同名的学术期刊。今天，人们已经不再需要进行相关的科普教育来强调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了。这种方法也适用于金融领域。鉴于我们的资源有限，很显然，金融部门也必须将绿色融资纳入主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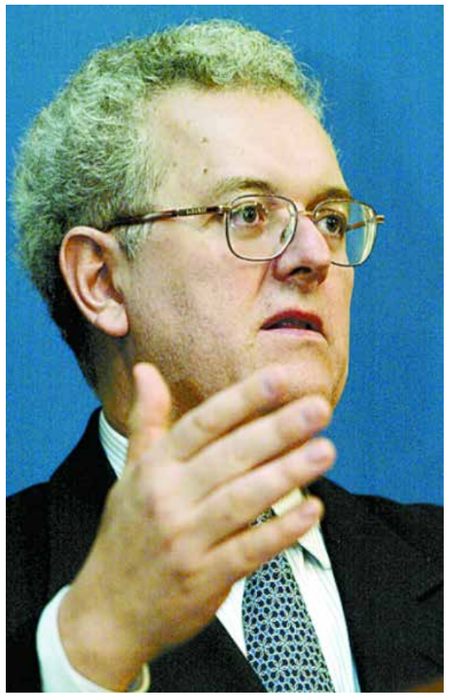
首先，我们必须投资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许多投资者和金融机构正在增加其业务对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影响的透明度。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是很好的投资，对气候和生物多样性都有好处。

其次，应该对依赖化石燃料的部门、社区给予转型扶持，帮助其逐步与化石燃料脱钩，实现公正公平的过渡，要尽量减少对工人和社区的负面影响。例如，必须承诺提供资金来重新培养劳动力的技能。ESG 投资者可以通过购买社会债券或可持续性债券来帮助提供这种资金。

我们正处于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减少灾害风险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决定性十年”，而且现在我们只剩下 9 年时间了。希望 2022 年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能够取得卓有成效的成果。

《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与COP26大会

■ 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 /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哥伦比亚前财长



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

所有的国家以及每一个经济部门、每一个行业都应作出努力，这样才能够达成《巴黎协定》和 COP26 大会的决定和承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COP26）是一次部分成功的大会，继六年前达成《巴黎协定》以来，各国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很多国家在 COP26 上做出承诺，并且达成了共识。但为什么说这只是部分的成功？因为我们必须要看到只有部分国家为其承诺作出实实在在的努力。《巴黎协定》设定的温控目标是 2℃，并努力把温度上升控制 1.5℃之内。如果我们对《巴黎协定》设定的温控目标无所作为的话，到本世纪末全球将升温 2.7℃。所以，所有的国家以及每一个经济部门、每一个行业都应作出努力，这样才能够达成《巴黎协定》和 COP26 大会的决定和承诺。

实现温控目标，我们还有机会，比如 COP26 大会上超过 100 个国家领导人承诺到 2030 年停止砍伐森林，并投入 190 亿美元公共和私人资金保护和修复森林。再比如，在 COP26 大会上，90 多个国家加入“全球甲烷承诺”，承诺到 2030 年前降低甲烷排放至 2020 年的 70%。越来越多类似的、控制全球变暖的承诺和协议在达成和实施过程中。虽然中美两国有关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尚未达成具体协议，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积极进展。

目前，交通运输行业还没有做出强有力的承诺，例如在汽车淘汰或者是放弃燃油车等方面，有些国家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但是有一些汽车生产大国还没有承诺淘汰或取消燃油车。交通运输行业是减排的重要领域，应该受到关注。冶金业也是减排的重要领域，亟需低碳转型，为降碳减排作出贡献。将来我们可以考虑用氢能来驱动这些领域的生产，当然目前这方面仍然是一个畅想。

在下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召开之前，各缔约方应积极推动各项承诺，否则我们将会看到大量不均衡、不平等的问题加剧产生，成为留给子孙后代的负担。这样的不平等不只存在于不同经济条件的国家之间，而且存在于不同地理条件的国家之间。如果全球继续变暖，有一些海洋中的岛国将会消失。

我们知道 50% 的碳排放是由 10% 最富裕的国家产生的，所以希望发达国家能够率先做出强有力的承诺，也希望各行各业的头部企业，特别是那些排放大户能够做出承诺。

气候变化的承诺必须转变成实实在在的投资

■ 丹尼·亚历山大爵士 /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副行长

丹尼·亚历山大爵士

虽然《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COP26）并没有达成一个综合性的全面协议，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国际层面，获得了更多承诺。当然，除了做作出承诺之外，更重要的是履行这些承诺，要践行已经作出的承诺。

在巴黎举行的第 21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上，各国通过提交国家自主贡献（NDC）助力达成《巴黎协定》目标。各国 NDC 目标每年都会更新一次，即将于 2022 年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的 COP27 大会上，各国将会再次更新各自的 NDC 目标。

在格拉斯哥 COP26 大会上，参会国领导人一致呼吁继续坚持《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即努力把全球升温的幅度控制在 1.5℃之内。现在全球极端气候灾害频发，所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迫切性与日俱增。

在格拉斯哥 COP26 大会上还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比如甲烷的排放，会上有 90 多个国家加入“全球甲烷承诺”，承诺到 2030 年将甲烷排放降低至 2020 年的 70%。尽管围绕煤炭使用前景的争议有很多，但是把煤炭问题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议程还是第一次，令人欣慰的是 COP26 最终达成了“逐步减少”煤炭使用的协议。此外，在 COP26 大会上，生物多样性保护议题也得到了高度关注，因为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两者密不可分、息息相关。

我认为格拉斯哥 COP26 大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就是“净零”排放，绿色金融联盟现在承诺的出资已经达数万亿美元。如果各国政府以及多边金融机构，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全球绿色发展署（GGGI）都能加入进来的话，将会给予该联盟巨大的助力。到 2025 年，全球的融资将有一半属于绿色融资，在接下来的十年当中，至少还会有 500 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可持续绿色发展领域。

各相关方携手发力，才能确保《巴黎协定》和 COP26 关于净零排放目标的实现。国家自主贡献融资项目无论是否直接与气候变化相关，只要符合《巴黎协定》的方向，我认为多边金融机构就有必要给予支持。同时由于现在的融资缺口已达几万亿美元，所以亟需动员大量的私人资本投入该领域。

实现碳中和更需要落实承诺的具体行动

■ 翟永平 / IFF学术委员、腾讯战略发展部高级顾问、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能源专家

翟永平

看待任何一场会议或一件事情，它的成功和失败总要有一个标准，我认为判断《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COP26）的成功或失败也有一个定量的标准，就是《巴黎协定》的温控目标，因为这个目标大家都认同，我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讲 COP26 大会是一次成功的会议。

在 COP26 大会上，很多国家做出了承诺，比如禁止砍伐森林承诺、全球甲烷排放承诺、碳中和承诺等。承诺固然重要，但兑现承诺，用具体的行动落实承诺更重要。在履行承诺过程中，有几件事情要做：第一，要有路线图。比如实现碳中和承诺的路线图，最重要的不是 2050 年、2060 年实现碳中和这个目标本身，而是从现在开始到 2025 年、到 2030 年，我们具体做什么，要有非常详细的步骤。第二，实现路线图的资金从哪里来。例如碳中和的资金来源，其中一个关键点就是碳价。第三，路线图里要有具体的技术方案。例如实现碳中和的低碳、零碳、负碳技术方案。

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的前任能源专家，我一直在发展中国家工作。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我认为 COP26 会议带来了很大的希望，但依然有很多挑战。发展中国家实现碳中和主要面临着三重挑战。第一，要满足本身的能源需求，很多发展中国家用电的人口还是比较低的；第二，在满足自身发展需求的过程中还要做到低碳，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三，很多小岛国和边远地区，因气候变化经济发展遭受重创，亟需国际社会给予援助。

作为一家民营企业或一家大型科技企业，腾讯在履行碳中和承诺的过程中，在路线图、资金、技术三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腾讯绘制了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具体路线图，并承诺投入资金支持，腾讯还充分利用其数据中心多以及作为科技企业的优势，给予了具体有力的技术支持。作为一家有影响力的大型科技企业，腾讯讲碳中和的时候，不仅是指自身的碳中和，也希望能利用自身的科技、数字化技术来助力整个产业实现碳中和。除了自身行业领域，腾讯也希望与其他领域企业，无论是能源、钢铁还是水泥等行业的企业，包括各级各类的机构，腾讯都希望有机会与之合作，找到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场景。因为我们坚信在碳中和的实现过程中，数字化技术将在低碳、零碳、负碳的充分应用方面起到很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碳中和国际峰会学术讨论

主持人：王　冠，CGTN《全球财经》主持人
嘉　宾：巴罗佐，IFF联合主席、欧盟委员会前主席、葡萄牙前总理
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哥伦比亚前财长
武内和彦，日本全球环境战略研究所主席、日本政府中央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主席
弗兰克·里斯伯曼，全球绿色发展署（GGGI）总干事
周月秋，中国工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丹尼·亚历山大爵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副行长
翟永平，IFF学术委员、腾讯战略发展部高级顾问、亚洲开发银行前首席能源专家

王冠：作为一位气候科学家，您认为可再生能源的替代速度现在是否足够快，是否能够帮助我们达成碳中和的目标？现在全球有 80% 的能源需求是由化石燃料来满足的，我想问您，可再生能源的占比能不能更加快速上升？

弗兰克·里斯伯曼：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可以做到。我们现在看到还有很多政府它们还没有被说服，那就是可再生能源会更便宜，但是也有一些政府推出了激励性的政策，为可再生能源电厂划拨了用地。在这些国家当中，我们也看到有更多的私人投资投入到可再生能源领域。当然目前可再生能源的占比是不够的，上升的速度也是不够。但是我们有这样的潜力进一步加速，在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都能够做到，而且这也是必须要做到的。可再生能源使用的加速，对于非洲一些国家来说，能够进一步地普及能源的覆盖面。对于非洲国家来说，现在头号难题并不是排放，而是能源的普及。

王冠：应对气候变化进入了关键的十年，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又使得中短期的投资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奥坎波先生，您是如何来看待在抗疫的同时，继续为 2050 年、2060 年，乃至于 2070 年的碳中和奠定基础呢？

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抗击疫情会给他们带来发展的机遇。因为抗击疫情需要新的投资，新的投资会带来新的经济活动。有一些经济部门，包括生产部门，会因疫情而萎缩，而与此同时，疫情也会推动技术在一些领域的研发。疫情爆发后，我们需要通过技术手段适应新的形势，这就推动了新技术研发的投资。这些新的研发投资对中国以及其他很多国家来说，带来了进一步推动绿色和减排的机遇。

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是融资问题。首先，发达国家并没有兑现从 2010 年到 2020 年，每年拿出 1000 亿美元援助发展中国家减排的承诺。其次，接下来也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计划，让发达国家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减排的资金支持，这是我们碰到的难题之一。但这个问题必须要加以解决，发达国家应该做出更加强有力的承诺和采取更切实的行动。

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行长倡议各开发银行、金融机构必须要承担起责任，发挥更大的作用助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因此，在接下来一年中，我们也将继续关注多边开发银行、多边金融机构在该领域的承诺和投入。

我还想再强调一下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行融资的重要性。现在气候变化的威胁日益加剧，极端气候灾害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如何通过投资来增强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非常重要。应该通过增加气候变化适应性投资来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和伤害。在这一方面，过去的资金投入不足，对投资需求的估计也不足，这就带来了巨大的资金缺口，而现在填补这一缺口也是气候变化投资的一个重点。

王冠：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大部分投资，都投入到了“减缓影响”，而不是“适应影响”，因为投资于减缓气候变化造成的负面影响，其效果是容易衡量的。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是否应该捐助或者以更多的投资来

帮助中低收入国家，以及在气候变化中处于影响最前沿的国家，来帮助其增强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我刚才已经讲过，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也是可以衡量的，比如对不同自然灾害的管控、处理，对气候变化带来影响的处理，这都是适应的一部分。如果对于适应气候变化不做任何投资，会带来极其惨重的代价，今年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惨痛的实例。我们既可以衡量减缓影响的效果，也可以衡量适应影响的结果。就此而言，格拉斯哥 COP26 大会是成功的，因为在 COP26 大会上，我们第一次看到如此重视增强气候变化适应性问题，以前对此言之甚少。

王冠：奥坎波先生您在美国可以看到，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上泾渭分明。甚至现在仍有一些共和党人拒绝承认气候变化，或者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拜登政府相信气候变化确实存在，而且也希望能够应对气候变化，但是每四年一次的美国大选后，美国的气候承诺可能又会开倒车，因而也会带来相应的产业变化。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在气候承诺方面是否会开倒车？您是否会对此感到担心？

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我是在美国，但我不是美国人，我是哥伦比亚人，哥伦比亚是一个热带地区的国家。您讲得很对，在美国至今仍然有一些人拒绝相信气候变化，甚至有一些科学家也拒绝承认气候变化的存在，所以我认为必须要采取实际行动。当然，拜登政府在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承诺，而且我认为他们已经做出的承诺是不可逆的。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在过去的数年当中，欧洲的很多石油企业在气候变化方面做了很多承诺，现在美国的石油企业也开始做出了关于气候变化的承诺。美国现在还存在怀疑论者、拒绝论者，而且共和党仍然有可能掌控美国的局面，令气候变化拒绝论再次抬头，这对于美国、对于全世界都是不利的。

王冠：是的，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的气候政策、气变态度是有不确定性的，将来我们也要小心谨慎面对。翟教授，中国在实施碳中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和努力，对于碳强度从峰值到中和，中国历史性地规划了会用最短的时间来实现，而且到 2025 年，非化石能源的占比会增加到 20%，2030 年 25%，2050 年将达到 80% 以上，您觉得哪一种非化石能源会扮演主力的角色？

翟永平：中国作为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承诺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在 2060 年前、用 40 年时间实现碳中和，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和挑战。我认为具体的挑战表现在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对任何国家都适用，但是对中国而言是更为重要的。

第一，在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首先要保证能源供应安全地转型，比如从 80% 的化石能源结构到 2060 年的净零排放。从现在起到 2030 年达峰再由达峰逐渐实现碳中和，我们能不能保证这个过程中能源供应是稳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源转型的过程。我们一定要注意，从化石能源到可再生能源，再到零碳能源的转型过程中，必须要保证能源供应的安全与稳定。

第二，这一转型过程应该是公平正义的。我们有这么多化石能源的相关行业及其从业人员，这些从业人员身后又有无数的家庭，如何保证在转型的过程中相关从业人员能够找到新的工作？我们必须保证一个公平正义的转型过程，不仅要保证化石能源相关行业从高碳到低碳，也要保证相关从业人员在绿色领域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要让他们受益于转型发展，而不应在低碳转型过程中忽略这一群体的利益，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

第三，这个挑战与前面说的两个挑战密切相关，就是转型的可负担性。从高碳到低碳再到零碳，我们能否保证老百姓可以负担得起？我认为这个方面的研究还不太多。如何在从高碳到低碳再到零碳的过程中，让老百姓不仅能够负担得起，而且可以从中获益，从而提高其生活品质，这是一个应该被重视的问题。

我认为中国在这三个方面都要面临巨大的挑战，但政府可以通过引领作用解决这些问题。哪一种低碳能源将在转型过程起到重要作用？我认为光伏、风能、地热、水电、核电等低碳能源都很重要，这些一个也不能少，只有将这些低碳能源都利用上，才能够保证低碳转型是安全、公正、可负担的转型。

中国能不能在 2030 年到 2060 年的 30 年时间内，由碳达峰到实现碳中和？其他国家做类似承诺的时候，他们可能早已经达峰了，他们实现碳中和的过程可能实际是 60 年。我们回顾一下中国从人均国民收入 200 美元到现在 1 万美元的发展过程和所用时间，说是一日千里的跨越式发展绝非夸大其词。我相信正如中国跨越式发展曾让世界刮目相看，中国实现“双碳”之路也一定会令世界震撼。中国在国际上历来重信守诺，既然做出了“双碳”承诺，我相信中国就一定可以在 2030 年、2060 年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王冠：翟教授，您认为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将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连带影响？因为中国做任何事情的规模都很大，我们看到中国已经大幅降低了太阳能光伏的成本，而且中国也将继续对清洁技术进行投资，这样的投资对全球的绿色转型会产生何种正外部性影响？

翟永平：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可以以光伏发展的例子来看这个问题。在 2000 年前后，欧洲等国家在鼓励太阳能发展方面起到了引领作用，如德国率先推出了强有力的鼓励措施，推动其国内对太阳能光伏的需求，而谁来满足了这个需求呢？是具备完整的产业链、且有充足高素质劳动力的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抓住了这个机遇，把太阳能光伏发展了起来。在过去的十年中，太阳能的成本降低了 90%，这是中国和世界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中国以其特别的优势，包括超大的市场、完整的供应链、充裕的资金、高素质的劳动力，发挥了尤为关键、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风电或其他可再生能源，特别是大家现在关注的负碳技术，如 CCUS（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这个技术现在成本较高，但它是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必将用到的技术。能否大幅降低 CCUS 技术的成本，我认为中国依然可以利用其庞大的市场、完整的供应链、高素质的劳动力、充裕的资金，以及过硬的研发实力，把 CCUS 等其他低碳技术的成本大幅度降低，造福于全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光伏的发展历程证明国际合作是低碳技术发展的一个关键。

王冠：感谢翟先生，如果碳捕集的成本能大大降低，那将是非常棒的。丹尼，刚才您提到 2025 年将有更多的绿色金融，也将有绿色组合的投资，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内部将做什么样的工作来支持更多的绿色投资？

丹尼·亚历山大爵士：亚投行现在的主要投资方向是亚洲低收入国家，因此我们在中国进行投资，但更多是在印度、土耳其等国家进行投资。对于亚洲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要加快适应气候变化的转型发展，因为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大部分人口都生活在气候变化适应性脆弱的地区。在《巴黎协定》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增强世界各个地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降低脆弱性，在今后的一二十年甚至三四十年都要考虑这一问题。

现在人们越来越认为以自然为基础的投资能够增加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让世界各国共同研讨应对气候变化，共同探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问题。

亚投行已经推出了可再生能源方面的一些组合产品，比如在氢能利用上我们能做更好的支持，我们希望能为采用高新技术的企业给予金融方面的支持。对于支持的所有项目，我们都要看碳数据，在这个基础上助力企业

进行低碳的适应和转型。此外，城市内的基础设施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将低碳议程纳入到今后的行动当中，无论是公共汽车、地铁，还是电动公共汽车等等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最后，我相信亚投行所投资的项目一定能够助力亚洲低碳转型，一定能够促进亚洲的绿色金融。亚洲是如此，其他的地区也是如此，我们主要是通过组合产品和投资，给投资者更好的信息，鼓励投资者自身产生强烈的意愿投资于环境友好的项目。

除了刚才所说的这些情况，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亚投行能够发现越来越多的高新技术，并积极把这些新技术纳入亚投行所支持的项目当中。

王冠：周月秋先生，我们在绿色金融方面已经走在前列，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中国在绿色金融方面的经验吧。

周月秋：在最近这些年里，中国的绿色金融发展非常快，在应对气候变化、低碳转型方面确实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我给大家举两个数字，大家就可以有直观的体会。2021 年上半年，中国主要银行的绿色贷款余额已经超过了 14 万亿，绿色债券的余额也到了 1.1 万亿，从这两个数字可以看出，中国的绿色金融确实已位于世界前列。中国在绿色金融方面起步并不是最早的，这些年为什么能发展得这么快？绿色金融支持低碳转型的过程是有一些共性的，这些共性对于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第一在治理层面，比如在董事会、管理层有相应的关于绿色金融的委员会，在整个流程里都能体现绿色金融的工作方向，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工商银行就是这么做的，实际上是从董事长到管理层到业务流程到员工，有这样一个境内外机构部门协作的体系。

第二，绿色金融和原来传统的金融毕竟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产业的转型过程要形成新的盈利模式，绿色金融同样要适应这一模式，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创新就非常重要。无论是绿色金融产品还是绿色投资资产，以及像中国在前两年开始推的绿色金融五大试验区，我们都鼓励大家去探索新的模式，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做法，同时也形成了一些经验。

第三，风险的防范和开放的合作。转型的过程要安全、要稳健、要有序，这个过程中的风险控制在流程上怎么样去实现，授信的体制方面怎么样体现，风险的计量上怎么样体现，我认为这都是金融机构必须要面对的。

中国的金融机构在这些方面做了一些探索，比如工商银行 2015 年开始考虑环境风险对企业的财务影响，以及进一步传导到银行、信贷资产上的压力测试，并对不同情景进行分析。如果这样的压力测试能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再到大多数行业去推而广之，就会使得银行在成本计量、风险控制等方面逐步走向成熟。

当然，不管是国内的合作还是全球的合作，我认为都特别重要。不是仅仅从中找到合作的项目和机会，更重要的是大家在合作的平台上，可以去分享非常多的支持低碳转型、绿色发展的融资方式、融资模式和经验，甚至可以找到很多的案例。

我认为中国这些年的快速发展跟这一点有直接的关系，比如我们参与很多国际机构平台讨论，围绕全球绿色转型的案例推出了很多论著。我认为各国合作交流、相互借鉴可以推进共同发展。

王冠：非常感谢周教授。最后，请翟先生做一个总结，我们如何能够在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地发展绿色科技，我认为科技一定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非常好的作用。

翟永平：我在非洲和亚洲总共工作了 30 年，刚才我讲过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三重挑战，一是要满足自身的能源需求；二是这个能源需求必须是绿色低碳的；三是还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指望发展中国家走一条像发达国家或者像中国走过的道路，我相信是非常困难的，也是很难实现的，只有利用现在的先进技术让发展中国家有一个跳跃式的发展才行。关于这个跳跃式的发展，举个例子，大约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有一段时期中国家庭纷纷安装固定电话，要申请、要排队等很长时间，成本也非常高。而非洲很多国家没有经历过家庭安装固定电话阶段，就直接开始使用更便捷、成本也相对较低的移动电话、智能手机，我相信同样的现象也正在新能源领域发生。利用先进的技术、可再生能源加上数字化技术，能够有效应对我刚才讲的三种挑战。

举个例子，现在非洲、亚洲一些国家正在利用屋顶光伏为老百姓提供电力，这些屋顶光伏是由私人企业去安装的。他们以数字化技术来帮助运行这些屋顶光伏，老百姓也不用去投资，只要他们能付电费这个电就是有的，当然也有储能。用这种数字化技术来帮助运营，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这种方案会越来越多。还有扩展的微电网模式，这其中就有可再生能源 + 储能 + 能源控制系统，来解决一个村甚至更大范围的能源供应。

这些理念和技术正在不断应用，相信发展中国家能够赶上绿色转型的机遇，这是一个挑战，但更是机遇。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最需要的是资金和先进技术的支持，同时也要有商业模式。只有商业模式的融资才是可持续的，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也可以向发展中国家分享，

我相信发展中国家在绿色转型过程中的机遇还是大于挑战的。

王冠：非常感谢翟先生，的确我们看到现在科技能够在发展中国家进行跳跃式的发展。我们现在看看观众有没有什么问题？

观众提问：非常激动听到了一些关于气候变化大会和对企业转型有很多参考价值的精彩解读。我想问工行的领导，11 月份人民银行已经发布碳减排工具，我们都很关心什么时候，2021 年年底还是 2022 年，能出台一些具体的关于绿色金融支持零碳项目的办法，包括金融局等地方金融管理机构的相关规定。我想了解接下来国有银行在这方面有什么安排，我很想得到这方面的支持来做关于绿水青山的项目。

周月秋：我分两方面来说一下这件事情。

第一，你刚才提到的支持碳减排的工具，这是人民银行刚刚推出来的新政策，这个政策现在已经在实施。这一政策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是用再贷款的方式，先贷后借，这样商业银行可以先把资金用到三大低碳领域里，再去向人民银行申请再贷款的资金支持，再贷款最高可以达到资金的 60%；第二是成本，相对来讲在再贷款里，这算是一个比较低的再贷款利率的安排，具体利率是 1.75；第三，这个再贷款的期限是一年，但是还可以申请展期两年。就宏观政策来看，对于商业银行用碳减排的工具来支持低碳转型的发展，其实是有了很好的支持来源。当然，商业银行在支持低碳转型使用再贷款的过程中，也要遵守相应的监管要求，我认为这个监管的要求是真正支持低碳转型的，而且要经过第三方校验。这是我想讲的一个方面，是宏观政策方面的，因为人民银行发布的是一个政策。

第二，商业银行本身有两件事可以做。一是绿色信贷，商业银行已经有 14 万亿人民币的绿色信贷支持，国内的商业银行最近一年绿色贷款的增速一直高于整个贷款的增速，而这样的增速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里会更快一些，这是信贷方面。当然，融资不仅仅是信贷，还包括很多方式，比如绿色债券。绿色债券对银行而言可以做三件事情，通过自己的投资机构可以做投资，也可以做承销，也可以做贷款，这些绿色债券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为绿色项目提供相应的支持。除此之外，还有银行或其他类型的金融机构可以合作，如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等。2021 年以来，商业银行绿色融资方面所提供的各种工具，以及工具的新模式，推动了绿色融资的快速发展。我相信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在绿色信贷以及其他绿色服务上还会做很多的工作。

最后，是碳市场的建设。在碳市场的建设过程中，目前银行并不在碳市场的交易主体里，但是在碳市场交易的过程中，无论是支付、结算、清算、交割，还是估值，以及碳组合产品的托管，我认为商业银行都是可以去做一些支持低碳转型的很重要的工作。

王冠：绿色金融机遇非常大，非常感谢周博士。感谢各位线上和线下的嘉宾。大家不断谈到合作的精神，也讲到了前所未有的全球货币和财政政策以及合作抗疫，与此同时也要进一步提升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的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我们的对话决不会到此为止，我们只是启动了更多的对话，包括在 IFF 未来的会议当中。

全球气候投融资峰会：全球气候变化下的商机

IFF 学术委员、亚洲开发银行前资深副行长 163
宾度·罗哈尼：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力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165
徐林："双碳"目标下的能源变革和全球金融通力协作

国际金融协会可持续金融董事总经理 167
索尼娅·吉布斯：气候变化导致经济和监管政策变化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董事长 169
赖晓明：中国碳排放市场建设需要多层面工作

淡马锡集团 ESG 投资管理董事总经理 171
朴炅娥：淡马锡集团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实践

全球气候投融资峰会学术讨论 173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合力

■ 宾度·罗哈尼 / IFF 学术委员、亚洲开发银行前资深副行长

宾度·罗哈尼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COP26）令人记忆犹新，大会探讨了如何找到通向净零排放的途径，以及如何使所有相关行业都加入进来。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更多地谈论私营部门的作用。自《巴黎协定》签署以来，我们已经召开多次缔约方大会。但是为什么说 COP26 不同于以往？我们能从中收获什么？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点体会是：能源争论的深化。过去关于清洁能源的讨论，从来没有像 COP26 大会这样达到"淘汰煤炭"这个深度。能源行业的脱碳，乃至整个实体经济的脱碳，电力、交通、食品、热力部门以及涉及大量商品和服务的私营部门的脱碳，都出现在这次 COP26 大会的议题中。

脱碳是非常深刻复杂的问题，也是通往净零排放道路所必须的。这个问题将引发各行业短期发展方向的辩论，是一场需要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参与的辩论。

第二点体会是：绿色技术的创新需要扩大规模。这个问题已经谈论很长时间，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们都在为此而努力。要实现净零排放，创新是必须的。对私营部门来说，清洁技术的创新更难，风险和成本都很高，融资也非常困难。当年我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的时候，想做一个像中国的碳捕集和碳存储一样的示范项目，需要筹措大量资金。这个项目可能会起作用，也可

脱碳是非常深刻复杂的问题，也是通往净零排放道路所必须的。这个问题将引发各行业短期发展方向的辩论，是一场需要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参与的辩论。

能不起作用，后来我们知道它起了部分作用，但当时对于私营部门来说，还不是加入的时机。

所以，谁来投资、如何投资、谁能参与，仍然是需要讨论的问题。我曾经在多边银行工作，那时资金充裕、调用灵活。但私营部门可能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例如欧洲一项研究称，目前 85% 的碳排放量可以通过已经证明的技术来减少，然而使用这些技术的路径仍不确定。因此，在我们真正摸索出有效的路径之前，私营部门很难参与其中。所以扩大技术规模，为其提供资金，并让私营部门参与进来是非常重要的，但要做到这些可能需要公共部门、金融机构的帮助，这是一个务实的开端。

第三点体会是：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适应或学会适应气候变化，让未来的发展更具气候韧性，这是一个挑战。无论哪个行业，工业、基础设施相关行业，每一项开发工作，我们都必须确保它们的气候适应能力或对气候友好。

这意味着，开展工作必须要适应气候变化，正如当年多边银行做的那样。我们要求进行 ESG 评估、气候评估、脆弱性评估，做了相当多此类工作，但是有时候很难要求私营部门也像多边机构那么做。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已经投入使用，并且在 COP26 大会上获得了认可。几年前，一项研究表明，在 2020 年至 2030 年的 10 年间，亚洲对气候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求将达到 26 万亿美元，而应对气候变化的投资将达到 3.4 万亿美元。

第四点体会是：现在发展中国家亟需发达国家提供资金帮助。适应气候变化的成本，或者说气候适应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需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解决。据说每年在这方面的投入有 1000 亿美元，但这还不够。调动私营部门的资源变得更加重要。现在私营部门愿意与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一起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公共部门的财政资源应当与私营部门的资源相融合，并确定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合作方式，以便私营部门能够安全地进行投资。

私营部门希望在取得回报的同时降低风险。发展中国家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政策风险、缺乏完善的交易市场和退出困难，这些是政府可以提供帮助的地方。多边金融机构也可以提供帮助，他们有多种金融工具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尽管目前已有一些金融工具，如债券、绿色债券等等，但是我们需要更具创造性的融资结构来实现气候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资。

我在早期工作中还注意到，有时即使很有钱，也没有足够的可用于银行担保或适合投资的项目。私营部门往往不愿意或没有资源进行成本高昂的可行性研究，因为它们不知道这是否会真正促成投资。因此，政府必须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发展大量的可用于银行担保的项目，从而吸引私营部门参与并进行投资。

我对 COP26 大会持赞成和肯定的态度，私营部门、机构、银行、投资银行、养老基金的响应似乎更加积极。亚行确实有与机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和其他私营部门合作的经验，但问题是投资回报总是不够好，希望这一次能有所不同。也许这一次我们可以引入其他资源进行整合，从而使其变得更有吸引力。但是如果没有私营部门的加入，我认为我们不会走得很远。

现在私营部门愿意与政府和国际非政府组织一起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认为公共部门的财政资源应当与私营部门的资源相融合，并确定私营部门与公共部门的合作方式，以便私营部门能够安全地进行投资。

“双碳”目标下的能源变革和全球金融通力协作

■ 徐林 / 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已经形成了共识，格拉斯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COP26）形成的共识和宣言，有助于各国采取更多的行动来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中国已经有了明确的目标，到 2030 年实现碳达峰，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双碳”目标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我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处理层出不穷的问题，所以在中国国内与之相关的讨论热度非常高。对中国来说，实现“双碳”目标究竟走什么样的路径，确实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

中国在脱碳或者减碳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合理的节奏，有科学的重点。在中国碳达峰的过程中，个人认为中国应优先做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要节能。目前中国的能效水平与世界最先进的国家相比，大概还有 30% ~ 40% 的差距。如果把能效水平的差距弥补上，中国可以减少更多的能源消耗，这对中国来说就是减少碳排放。因为在中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的比重超过 70%。

第二个就是要有步骤地推动向绿色能源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确实也有自己的独特性。因为中国是一个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国家，所以在替代煤炭或者减少煤炭消费的过程中，不可能一蹴而就。按照专家的估计，即便是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时候，中国还会有 10 亿吨左右煤炭的消费。因为这些煤炭消费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可以被其他的一些措施中和掉，所以中国可以在 10 亿吨煤炭消费的前提下实现碳中和。

在替代煤炭的过程中，也就是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天然气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天然气虽然也是化石能源，但是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煤炭要小得多，所以这是中国可能不得不作出的一个选择。

真正的绿色能源替代，比如说光伏发电、风力发电、核电以及生物质能源等，中国在这些领域已经取得了飞速发展。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把握一个合理的节奏，因为这些领域还有一些技术瓶颈没有克服。以光伏发电为例，光伏电池板的转换效率目前大概是 23% ~ 25% 左右，未

徐林

来六七年转换效率可以达到 30%。这样的话，如果建设各种光伏发电站的速度过快，就会出现光伏发电站建成竣工后，其使用的技术已经落后，而一个光伏电站一般只有 20 年左右的寿命，所以即便是实现这种光伏、风电、核电的替代，我们也要有一个合理的节奏安排。

第三个就是中国各个产业的脱碳和减碳。按照目前的计算，中国的制造业排放接近 30% 以上。那么在这些领域，比如化工行业，今后可能要去寻求非化石原料的替代，在这些领域也有很多新的技术在不断涌现，比如合成生物学的技术，它可以产生很多生物基的化工原料，这有利于化工产业的脱碳。在农业领域也是同样的，农业排放的温室气体，比如甲烷、一氧化二氮，也要采取

措施来减少这些气体的排放。

中国的减碳要在能源结构上进行调整，特别是绿能替代，以及在一些重要的产业进行脱碳，要做大量的工作，这些都将涉及巨额投资。究竟需要多大的投资，其实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算法，最近看到马骏团队的材料，他们认为中国要实现碳中和，未来还需要投资差不多 500 万亿人民币，也就是约 80 万亿美元。既然需要如此巨额的投资，就必须要有完善的绿色金融投资激励机制，这是中国政府需要做的很重要的事情。

对中国来说，激励更多的金融机构，特别是私营机构投资绿色低碳领域，需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要使投资机构、企业投资绿色低碳形成的收益，内化成投资机构或者企业的收益，这是一种外部收益。如果没有这种机制，就不足以支持或者激励投资机构特别是私营投资机构，通过商业化的投资推动绿色低碳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中国碳达峰之后，就需要实行比较严格的碳排放额度总量的控制和分配制度。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健全完善全国的碳交易市场。因为碳交易市场是一个能把碳排放的收益通过交易市场内化成投资者收益的重要机制。

中国政府还需要把现行的能源价格体制进一步市场化，现在一些产业领域还实行能源价格的补贴，这种补贴是不利于节能的，不利于节能就不利于减排。一些价格制度是几十年前留下来的，在碳减排的目标之下，这些制度应做根本性的调整。

最后，要开展碳减排领域广泛的国际合作，有两点值得讨论。

第一，要实现碳减排目标，需要大量的投资和融资，在这个过程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鉴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既缺技术又缺资金，发达国家应该向国际金融机构，包括向世界银行、亚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多边或区域性的开发金融机构，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同时这些国际金融机构也应提供更多样化的金融产品，支持绿色低碳的投资和融资。目前的金融产品是不够丰富的，比如上述的国际开发金融机构，他们提供的长期贷款可能更多一点，但是他们提出的股权投资比例是非常低的。在绿色低碳领域，很多从事技术开发的企业，特别需要长期的股权投资支持，如果国际金融机构能在这方面有所突破，是非常有益的。

第二，绿色低碳技术产品和服务的自由贸易、投资制度也非常重要。在这个领域，无论是跨境投资还是贸易是存在一些障碍的，这些障碍应该消除。既然我们面对的是人类共同的挑战，一些领域就不应该在技术推广、产品服务推广等方面设置障碍。

气候变化导致经济和监管政策变化

■ 索尼娅·吉布斯 / 国际金融协会可持续金融董事总经理

索尼娅·吉布斯

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的成果之一就是“净零”目标涉及的范围大幅扩大。国家、公司甚至个人都在纷纷承诺“净零”排放。要实现“净零”目标，就意味着脱碳。这将是未来几十年的中心主题，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行业将从根本上推动全球经济。由于每个行业或多或少都与化石燃料有关联，因此气候变化导致的经济和监管政策不断变化，使各行各业发生根本性改变。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煤炭行业，这个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就是先进经济的支柱行业已经在崩溃，石油和天然气行业也将发生根本性改变，规模将缩小。随着电动汽车的发展壮大，汽车行业正在发生转型，汽车生产和零部件生产领域迎来半个世纪以来首批新参与者。建筑和房地产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旅游业和许多其他休闲活动也将发生深刻的变化。农业面临与气候风险相关的重大挑战，必须加以应对。降低新技术的成本，例如碳捕获和储存、可再生绿色能源、氢和所有其他新能源的成本至关重要。承担这些成本非常困难，尤其是对于新兴市场。但如果没有这些新技术，将无法实现绿色转型。需要强调的另一点是，过去应对气候风险主要是公共部门的事，是政府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现在，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公共和私营部门需要共同面对的紧迫任务。这一点在 COP26 大会上表现得非常突出，私营部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这是前几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不曾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私营部门表示对管理气候风险和脱碳感兴趣。

气候变化有三个主要驱动因素。首先，是自下而上的。显然，世界各国都对气候变化以及有助于抗击气候变化的产品和服务非常感兴趣。其次是来自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自上而下的引导，要求私营部门做出回应的态度越来越鲜明，包括管理风险、披露风险、利用机遇、扩大气候融资等方面。最后是内部承诺。全世界大概有三四千家公司做出了“净零”承诺。以上三个主要因素正有力推动气候变化的应对。

国际金融协会（IIF）正在研究金融监管，以确保其健全有效并可以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工作，并提出了可持续金融监管议程等区域级别的倡议。欧盟正在推进各种与气候相关的监管政策，很多国际机构也是如此。特别是国际准则制定者——金融稳定委员会、银行监管委员会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已经建立国际可持续性标准、秩序和披露要求。在所有层面上，监管都在发生变化。目前的一大重点是情景分析和信息披露。考虑到未来可能面临的气候情景，披露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和机遇有助于能源转型。

对金融公司来说，监管者需要看到公司的转型计划；而对于特定类型的产品，则需要在资产负债表上明确所持有的资本；对于资本在绿色和棕色行业之间的分配，监管者需要把资本导向正确且具体的方向。气候风险管理工具正经历着快速的发展。2020 年，国际金融协会对全球 20 家银行进行了基于情景的气候风险管理评估，银行和监管

机构也正在进行情景分析，研究未来的气候风险和商业机会。我们需要努力了解、分析气候风险，并寻找、抓住商业机会。私营企业和监管者的目标其实是非常一致的，双方都想加强风险管理，促进和改善气候风险管理战略思维。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对气候情景的研究就是例子，这也是银行业经常参照的研究。

要避免混乱并迅速采取行动，关键在于如何采取一致的国际行动应对气候风险，以及在建立资本框架时，如何使用气候情景和压力测试的结果。这需要在国际上保持一致，否则由此产生的分歧只会增加气候金融市场的难度。披露议程工作量非常大，每个企业都需要披露气候风险和机遇。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自愿披露框架，如全球报告倡议、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理事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应运而生了，它综合各种新思维，以强大的基础构建了一个跨国界的气候披露通用方法的框架。ISSB 这个机构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如果没有正确的披露框架，就不能有效管理风险、及时抓住商业机会。在 COP26 大会上正式启动 ISSB，是希望能有益于公司信息披露和财务信息披露。

COP26 大会最令人关注的成果之一是“转型”的必要性得到认同。“转型”将给金融业带来大量的商业机会。事实上，所有承诺实现“净零”的公司，都得将其投资组合和商业模式与“净零”目标相结合并制定转型计划，才能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目标。为此，很多倡议应运而生。其中最受关注的是格拉斯哥净零金融联盟（GFANZ），它将各种私营金融公司聚集在一起，组成不同的联盟，如银行业联盟、资产管理人联盟等，朝着实现“净零”的共同目标而努力。

最后，谈谈其中的商机。实现“净零”和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需要大量投资，这不仅仅是气候问题。现在自然资本和生物多样性问题需要解决，这其中有巨大的机会。气候行动与经济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真的可以齐头并进。在这个领域有非常多的机会，尤其是在新兴市场。

我想在这里指出两件事，首先是基础设施投资。这是新冠肺炎疫情复苏刺激计划的关键，也是实现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而且基础设施投资缺口巨大，估计到 2040 年大约有 15 万亿美元。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正是现在关注的焦点。目前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需的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4.5%，这将需要大量的资金。向低碳经济的转型意味着能源消费结构的重大转变，有利于风能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实现大量减排的技术仍在开发之中，这些新技术的研发投资进展还不够快，远远低于将技术推向大众市场之前实现技术和成本效率改进所需的水平。近年来，每年公共和私人能源技术的研发支出约 1250 亿美元，这仅仅是国际能源署预估年需求量的 1/3。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资金缺口。因此，未来的关键是筹集资金来解决这一差距。

气候变化有三个主要驱动因素。首先，是自下而上的。显然，世界各国都对气候变化以及有助于抗击气候变化的产品和服务非常感兴趣。其次是来自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自上而下的引导，要求私营部门做出回应的态度越来越鲜明，包括管理风险、披露风险、利用机遇、扩大气候融资等方面。最后是内部承诺。全世界大概有三四千家公司做出了“净零”承诺。以上三个主要因素正有力推动气候变化的应对。

再简单说一下碳市场。2020 年，由马克·卡尼（Mark Carney）发起并由国际金融协会支持的扩大自愿碳交易市场特别工作组成立，致力于扩大有效和高效的自愿碳市场，以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并帮助推广必要的技术。自愿碳市场是对已经存在的排放交易计划和合规监管、合规市场的补充。

目前的体系需要大幅扩大规模，将向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输送资本，那里有许多碳补偿项目，从而保护自然资本和生物多样性。此外，COP26 大会在许多领域取得的进展，将对自愿碳市场产生良好的作用，对碳信用的理解也将更加有序统一，这将使碳市场增长更快。针对自愿碳市场，诚信委员会已经建立，该委员会制定了核心碳信用原则，这将有助于市场的标准化和发展，从而使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发展。新加坡推出碳交易平台 Climate Impact X，在全球范围内运营，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我们相信，未来几十年碳交易将会迅速发展，建立碳市场将有助于支持全球碳定价。

中国碳排放市场建设需要多层面工作

■ 赖晓明 /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董事长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现在承担着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运行管理工作，碳交易现在在中国非常受关注，它是一个以市场化手段来推进碳减排的重要机制创新。通过交易形成的碳价格信号来引导资金、技术投向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市场，它有助于降低全社会的减排成本。中国的碳交易、碳市场的基本框架是国家在上海设立负责运营、管理碳交易的交易所和交易平台，在武汉设立碳市场的登记和结算平台。

2021 年 7 月 16 日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到目前为止大概运行了 90 多个交易日。现在的交易情况是，碳排放配额（CEA）累计成交量 5100 余万吨，累计成交额突破了 21 亿元。中国的碳市场才刚刚起步，这样的交易规模应该还是可以的。

目前碳排放的价格稳定在 42 元 / 吨的水平，最高的时候达到 61 元，最低是 38 元。随着中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截止日期的临近，市场比较活跃，流动性逐步增强。

中国碳排放市场刚刚起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机制尚待完善，市场建设方面的工作也还需要进一步推动，主要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碳市场虽然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但 2000 多家企业，45 亿吨的配额，已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目前八个高能耗行业中，只有电力行业纳入了中国碳市场交易范围，按照国家的统一安排，其他七个高能耗行业：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化、化工、造纸、民航也将陆续纳入中国碳市场。所以我们现在的工作是要尽快扩大碳市场的覆盖面，从现在的单一电力行业扩大到其他高能耗行业。2022 年，计划将有色金属和建材行业纳入中国碳市场。

第二，目前碳市场里面只有控排企业，还没有纳入非控排企业，也就是没有非履约企业或者说投资机构在里面交易。之前有七个省市做了地方的碳交易试点，按照试点经验来看，投资机构是试点市场中的主力，他们的交易规模占整个市场交易总规模的 2/3 以上。从国际市场上的经验来讲，投资机构对市场活跃度、流动性的提升以及对规模的扩大，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中国的主管部门（生态环境部）认识到了投资机构对碳市场的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也有计划尽快推动，将投资机构纳入碳市场。

赖晓明

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金融机构作为投资机构的特殊群体进入碳市场的意义。在中国碳市场中，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的情况还比较少，只有两三家金融机构和券商参与了地方试点碳交易。我们认为金融机构参与对碳市场的升级发展很有意义。

首先金融机构的规范性、市场操作的经验都比较强，同时，按照欧盟碳市场的经验，金融机构在碳市场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我们希望尽快将金融机构作为投资机构的一个特殊群体引入中国碳市场，当然这需要金融监管部门制定相应的规则，给予一定的支持。

第三，要加快推动企业提升碳管理的能力，建立碳管理体系。中国的控排企业接触过碳市场的还不多，首批加入碳市场的 2000 多家电力企业，之前参与过地方碳交易的也就 10% 左右，大部分企业对碳市场不太了解。除了一些央企和地方骨干企业以外，很多企业没有建立

碳管理机构，缺乏碳管理人才，企业内部也没有形成碳交易、碳管理的工作流程，这对企业参与碳市场的积极性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从碳市场正式启动上线交易到目前为止，首批纳入碳市场的 2000 多家的电力企业，只有 20% 左右参与过碳市场交易。

交易机构接下来的一个重点工作就是服务企业，帮助他们提高碳管理能力和碳管理的意识，使其能够更加熟悉和掌握碳资产管理工具，以提升其碳资产管理效率。

第四，加快国内碳市场产品的多元化创新。碳市场是现货市场，本身就有一定的金融属性，它的金融化发展程度在国外已经比较高了。要充分发挥好碳市场的碳定价功能，形成有效的碳定价体系，仅是现货市场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积极探索衍生品市场，推动期货市场的研究发展。我们计划先从探索场外衍生品开始，从一些非标产品的研究推出开始，逐步进入场内的或者标准化的衍生品，形成一个包括现货期货等多种产品并行的碳市场体系。当然这项工作的开展，也是一个逐步发展、逐步深入的过程。

第五，要推动一级市场、分配市场，更加有效、更加市场化地运行。现在的配额分配是完全免费的，这既是基于中国碳市场刚起步，也是基于中国企业的具体情况制定的，但是一级市场完全免费发放，容易导致价格在一级市场缺乏引导信号。我们觉得还是有必要拿出小比例的少量配额，通过拍卖的方式来分配，形成一级市场的评价，这项工作目前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加紧推进。

第六，要继续积极探索碳市场和其他市场的联动。碳市场的价格波动也受到诸如电力市场、煤炭市场、天然气市场等能源市场的影响。当然，目前国内能源市场价格并没有完全市场化，这也是国内市场的一个特点。我们认为只有把碳市场和能源市场充分联系起来，建立一定的联动机制，才能够指引企业进一步做好碳管理、节能减排等工作。

淡马锡集团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实践

■ 朴炅娥 / 淡马锡集团ESG投资管理董事总经理

朴炅娥

我在环境可持续发展领域工作了 15 年，初期主要关注“为什么”，即企业为什么需要应对气候问题，今天时间已印证了可持续发展的商业价值，进入探讨“如何做”的阶段，即采取哪些行动可以加快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虽然目前市场上有关于“漂绿”的议论，质疑企业做出 ESG 承诺是出于声誉和品牌效应的考量。我对此的看法是，投资考量已成为关键动力，一方面因为已有相关风险的真实案例，另一方面当前的机会令人难以拒绝。

我主要谈三方面内容。首先从企业角度看机遇和风险，然后以淡马锡为例阐述投资界的相关作为，最后强调共同行动的重要性。

传统观点认为，气候变化是已经存在数十年的风险，与之不相称的是，气候相关市场建立时间短，并且企业采用的管理方式很传统。当前世界各地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去年一年造成的损失就达数十亿美元。据研究报告称，气候危机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新冠肺炎疫情的两倍。

气候韧性及适应性已成为企业关注的重要事项。第一，世界各地在制定政策方面，不论是疫情后刺激经济目标、基础设施计划还是五年中长期规划，都将气候问题作为核心内容，创造了数万亿的投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还在快速增长，并将持续数十年。因此，市场和企业愿意进入气候领域。第二，疫情之下，ESG 资本流动加快，ESG 基金和绿色金融表现良好。随着金融部门加大投资，ESG 资本流动还会进一步加快。第三，通过解读市场民意调查可知，消费者特别是千禧一代在消费时会考虑气候因素，这将促使企业提供更清洁、可持续的能源，形成良性循环。

淡马锡作为跨时代投资者，注重长期可持续回报，为应对气候变化，制定了在 2030 年前将温室气体绝对排放量较 2010 年基准水平减半，以及在 2050 年实现“净零”的目标。我们的投资包含“难以减排”的行业，例如航空公司。为了达到这一宏大目标，淡马锡目前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直接投资促进低碳气候科技的发展。例如清洁能源、高级移动出行、可持续食物等领域。我们与黑石集团成立合资公司——“脱碳伙伴（Decarbonization Partners）”，共同调动 6 亿美元，通过一系列基金与其他有类似想法的第三方投资者合作，支持创业公司的初步成长，降低新一代气候解决方案的融资难度。

二、配置资金以促进转型。气候问题不仅需要投资绿色经济，还要推动棕色经济转型。我们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开展这项工作，比如一对一参与，或将投资组合公司聚集在一起交流最佳实践，加快制定“难以减排”行业的解决方案，例如可持续航空燃料和氢燃料的解决方案。在共同合作方面，淡马锡是全球最大清洁能源投资

基金——布鲁克菲尔德全球转型基金的两个创始合伙人之一，该基金专注于帮助现有公司转型，特别是在“难以减排”行业。

三、制定减碳解决方案。在碳市场领域，解决方案十分重要，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果不制定解决方案，就不可能实现净零排放。因此，我们正在投资从大气中除碳的技术，如碳捕获和特定的定向捕获，以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如保护森林和红树林。此外，我们还与新加坡交易所、星展银行和渣打银行合作建立“气候影响 X（Climate Impact X）”交易市场，目标是建设全球性交易市场和高质量的碳信用，以自愿参与的方式，提升价格透明度和标准化。

尽管有良好的商业发展势头，但气候挑战的紧迫性以及实现“净零”目标百万亿美元的资金需求，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更多、更快的气候行动。我建议市场和企业应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是碳定价，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碳定价。中国启动了碳交易市场，欧盟实施了碳排放交易系统，但我们需要全球有更多的政府参与碳定价，并且加大碳定价力度。现在已有许多企业自愿开展内部碳定价，以便做出正确的资本投资决策。淡马锡在所有投资活动中，均通过应用内部碳定价衡量风险调整回报，关注碳暴露指导资本配置。

其次，如何将不同形式的资本整合，使其快速发挥作用。当我们考虑资本流向弱势市场、推动创新以及推动“难以减排”行业转型时，混合金融尤为重要，多边银行、全球金融机构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可以降低公共资本挤出私人资本的风险。此外，要扩大和加速多边开发银行（MDB) 和国家开发融资机构（NDFI）的技术支持和助推作用。

最后是温室气体问题的全球协调和伙伴合作属性。资本市场和技术同样具有全球性。因此，我们确实需要整个市场的协调。推动自由贸易，要有全球标准作为合作基础。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正在为此而努力，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也已开始相关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扩展更多的合作。许多国家参与了国际可持续金融平台，欧洲和中国在绿色分类法和可持续金融领域展开合作，这些都推动了私人资本的流动。

缓解气候变化迫在眉睫，它与获得长期可持续回报和商业价值是一致的，并且已经成为所有企业的必要事项。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以包容的方式应对气候挑战，确保最弱势群体能够适应气候变化，我们要共同建设宜居的地球家园，让人类世世代代享受繁荣昌盛。

全球气候投融资峰会学术讨论

主持人：戴青丽，IFF理事、保尔森基金副主席兼总裁
嘉　宾：宾度·罗哈尼，IFF学术委员、亚洲开发银行（ADB）前资深副行长
索尼娅·吉布斯，国际金融协会可持续金融董事总经理
赖晓明，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董事长
徐　林，中美绿色基金董事长
朴炅娥，淡马锡集团ESG投资管理董事总经理

戴青丽：刚才索尼娅说到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可以发挥一些作用，宾度先生，请问在气候变化方面，寻找解决方案是不是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来发展呢？

宾度·罗哈尼：我曾在亚开行做过投资组合、气候议程和绿色债券等方面的工作。世行、亚开行等多边金融机构都规定将气候变化纳入战略、政策和运营的关键内容，要求每个项目都要进行气候影响、风险和脆弱性评估，写入项目设计方案，纳入项目成本，作为每个项目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在我任职期间，亚开行投资组合从10亿美元增长至30亿美元，到现在已经达到60亿美元，而且亚开行行长在 COP26 大会上表示，预计 2030 年将达到 1000 亿美元。世行等其他多边银行也看到了气候领域的需求和机遇，纷纷扩大了投资。实际上，双边机构更容易开展此类示范项目

关于增加流动性，我在亚开行任职期间和私营部门合作，开展过 PPP、MFI 和私募股权等项目，有些项目容易开展，有些较困难。与双边资金混合投资的时候比较容易，因为这种方式下资金成本较低，容易被私营部门接受。我曾经在亚开行与养老基金合作，并担任该养老基金投资委员会主席。当时还没有指引准则，所以我们从负面清单入手开展工作。总之，我们要加强与私营部门的合作，需要一些除绿色债券以外的新工具，比如建立碳市场、碳基金等等。发展中国家很难拿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系统的气候信贷，即使拿到也往往需要耗时很多年，所以发展中国家创立了自己的碳基金，降低融资成本。我们还尝试了气候保险、巨灾债券（CAT），但都非常昂贵。总而言之，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需要进一步探讨。

戴青丽：索尼娅，我有两个问题问您，第一个问题，您深度参与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全球共同标准的制定，比如分类标准，目前每个国家有各自的分类标准，您认为是否可以制定全球统一的分类标准？第二个问题，您刚才也提到并没有一剂速效良方来解决问题，但是如果让您给政策制定者提一条建议，例如促进气候转型投资等，您会给出什么建议？

索尼娅·吉布斯：谢谢您提的两个问题，这些疑问直指问题的核心。关于全球统一的标准，在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聚焦气候风险和信息披露准则领域之前，我们与一些组织合作发起了许多自愿性倡议，但是这些倡议彼此分割。如果不统一标准，怎么做好信息报告和披露？所以，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于 2015 年诞生了，提出了很多建议，这些建议在很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并且被采纳为监管内容，包括被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采用。因此，可以说我们已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另外，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最近刚成立，它可以借鉴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TCFD) 的成功经验，提高人们对自然资本和生物多样性议程紧迫性的认识。毕竟气候问题占据了人们大部分时间，自然资本问题同样需要被关注，并且需要与气候议程齐头并进地推进。

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的成立令人振奋，将有力推动全球统一准则的建立。分类标准问题统一的难度较大，因为一些分类标准与地区和具体情况有关，例如界定哪些是绿色的，哪些不是绿色的，涉及很多规

范性的细节问题，比如三层断桥铝窗户该怎么分类。这方面欧洲做得很好，我们希望其他国家包括美国能形成类似的指令性办法，但这很困难，新加坡和中国有各自的分类标准。我们可以就各大分类达成一致，例如深绿色、浅绿色、深棕色、浅棕色几个大类，暂时不用统一每一个小类别。G20 可持续金融研究小组恢复设立，由中国和美国担任联合主席，其工作将围绕分类标准这一核心问题，致力于推动分类标准的统一。

的确，分类标准的全球统一无法一蹴而就，但我们已经看到希望和进展，随着我们日益加深共识，深入了解其中的风险，共享知识，未来就能运用这些知识尽快解决问题。

戴青丽：赖晓明先生，在您谈到展望中国的碳市场时，您讲了很多，但碳信贷的建立没有讲，我们听到了其他专家在这方面的一些探讨，能不能请您讲一下中国在碳信贷方面有什么样的考虑？

赖晓明：碳信贷也是碳金融很重要的一部分，现在中国主管部门对碳信贷非常重视。我们在地方试点交易的时候，就曾尝试过把这个碳资产和银行的产品结合起来，也推出过碳的信贷贷款，包括用配额进行质押贷款，用碳的减排量，就是 CCER 来进行质押贷款，我们也推出了 CCER 和配额的组合质押贷款，这些工作都在稳步推进。

随着全球的碳排放正常启动，如何使用国家碳配额来进行质押贷款，这个工作正在加紧研究。目前，有一些地方、一些企业已经开始率先在做这方面的尝试了。

碳信贷质押工作的推动需要金融主管部门和碳市场的主管部门进行政策上的协调，要共同制定相应的规则和政策。前不久，人民银行也推出了通过金融工具支持碳市场的政策，据了解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在研究制定相关的指导细节和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的操作细则。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作为碳市场重要的基础设施，现在也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包括一些规则、细则、操作流程方面的研究。

总的来说，我们把碳资产作为一项很重要的减排权益，希望它能更多地助力企业获得资金以支持减排。所以，不仅可以通过交易使企业获得减排的收益权益，也可以通过碳资产的管理解决在减排方面、投资方面需要的资金问题。

戴青丽：徐林先生，作为投资行业的从业者，您在气候新科技方面看到了哪些好的机会？

徐林：作为一个投资者，要见很多的企业，而且这些技术企业都是做低碳技术的研发和产品生产的，所以对未来全球，特别是中国能够尽快实现碳中和，我充满信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以光伏发电为例，过去十年中国

光伏发电因为技术革新使成本降低了 9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幅度。现在中国的光伏发电，每度电的成本用美元来衡量大概也就是 4 美分，这个成本对中国的光伏发电上网已经很有竞争力。再用不到十年的时间，我相信光伏发电电池的转换效率可能会达到 30% 左右。这样的话，中国未来光伏发电的成本就会降低到大概 2 美分左右，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技术进步，而且为未来绿色低碳能源替代奠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我做投资就会比较有信心。

虽然中国从碳达峰到碳中和只有 30 年的时间，而其他大部分国家可能都有 50 年，甚至 60 年的时间，但是我觉得我们面临的绿色低碳的技术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新技术对中国未来实现碳中和提供了非常坚强的支撑，我相信对全球来说也是如此，所以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戴青丽：朴炅娥女士，淡马锡如何看待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您是该领域的思想引领者，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把森林、鸟类、蜜蜂当成资产？请您分享一下淡马锡在该领域的行动。

朴炅娥：谢谢您提的这个问题。人们一直以来把自然视为理所应当的资源，对待自然首先想到的是开发利用，然后才是自然的保护和生态价值。这种价值观的后果已经显现，比如森林退化、地球之肺被破坏，以及被忽视的生物多样性，这些问题往往相伴相生。

我们之所以需要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不但因为它与气候变化相关，还因为在保护自然的大背景下有一些协同效应。我们常常忽视自然的社会属性，许多弱势群体的生活往往非常依赖自然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那么作为长期投资者，我们该如何参与解决方案，如何看待资本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比如金融资本促进增长和创新，人力资本提升技能和培训新技能，社会资本可以帮助社区，自然资本推动应对气候变化等更广泛行动。这其实关乎我们如何认识自己作为资本配置者或提供者的角色。

在淡马锡，基于资本的解决方案会采取投资组合的方法。我们的投资组合设计刚起步，它将包含直接投资森林等项目，还将包含与该领域的现有投资者合作，以合作伙伴的方式向已有基金注资或者与其共同投资。未来我们还会考虑投资其他被忽视的自然资源，例如海洋、红树林等。所以我们需要采取全面的工作方法，不仅仅是通过项目、投资和基金，还会思考如何管理整个生态系统。例如我们与谷歌、世界银行等机构合作建立可持续科技加速器，用来支持碳排放 MRV 创新，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 MRV 成本，从而提升项目落地的效率。其他投资还包括交易市场，因为建立透明的市场非常重要，还有合约标准化、设计衍生工具远期合约、更好地定义高质量碳信用等。总之，我们采取的是全方位的投资策略。

戴青丽：非常感谢所有的发言嘉宾，也希望听众能够更了解这个主题，商业界会有更多的机会，金融监管，还有金融机构的设计方面也都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非常感谢世界各地参与讨论的朋友，感谢大家！

2021 丝路国际联盟大会：“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减贫经验

IFF 理事、菲律宾前总统、丝路国际联盟（SRIA）联合主席 177
格罗丽亚·阿罗约：中国减贫经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疫情后绿色复苏的借鉴

IFF 理事、新西兰前总理、丝路国际联盟（SRIA）联合主席 179
珍妮·希普利：丝路国际联盟（SRIA）为中国脱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活力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 181
张文才：中国特色的金融扶贫经验与“一带一路”发展思考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第一副院长 183
梁子谦：中亚区域减贫面临的挑战

中国葛洲坝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184
林晓丹：中国能建为实现中国脱贫增砖添瓦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 186
张建宇：助力全球产业低碳转型，中国一直在行动

2021 丝路国际联盟大会学术讨论 188

中国减贫经验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疫情后绿色复苏的借鉴

■ 格罗丽亚·阿罗约 / IFF理事、菲律宾前总统、丝路国际联盟（SRIA）联合主席

格罗丽亚·阿罗约

中国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实现了两个百年目标中的第一个目标，即在 20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也一定能够在 20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时，顺利圆满地完成第二个百年目标，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 2020 年，中国已经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中国的变化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扶贫，使 8 亿多人摆脱了贫困。刚过去的这段时间，中国领先全球的经济增长速度，使得中国即将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在过去的 40 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令人惊叹的增长。这是因为在 1978 年，中国大胆地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如果让我总结中国在 40 多年的时间里取得成功的关键，我认为有四个因素。第一，有一个长远的愿景；第二，有坚定的信念来落实这个愿景；第三，认识到先进技术的价值；第四，认识到基础设施的价值。

在 2021 年 3 月初举行的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国将巩固和扩大扶贫成果，努力促进农村振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够从中国的经验当中借鉴、学习，建立长期愿景和坚定的决心。“一带一路”是中国最广泛的合作、协作平台，伟大历史学家 A.G. 霍普金斯曾将最古老的全球化追溯到丝绸之路。鉴于今天中国正处于再次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轨道上，学者们现在将“一带一路”描述为 “全球化 2.0 ”是很恰当的。

20 世纪 80 年代，我刚开始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职业生涯，当时“中国龙”这个词汇是第一次出现，用于描述在中国发生的经济奇迹。作为菲律宾贸易部的一名官员，我当时想，中国是否会成为我们在世界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当时没有人意识到中国将会自成一系，事实证明，中国不是一个竞争对手，而是一个发展伙伴——它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是一个捐助国，是一个资本和技术的提供者。

中国争取与邻国在发展中建立伙伴关系是正确的。这种开明的态度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持续的友谊打下了基础，尤其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在联合国成立 75 周年纪念峰会上，习主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袭击是对整个世界的一次严峻考验。人类已经进入了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全球性的威胁和挑战需要强有力的全球性应对。

尽管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发了全球恐慌，但人们认为各国很快将进入这场大流行病的最终阶段，即新冠肺炎从大流行病转变为地方病。这一次的疫情也将被看作是一个长久存在的威胁。我们公共卫生努力的焦点将会从管理病例的数量转换为管理严重疾病和死亡。

但是，这场疫情给世界留下了永久的创伤，并且突

显了世界在追求可持续发展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因此，现在世界关注的重点是经济复苏和绿色发展。新冠肺炎疫情促使人们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些关键重点领域进行重新思考。现在的“一带一路”是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和绿色丝绸之路。

自疫情爆发以来，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一带一路”投资的主要对象。正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行长所言，这场疫情促使世界探究病毒和其他疾病与未来生态灾难的联系，因此有必要在所有商业活动中制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亚投行的《环境与社会框架政策》，能够在 ESG 上起到更好的引领作用，让客户更好地管理投资项目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中国争取与邻国在发展中建立伙伴关系是正确的。这种开明的态度为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之间持续的友谊打下了基础，尤其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

习近平主席在 2021 年 11 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让我们记住他的提醒，使疫情后的复苏成为绿色的复苏。

丝路国际联盟（SRIA）为中国脱贫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活力

■ 珍妮·希普利 / IFF理事、新西兰前总理、丝路国际联盟（SRIA）联合主席

珍妮·希普利

现在有清晰的证据表明，如果我们将本地区经济与全球的经济联系起来，将不同经济体和人们拉得更近，就有更好的机会减贫，创造繁荣。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之下，我们不断挑战自己，使我们的成长和发展更有包容性。如果想在未来十年获得成功，我们就必须考虑过去五年发生的事情，尤其是过去两年当中，在疫情期间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现在有清晰的证据表明，如果我们将本地区经济与全球的经济联系起来，将不同经济体和人们拉得更近，就有更好的机会减贫，创造繁荣。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在这方面的突破，比如亚洲的经济体日益强盛起来。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看到平等性逐渐在提高。我相信这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来帮助这种包容性的成长。比如中欧班列的开通，这是非常好的例子，说明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带来好处，尤其是由大型经济体向小型经济体提供援助带来的回报，可以帮助本地区更好地减贫。

“一带一路”倡议和很多其他倡议关注的焦点一样，我们需要非常谨慎面对。从全球来讲，脱贫工作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同时我们知道还有一些非常深层次的贫穷问题，尤其是在农村地区，问题比城市更加严重。如何提高农业生产力，通过什么样的技术支持中小型企业，让中小型企业可以做得更好，并且和真正的经济联系在一起，同时能够对脱贫作出贡献，这些都是下一步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议题。

还有贫穷和不平等的问题。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全球范围内，除了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之外，还有资源流动的不平等。由于疫情，资源流动的不平等更加严重，要想真正取得成功，必须要解决不平等的问题。我们有义务做到这一点，这是为人类、为经济作出贡献。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的教训是，如果在获得疫苗方面出现不平等，会导致更多的问题出现，而这将给所有人带来不利影响。

现在世界需要多边主义，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个视角来思考多边主义。多边主义或双边行动曾取得过很多成果，现在需要再次为此投入。丝路国际联盟（SRIA）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让更多地区实现繁荣发展。我们要关注经济体之间的合作，通过多边的方式进行协作，或者政企的合作。我们还要思考疫苗、药品、知识产权如何以适当的成本进行分享，这样不仅能够帮助经济落后地区的人群，也能够保证其他人的利益，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想保护自己的利益。

“一带一路”倡议所取得的成绩如果能够成功复制，在其他领域可以做得更好。亚洲可以和其他经济体共同研究，互帮互学，促进更好的包容。我认为总体来讲，亚洲在包容方面表现是不错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毫无疑问，中国在亚投行以及其他机构合作方面所展现出的领导力，让我们相信亚洲区域将来是可以持续繁荣的。根据预测，到 2030 年亚洲经济体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大概会占到全球经济的 60%，这是 10 年之内就可以实现的目标。与此同时，丝路国际联盟（SRIA）也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继续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可以让老百姓通过经济发展获得福利。

最后一点是可持续性问题。要让可持续概念变得更加切实和有意义，这一点比以往更加重要。在过去的 10 年或者 15 年，可持续性主要关注的是地球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倡议。这些倡议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但是现在我们对生态和环境的关注决定我们是不是可以真正拥有可持续的未来。通过多边主义，可以真正地实现可持续发展，使可持续真正成为一个主流的、有意义的概念。“一带一路”倡议和丝路国际联盟（SRIA）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目标。

我必须要强调的是，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年会设置了“IFF 全球绿色金融奖”，这样的举措不仅可以促进金融机构在环境方面作出更多的努力，同时也能让金融行业认识到可持续和绿色的概念，并通过他们的贷款为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要考虑到很多方面的关联，经济的发展、对社会的支持、对地球的关注，都需要关联在一起。

“一带一路”倡议所取得的成绩如果能够成功复制，在其他领域可以做得更好。亚洲可以和其他经济体共同研究，互帮互学，促进更好的包容。我认为总体来讲，亚洲在包容方面表现是不错的。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

中国特色的金融扶贫经验与“一带一路”发展思考

■ 张文才 / 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

中国长期以来始终致力于推进可持续发展，把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汇聚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打响脱贫攻坚战，并于 2020 年实现全面胜利，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取得这一成就，关键在于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减贫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坚持用发展的办法消除贫困，将精准扶贫方略贯穿始终，坚持汇聚各方力量，不断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做到了真扶贫、扶真贫、脱真贫。

农业政策性银行是中国实施脱贫攻坚的战略工具。作为中国唯一、全球最大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农发行在 2015 – 2020 年间积极发挥金融扶贫先锋主力模范作用，累计投放精准扶贫贷款 2.32 万亿元，2020 年末扶贫贷款余额达 1.5 万亿元，投放额和余额均居金融同业首位，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扶贫经验。

一是瞄准短板弱项加大信贷资金投入力度。全力支持贫困地区粮棉油收储，助力贫困农户持续稳定增收。坚持把产业扶贫作为精准脱贫、稳定脱贫的关键之举，推出产业化联合体、总部经济、产业扶贫合作平台等模式，重点支持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提升和新产业、新业态发展。积极做好易地扶贫搬迁信贷支持和后续扶持，将“输血”“造血”相结合，全力支持解决“三保障”和饮水安全突出问题。大力开展基础设施扶贫，助力改善教育、医疗和农村住房等薄弱领域。加大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强政策倾斜，强化资源保障，助力深贫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

二是创新带贫益贫的金融产品和利益联结机制。中国坚持精准扶贫，确立了不愁吃、不愁穿和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的工作目标。农发行聚焦“两不愁三保障”的突出问题，创新金融扶贫政策、产品和模式，实行资源倾斜、利率下浮、门槛降低。贫困人口占有的优质市场资源较少，市场意识和观念不强，参与市场进程的机会相对不足。农发行通过向带贫益贫效应明显的经营主体发放贷款，实行严格的扶贫贷款质效管理，支持其流转贫困人口的土地，签订收购订单，提供原材料、技术服务和就业机会，建立起经营主体与贫困人口的利益联结机制，解决贫困人口市场能力不足的问题。许多贫困人口还成为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享受分红收益，这些都实实在在推动了增收脱贫。

张文才

三是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双重作用。单纯依靠政府或者市场，会导致贫困人口的福利依赖或农村金融资源被城市抽取等客观问题，难以实现贫困的有效治理。农业政策性银行是弥补市场失灵的制度设计和策略选择，能够发挥“当先导、补短板、逆周期”的职能作用。农发行依托国家信用，采取市场化手段筹集资金，向市场发育滞后的贫困地区逆向配置金融资源，

推进城乡之间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互联互通；支持水利、公路和产业园区建设，减少了生产要素向贫困地区汇聚的成本，帮助贫困地区培育市场主体。同时，注重加强区域信用建设，与地方政府联合建立风险分担机制，引导社会资金更多投入扶贫，成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协同运作的桥梁和纽带。

四是构建解决多维贫困的系统治理体系。中国针对贫困人口、贫困类型、致贫原因的不同，设计了“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的精准脱贫路径，构建了“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的扶贫格局，解决了贫困个体依靠福利性救济、离散式帮扶不能解决的多维贫困问题，成功将贫困人口推入国家现代化进程。农发行除了贷款支持贫困地区发展外，充分发挥机构和客户优势，协调引导各方力量共同参与扶贫，统筹实施定点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万企帮万村、驻村帮扶和消费扶贫，构建融资、融智、融商、融情的“四融一体”帮扶体系，为贫困人口提供更多发展机会和能力建设。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习近平主席指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大方向没有改变，共建“一带一路”仍面临重要机遇。同时，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激烈竞争前所未有，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前所未有，共建“一带一路”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一带一路”沿线一些国家经济结构比较单一，长期依赖农业、旅游业，现代制造业、服务业发展不足；资本市场发展受限，资金供给存在瓶颈，同时基础设施不够健全，投资环境亟待改善。中国将遵循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坚持发展优先、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深化互信，探索建立更多合作对接机制，共同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聚焦减贫、粮食安全、抗疫和疫苗、发展筹资、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工业化、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等八大重点领域，进一步凝聚各方共识，推动各国共同应对挑战，携手抓住机遇。

农发行愿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相关金融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发挥政策性银行优势，更好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持续发展。持续加强减贫合作，动员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推动更多资金、技术和知识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增强贫困者脱贫的内生动力，把“一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增长之路。加强信息共享、经验交流，进一步加大粮食全产业链和农业基础设施支持力度，保障粮食生产恢复和供应链畅通，支持农业领域对外合作、农产品国际贸易和项目融资，切实维护全球粮食安全。加大绿色金融支持力度，加强基础设施、能源、交通等领域的绿色合作，促进绿色、低碳、生态项目发展，提升沿线国家生态环保、污染防治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大力动员社会资本、私人资本，撬动公共卫生、新能源、新基建、数字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解决资金缺口，推动技术合作，优化治理体系，提供更多优质公共产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全球贫困人口下降趋势出现逆转，消除贫困更加任重道远。让我们携手共进、迎接挑战，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继续努力奋斗！

中亚区域减贫面临的挑战

■ 梁子谦 /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第一副院长

梁子谦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是一个政府间的机构，我们通过知识创造和能力建设为中亚区域的经济合作做贡献。我们一共有 11 个成员经济体，包括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格鲁吉亚、蒙古、巴基斯坦和 5 个中亚国家。作为中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一个知识枢纽，我们不断支持各成员经济体推动各地的减贫工作，这也是我们过去多年的主要关注点。

过去几十年里，中亚区域的经济体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在减贫和改善福利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在中亚区域的人口当中，生活在每天 1.9 美元国际极端贫困线之下的极端贫困人口比例，从 2001 年总占比 18.6% 降到了 2019 年的 2.2%。同期，生活在每天 3.2 美元中低收入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从 47.1% 降到了 12.3%。在这两组数据当中，中亚区域的表现好于同一时间段世界平均水平，这个区域内的一些成员经济体的减贫速度比其他经济体要快。

非常令人惊叹的成功是中国在 2021 年初宣布，已经完全消除了绝对贫困，让近 1 亿农村居民在过去 8 年当中脱贫。中亚区域位于古老的丝绸之路上，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中国成功的扶贫经验，可供中亚区域国家学习借鉴。

尽管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中亚区域作为一个整体仍然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还需要在很多方面继续努力才能赶上发达经济体。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重要指标。根据这一指数，所有的中亚区域经济体从 2010 年到 2019 年间都在总体表现上稳步提高，但是这个区域的平均人类发展指数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14 年 -2019 年，超过一半中亚区域经济体排名在前 100 位，其中 4 个国家被认为是中低发展国家，其预期寿命、学校教育以及人均 GDP 相当低。

2020 年以来，因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世界各地的减贫进程已经放缓，大量人口重新陷入贫困，甚至变得比以前更穷。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仅在 2020 年一年内，就有约 1 亿人口因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重新陷入极端贫困。在中亚区域，一些成员经济体的情况可能更糟。亚洲开发银行公布的数据表明，2020 年，阿富汗几乎有一半的人口生活在国家贫困线以下。从那时起到现在，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与此同时，有一些国家比如塔吉克斯坦，事实上是非常依赖海外劳工的薪资回流，但是我们看到 2020 年这部分收入在塔吉克斯坦 GDP 中的占比降到 26.7%，这是自 2006 年以来最低的占比。

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作为致力于区域一体化的重要政府间知识机构，在促进各国政府加强减贫沟通的同时，学院也欢迎其他智库和大学与我们携手，共同开展与消除贫困有关的课题研究。为了促进这项工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愿意组织研讨会并邀请专家分享最佳实践。

中国能建
为实现中国脱贫增砖添瓦

■ 林晓丹 / 中国葛洲坝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能建是一家为全球能源电力、基础设施等行业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全产业链服务的综合性特大型世界500强集团公司，业务涵盖能源电力、水利水务、铁路公路、港口航道、市政工程、城市轨道交通、生态环保和房屋建筑等领域。

在中国政府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共同推动减贫目标实现进程中，中国能建牢记国资央企使命担当，在中国偏远、贫困地区大力投资建设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运营的高速公路累计对农产品运输车辆免收通行费用近 15 亿元，规划建设的光伏扶贫电站项目为近万户农民提供了既可自发自用、也可上网获取收益的绿色电能，有力促进了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此外，公司还加强对定点帮扶地区的资金援助，累计投入资金约 1 亿元，定点帮扶的陕西镇巴县、广西西林县合计 10.5 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中国全面实现小康作出了应有贡献。

同时，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领军企业，中国能建积极在“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累计实施电力、交通、房建、水务等基础设施项目金额约 800 亿美元。公司投资建设的巴基斯坦 SK 水电站，在建设期为当地居民提供了 6600 个就业岗位，建成后每年可提供 32 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在巴西圣保罗投资的水厂，可满足近 200 万居民的用水需求。

林晓丹

我从企业角度出发，就促进“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推动欠发达地区实现减贫目标谈几点看法和建议。

一是加大务实合作力度，共同应对“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新形势。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震荡，给“一带一路”高质量推进带来了诸如收益水平下降、投资动力不足、金融供给不够、壁垒障碍增多等不利影响。中国能建愿意积极发挥基础设施“投建营”一体化优势，与各方携手打造更多优质的投资驱动工程、绿色发展工程和减贫惠民工程，重点推进一批“幸福坝”“友谊桥”“致富路”“生态城”投资建设，提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为欠发达地区打通致富减贫渠道提供更多硬件支撑。

二是贯彻绿色发展基调，奋力开创“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新局面。全球电力能源革命正朝着绿色、清洁、低碳的技术路径和产业纵深持续挺进，各方应抢抓“双碳”目标下产业链、价值链升级机遇，深化在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制造、绿色建筑等领域的合作。中国能建作为全球能源一体化方案解决商，将借助传统技术集成和新技术创新的驱动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开展“风、光、水、火、储（能）一体化”“（电）源、（电）网、（负）荷、储（能）一体化”实践，推动绿色产业培育，使更多绿色发展成果惠及当地民众，开拓“一带一路”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新局面。

三是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携手增添“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新动能。各方应遵循可持续回报、高效率和风险可控等原则，通过多元化工具组合进行融资，确保项目全生命周期内的财务可持续性，共同解决部分国家债务脆弱性问题。在政府、投资人、融资机构间建立更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加快推动发展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建设；更好发挥多边金融机构作用，促进融资来源和机制多样化；积极开展多双边合作、第三方合作，以新模式引导更多主体参与实施“小而美、惠民生、见效快”的项目。

中国能建将积极发挥全球市场布局优势和全产业链一体化优势，瞄准“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目标，在推动“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中奉献能建之智，贡献能建之力。

相关名词解释：

光伏扶贫工程：主要是在住房屋顶和农业大棚上铺设太阳能电池板，“自发自用、多余上网”。也就是说，农民可以自己使用这些电能，并将多余的电量卖给国家电网。通过分布式太阳能发电，每户人家都将成为微型太阳能电站。光伏扶贫作为国务院扶贫办 2015 年确定实施的“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充分利用了贫困地区太阳能资源丰富的优势，通过开发太阳能资源、连续 25 年产生的稳定收益，实现了扶贫开发和新能源利用、节能减排相结合。截至 2020 年，中国累计建成 2636 万千瓦光伏扶贫电站，惠及近 6 万个贫困村、415 万户贫困户、每年产生发电收益 180 亿元，相应安置公益岗位 125 万个。

风光水火储一体化：侧重于电源基地开发，结合当地资源条件和能源特点，因地制宜采取风能、太阳能、水能、煤炭等多能源品种发电互相补充，并适度增加一定比例储能，统筹各类电源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营。

源网荷储一体化：侧重于围绕负荷需求开展，通过优化整合本地电源侧、电网侧、负荷侧资源要素，以储能等先进技术和体制机制创新为支撑，以安全、绿色、高效为目标，创新电力生产和消费模式，为构建源网荷高度融合的新一代电力系统探索发展路径，实现源、网、荷、储的深度协同。

助力全球产业低碳转型，中国一直在行动

■ 张建宇 /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

张建宇

中国通过实际行动促进绿色“一带一路”的发展，应对人类面临的重要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绿色和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在 2019 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成立。自此之后“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现在已与 150 多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成为合作伙伴。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当前关注三件事，第一是 10 个相关主题的合作。包括低碳发展、可再生能源合作、生物多样性、环境法和监管等，每个主题的合作伙伴都由最重要的、最有力的国内国际组织组成。大家一起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从事相关的合作工作。第二个是旗舰报告。研究院一直在发布一系列的主题报告，比如关于绿色“一带一路”的报告，包括针对中国在海外投资行动的最新绿色投资指南。第三个是开展试点活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和一些国家、企业开展具体项目的试点工作。目前正在和蒙古开展合作，还在埃塞俄比亚有一个项目，与老挝就其国家绿色发展战略进行合作，以上是近期研究院经过努力取得的成果，希望未来能够有进一步的进展。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COP26）成功举办，受到了很多关注。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对在格拉斯哥举行的 COP26 会议的成果不甚满意，包括每年 1000 亿美元气候变化援助资金的落实问题，这是发达国家在 2009 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曾经做出的承诺。另外新作出的承诺是否能够如期全额到位，也不太清楚，而且大会没有太多关注《巴黎协定》规定的关于损害赔偿的落实，这些都令发展中国家不满意。现在全世界都在向绿色低碳转型，公正转型这个话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强调，这也应该是全球契约当中的一部分。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气候变化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而且中国一直遵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原则，积极地支持发展中国家，保障其发展权益以及在全球低碳转型当中的权益。2020 年 9 月，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主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将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2021 年 7 月，中国启动了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场。9 月 21 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一般性辩论，宣布中国将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的发展，而这句话是中国停止新建境外煤电项目的前提。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气候变化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而且中国一直遵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原则，积极地支持发展中国家，保障其发展权益以及在全球低碳转型当中的权益。

中国一直在加紧实施习近平主席作出的承诺，推动“一带一路”新发展。在疫情背景下的卫生领域合作、绿色低碳合作，以及数字“一带一路”建设，所有这些中国都在非常快速地付诸实践。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中国强调将会加强可再生能源开发技术方面的合作，以及绿色金融方面的合作。同时非常令人振奋的是，在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上，双方也强调了合作，并且认为气候变化已成为中国和非洲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挑战。双方一致肯定，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在适应及减缓气候变化合作中采取的举措和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和非洲第一次宣称将会在天然气基础设施方面进行紧密的合作，在可再生能源方面进行合作，这些都是本次会议联合声明公布的会议成果。这些也是落实习近平主席讲话的具体行动，还有很多其他的国际倡议也在稳步推进。

2021丝路国际联盟大会学术讨论

主持人：亚历山德罗·特谢拉，IFF理事、巴西工业发展与贸易部前部长、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前主席
嘉　宾：珍妮·希普利，IFF理事、新西兰前总理、丝路国际联盟（SRIA）联合主席
张文才，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
梁子谦，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第一副院长
林晓丹，中国葛洲坝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张建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执行院长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和贫困三者之间是有相关性的，很多人由于气候变化丧失了工作，他们没有机会脱离贫困，因为他们没有就业的机会。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并不是一个完全平等的时代，贫困是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包括饥饿、犯罪率，以及很多其他的情况。刚才希普利女士也提到不平等问题以及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困难程度。

我的问题是，中国在过去 40 年做出的典范、政府采用的政策、私营部门和政府之间的合作，这些经验如何能够被其他国家借鉴？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怎样用自己脱贫的经验更好地去引领其他国家的脱贫？

珍妮·希普利：首先，中国有个独一无二的优势，比如中国的金融机构和企业能够主动落实政府倡导的措施和经验，因而得以更好地发展和创新。当国家遇到危机政府发起倡议时，中国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甚至中小微企业，都会积极响应，把国家政府的事看作是自己的责任，并努力为之做出贡献。我觉得这一点是中国过去 40 年做出巨大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中国向全世界展示的一种独特能力。

我在几个不同的场合亲眼见证过这种独特的优势，中国的企业并不是孤立于政府之外的，在“一带一路”的倡议当中，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企业所发挥的作用，这是中国的独特优势。

第二，关于绿色金融。现在世界各地很多人都在讨论绿色金融，但在绿色转型实践中，很多企业因没法获得技术和资金支持，没办法把传统的生产工艺加以改进而受困、受限。在中国过去的 15 年中，我们看到互联互通的程度有了极大的提升，中国各个角落的人们都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知识、信息，助力生产、投资、合作、销售。现在的新西兰，我们还没办法做到这一点。现在互联网已经覆盖了中国每个角落，所以中国人民可以利用互联网基础设施普及的优势，更好地抓住发展的机遇，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很多政策想要有效地落实执行，也需要这种网络基础设施，尤其对于边缘和贫困地区的人民来说更是如此。不管是互联网还是公路、铁路，所有的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国家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在其他很多国家，我们发现基础设施都没有达到中国的普及程度。

第三，关于交流合作。不仅仅是在减贫领域，在很多其他方面，包括新能源、新实践都有赖于交流合作。交流合作可以帮助传统产业中的人们脱离陈旧的环境，通过接受新科技、新工艺、新产业，过上更现代的生活。在这方面，中国的进展是非常令人惊叹的。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概念将带来深远的影响，包括人民生活品质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很多优势。近 40 年中国发展得极好，世界应该赞赏中国的成就。

我感到非常荣幸，见证了中国发展的奇迹。我去过中国很多省份，也看到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建设的成功例子，实践证明合作、创新是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推动力。我们应该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加强合作，合作能够使我们更快地去克服一些困难，尤其是战胜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些问题和挑战。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好的，非常感谢希普利女士刚才提出的清晰观点。请问有没有其他哪位嘉宾想要就这个问题再作一些补充？好，梁院长，请！

梁子谦：我觉得减贫是需要全球一起行动的事情，这得到联合国的支持，也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已达成共识。我们中亚区域有 11 个成员国经济体，除了中国之外，其他的 10 个国家也都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也从“一带一路”倡议当中获得了实际的益处。

我认为中国的减贫实践是非常有用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它有两个特点，一是它与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密切相关；二是它的具体方法和措施非常适合中国国情。 现在互联网发展得非常快，很多工作模式、商业模式、生活模式等都因网络发展普及而变化。中国的减贫与这些是紧密相关的，我觉得这一点相当重要。

现在我们学院在开发线上的培训项目，例如跨境电商的培训项目。我们提供免费的培训课程给客户，目前我们在中国的开发培训课程，主要是基于中国的减贫经验，我们也会与其他成员国的学校进行合作。通过这个模式，我们也许能够为有网络覆盖的边远地区居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这是我们从中国学到的经验。我们要把中国经验推广到其他的成员国经济体中，这个项目正在筹备过程当中，明年年初我们会推出。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我想向林先生提一个问题，我们想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来减贫，并让私营部门参与，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众多的中小公司来参与。您是中国大企业的代表，您认为国有企业如何更好地参与这个方案？

林晓丹：就像刚才希普利总理讲的，中国有很多脱贫、减贫的经验，一定程度上是基于中国政府强大的社会治理能力，其他国家和地区想借鉴这方面的经验，可能有一定的难度。我个人感觉，还是要根据当地的文化、政治环境，有选择性、分步骤地去借鉴中国相关的发展经验。我们作为一家央企，定点帮扶两个县的脱贫任务，类似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者其他国家，想借鉴和效仿肯定是有难度的。但可以从目前可以实施的、大家都认可的基础设施着手对脱贫减贫给予强大支撑。我们这些中国大企业，实际上“走出去”以后，这么多年一直都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前一阵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我们在巴基斯坦水电站投资的新闻，这个投资项目在各方面都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很多好处，就连当地村镇的小商店交易额都翻番了。我们的投资项目促进一个大区域的脱贫减贫可能有难度，但是做到帮助项目周边几个村或几个镇脱贫减贫，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我们投资项目的同时，还为当地的学校捐赠物资、无偿修路，开展了许多公益活动。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另外一个问题想请教张文才行长，也是关于减贫以及乡村振兴的一个问题。从 2013 年开始，中国落实了大量的乡村振兴以及乡村现代化的

政策，在这方面，您所在的银行做了哪些具体工作？取得了哪些宝贵经验？

张文才：非常感谢您的提问。我们在促进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首先要把脱贫成果巩固好，防止脱贫人口返贫，做好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的有效衔接。以前我们投入比较多的是支持农村地区减贫，主要是保障粮食、农作物的供应，确保农民在卖粮的同时获得收入，增加农民在农产品种养方面的积极性，同时要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粮食充足的供应。

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支持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供水、灌溉、道路、能源以及其他一些基础设施方面的建设。未来，作为金融机构我们会加大对农业科技创新的投入，特别是种子和高标准农田。因为种子是非常关键的，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短板，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种子方面也是有很多短板的。我们要进一步支持高科技农业产业园的发展，加大对农业科技的投入。

另外，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大乡村数字建设，包括智慧农业、乡村数字农业方面的建设，还有电商平台、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当然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促进城乡融合，不论是农村的发展，还是农业的发展，不能光靠农村自身，还要通过跟城市的融合，通过城乡之间的相互支持，包括工业和农业之间的相互支持，我觉得这些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

要进一步促进农业对外合作和农产品的贸易，包括中国农业企业走出去，特别是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的合作，我觉得都是双赢的，不光中国受益，相关国家也受益。很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业还是传统产业，而且就业、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于农业。制造业、服务业也非常重要，但是农业是很多国家实现减贫的最基础产业，包括粮食安全，这方面我们不要放弃。

我觉得我们的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也愿意加强农业领域的合作。原来我在亚洲开发银行做副行长时，有一些南亚和中西亚国家朋友曾问我，是不是应该成立他们自己国家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来支持相关产业的发展。有些国家有开发性银行，有些没有，是开设一个投融资的基金或者公司，还是银行，这需要探讨。怎么发挥开发性、政策性银行的作用，虽然国际多边开发银行非常重要，但有别于国家自己的政策性金融机构能起到的独特作用。比如我们银行通过发行债券，把社会资金动员起来，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好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农发行每年发行债券 1.5 万亿，今年发行绿色债券的资金比例可能会更高。我们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支持农村可持续绿色发展。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有些可能对其他国家有借鉴意义。当然，每个国家的国情不一样，但是我相信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现在气候变化造成的灾害频繁发生，怎么增强农业基础设施抗灾害的能力，增强它的韧性，我觉得这方面非常关键。面对气候变化的冲击，面对疫情的冲击，怎么帮助农村尤其是贫困农村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有一个关于绿色发展的问题，是观众提问张建宇先生的，很多地方在减少煤炭发电等高能耗项目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导致失业问题，请问怎样保证绿色发展和就业不发生冲突？怎样避免失业人群返贫问题？

张建宇：首先，当我们讲气候变化问题时，我觉得我们其实讲的是整个人类正在面临的涉及生存的威胁，而且我们要在可持续发展这个框架和背景之下来探讨这个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其实是为了帮助维护和增强全球老百姓的福祉。我们不能让应对气候变化成为老百姓额外的成本和负担，这也是为什么全球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到公正转型这个概念。怎样重新分配资源，保证就业的稳定和人民的福祉，不让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给老百姓造成负面影响，我们目前还在探索寻找最佳方案。

中国已探明的煤炭储量位居世界第一，而且中国也是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中国向全世界承诺在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下定了多么大的勇气和决心，是多么有大国担当。实现“双碳”目标肯定会对中国现有的能源结构带来很大的冲击。我们应该怎么应对？中国毫无疑问正在探索各种不同的方式，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需要制定一个框架，包括政府指导、协调和财政支持，以及市场机制、投资融资、核算体系等方面的努力才能实现。通过这样一个框架，确保努力实现转型的企业、机构，能够得到认可和回报。

中国在实现“双碳”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而且取得了一些初步成绩，其中一项就是 2021 年 7 月中国推出的全球最大的碳市场，目前已覆盖 40% 的国家碳排放，初期只纳入了电力行业，但今后将会慢慢纳入其他高能耗行业。中国正在尝试通过碳定价，通过市场的机制，让那些在减碳方面做出重大努力的行业和领域能够得到补偿。中国将继续完善碳定价政策和机制，进一步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不仅需要政府资金，也需要私有资金的加入。实现碳中和目标需要上万亿美元巨额资金支持，通过碳定价体系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可以更快地吸引更多资金。

总之，我想强调的是，技术绿色转型、建立全球碳市场，将不同地方的碳市场连接在一起，从而传递出碳价格信号，指引资金流入到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发展中国家更需要绿色金融。我觉得中国绿色“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它可以让大家知道，怎么样通过建立机制让有能力的国家发挥引领作用，从而避免或减少发展中国家或者欠发达国家，在绿色转型过程当中受到负面影响。世界各国都在为绿色发展而努力，目前还没有一个特别成功的案例，各个国家的做法不一样，我觉得最终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不同的国家通过不同的形式进行合作交流，共同推动全球绿色可持续发展。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谢谢张先生。非常遗憾，到了讨论结束的时间，非常感谢各位发言人，感谢你们精彩的、发人深省的分享。通过今天的探讨，我觉得起码应该能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脱贫和绿色发展之路是艰辛的，独木难成林，政府不可能独立完成，全社会包括私营部门都要参与其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国际金融论坛（IFF）的一个重要使命，IFF 会提供一个国际交流平台，让各方能够在此进行充分的讨论。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这部分的讨论，我也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 2021 年 IFF 全球年会当中能够度过愉快的时光！

数字金融峰会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193
李东荣：全球金融科技治理的五大重要趋势

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 195
周延礼：规范发展互联网保险，促进保险业稳定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197
狄刚：区块链技术助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

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首席代表 199
悉达多·蒂瓦里：大型数据平台给金融领域带来的三个新挑战

IFF 学术委员、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200
夏乐：浅谈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202
肖风：数字金融落地应用的三个层次

数字金融峰会学术讨论 204

全球金融科技治理的五大重要趋势

■ 李东荣 / 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随着金融业务网络化、移动化、数字化的发展，金融业面临的网络恶意攻击、非法侵入等问题日趋严峻，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加快了网络服务渠道的推广和远程办公模式的普及。局部的金融风险也可能因为网络安全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李东荣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活跃密集的时期，数字经济浪潮蓬勃兴起，金融科技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支撑，已成为各国、各地区金融竞争与合作以及资源布局的焦点领域。面对金融科技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如何更好地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已经成为各国金融监管部门需要科学、妥善应对的现实课题。全球金融科技治理展现出五个重要趋势。

一、应对金融网络风险，完善网络安全管理迫在眉睫

随着金融业务网络化、移动化、数字化的发展，金融业面临的网络恶意攻击、非法侵入等问题日趋严峻，而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加快了网络服务渠道的推广和远程办公模式的普及。局部的金融风险也可能因为网络安全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由世界银行和剑桥大学共同发布的《2020 年疫情下全球金融科技监管快速评估报告》显示，在全球 114 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监管机构中，有 78% 的受访机构认为网络安全风险正在上升，约 30% 的机构正在抓紧推进网络安全相关政策措施。因此，加强金融网络安全管理已经成为各国金融科技治理的一项重要且紧迫的任务，这形成了一定的共识。

二、加强金融竞争数据领域的监管协调十分重要

作为金融监管和科技创新深度融合的产物，金融科技不仅会给金融带来效率提升方面的物理变化，还会通过引入新的市场竞争主体，包括大型网络平台、新的金融数据要素等，大量替代数据，以及新的金融合作模式如助贷引流模式，从而带来金融功能实现方式的化学反应。因此传统金融领域的审慎监管规则并不能完全覆盖金融科技新主体、新数据、新模式所带来的新风险。从全球监管实践看，部分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已开始注重加强金融竞争数据领域的监管统筹和协调，比如英国于 2020 年 7 月建立了跨部门数字监管的合作机制，旨在促进金融监管机构、竞争

金融科技的发展与治理已是一项全球性的重要议题，需要凝聚全球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参与，协同推进。希望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科技业界能够进一步依托国际金融论坛（IFF）这样的高层次、国际化、持续性的对话平台，共同深入探讨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所面临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推动金融科技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经济和人类福祉。

监管机构和数字监管机构之间的监管合作，统筹促进公平竞争，打破数据垄断，规范网络服务。

三、监管沙盒等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的应用更加深化

在科技的驱动下，金融创新迭代的速度日益加快。如何更好地平衡促进创新与防范风险的关系，成为摆在各国金融监管部门面前的一道共性难题。近年来，监管沙盒、创新加速器、创新中心等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得到快速推广，为金融科技创新应用在规模化进入市场之前，提供了特定的缓冲地带和试错区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创新监管困局。

随着监管实践的深入，部分国家监管部门持续迭代更新了监管工具箱，以更好地适应不断快速变化的金融科技创新生态。比如新加坡推出了为特定创新项目提供快速通道的快捷沙盒；英国推出了为初创企业提供定向测试验证的数字沙盒；澳大利亚推出了提供更长测试期限和更广参与范围的增强型沙盒；此外，英国还计划推出针对交叉性金融科技创新的跨部门沙盒。

四、推进金融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金融科技伦理是伦理思想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应用，是金融机构、金融科技公司等从业机构开展金融科技活动，需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当前，随着金融科技应用深度和广度的不断拓展，数字鸿沟、技术排斥、算法歧视、隐私泄漏等科技伦理挑战引发了全球性关注，国际社会关于加强金融科技伦理治理的呼声日益强烈。对此，部分国家和地区在金融科技伦理治理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但总体还处于起步探索的阶段。比如澳洲保险和职业养老金管理局成立了数字伦理咨询专家组，协助该局制定保险行业相关的数字伦理原则和规范；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组织行业力量成立了公平、道德、可问责和透明委员会，出台信用风险评分、客户营销等场景的公平性评估指标，帮助金融机构评估其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分析解决方案的公平性情况。

在中国，中国人民银行已组织启动金融科技伦理指引、金融行业标准的研制工作，探索提出守正创新、以人为本、诚实守信、公开透明、权益保护、安全合规、公平普惠、社会责任等伦理原则和落地标准。

五、金融科技跨境政策协调与国际规则研制正在加速

在全球金融市场开放性和网络基础设施连通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由于不同国家在经济金融发展阶段中的金融监管理念和制度环境不同，金融科技可能带来跨境监管套利、监管禁止和风险传染等挑战。因此，部分国家已通过国际风险和双边、多边合作机制，抓紧开展全球金融科技发展评估与风险监测，探索建立针对跨境金融科技应用的监管信息共享，以及风险联动应对和危机处置安排，并以网络安全、跨境支付、数据治理、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等关键领域为切入点，加快推进金融科技国际标准治理规则体系建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世界银行发布了“巴黎金融科技议程”，旨在为成员国改进金融科技发展与监管提供指南。世界银行近期也推出了全球金融科技监管政策数据库，包含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科技监管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以促进各国金融科技的监管知识和能力共享。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清算银行发布了金融科技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与应对，以及大科技公司金融监管、虚拟货币等领域的重要报告，持续总结全球金融科技监管经验。

金融科技的发展与治理已是一项全球性的重要议题，需要凝聚全球的智慧和力量共同参与，协同推进。希望各国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科技业界能够进一步依托国际金融论坛（IFF）这样的高层次、国际化、持续性的对话平台，共同深入探讨全球金融科技发展所面临的重点、难点、堵点问题，推动金融科技更好地服务于全球经济和人类福祉。

规范发展互联网保险，促进保险业稳定健康发展

■ 周延礼 / 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

周延礼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经济的发展，多措并举推动数字经济迈入新赛道。国家从制度建设入手，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加快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等。全国人大陆续通过了《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有关法律，国家有关部委也配套出台了《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条例》等管理规定，保障支持了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创新，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建设数字中国、智慧城市和数字社会，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以及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夯实了坚实的基础，并取得了显著的科技成果。

具体来讲，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由 2005 年的 2.6 万亿元，上升到 2020 年的 39.2 万亿元。2020 年，中国的数字经济占 GDP 的比例已达 38.6%，位于全球第二。伴随着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信息产业变革，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当前最具活力和创新力，辐射最广泛的经济形态，是国民经济的核心增长极之一。预计到 2025 年，数字经济占我国 GDP 的比重会超过 50%。

当前，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数字技术的丰富，对金融科技的应用领域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金融＋生态”对接数字中国的工业化生态系统，快速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层出不穷。数字经济生活的业态不仅满足了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同时还对网络化、智能化、数字化的金融科技产生影响，推动金融机构高效地落实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项任务要求，不断增强金融业服务能力和水平。

在新发展格局下，新一代信息技术是金融产品和服务变革的动能。互联网、5G 网络、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推动了金融机构的转型升级，必定会实现从“金融＋科技”到“金融＋生态”的转变，让金融业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防范金融风险、

提高经济效益，以及对科技赋能金融服务质量的变革、效能的变革，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从发展机遇来看，金融机构要加快实现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在风险经营管控方面，在产品研发及客户的体验等多个维度，创新实践并突破建立新领域。首先，要深度探索“数据＋新场景”，营造线上的新生态，为精细管理、精准服务和优化传统金融保险业务，提供数字化的方案。其次，要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实现金融服务的平稳转型升级，逐步加大与交易对手的业务模式合作，构建开放、融合和共建共创的合作关系，广泛地服务经济社会和民生，不断推出一些科技创新举措。

围绕规范发展互联网保险，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的权益，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有以下几点思考。

一、要健全互联网保险业规则，规范发展互联网保险

目前，监管部门创建了以《保险法》为依据，以《互联网保险业务监管办法》为核心，以《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保险机构互联网人身保险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加强自媒体保险营销宣传行为管理的通知》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为配套的互联网保险监管制度体系。针对互联网保险业务与传统业务的共通性、差异性，以及各领域互联网保险出现的一些风险和问题，已实时出台了针对性、阶段性、规范性的文件。这些后续的补充形成了“一个规章制度 +N 个规范性文件”的监管体系，提高了互联网保险领域监管的灵活性和有效性，逐步构建了立体化的互联网保险制度体系。

二、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的权益

监管部门要坚持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坚持机构持牌、人员持证的原则，压实主体责任，整治互联网保险存在的强制搭销、诱导式销售、销售误导等违法违规行为。以负面清单的形式明确非保险机构的禁止行为，发挥好与反垄断部门的综合治理合力，遏制互联网保险企业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垄断行为，防止大数据杀熟等不合理的数据使用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依托《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促使保险企业严格按照合法、正当、最小必要的原则来收集、使用和保护用户的信息，充分保障个人信息的隐私和消费者知情权、同意权、异议权、投诉权等合法权益。

保险机构应当确保网络平台、产品网页与保险条款的一致性，建立互联网保险的销售行为可追溯机制，定期收集、整理互联网保险业相关的监管规定，加强内部教育，提高内部人员的合规意识。保险业的主体组织要充分发挥行业的管理作用，正当引导互联网企业，特别是互联网保险企业的合法经营，探索建立互联网保险的作业规范等。

三、要加大互联网金融风险的防范力度，促进行业健康平稳的运行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历程表明，金融科技的发展也有其弊端，比如金融风险传递速度较快，使金融风险的结构更为复杂。为促进互联网保险的良性发展，保障金融安全、提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刻不容缓。

具体建议有：

第一，要探索对互联网保险业务开展分期分类的监管评估，完善分类评估的指标、结果分类对应的监管措施，以及结果的运用等内容。

第二，要进一步强化线上常态化的金融风险预警监测，提升实时在线的监管技术水平。针对互联网的开放性，提高监管部门的跨部门、跨市场、跨业态、跨地区的风险识别以及预警和处理的能力。

第三，要重视个人信息安全与数据的安全，依法加强保险业信息技术设施建设。

第四，要加强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隐私计算等技术的应用，借助科技赋能提高网络安全风险防范的能力。

第五，要为监管科技发展提供适宜的监管环境，科技赋能互联网保险的监管。监管科技能有效地应对复杂监管场景的变化，及时地掌握行业的风险状况，而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能创建缩小版的真实市场和宽松版的监管环境。在金融创新广泛应用之前，及时发现问题，为项目的纠错试错，为监管科技的解决方案提供安全的测试环境。

为持续地推动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工作，借助监管科技提高互联网保险监管的能力，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不断地完善更具包容性、审慎性的项目筛选，进一步夯实科技监管的基础工程，加强成功效能的规则和标准的输出，加强不同地区试点项目的联动。

总之，我们既要抓住数字经济时代的机遇，加快保险业数字化转型，同时也要持续地规范发展，守住风险的底线，切实做好保护保险消费者利益的工作。

区块链技术助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

■ 狄刚 /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狄刚

目前，全球已经进入数字化高速融合发展的阶段，数字技术的作用已经被全社会广泛认同，并在金融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与之前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相比，现在已经发展到数字化和智慧化时代，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从辅助、支撑、赋能，发展到融合、原生、泛在。

一、区块链技术已成为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引擎

（一）中国加速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2021 年 3 月，中国发布了“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在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部分，明确提出要培育壮大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网络安全等新兴数字产业。数字金融不仅是金融业务利用互联网实现业务流程搬家，更是要利用智能化、数字化技术实现体验、效率、安全、成本、普惠、智能、泛在这七大需求。而在重点关注的数字技术中，区块链技术已经成为数字金融发展的重要引擎。

（二）国际上区块链技术正在加速渗透。2021 年，有关咨询机构针对美国、英国、新加坡、德国、中国、日本等十个国家进行的区块链调研结果显示，81% 的受访机构认为区块链技术具有广泛可扩展性，并被主流机构采用。其中金融机构对区块链认同的比例更是高达 84%，所有受访的全球化金融机构都已经将区块链技术作为势在必行的战略优先项。2021 年 9 月，研究机构对全球TOP100的上市机构使用区块链技术情况进行调研，结果显示有 81 家机构正在使用区块链技术。

二、区块链技术在数字金融领域应用成果初现

（一）围绕发展全局，区块链技术应用已经初显成效。从拼专利走向了拼实力，从找场景变成了建生态，区块链技术落地成果不断增加，并发挥了越来越多的价值优势。如通过区块链技术应用精简无效中介和套路中介，减少中间环节、实现信息对称、降低总体成本、提升协同效率、优化业务流程、助力穿透监管。

（二）聚焦行业来看，中国金融业从内生改良、外部赋能两个方面积极发挥区块链效能。区块链技术在跨境支付、供应链金融、农业金融、贸易金融、普惠金融、社会城市、“三农”、民生等领域实现落地，部分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也在积极拓展区块链技术应用场景，包括贸易金融、信息共享、外汇交易、股权交易等。

（三）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以下简称数研所）率先在研发项目中实现数字人民币的区块链技术应用。

1. 在数字人民币体系中基于区块链技术构建了统一的分布式账本。央行作为可信机构将交易数据上链，保障数据真实可靠，运营机构可进行跨机构对账、账本集体维护、多点备份等。

2. 在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的支持下，开展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数研所作为数字货币桥项目技术委员会主席单位，探索使用分布式账本搭建的货币桥测试平台。

3. 牵头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专项，建设贸易金融区块链平台，以信息可穿透、信任可传递、信用可共享为目标，完成基于区块链的贸易金融生态体系建设。

4. 在标准化领域，数研所积极加强标准体系建设，牵头开展了多个区块链技术国际标准的制定，担任全国区块链分布式账本记账技术标准委员会副主任单位，参与区块链技术参考架构等多个国家标准的制定，在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简称金标委）的支持下推动区块链技术的评估规则、安全规范、互联互通、贸易金融等相关行业标准的制定。

三、区块链技术在数字金融领域面临的六大技术挑战

虽然区块链技术在全球数字金融领域已经拓展很多应用场景，但仍面临一系列的技术挑战。

（一）体系架构方面，性能和可扩展性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关注侧链、多链、硬件加速、链上链下协同等解决思路。

（二）隐私保护方面，目前零知识证明、同态加密、安全多方计算、联邦学习等主流隐私保护技术局限性还较大，还需要从理论层面创新，也需要从工程技术方面进行创新。

（三）信息安全方面，区块链面临自主可控、开源许可、量子计算等挑战，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安全技术创新，包括智能合约、形式化验证、合约安全以及分布式身份标识（DID）等方面。

（四）监管审计方面，区块链的节点里有很多都是匿名化和密态化，去中心难以监管，我们可以通过隐私保护技术和监管探侦技术结合，实现穿透式监管。

（五）融合集成层面，区块链和传统技术的集成和兼容性有待加强，存在技术摩擦，需要加强区块链基于传统技术的继承改良研究，以及与新技术的融合创新研究。

（六）标准体系方面，区块链互联互通性较差，核心技术标准与应用标准不够，需要加大互联互通标准体系的建设力度。

四、区块链可从八方面破局重塑数字金融

展望未来，面对机遇与挑战，为推动区块链技术助力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未来可以从八方面进行破局。

（一）基础理论方面。加大基础理论研究，数字金融技术实践往往快于技术理论的发展，需要加大体系架构、可信技术、共识算法、密码理论等方面的技术理论创新。

（二）核心技术方面。打造核心技术，包括智能合约创新、区块链的网络技术、芯片和硬件，以及跨链、监管审计、威胁监测等。

（三）标准支撑方面。制定核心技术标准，建立标准体系，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四）专项示范方面。积极推进重大专项和示范应用项目，通过示范项目撬动并引领产业。

（五）产业协同方面。加强政产学研用联合攻关，协同拓展场景，推动从科学研究到技术应用的衔接和转化。

（六）人才培养方面。加强技术和业务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加大战略人才资源储备，形成人才梯队。

（七）在生态共建方面。建立全球生态系统，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和协同效应。

（八）政策和资源保障方面。推出产业引导政策，提出技术创新、成功转化和激励机制，并形成国际化的协同机制。

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是中国人民银行直属事业单位，根据国家战略部署和中国人民银行的整体工作安排，承担国家法定数字货币研发，专注于金融科技的创新发展。数字人民币从 2019 年末开始试点，目前已经在 10 个地区及 2022 北京冬奥会场景进行试点。2021 年 7 月，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我们愿意继续以开放包容的姿态与国内外相关机构加强数字货币、区块链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大型数据平台给金融领域带来的三个新挑战

■ 悉达多·蒂瓦里 / 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首席代表

悉达多·蒂瓦里

数字化经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大型数字化平台企业的崛起，我们称之为大型科技公司、大型数据平台。这些大型数据平台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作用无处不在。

大型数据平台进军金融服务领域的势头非常强劲，国际清算银行（BIS）一直密切关注这一领域的动态和发展。在支付、信贷、保险管理方面，大型数据平台如何在世界各地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过去几年中，大型数据平台的移动支付业务已经占中国移动支付的 94%。2020 年数字化平台的贷款业务上升了 40%，在全球已经达到 7000 亿美元的贷款存量。而且这些大型数据平台的服务在金融领域的渗透率越来越高，为广大的金融消费者带来诸多益处。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大型数据平台上的信贷企业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来快速发放贷款，特别是帮助中小型企业获得贷款。

国际清算银行有一项研究项目报告，是关于香港虚拟银行业务发展的，我们称之为“信息资本”，即把不同的信息汇总在一起能够产生收益的资本。因为在进行借贷时，数据和信息是非常关键的要素。大型数据平台降低了信贷的成本，进一步推动了全世界普惠式金融的发展。

但是，大型数据平台也给金融领域带来三个新的挑战。

第一，对于各国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来说，第一个直接挑战就是金融稳定。大型数据平台在使用数据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带来了网络效应。例如，亚马逊、微软、谷歌和阿里巴巴这四大平台，占全球云计算服务的三分之二，这对金融业务来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云服务有着巨大的好处，能够让机构和散户提高效率。但是整个金融行业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这几个巨头，使得金融体系更加容易受到威胁、攻击，而且单点的失效就会牵一发而动全局，也更容易遭受网络攻击。

第二，是公平竞争领域的挑战和反垄断领域的挑战。各国都在面对这一挑战，尤其对反垄断执法机构来说更是如此。大型数据平台拥有多个方面的竞争优势，这得益于它们的商业模式以及它们的网络，也得益于它们领先的技术。在很多情况下，由于有些国家和地区的监管不足，或者存在监管套利，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第三，数据治理的挑战，尤其是对于数据监管机构来说。这些大型数据平台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取金融消费者的数据，因为数据或信息本身就是一种资本——“信息资本”。数据资本、信息资本对于大型数据平台的商业模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这三大挑战都需要公共决策部门作出回应。公共管理部门的目标绝不是要遏制创新，而是要在金融行业促进创新。这样的创新才能够符合公众的利益，同时能够在创新带来的益处和潜在的风险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

浅谈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

■ 夏乐 / IFF学术委员、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由国际清算银行（香港）创新中心、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央银行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共同发起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2021 年 11 月初，这个项目发布了用例手册，介绍项目的应用场景及测试进展。

中国在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和试用方面一直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数字货币的研发产生了兴趣，投入的资源也越来越多。美联储以及欧洲央行都认为央行数字货币将会成为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并投入了很大力量进行相关研究。中国的数字人民币现在已经进入试用阶段，2022 年北京冬奥会是一个集中应用场景，非常令人鼓舞。

央行数字货币的功能是有一些差别的。冬奥会中试用的央行数字货币称之为“数字人民币”，其性质更多的是一种零售型数字货币。所谓零售型数字货币是指使用者是个人消费者，用小额的支付来购买小额的商品。在使用过程中，它将给使用者带来很多便利。但其实对中国人来讲，它并不是非常稀奇，因为国内早已熟悉并普遍使用了一些线上移动支付工具，包括支付宝、微信支付、银联等。央行数字货币提供了更多的支付选择，其未来的应用场景也将更加丰富。

很多人提出是否可以利用数字人民币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我认为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是不适合作为主权货币向海外推销的。因为在推动货币国际化过程中，将会面临其他国家货币主权的冲击。试想一下，如果跟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小国家开展贸易时使用数字人民币，其国民都可以开设数字人民币账户，享受数字人民币交易的便捷，将会导致该国无人再愿意使用本国货币，对该国货币主权造成严重冲击，当然这是个极端例子。

夏乐

世界银行、IMF 以及国际清算银行在全球的调研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在欢迎数字货币的同时，也担心其国家货币主权遭受其他国家数字货币的冲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结果。

世界银行、IMF 以及国际清算银行在全球的调研中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国家在欢迎数字货币的同时，也担心其国家货币主权遭受其他国家数字货币的冲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结果。

所以，我认为目前数字人民币应该主要用于零售，特别是可在国内小额使用，而不应该急于把它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工具向海外推行。

数字货币技术能否推动中国货币的国际化呢？现在除了零售型数字人民币，央行的数字货币研究所已经开始合作开发批发型数字货币。这种批发型数字货币就是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这是几家央行合作开展的国际交易和结算。这里面有很多种场景，包括国际贸易、外汇买卖、跨境电商，甚至有供应链金融，这些都可能涉及跨境支付的应用场景。在这个背景下，各国央行共同研究如何用数字化的系统来帮助双方进行更快的结算。

批发型数字货币的优势主要有三项。第一，对于效率的提高是非常明显的。现有的研究项目显示，交易完成的时间可节省到之前的三分之一。第二，之前很多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小规模银行，通过央行层面的合作开始联系起来，它们协助自己的客户进行结算、跨境支付。这对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有很好的促进。第三，减少对其他货币的依赖性，特别是对美元、欧元这类“国际硬通货”的依赖性。

从披露出来的信息看，目前已在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整个试用过程中，很多私营金融企业参与进来。批发型数字货币发生在各国央行之间，好处在于它不会直接对其他国家的货币主权产生影响，因为它是一个双边结算的过程。以前双边结算是由民间机构通过国际银行机构，包括国际资金清算系统 SWIFT 来完成的。未来通过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可以由两国央行直接协助自己辖下的商业银行进行结算。

批发型数字货币的优势主要有三项。第一，对于效率的提高是非常明显的。现有的研究项目显示，交易完成的时间可节省到之前的三分之一。第二，之前很多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小规模银行，通过央行层面的合作开始联系起来，它们协助自己的客户进行结算、跨境支付。这对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有很好的促进。第三，减少对其他货币的依赖性，特别是对美元、欧元这类“国际硬通货”的依赖性。

现在进行外汇交易时，经常需要借助美元。比如中国想买泰铢，需先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再用美元换泰铢，事实上美元充当了“中介货币”。这一做法的好处是，选择一个相对稳定的货币进行中介交易能够避免损失；不好的地方是几乎所有的交易都加深了对美元的依赖性。未来，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就能避免美元成为外汇交易的“中介货币”，两家央行直接交易，人民币兑换泰铢就可以直接进行。这个项目对于未来国际金融系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因为它将会极大地削弱美元、欧元等作为“中介货币”存在的意义。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未来还需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商业银行之间有互相提供信用的信用行为。这种交易清算分为有货的和有钱的，到底是谁先把东西交给对方。以前是通过商业银行来完成，必然会涉及商业银行之间的信用行为。现在上升到央行的层面，在交易过程中虽然有很多办法避免所谓的信用风险或者说是对手风险，但无论如何，在交易过程中由于央行之间有信用行为的存在，必然会有信用风险。我们倾向于认为所有的央行都很负责任，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但是未来这方面也是需要研究的，即如何控制央行之间发生信用风险的可能性。

第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能够大大提高交易结算效率，但是也必然会对目前使用最多的商业银行间结算系统产生影响。由于央行参与到跨境批发型数字货币的开发和使用中来，所以央行一方面既是裁判者，另一方面也是运动员，如何平衡央行这两个不同的角色功能？到底是把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做到完全替代原有模式，还是把它做到一定规模，然后让二者以传统渠道和创新渠道形式共存？这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竞争。

第三，金融危机在国际上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之前出现金融危机的时候，各个银行会把自己原有的结算渠道砍掉，当然这对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来说很痛苦，但这是一个避免金融危机向全球蔓延的机制。未来通过数字货币桥项目，把各国中央银行连接起来，通过中央银行进行国际支付和结算，但是如果出现金融危机，应该怎么样应对？是否预先设定一个标准，在某种情况下，货币桥需暂时断开或者终止，以避免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这些问题都值得在未来货币桥项目的研究和测试中进一步深入探讨，取得共识。

数字金融落地应用的三个层次

■ 肖风 / 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肖风

从投资、商业机会、应用等角度来看，数字金融落地应用可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数字化技术，包括区块链、AI、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最低的层次可以把它看成工具，作为工具来说，它可以改进现有的金融服务模式，比如用 AI、大数据对客户进行画像，对银行、金融机构现有的风险管理模型做改善。数字化技术不会创造新的金融活动出来，但是可以改善传统的金融服务模式。总而言之，在工具层次数字化技术最主要的用途是基于客户画像的风险管理。

第二个层次是应用区块链技术做供应链管理、供应链金融，这是目前数字金融两个比较主要的用途。这是把它当作一个工具最起码、最基础层面的应用。但同时，可以把数字化技术提升一步，用这些技术搭建新的金融服务场景。如果缺少这些技术，传统金融机构从事某些金融活动会受到限制，或者说没有这些技术，可能无法提供一些新的金融服务。通过一系列的数字化技术搭配构建一个全新的金融服务场景，在这个场景里能提供原来不可能提供的新金融服务方式。

上海万向区块链股份公司用“区块链＋物联网”技术，把肉牛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生物资产进行数字化之后，让银行能够安心地接受一头活牛作为抵押物，养牛户可以把牛抵押给银行来获取贷款。在没有这些技术之前，银行是不可能接受一个有生命的动物作为资产抵押而发放抵押贷款的。在此之前，银行给所有的养牛户都有一个信用额度，20 万或者 30 万。在甘肃、青海、新疆，不管你养多少头牛，一家最多只能得到 30 万的信用贷款。可是一头牛犊都需要 8000 到 1 万块钱，育肥之后能卖 2 万。牛犊成长的这两年，其增值额实际上是非常大的，但是养牛户无法利用这个增值，把它变成一种资产去银行做抵押扩大再生产。

上海万向区块链股份公司设计了一个不可拆卸的、有很多传感器的项圈戴在牛的脖子上。这个项圈里面，第一有电子身份；第二有电子围栏，养牛场有一个物理空间来定位，牛跑出这个空间，我们就知道牛可能是走失或被盗了；第三有计步器，记录每头牛每天走多少步；第四有体温计，可以实时监测牛的体温，如果牛的生命体征没有了，显然该抵押资产出了问题；第五，有体重测量仪器，牛从那里经过的时候，项圈感应器可以将感应到的体重记录下来。银行可以通过查看传感器项圈的各种数值，获知牛这个风险资产到底是改良了还是恶化了。如果牛每个月都增长 20 斤、40 斤肉，显然该抵押物每个月都处于风险资产改良的过程中。

收集这些数据监测风险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所有的传感器都汇聚到区块链上，数据一旦被采集就同时显示在链上。区块链最基本的特征是不可篡改、不可撤销、不可删除，因此银行相信链上的数据是真实的。所以，银行开始接受以活牛作为抵押物向养殖户发放贷款。一头牛经过“区块链＋物联网”项圈就可以在银行抵押、贷款一万元。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的 2000 头牛参加了试点项目。到目前为止，该项目在山东非常著名的曹县发放了 7000 头牛的贷款。现在正在迅速地扩大这一试点项目。

这是一个用数字金融技术做普惠金融，实现乡村振兴的真实案例。如果没有“区块链＋物联网”技术，银行不可能接受一头活牛作为抵押物来发放抵押贷款。养牛是一个很古老的行业，有了数字金融技术的支持，养牛的规模可以扩大，获得贷款、金融支持的规模也随之扩大。把这些数字化技术组合起来，就可以创造出新的金融服务场景，没有这些技术，这些场景是不可能存在的。

我们在云南做的一个项目，是用“区块链 +AI”做普洱茶的溯源和存证。任何一个普洱茶压制成茶饼之后，茶饼的纹理是很难被模仿和重复的。要重造一模一样的茶饼纹理，成本可能是几万元，不可能有人去做。因此，如果将普洱茶压制成茶饼后，用照相机把茶饼的纹理拍出来，把数值、纹理的数据同步到区块链上，这件事就完全可信，不需要任何第三方鉴定。在 20 年之后把这个饼茶送给你，告诉你这是 20 年前的茶，你只要打开我们开发的 APP，用新拍下来的茶饼纹理照片与 20 年前区块链上的饼茶纹理做一个比对，就可验证。

我们用 100 万张普洱茶的纹理照片训练图像识别的 AI 算法，现在已经能根据一块只剩下三分之一部分的普洱茶饼，溯源出其生产日期、生产者以及存储地址等信息。经过溯源能证明普洱茶的年代久远，对于茶农或投资者而言，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品，因为它每年肯定有 10% 以上的增值。这套“区块链 +AI+ 图像识别技术”，对茶农、对云南的普洱茶、对云南的乡村振兴或者扶贫来说，就是数字技术的巨大赋能。这是第二层次，我们在这方面有非常多的案例。

但这仍然不是数字技术能够给金融带来的最大变化，我认为它还可能给金融带来第三层次的变化或者说最高层次的变化。该变化是基于区块链等一系列数字技术的数字货币以及基于数字货币支付系统的新金融基础设施。这些新的金融基础设施是在数字化技术加持之下才有可能被构建出来的。

在这些新的金融基础设施上将出现新的金融市场体系。数字货币，不管是中国央行的零售型数字货币，还是正在研发的批发型数字货币，都在构建一个新的货币市场体系。这个货币市场体系和现有的货币市场体系、金融市场体系、资本市场体系有着巨大的不同，在技术特性上有本质的区别。

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民银行是基于 M0、现钞、现金来发行数字人民币，但这只是中国人民银行数字人民币的 1.0 版本，相信它将来会走向批发型的 2.0 版本或者 3.0 版本。它会从仅专注于零售支付体系的建设走向批发，甚至走向其他更广泛的数字货币市场体系，去发挥作用或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数字金融峰会学术讨论

主持人：张　媛，第一财经制作人、双语主持人
嘉　宾：李东荣，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
周延礼，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
狄　刚，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副所长
悉达多·蒂瓦里，国际清算银行亚太区首席代表
夏　乐，IFF 学术委员、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肖　风，中国万向控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张媛：肖风董事长刚才提到养牛的案例，我知道您在万向区块链实验室做了很多的创新，有丰富的创新场景。就我理解，您探讨的核心是技术如何有效地与场景进行结合。无论是养牛还是种普洱茶，其实都是零星摸索中的实践，还没有出现广泛的现象级应用。您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能够让以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为代表的这些数字新技术，能够普遍地应用于场景，助力数字金融发展？

肖风：我刚才讲了一个新技术的三个层次，最高的一个层次是把它看成一种制度变革，它的影响会非常广泛，甚至对现有的金融市场体系、货币体系产生某些颠覆性的影响。因此，必须一点一点去尝试去摸索，不能头脑发热，不经过观察和体验技术带来的影响，就大规模大干、快上，在金融市场里这显然是不可以的。一定是先把新技术做成工具，在现有的金融市场体系里做边际效益的改善，逐渐去构建一些新的场景，最后才会涉及到制度上的变革或颠覆性的商业模式创新。现在确实有很多人问，为什么区块链或者其他数字技术没有出现杀手级的应用。我认为假以时日“杀手级”的应用一定会出现，因为它涉及到金融市场体系。从金融稳定的角度，从普惠金融的角度，这些东西不可能一下子被颠覆。

另一方面，从 AI、区块链等技术创新的角度来看，我们所改造的是一个经历过几百年风风雨雨、经历过金融危机考验，是人类积累了很多经验教训才搭建起的金融市场体系。无论是监管还是金融机构的商业模式，都是这么搭建起来的，这些经验都是值得尊重的，不能以为有新技术出现，这些东西就不存在了，风险就不存在了，或者以前的经验就可以完全作废了，完全不是这样的。无论从技术的角度，还是从创新者的角度，我们都要敬畏市场，要真正地理解为什么金融市场是今天这样一个架构。在现阶段，在现有技术情况和市场状况下，它的存在是合理的。

张媛：技术究竟在哪些维度可以被应用，以及应用到什么程度，必须要结合实践来谈。在金融科技领域，在科技与金融相融合的过程中，其实学术界和产业界的关注点是有差异的。现在数字货币应用的场景其实还局限在试点摸索阶段，或者我可以理解它还处于监管沙盒的状态，还没有普遍应用。关于技术和产业之间的融合，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夏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目前零售型数字货币在中国已经试点了一段时间，但是还没有大规模地推广。据我了解，在试点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技术或其他方面的问题，当然这是好事，我们就是要通过试点来发现问题，然后再解决问题。

但是我个人认为，这种零售型数字货币的推广或者大规模使用，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特别是在中国。因为绝大部分的国民对于电子支付、移动支付方式并不陌生。其实数字货币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给大家增加了一个支付方式的选择。

另外，监管者更多关注的是金融稳定，比如数字货币推出后，是否会对现有线上支付提供商造成冲击，是否会对目前的基础设施、市场结构造成冲击。我认为只要通过一些精心的设计，建立好防火墙，建立好防护栏，数字货币的推广其实并不遥远。当然，我是指我们国内的零售型数字货币。也许到冬奥会结束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中国数字货币推广到更多的试点，会有进一步更好的发展。

张媛：谢谢夏教授，您对未来充满信心，但也提出在抵达未来的过程中需要精心设计，需要一步一个脚印。数字技术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兴起，国际合作是大势所趋。悉达多·蒂瓦里先生，目前互联网数字化生活已经走入千家万户，IT 革命也给世界带来了巨大变化。如何看待监管在其中的作用？

悉达多·蒂瓦里：以一种安全的方式引入创新技术，所有国家都非常注重“公私合作”模式。我这里所谈的“公私合作”的“公”，指的是公共部门中的监管部门，所谓“公私合作”，是指在监管的框架之内，私有部门进行技术创新，给予消费者最优、最高效的选择。例如，无论是用牛作为抵押品获取贷款，还是对普洱茶进行溯源，这些事情都是由企业来具体实施的，只要有一个监管的框架，它们就能在其中发挥作用。

同时，也要对现有的监管规则进行调整和适应化，要适时推出新的监管规则。中国、欧盟和美国这几个经济体的监管机构，关注的焦点是确保公平竞争、做好数据治理以及促进金融稳定。

首先，促进公平竞争。监管机构在这方面能起到关键和决定性作用。监管机构通过事后监管和事前监管相结合来确保市场的公平竞争，比如中国的反垄断法实施细则——《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以及欧盟的数字市场监管法律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其次，做好数据治理。数据治理方面要保护好个人的数据隐私权，特别是个人化的内容和数据的可迁移性。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最后，确保金融稳定。显而易见，当今金融和非金融企业之间的界限正在被快速地模糊化，越来越多的非金融企业在开展金融业务。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需要对金融业务实施牌照管理，很多人将之称为基于业务的监管，而不是基于企业实体的监管。

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二大部分是和支付体系有关。支付体系中的工作是要确保消费者能够更便捷、更透明、更可靠地进行支付。央行要进一步扩大支付服务的可及性，一方面要提升国内的支付体系，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提升跨境的可操作性。在欧盟以及更广泛的范围内，已经有 59 个不同的零售支付体系，现在的快速支付体系能够做到全年 365 天 24 小时全天候安全管理，它能够帮助央行数字货币在流动性以及完整性方面做得更好。

国际清算银行（BIS）近年来一直关注数字货币方面的研发，用科技引领私营企业在数字货币、数字科技方面走在前沿，给各国央行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为亚洲地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解决金融行业中的一些具体和实际问题，并且能够使得科技真正促进模式上的转变，而不仅仅是增加一点附加值而已。

刚才我们的嘉宾介绍了数字货币桥项目，中国央行、阿联酋央行、泰国央行、新加坡央行、马来西亚央行等参加了该项目，多国央行共同协作，使数字货币桥的项目更加完善。通过探索、了解各个国家不同的法律机制和组织架构，积极促进私营机构不断创新，进而推动整体模式性的转变。

张媛：感谢蒂瓦里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介绍，国际

清算银行是希望世界各国央行团结起来，建立一个有韧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当然您也给我们介绍了新科技的使用，并且在不同的地区都有创新的枢纽和核心。您刚才所说的这些远景如何能够真正实现，如何降低交易的风险？

悉达多·蒂瓦里：我认为国际清算银行使用的是全球的平台，而不是一个地区的平台。需要所有央行的相互协作，包括和监管机构、国际金融机构以及学界进行协作。如果仅仅是其中一个国家或一个利益相关者参与，就会出现我们在一开始讲的那些问题，比如整个系统的四分五裂，无法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方案来解决这些挑战和问题。现在这些创新中心已经意识到要建立多层次的合作伙伴关系，这样就能够在一起协作努力。

当然，这些创新中心可以和标准设定机构来共同协作，比如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以及有关付款体系的国际组织和机构。我们可以把各自提出的倡议推广到G20，甚至推广到全球范围，使得这些项目能在世界各地落地。我们现在所说的工作是由各个不同层次的工作组成的，因此我们要有自己的矩阵和方法，要将各方的努力都集合起来，这样才能够为私营机构的创新提供充分的动力。

张媛：面对不确定性，蒂瓦里谈到的关键词其实还是合作，但是因为现在技术和场景之间存在一个“AI+”，还有“+AI”，技术要找到场景，场景要构建生态，这是双向奔赴的事。前面我们提到要内生改良、外部赋能，肖先生，从您的实践来看，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探索？您认为其中重大的机遇在哪里？

肖风：技术逻辑和业务逻辑之间虽是融合的，但同时它们之间也会产生冲突。十多年以前，互联网公司曾经创造了一个名词叫“互联网 +”，但是那时候传统金融机构的金融家们会说成“+ 互联网”。因此，后来无论出现“互联网 +”还是“+ 互联网”，大家都会有很多争论。其实这个争论到现在为止，它本质上还是技术逻辑和业务逻辑怎么样更好结合的问题。

我前面也特别提到过，技术方对现有的体制、市场结构要有敬畏之心，因为现有的体制、市场结构之所以存在，是无数次的经验萃取出来的一套相对合理的状态。有了新的技术，对业务逻辑非常了解的资深金融家或者金融机构，要明白新的技术有可能带来三方面的变化，它既可以是“+ 互联网”或者“+ 科技”，也有可能是“科技 +”。所谓“+ 科技”，也就是把它当工具用，更好、更精准地为客户画像。因此，改良了风险管理的模型，使得坏账率降低，这当然是一个好事；用区块链做供应链管理，使得供应链金融能够做得更好、坏账率更低、发放贷款更及时，那当然是好的，这就属于“+ 互联网”或者“+ 科技”、“+ 数字化技术”。但是数字化技术并不仅仅是停留在这个层面，技术逻辑有可能改变金融市场的底层逻辑，可能会重构新的金融基础设施。就像数字货币带来新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变化那样，那个时候，科技在里面起到主动作用的比例要更大一些，是推动变革的催化剂。

从业务逻辑来说，时代一直在变化，新的技术层出不穷，而金融服务的需求可能数千年都不变。存款、贷款、汇款或者支付、交易，这些需求都存在，但是满足这些需求的方法时时刻刻都在变。例如，我们现在肯定不会拿着银元去小酒馆里支付酒钱。满足需求的方法、形式一直都在变，而这种变化是由技术带来的。为什么在中国出现了纸币，看上去是金融需求，但其实它和技术进步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不够精良，纸币流转几次，印在纸上的数字和文字就模糊了，甚至纸币本身就烂了。

造纸术、印刷术等科技的进步，使纸币的使用成为可能。因此从业务逻辑角度讲，如果拒绝技术的使用，被淘汰的肯定是自己。作为一个金融用户，不管服务是谁提供，我只要最好的，如果你不能提供，自然有人会提供，需求是不变的，满足需求的方式永远在变化。

张媛：感谢肖总。现场在座的嘉宾都是各领域的专家，几位嘉宾都提到，要找到真实的需求，与时俱进。虽然现在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是坚定向前推动国际合作，这是确定的。

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讨论分享到此结束。

财富管理峰会

贝莱德中国区负责人 208
汤晓东：财富管理市场的变化及可持续投资的重要性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总裁 210
李彤：中外财富管理的对比及展望

国投瑞银基金总经理 212
王彦杰：数字金融对财富管理市场的冲击和变革

华安基金总经理 214
张霄岭：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变化与发展

财富管理峰会学术讨论 216

财富管理市场的变化及可持续投资的重要性

■ 汤晓东 / 贝莱德中国区负责人

过去的十年对于中国资本市场来说，是前所未有加速开放的十年，也是充满变化的十年。一方面，监管机构日益加深对市场规范化、透明化的管理。资管新规出台以来，财富管理逐渐转向净值化，在防控风险的同时，真正促进财富管理市场投资于实体经济，为投资者提供市场化的收益。另一方面，随着资本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对境外资本的限制不断放开。投资境内资产的额度限制逐渐放宽，股票市场交易的互联互通， 如沪港通等机制丰富了跨境投资的平台和渠道。

在牌照方面，从开放外商独资公募，到允许外资机构控股公募基金、证券公司和合资理财公司等一系列举措，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境外机构在华业务的设立和海外经验的引入。这些变化令我们备受鼓舞，这样的变革趋势让我们信心倍增，也为财富管理机构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随着中国居民的收入不断增加，如何强化其长期投资意识，增强居民对财富管理的认知与理解，最终促进财富从增值向保值转变，将是未来财富管理机构需要不断探索的新方向。目前，中国长期资本配置市场的大部分资金仍处于储蓄、房地产等资产中。随着资本市场制度日益完善，如何通过丰富、创新的投资产品吸引长期投资资金入市，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养老金投资产品是引导长期投资文化的一个有效解决方案，并且能帮助中国积极应对亟待解决的养老难题。

目前中国的养老金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主要以第一支柱为主。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据预测，第一支柱在 2035 年之后将难以支付退休人口所需的养老金数额。另外，中国居民对储蓄的偏好，并不足以保障其未来的养老生活。因此，第三支柱的个人养老产品，将在促进储蓄向养老投资转化以及建立长期投资理念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未来，具有保障本金、拉长投资期限、满足各年龄段人群养老需求的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能够帮助中国居民实现资本的长期稳健增值，使中国居民真正拥有体面的退休生活。

汤晓东

同养老金投资一样，可持续投资是当下具有高度社会性意义的投资主题，也是资本市场重新配置中一项重大的结构性变化。根据贝莱德在全球范围内的测算和观察，这一投资趋势已经深深影响到资产与财富管理行业，客户对投资组合的需求改变。预计到 2025 年，贝莱德全球客户可持续投资的资产规模，在其投资组合中的占比，将会从 2020 年的 18% 升至 37%。投资者对可持续投资的重视，不仅仅在于其对环境、社会和治理的正向作用，更加在于可持续投资带来的超额收益，尤其是在市场下行时，可持续投资策略被证明更具韧性。在此基础之上，财富管理客户对可持续投资的需求，在投资主题、策略、风险与收益等方面各有不同。随着可持续投资在中国越来越受到政府和监管层面的关注，如何将其系统、有效地纳入自己的投资解决方案，提供符合不同客户需求的可持续投资策略，将是未来中国财富管理机构需要思索的发展方向。这不仅仅需要数据、技术及分析工具的支持，更需要机构自上而下地在内部贯彻 ESG 评级体系，将其与各个策略的投资流程及风险管理进行有机结合。

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是当下可持续投资的重要动因之一，其风险将覆盖世界各国。因此，抵御气候风险、实现净零目标、推动未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需要世界各国通力合作的重大举措。据贝莱德测算，在未来 20 年，净零转型可将世界经济累计 GDP 增速提升 25% 以上。目前，中国政府通过实现“双碳”目标，有力推动全球净零转型，其监管机构对绿色金融的推行力度领先于全球其他国家。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各经济体的气候行动。

气候变化给我们带来危险的同时，也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资本市场联通全球、吸引私有资本的作用，将成为净零转型过程中技术及基础设施等领域的重要融资渠道。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看到越来越多的财富管理机构关注气候变化这一投资主题，将气候相关因素纳入投资策略。同时完善与气候相关信息的披露程序，深化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互相信任，帮助投资者在获得优异回报的同时，让投资者拥有更多元、透明的选择空间。

2021 年是中国财富管理行业收获满满的一年，也是贝莱德在华业务里程碑式的一年。我们很荣幸成为首家获批在华同时设立全资公募基金及合资理财公司的国际资产管理机构。期待未来能深化与监管部门和中国本土机构的合作，携手推进资本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为中国机构提供更丰富、更优质的投资解决方案。

中外财富管理的对比及展望

■ 李彤 /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总裁

李彤

财富管理业务满足社会大众对财富保值增值和代际传承的需求，且能够对国民收入结构和资产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中国经济进入到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需要增加全体人民的财富，与财富管理业务密不可分。在新发展阶段，我国财富管理业务也应更强调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满足更多普通家庭，特别是广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财富管理需要，让更多群体通过专业机构提供的资产管理服务来增加财产性的收入，共享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带来的成果。海外经验也显示，财富的增值传承与捐赠、慈善活动密不可分，这是有助于发展和促进第三次分配的。

未来增加中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来源有两个重要抓手，第一个抓手是金融市场的资产管理功能，大力发展共同基金等财富准入门槛相对较低、由专业市场资本机构管理的资产管理业务。第二个抓手是要做大做强资本市场，发挥资本市场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和直接融资服务科技创新的独特优势，通过优质企业的成长和创新，为投资者创造较好的长期回报。

财富和资产管理业务同时满足居民的财富保值增值需求和不同层次的企业融资需求，是资本市场的资金提供者和市场交易者，关系到资本市场的资金配置方向和资产定价效率。财富业务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能够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而中等收入群体一般是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的主要投资群体，这有助于形成长期投资、理性投资的健康市场关系，为资本市场特别是股权市场的发展提供支持。这个支持对中国的科技自立自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会为经济创新转型提供长期的投资资金来源。

中国财富和资产管理业务起步相对较晚，但是近几年发展非常迅速。根据中国银行业智库 BCG 的统计，中国是全球第二大资产管理市场。2020 年底，不包括理财在内的内地资本市场规模 AUM 是 9.4 万亿美元，此外香港资产管理业务规模是4.5万亿美元，其中包括近1.5万亿美元的私人银行和私人财富管理。中银国际是做私人银行业务的，也在这个范畴内，香港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私人财富管理中心。2020 年纳入银行理财和部分非标业务后，在岸总资本规模 15 万亿美元左右，其中银行理财 4 万亿美元，公募基金 3.1 万亿美元，私募基金 2.6 万亿美元。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日益成熟，直接融资比例不断上升，科技创新上市企业的持续成长。与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的互联互通，使我国投资人能够在全球市场进行优质的资产配置，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等专业的资本市场机构能够较好地贴合家庭增配金融产品，特别是股权产品的需要，将在推动共同富裕、发展直接投资、支持经济转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财富管理不仅仅是让财富增加，它对社会进步也具有积极作用。

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家庭在通过持有共同基金等各类资管产品来实现从教育、购房到养老等一系列家庭财务目标的同时，还参与美国的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市场，管理规模大概是 45 万亿美元，其中 65% 是美国共同基金和各类的 ETF。美国家庭对共同基金的依赖是较高的，将近一半的美国家庭持有共同基金，共同基金和 ETF 合计管理着 23% 的美国家庭金融资产，其中包括非常重要的美国居民退休账户。根据央行的调查，中国城镇家庭资产中只有 2.3% 是各类股票、基金和债券产品，也就是金融产品在中国家庭财富的资产配置占比是相当低的，房产占比最高。

2020 年中国开放式公募基金中有 40% 是货币基金，股票型基金只有 10% 左右，混合型基金占比是 22%。国际上，美国共同基金中的 80% 以上是非货币基金，50% 左右是股票基金。参考国际同业经验，可以预见，伴随着未来中国家庭金融财富配置需求的增加，通过更多地持有由专业机构管理的权益类资产，将是广大社会群体分享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红利的重要渠道。鼓励社会各收入群体参与到财富和资产管理市场，也是中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

成熟的国家资管中，20% 左右是养老金，而且养老金里面一半投资于美国的共同基金，以此进行跨生命周期的现金流管理。开展市场化的养老保障，中国面临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养老金的支出压力较大。而养老金的可持续性和较高的养老金替代率，不仅是发展银发经济的物质基础，更是使现代年轻人安心消费的关键前提。国际经验显示，单纯地依靠储蓄恐怕很难抵抗通胀，满足未来养老消费支出，需要财富管理提供长期收益。过去几年，中国的社会保障基金通过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投资取得了较高的收益率，增加了社保体系的财富储备。因此未来鼓励居民通过财富管理业务进行养老储备，发展养老金第三支柱，将有助于减轻养老的财政负担，保证养老体系的可持续性。

展望未来，财富管理业务将成为拉动中国金融行业增长的新引擎。财富管理业务一直是中银国际的重点业务，从 2009 年开始，中银国际在香港为客户提供高端私人银行服务。虽然开办的时间不长，但是成长性还可以，中银国际连续五年被评为亚洲最佳私人银行，也是中资机构里面唯一的一个。中银国际旗下另一个公司是保诚资管公司，它是为香港管理养老金的。香港有一个养老金叫强基金，保诚在强基金的管理份额里面的占比是较高的，所以中银国际非常关注这个市场。

未来发展财富管理业务，一是需要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理念，着力提高投研能力和风控能力，按照“know your customer”的原则来匹配客户需求。

二是适当地引入普惠金融的发展理念，通过金融科技手段增加对长尾用户的覆盖。

三是将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纳入投资框架，这是大家的共识。通过探索投资收益率的长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挖掘经济转型带来的新增长点，实现业绩回报与服务实体经济之间的平衡。

四是推动财富管理与国际市场同业接轨，满足财富投资者全球化资产配置、跨境分散投资风险的需要。跨境理财通业务 2021 年 9 月份在粤港澳大湾区宣布试点，正式为跨境财富管理业务的发展提供新的机会。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发展阶段，财富管理业务即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也需要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只要不忘以人为本的初心，牢记服务实体经济的使命，中国的财富管理业务一定能够行稳致远，越做越好。

数字金融对财富管理市场的冲击和变革

■ 王彦杰 / 国投瑞银基金总经理

王彦杰

随着市场的演进，也是监管风险防控的需求或者说传统金融行业对于竞争压力的需求，下一个阶段，传统金融行业将逐步通过数字化转型重新回来，再重新争取一些新的客户，这个现象正在发生。

未来财富管理市场的生态有两个重要变化，可能会给整个市场带来质的变化。第一是财富管理的数字化，第二是 ESG 理念的推动。

一、财富管理的数字化

中国财富管理市场的确有增长潜力，现在国内的状况跟 20 世纪 80 年代左右的美国是比较接近的。从财富管理的角度来看，它体现为两个特征，第一是居民财富的累计正在快速增长，第二是居民的资产配置结构正在发生比较大的改变。居民对金融产品的需求正在快速增加，这是从海外市场可以得到的借鉴。

中国市场还有一个明显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国内整个金融行业本身的科技氛围是比较浓厚的，这就造成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中，互联网跟金融行业的界限是比较模糊的。互联网巨头不断跨入金融市场，在金融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力。

随着市场的演进，也是监管风险防控的需求或者说传统金融行业对于竞争压力的需求，下一个阶段，传统金融行业将逐步通过数字化转型重新回来，再重新争取一些新的客户，这个现象正在发生。

另外从客户本身需求的角度来看，国内互联网的普及性、便利性在全球是属于领先水平的，更多的客户或者说投资者慢慢地习惯了在互联网上的便利，他们希望这种及时性、便利性特征能够在金融服务上获得满足。种种原因结合起来，财富管理的数字化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怎样定义财富管理的数字化，这当中包含三个核心要素。怎么样通过推出金融产品以及客户服务，叠加科技力量给投资者提供更全方位的服务。理财服务其实是传统金融行业都在做的事，加上科技力量之后，整个服务模式会产生结构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与之前有很大的不同，可以从以下四个角度来分析具体差异。

第一就客户的价值体验来讲，数字化的财富管理是通过数据挖掘以及技术的创新来实现为客户提供智能投顾服务的。它跟传统的财富管理即通过客户专员或者投资顾问提供面对面的服务，其实是有很大差别的，它是覆盖更全方位的服务。

第二从服务的客户群来讲，互联网金融刚开始定位的客户属于对价格敏感性比较高，对改易的便利性要求比较高，同时对新事物的接受度也比较高的客户群，它跟传统的财富管理锁定的客户群，即有一定高净值且服务综合性要求比较强的客户群，是有很大的差别。但是随着数字化的推动，某种程度上早期互联网金融帮助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扩大了客户群。有很多过去没有被传统金融机构覆盖的客户，现在也进入到财富管理的市场。

从国投瑞银基金的经验来看，越来越多的高净值客户也感受到数字化服务的便利性，所以也逐步地通过数字化平台来做交易、做投资，线上跟线下慢慢地融合、互存共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

第三是从产品层面来讲，在数字化的早期，客户喜欢的都是比较单纯的、清晰明了的、简单的产品。因为传统的财富管理产品主要是在银行服务渠道销售，所以产品比较多元，复杂度是比较高的。提供这种差异化的产品，导致与投资者沟通的方式产生一些本质上的改变，给金融机构整个营销的策略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第四是从服务模式来讲，线上服务可以提供 24 小时全天候的服务，跟传统的服务方式还是有些差别的。当然它本身也存在一些劣势，比如客户陪伴、面对面的感受是没有办法达成的。过去一年的时间，所有推动线上财富管理的机构，其实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创新和努力。展望未来，数字化金融将会给中国财富管理带来结构性根本变化。各金融机构现在正从第一个阶段——把线下转成线上，逐步地迈入第二个阶段——提供更专业化、更精致化、更精准的营销服务。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的财富管理市场应该迈入另外一个新的高峰。

二、ESG 理念的推动

资管行业主要有两个核心功能，第一个是募集资金，第二个是投资管理。国投瑞银基金的外资股东是瑞银资管 UBS，ESG 的概念在欧洲是最受认可、最为普及的，所以国投瑞银基金很早就开始在这方面投入资源。在市场上有一些相对应的产品，在推动的过程中，首先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虽然 ESG 或者“双碳”是大家都有的共识，市场上都认同这是未来的政策方向，但是不管是投资者还是金融机构的销售伙伴，其实对 ESG 的认知还有需要更深入的地方。

举个例子，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身有与新能源相关的基金，跟 ESG 主题是结合的，该基金今年以来的规模大概增长了 10 倍。从某个角度上可以解释为市场对新能源、ESG、“双碳”是认同的，但实际上就我个人的观察，这些投资者本质上还是逐利的，基本上都是看到新能源板块的投资机会能够带来很好的回报。

很多投资者对于 ESG 的概念还停留在“碳中和”是个政策方向这个层面，但投资者其实不知道资管行业讲的 ESG 投资方法究竟有什么好处，或者说它只是一个价值观的体现。但是如果深入了解一些相关研究，就应该知道 ESG 的策略实际上提供的超额回报是很显著的，而且它还能够发挥风险规避的作用。结合 ESG 的投资，是把投资者希望达成的财务目标与 ESG 的架构结合起来，本质上还是希望给投资者带来更好的收益或者是风险调整后的回报。而这个理念，其实是需要不断地跟投资者沟通的。

碳中和是一个政策目标，ESG 是一个投资方法，两者不完全一样，但彼此可以互相结合，从而达成投资者想要的理财目标。在 ESG 投资方面，需要整个金融行业的所有从业人员持续地去推动，从投资者教育的角度，让投资的理念不再只是单纯的价值观认可，而是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样的投资方法是会给投资者带来回报和利润的。

第二个挑战来自投资管理方面，现在交易所对所有上市公司都有 ESG 披露的要求。但是有很多公司是以最低标准来做这件事，本质上并没有重视 ESG 的要求。投资管理者在 ESG 信息获取方面困难较大，因此必须投入更多的资源和力量去发掘 ESG 方面的资讯或者依赖第三方 ESG 评级机构，但各个不同的 ESG 评级机构可能对同一家公司有不一样的看法。这是投资管理者面临的挑战。

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变化与发展

■ 张霄岭 / 华安基金总经理

张霄岭

一、 中国财富规模和资产管理行业的巨大变化

（一）规模的变化

中国财富规模和资产管理行业这几年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其中财富规模已经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根据相关数据，2020 年中国的财富规模达到 75 万亿美元，占全球的 18%，其中金融资产达到 36 万亿美元，占全球的 14%。据中信证券测算，中国的可投资资产规模，包括可投资的房地产，大概是 240 万亿人民币，剔除可投资的房地产，也达到 200 万亿人民币。与之相应，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增长也非常迅速，仅仅三年的时间，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从 2018 年底的 111 万亿人民币，增长到 2021 年的 132 万亿人民币。

（二）结构的变化

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的管理规模占比上升，信托、证券资管和一些子公司的基金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即专户业务规模占比下降。公募基金的规模占比，从三年前的 11.7%，现在上升到 18%，成为第二大资产管理产品，仅次于银行理财。信托的规模占比从 2018 年的 20%，现在下降到 15% 左右，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三）财富和资产的大转移

另外一个变化是居民财富和资产的大转移，现在中国居民的财富正在从房地产向金融资产转移，从稳健型比如理财、信托类向股票基金类风险资产转移，这是中国资产管理行业产生的明显变化。

二、产生巨大变化的原因

第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变化，资本市场越来越重要，所以资产管理行业就越来越重要。

第二是制度安排、监管政策的出台，尤其是 2018 年资管新规的出台，为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三是中国的信用扩张到达了一个转折点。中国长达几十年的信用扩张，随着恒大标志性事件发生了转折。中国信用扩张的转折、信用风险的出清，也为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宏观的条件。

第四是中国无风险利率持续性下降。过去几年，中国无风险利率在持续下降，比如理财产品的利率，余额宝的利率从 2014 年的 7% 下降到现在的 2% 左右，这给权益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基础。

三、中国资产管理的转型

现在整个金融行业，包括银行、券商都在进行资产管理转型，其中很重要的核心就是整个行业在向以客户为中心进行转型，作为从业者身在其中感受非常明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投资者的理念在迅速升级，对投资管理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中国资本市场还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趋势，就是专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其中结构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比如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和外资，在中国的 A 股市场已经逐渐成为一个主导力量。

客群的年轻化、数字化转型，在资产管理、资产管理行业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一方面传统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在关停，另一方面巨量的互联网客户在增加，凸显了中国客户的年轻化、数字化的趋势。

四、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前景

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发展其实才刚刚起步，中国有增长非常迅速的高净值客户人群。2014 年中国的高净值人群只有 104 万人左右，到 2020 年已经达到 262 万人，持有 84 万亿人民币可投资资产，人均可投资资产已经超过 3200 万人民币。所以，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有点类似于美国的 20 世纪 80 年代。

跟美国和欧洲等主要的发达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资产管理规模还比较小。比如美国现在的资产管理规模是其 GDP 的 1.8 倍，欧洲是名义 GDP 的 1.5 倍，而中国现在只有 0.95 倍，中国资产管理规模占 GDP 的比例还没有达到全球的平均水平。

另外，养老行业的发展和养老体系的完善，为中国未来的资产管理提供了长期资金。中国的储蓄率长期处于高位，也意味着中国的资产管理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五、“双碳”和 ESG 对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影响

首先，碳达峰和碳中和对中国资产管理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其次，碳达峰、碳中和也是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华安基金非常重视“双碳”和 ESG 可持续投资，视其为一个长期的投资主线，并积极向先进的同业学习。最后，疫情对资产管理行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在疫情之前，大家更多的是考虑效率和公平的一种平衡。现在大家把安全这个维度也考虑进来，要考虑效率、公平和安全的平衡。疫情导致了贫富差距加大，也催生了生命科学、通讯、云计算等方面的变革，不但对资产管理行业，而且对全球的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财富管理峰会学术讨论

主持人：俞　岚，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兼中国新闻网总裁
嘉　宾：李　彤，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总裁
Soonyoung Chang，迈达斯国际资产管理公司创始人兼董事长
汤晓东，贝莱德中国区负责人
张霄岭，华安基金总经理
王彦杰，国投瑞银基金总经理
汤勇军，香港大学金融学教授
张顺荣，国际资本市场协会亚太区总监

俞岚： 请问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总裁李彤，刚才您从宏观的层面讲了共同富裕，讲了资产管理对于经济社会的重大意义，作为最老牌的中资投行，对于资产管理市场的看法现在有哪些变化，您认为在中国双循环的大背景下有哪些新的投资机遇？

李彤： 最近确实会有一些变化，刚才我听了几位嘉宾的分享，张霄岭提到了国内的一些变化，比如信用扩张转折，无风险利率下降，这些都是国内的一些变化。我们可以结合疫情的影响，从更加广阔一点的角度看全球的变化。

疫情之后，全球 30 多个央行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扩张流动性策略，近期疫情又有反复，再加上一些其他因素，我们确实看到金融市场的波动在加剧，这也是最近的一个变化。

全球目前最大的一个风险应该是通货膨胀，这个也是必然的，因为流动性增加必然要带来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对资产管理有哪些影响呢？比如说，从 2008 年到 2020 年大概 12 年时间间，在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的环境下，资产管理的配置比较多的是在固定收益类的产品。通胀上升导致固定收益类产品的实际回报会下降，这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另外有一些主要经济体的信用收紧，信用收紧可能会导致权益类的产品在价格调整方面面对一些风险，这是一个变化。

再有，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这几年的债务水平也在上升。近期，债务风险以及汇率风险上升。为应对疫情而采取的经济刺激政策，客观上加大了财富的贫富悬殊，这也是疫情带来的新变化，是国际国内资产管理环境的变化。

我们的应对策略就是贴近客户需求，在追求投资价值的同时，也要注重社会价值，比如，贴近 ESG 做投研和产品设计，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应对方法。

还有就是风险管控，现在对风险管控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要求，就像我们的视角要从全球聚焦到某一个特定经济体，从宏观到微观。从各个角度来看，这些方面可能跟以前的风险管理要求不同。我们从全面的角度到特定行业、到特定产品都需要加强风险管控，特别是要加强敏感性的测试分析、压力测试，管理好我们的风险敞口，这是我们应对的有效途径。

再有一个就是数字化跟智能化，这个大家都提到了，我也是非常赞成，将来这一块我们会加强。增强资产管理的普惠性，同时它也能够提升我们的资产管理效率，也能一定程度的对抗风险。

俞岚： 谢谢李总给我们进行了很精彩的分析。

我想问一下 Soonyoung Chang，怎么样让主动投资和被动投资在资产管理中扬长避短？您认为量化投资和基于技术、模型算法的衍生产品，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如何？

Soonyoung Chang： 资产管理主动投资可以带来很好的投资回报，但相对来说风险和投入也较大。2009 年，我在韩国的时候进行了主动投资实验，对于投资管理人来说主动投资波动性比较大。六七年之后，行业出现了一个转向，开始进行了 ETF 之类的被动投资，投资比较稳定。市场上升的时候可以说是水涨船高，市场比较平稳的时候指数型的投资可以跟着上上下下。2009 年 -2019 年我在韩国经历了这样一个阶段。如果投资者想要更多的高于指数型基金的回报的话，可以加仓或者是减仓指数型基金的投资。

我觉得中国在量化投资方面的前景潜力非常大，但是还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个是 AI，另一个是超计算。这两项技术，中国已经处于领先地位，而且这方面的人才非常充足。中国在金融领域的人才是很多的，所以会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

俞岚： 感谢 Soonyoung Chang。

下一个问题要请问贝莱德的汤晓东，贝莱德作为中国首家获批的外资独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其第一支公募基金运行已经快三个月，最近刚刚打开申购，您认为在国内越来越激烈的公募市场竞争中，贝莱德有什么竞争优势？您对中国资本市场怎么看？

汤晓东： 国内现在的资产管理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光是公募基金就有 140 多家。所以在这方面要想在国内市场立足，确实就要发挥自己的一些核心竞争力。这里面有刚才讲过的养老产品，比如我们在 1993 年就推出了养老基金。另外在 ESG 投资方面，我们也是希望逐步引进全球的一些最佳实践，包括公司成立了专门的可持续投资团队。目前我们在全球管理的资产中，已有超过 4340 亿美元专门用在可持续投资方面。我们也希望能把一些好的投资模型、投资理念，特别是最佳实践带到国内来。

另外我们一定要跟本地的国情相结合，与政府监管携手，与其他的机构进行深入的合作，真正为投资者提供各种风险类型和收益偏好的产品，提升中国居民的财富数字。

我们希望跟国内领先的销售渠道，包括银行、券商，还有数字化的销售渠道进行深度的合作，通过他们广泛客户的网络，加深对中国本土投资者投资需求的理解，帮助投资人建立长期投资的信心。

俞岚： 接下来一个问题想问张霄岭总经理和王彦杰总经理，越来越多的“贝莱德”来到了中国，国内的公募基金怎么办？海外市场调研显示，现在有超过 30% 的年轻人把公募基金作为获得人生第一桶金的主要理财手段，张总和王总两位认为国内的公募基金行业发展有哪些优势？外资公募基金有哪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张霄岭： 就像刚才汤总所讲，中国的公募基金行业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我觉得中国金融市场竞争最充分的就是资产管理行业，各自有一些优势，也各有一些特点。比如华安基金是中国最早的 5 家公募基金公司之一，有 23 年的历史，但其国际化程度跟贝莱德这样的公司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公司跟中国大部分基金公司一样，一开始都是从服务中国的散户做股票起家的，这也是华安的传统优势，就是主动权益。所以我们主动权益的业绩也一直非常优异，中国很多公募基金公司都有这样的特色。然后逐步发展出来固定收益，现在大家开始往多策略、大类资产配置的方向发展。所以中国基金行业的大部分公司，都经历了从传统的为散户零售服务，逐渐转向为多元化的客户服务的过程。

我认为中国的公募基金，如果想要在现有的资产管理生态圈里占一席之地，主要要做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要以客户为中心。实践已经证明了那些为客户创造价值、以客户为中心的机构，确实越来越受到客户的认可。第二个就是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尤其是服务客户的能力。这个服务客户的能力，最主要的就是投资管理的能力，因为中国的公募基金有一个特点，就是定位比较窄，但是比较专。比如我们的理财子公司相对一些大的外资

公司来说，我们的能力范围虽然比较窄，但是比较专精。第三个就是要提升我们团队的执行力。

如果国内公募基金能在这几个方面切实提升能力的话，我们认为它是可以跟任何人竞争的，这是我的观点。像国际化的公司，比如贝莱德或者马上要获批进入国内的其他几家公司，他们的优势就是综合能力比较强。另外，外资在中国的渠道能力，目前还处于建设的过程中。所以中外各有优势、各有特长，良性竞争、互相促进，可以进一步丰富中国资产管理行业，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未来的发展也会非常好。

王彦杰：从公司的成立历史来讲，我们没有华安那么早，但是肯定要比贝莱德早。我们国投瑞银的股权，是国投集团占 51% 的股权，瑞银资管 49%。从股权结构来讲，我们是居于中间。公司成立之后，经常会被客户或者媒体提问，我们的股权将来会有什么变化。当然我作为公司总经理，也不适合做太多评论，但是我开玩笑地说，基本上中外股东都非常喜欢我们，所以没有人想要把股权让出来，这是我目前所看到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资产管理行业有两个很重要的核心发展方向。首先每一个市场都有它的特色，特别是中国市场有中国特色，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我认为本土化是很重要的，即使像外资的独资公司也会聘请本土专业人士，比如像贝莱德聘请汤总这样本地的专业人员来做管理。我们做过一些研究，比如境外有很多投资 A 股的基金，如果把业绩拿来比较，事实上国内的 A 股基金整体的平均业绩，要比境外管理人做的 A 股业绩好很多，这其实是一个本土化的优势。

另外，国际化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的市场，毕竟还是在走向跟国际接轨的道路上，所以不管是资本市场还是整个公募基金的发展，其实整个框架还是按照欧美的框架来走的。未来国内公募基金的发展方向参考海外市场，也是有很大借鉴价值的。所以我觉得整个行业的发展，其实就是在本土化跟国际化之间取得一个适当的平衡。

从国投瑞银本身来讲，我们基本上就是在中外股东双方资源的结合之下，会发展一些中方股东具有优势的背景，同时我们也在持续引入瑞银资管全球完整的产品线，以及比较完善的投资流程和风险管理框架，就是希望未来能够在本土化和国际化之间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给投资者提供好的产品，并让他们获得好的收益。

俞岚：谢谢三位的分享。我想无论是哪一种竞争，尤其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里，最后竞争的其实还是人才。刚才汤勇军教授也谈到了关于资产管理人才的培养，请问您在中国蓬勃发展的资产管理市场，专业人才的缺口到底有多大？

汤勇军：我们之前有一些毕业生，他们现在正在从事资产管理的行业，甚至有的人已经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他们的反映是人才非常短缺。原因有两点：

首先是因为财富的集聚和发展特别迅猛，比如腾讯、阿里等新公司，一上市就出来很多亿万富翁，所以需要很多的专业人才去帮他们打理。但是之前学校的教育都是传统的模式，有些可能做得很好他就跳槽了，自己创立公司或者去做别的事情。从学校一出来就能够去从业的人本来就不多。其次市场也在发展，所以市场里很缺人，香港特区政府甚至在拿钱培养资产管理方面的专才，也成立行业协会，自己组织项目来做人才培养。总之，有非常大的人才缺口，需求至少是现在从业人员的 3 倍。我们学校从五年前开始设计项目，四年前开始进行本科招生，今年才有第一批毕业生。因为我们对质量要求比较高，所以第一批毕业生只有二三十个人，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另外一个办法，是对现在已有的从业人员，做一些培训提升。这是我们跟国际金融论坛（IFF）合作，帮助行业里的从业人员进行知识培训的原因，培训内容包括合规、新经济等等。我们不只是在学校做项目，也会去联合业界，不止有学校的教授，也会找一些成功的从业人员设计和做项目。我们会带着学员去各地学习和实地考察。大学是非营利机构，我们在做项目时，宗旨就是为了服务社会、服务国家，也包括为大湾区发展服务。

俞岚：好，谢谢汤教授的分享。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张顺荣先生。刚才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总裁李彤女士又一次讲到，我们现在国际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一直在增加。在这样的环境下，您对中资企业的海外投资有什么建议，特别是您刚才讲到可持续投资？

张顺荣：是的，随着国内开放程度的深化，双向管道是畅通的。今年随着债券通、南向通、财富跨境通的推出，对于资金走出去是非常有利的。

第一，对于国内资金来说，当然是追求回报、追求流动性的。国际跟国内的业态还是非常不一样的。逃不开一些宏观趋势，比如像新的 QE 会造成一些通胀，很多安全资产相应的回报率比较低，但是从资产配比上，要规避风险即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从产品的角度，特别是市场上比较新的产品，有可能给投资机构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资金通过不同的渠道流入到债市、股市，比如沪港通、深港通。疫情之后，虽然人员的流动非常困难，但是资产流动仍然很顺畅。特别是政府加大了开放的步伐，相应资金流动到国内，趋势更加明显，量也增加很多，特别是一些利率债。

国际金融论坛（IFF）设定了很多与碳中和相关的主题，现在国内和国际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就碳中和而言，第一是绿债的深化。第二我们对标国际市场。今年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陆续推出了可持续挂钩债券、可持续发展债券等，使国内资产从产品种类来说，更加对标国际市场。第三增加了国际投资人能够更方便使用的对冲工具，或者提供了税收等方面的便利，使其能够更方便进入中国市场。

在绿色金融里面，大家知道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主导方之一，可持续国际金融平台（IPSF），2021 年在格拉斯哥 COP26 会议上发布了最新《共同分类目录》。使得相关中资投资人不管是在境内和还是境外，都可以对标这个目录发行债券，投资人相对来说会更有信心，而且也更符合他们的投资需求。在国内，由于政府鼓励，有一些政策上的配合，发行端的需求是很大的，国际上发行端反而需求未必这么大，我们投资端虽然不强，但是国际上投资端需求很强。之前是因为中国和国际上规则不统一，使得一些资金未必愿意流入到相应产品当中去。以后国内在发行债券的时候对标国际规则，可以使国际投资人更有信心投资这些产品，使得资金流动更有效，配比更强。特别是国内发行端和国际上投资端，资金双向流动也会更加有效，相应的产品也会更加丰富，并在定价和价值上体现，最终会使市场有效健康发债，这对于长远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俞岚：感谢张总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嘉宾的共同参与，从宏观到微观，从国际到国内给所有人都上了一堂非常丰富的资产管理的课程。我想所有关注本场峰会的朋友都跟我一样获益匪浅，很多朋友回去以后就会调整个人和家庭的资产管理计划，有很多朋友可能也会调整个人的职业规划，希望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含金量很高的峰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回报。

科技创新峰会

中国科技部原副部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荣誉主任 221
刘燕华：科技创新时代的重要举措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 223
龚克：在新形势下以正确的态度、政策和举措，坚定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25
赵志耘：全球科技创新的趋势和中国科技创新面临的潜在风险

第 20 届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主席、韶关市委书记 227
王瑞军：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低碳发展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 229
樊建平：建设国际化、产业化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华南人工智能研究院董事长 231
杜兰：产学研用助力科大讯飞砥砺前行

科技创新峰会学术讨论 233

科技创新时代的重要举措

■ 刘燕华 / 中国科技部原副部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荣誉主任

今天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我们所处的时代；第二，时代催生创新；第三，新形势、新举措。前两个问题简要说一下，重点谈第三个问题。

第一，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进行各种各样的调整，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管理制度调整，特别是“十四五”期间要实施一系列新的举措，特别是提出了创新的要求。

中国目前还处于工业2.5阶段，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创新是驱动力，要创新，就要解决创新生态问题，要有创新的活力，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目前来讲，中国的创新能力和水平在世界上处于第十几位的水平。

什么叫创新？创新是从创意到形成价值的全过程，新的创新要替代传统的创新，因此也要有新的管理制度，新的制度要替代旧的制度。

第二，时代催生创新。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国的结构转型有了一系列举措，新冠肺炎疫情催生了许多新的技术能力和业态模式，这也是疫情给我们带来的变化。另外，中美贸易战历经四年，我们经过了很多坎坷，迫使我们思考中国自己的创新之路，中国的创新就是要走向自立自强。

第三，新形势、新举措。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应该干什么？有四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一、建设科技平台

比较一下“德国工业 4.0”和“中国制造 2025”，我们发现有一个区别，“德国工业4.0”瞄准九大科技前沿，在德国打造九大平台，每个平台既包括基础研究，也包括技术研究；既包括产业，也包括市场。通过打造九大平台吸引世界顶尖的研究人才、产业人才、市场人才在这个平台周围聚集，这是“德国工业 4.0”的基本理念。“中国制造 2025”符合中国国情，因为我们属于工业 2.5 阶段，我们瞄准的是十大技术产品，要解决这些产品的产出，支持一些企业完成产品。“德国工业 4.0”是平台导向，“中国制造 2025”是产品导向。

为什么说平台重要呢？大家都知道鲤鱼跳龙门的故事，鲤鱼跳龙门之所以困难，是因为鲤鱼所在的水位过低，

刘燕华

离高耸的龙门过远。如果水位升高，鲤鱼所在水位与龙门的距离缩小，鲤鱼跳龙门就容易了。水位的抬升就像是科技平台建设，有高阔平台的托举，科技创新鲤鱼跳龙门的成功案例就会不断增多。要建设科技平台就要解决科技产出工程的市场化方案，还有技术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案，平台建设要经过功能测试。科技服务业已经成为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柱，我们要有技术解决方案、商业模式，同时也要储备竞争。这个平台上包括发现、发明、产业、市场。科技服务平台创新包括哪些内容呢？这是一个发达国家以及中国生成服务平台的总结，一个基本标配。在创新初期阶段、中期阶段和市场化阶段都有很多内容，其中特别要注重把专利维护、技术市场、风投的介入、法律政策咨询、成本核算全都放进去，服务平台瞄准的是创新产业链的整个链条，而不是在某一个环节上。

二、加强科技软实力

创新的生态，硬实力要强，软实力也要强。软实力有三个问题需要考虑。

第一，要考虑逆向创新，传统的科学研究考虑的是正向创新，从基本的原理发现到技术改造，再到产业进入市场。从科学家的研究开始，电话从发明到市场推广大概经历了 60 ~ 160 年，时间很漫长。现在的创新不想等这么长时间，就要采取逆向创新的方式。逆向创新指的是根据需求来组合创新的题目，要瞄准未来的消费，要解决替代的产品，调整生产和经营的关系，根据需求来进行创新。简而言之，逆向创新是根据市场需求，通过为用户量身制作，将已有知识集成加工，使研发成果快速进入生产和市场。根据哈佛大学一项研究，最近几十年来，全球约有 80% 的创新成果产生于逆向创新。

第二，要考虑无形资产。在传统认知中，资产是土地、劳动力、矿产、水等有形资源。在新时代，占有和掌握“无形”资源的竞争已渐显激烈，全球性“无形资源”的圈地运动早已悄然展开，比如计算机 IP 地址根目录、通讯的频道、空间轨道、排放空间分配、功能基因注册，还有商标、知识产权、专利等等，都属于无形资产。在新的创新大环境中，无形资产所有权具有独占性、唯一性，同时也处于价值链的高端，我们必须要高度重视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是前沿高科技的国际制度安排与标准，要在国家层面上进行部署安排，在国际事务中获得主动。

第三，要考虑智力资本。人类发展从自然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现在科技竞争已进入智力资本阶段。智力资本是一个企业组织乃至于一个国家最有价值的资产，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我们考虑创新过程中的人才资源，既要考虑研究人员，也要考虑产业化的人才，还要考虑市场的人才，各种人才聚集在一起，才形成智力资本。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源大国，但是还没有实现智力资本的强国。中国要成为科技创新的强国，在人才智力资源方面也要成为强国。

三、重视创新方法

中国有一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在方法和技巧上要下大功夫，创新的方法包括创新的思维、创新的技巧以及创新的工具。如果创新思维的横坐标表示马拉车，纵坐标表示交通工具发展历程，那么横坐标马拉车有很多东西可以研究，比如育种、饲养马、四个轱辘等等都可以研究。但是，所有这些研究成果累计在一起，也冲不破一个局限天花板——马车的速度永远超不过马跑的速度。用传统思维做研究有天花板，思维的创新就是要跳出传统，变革创新出一种新的动力方式。纵坐标从煤到汽油、燃油、核动力等等，于是出现了火车、飞机、轮船、太空飞船，所以我们必须要跳出传统思维来考虑创新。

创新的方法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陈景润哥德巴赫猜想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创造了一个转换原理的方法，用新的方法才解决了哥德巴赫猜想。回顾众多的科学发现，都是有了新的方法才能使发现成为现实，所以方法就是我们的诀窍。另外，目前许多科研设备中国还没有，还要对外依赖，今后必须解决中国的这一短板。

重视创新方法，思路决定出路，方法决定成败，工具决定实力，工具相当于打仗的武器一样，创新的路不止一条，创新技巧需要积累，武器是制胜的底气，所以我们在创新方法上必须要加强。

四、强化基础研究

在许多场合人们都在说，强化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在整个创新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创新有研发链、产业链、市场链，研发链有基础研究、应用基础、技术应用等等，产业链是产品、中试、生产、产业，市场有供应、销售、流通、服务等等，创新链有很多环节，基础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基础研究是整个价值链当中的源头，是 0 到 1 的问题。

强化基础研究非常重要，增加经费是基础研究的推动力，发表论文是基础研究的一个考核指标。 这里举一个例子，我们到以色列一些大学访问，发现以色列在基础知识研究加工开发方面有很独到之处。在特拉维夫大学有专门一批教授，这些教授懂得科学，同时也懂得市场，他们以全世界已发表的高端论文为研究对象，将选中的论文思想与技术和市场相结合，加工开发之后推向市场，他们对基础研究的开发和利用发挥了很大作用。基础研究很重要，但是基础研究的开发利用也很重要。

新形势、新举措，要在几个方面进行转变：从“游击战”转到“阵地战”（基地、平台建设）；从“短线”到“长线”（突破与储备、战略）；从“单兵种”到“多兵种”（跨学科）；从“短期效果”到“稳定支持”（队伍建设）；从“单项技术”到“全产业链核心技术”（创新）。

总之，要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迈进，就要真正实现“中国创新”的自立自强。

在新形势下以正确的态度、政策和举措，坚定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龚克 /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

龚克

我今天分享的内容是：在新形势下以正确的态度、政策和举措，坚定推进国际科技合作，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被写进了“十九大”报告中，也是习近平主席强调的理念。

我在国际组织工作，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变化对科技合作的影响，体会和感受非常深。我认为逆全球化的思潮并不是从疫情开始的，尽管这两年随着疫情蔓延逐渐凸显，但其实是从 2008 年、2009 年全球经济危机时就开始了。美国特别是自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的美国政府，已游离于全球治理民主化进程之外，美国退出了很多国际组织，也包括世界工程组织。美国曾经是世界工程组织的发起国之一，在组织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退出了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虽然还有一些美国专业组织，比如工程学会仍是我们的会员，但是作为国家会员，美国已经退出了。

现在的中美关系已成为国际政治非常突出的问题，影响着国际格局，很多国家特别是中等发达国家非常担心中美发生“新冷战”，继而把全球拖入一个割裂的形势中去。中美之间如果发生政治、经济冲突，必将影响国际科技、工程等各种国际性的合作。美国政府不久前又公布了一批限制出口的中国企业名单，这意味着美国企业将无法向这些中国企业出口产品或技术。有些美国政客甚至公然主张中美进行全面科技脱钩，包括现在中国已经参与的一些重要领域，比如人工智能等领域。

但是在我看来，美国这些逆全球化行动并不能阻挡全球化的历史性大趋势，国际科技的交流合作源于内在需要，是科技创新本身的需求，而不是外部推动或强加的，更不是哪个国家或哪位领导人要求的。现在我们的世界处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开放与封闭、合作与对抗的十字路口。面对这个十字路口，中国持什么态度？习近平主席在 2020 年 9 月 11 日主持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国际科技合作是大趋势，我们要更加主动地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创新能力。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习主席这段讲话包含两个方面意思，一方面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提高自己的创新能力；另一方面，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促进全球科技创新合作。

全球化大趋势不容逆转且在不断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也是大势所趋，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在推动，现代科技推动生产力，已经把全球科技经济深度一体化了，开放已经成为必然的内在要求，封闭是没有出路的。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说，“我们要拆墙而不要筑墙，要开放而不要隔绝，要融合而不要脱钩”。现在人工智能正引领着新一轮科技革命，而人工智能本身就是在开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技竞争其实就是在比谁更开放，过去的美苏冷战，最终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开放体系战胜了苏联比较封闭的体系，过去如此，今后更是如此。

11 月 23 日，在巴黎举行的第 41 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193 个国家一致表决通过了《开放科学建议书》，这是国际上首个关于开放科学的框架。其中开放科学五个支柱里，第一个就是开放科学知识，包括开放获取科技成果、开放允许公众参与科学过程、开放科技教育资源，特别还提出了开放软件和硬件，这些都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必将进一步深化全球化。

全球化的挑战也更加紧迫、严峻地呼吁我们要加强合作。特别是上个月在格拉斯哥召开的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以及 8 月份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 6 次评估报告（AR6），都指出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正在给自然界造成危险而广泛的损害，并日益严重影响人类生活。1950 年之前，人类的活动基本上是符合自然趋势的，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造成影响主要是 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在过去 40 年间，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超过过去 300 年，甚至上亿年的影响。这种影响产生不可逆转的趋势，因为以前几千万、亿万年都是上下波动的，一旦经过了一个所谓的转折点之后地球将走向毁灭，使人类无法生存。我特别喜欢这张照片，这是中国首席代表谢振华和美国首席代表克里，戴着口罩一起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全世界也好，都需要一起合作。

没有全球合作就没有所谓的 Build Back Better World(重建美好世界) 。去年，联合国 75 周年纪念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公开征求疫后重建的意见，举行了 300 多次区域性跨国对话，联合国 196 个成员国 7 万多人完成了标准化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全球合作在所有年龄和社团中都得到了压倒性的支持，而且支持度越来越高。这就表明没有全球合作就没有更好的疫后重建。

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华民族的振兴，过去几十年，中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包括 14 个坚持。其中第 13 个坚持就是 :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中国的命运和全世界的命运是息息相通的，“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国际环境、国际秩序。

可以说疫情确实对世界各国发展造成巨大冲击，引起国际关系的变化、调整和冲突，但是，疫情并没有改变当今世界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和平与发展，也没有改变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应该说事实验证了党的十九大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十九大报告指出，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病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并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希望，也充满挑战，我们不能因现实复杂而放弃梦想，不能因理想遥远而放弃追求，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

最后用一句话总结我的发言，就是在这样的疫情之下，要用正确的态度、政策和举措，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科技创新的趋势和中国科技创新面临的潜在风险

■ 赵志耘 / 中国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赵志耘

本次国际金融论坛（IFF）年会的主题是全球挑战下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变革、合作，它反映了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背景和趋势。全球科技创新的格局正在持续深度调整，科技创新能力已经日益成为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的决定性因素。依靠科技创新来抢占竞争优势，应对国内外挑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战略选择。各国纷纷出台科技创新战略，而且尤为注重基础研究和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国如何抢占未来科技竞争的制高点？在人工智能、脑科学、量子计算、生物医药等战略性前沿领域，在各国竞相布局的重点领域，应该怎样发力？怎么样进一步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合作，让科技创新成为支撑引领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是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破解的问题。

对于全球科技创新大趋势，我们可以从五个维度进行判断。第一个维度是基础科学。目前基础科学从微观到宏观都在加快演进，并向纵深进阶发展，既有可能影响人类对于物质、生命、能量的基本认知，也有可能催生新的重大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第二个维度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以人工智能引领计算驱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快速迭代，与生物、能源、制造、材料等前沿技术交叉融合，正在发生着多技术群、多点的突破，相互支撑、齐头并进的变革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第三个维度是产业应用的维度。以场景驱动为特征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持续爆发，不断产生新的生产平台、新的业务模式，也正在重塑着新的工业体系，推动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快速演进。第四个维度是范式变革维度。大小科学并重，大小企业协同，开放式、体系化的科技创新的组织模式正在成为主流，大数据的研究已经成为科研新范式，网络化、平台化、生态化正在成为产业的新范式。第五个维度是全球化维度。科技创新在急速加剧着全球化的深度和广度，创新要素正在全球加速流动，科技创新活动和科技创新成果越来越呈现出跨国际、跨地域合作共享的新态势，所以科技创新的全球化应该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全球科技创新的大背景下，中国未来的科技创新也面临着五大潜在风险。

第一个潜在风险是中美关系。中美科技的局部脱钩将长期存在，形成制约我国科技发展空间进一步扩大的潜在风险。在科技创新全球化进程中部分脱钩，在关键领域、关键技术、高端人才等方面，对我国抑制打压和封锁具有长期性和根本性，所以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加严峻。

第二个潜在风险是新技术应用的风险。科技创新日益呈现出了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别是新技术的突破性进展和颠覆性应用，可能会带来就业结构的改变，进而冲击社会伦理关系，挑战现有的法律法规，在国家安全与个人隐私等方面存在潜在风险。

第三个潜在风险是错失发展机遇，丧失主动权。我国独立研判科技发展方向的经验和能力不足，可能会错失科技革命的机遇、丧失发展的主动权。比如在引领科技新发展、开拓学科新方向的一些原创性创新，以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如果我国没有率先取得突破，将会进一步拉大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丧失抢占未来科技制高点的主动权，导致失去更多的经济权利和社会财富，以及产业高端持续受限，造成结构性失业等风险。

第四个潜在风险科技体制改革滞后。如果我们的科技体制改革滞后于科技创新发展需求，将使科技创新发展进程受阻。比如我们在有效组织产学研协同攻关的体制机制上，如果不能够快速改革完善，新技术快速发展的监管能力和水平跟不上，也有可能成为潜在风险。

第五个潜在风险是科技人才的安全。科技人才队伍面临着供给的结构性失衡，以及外部打压双重风险，如何保障人才安全的形势依然非常严峻。

面对目前日益复杂的发展环境和各类潜在风险，我们必须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历史性机遇，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走自主创新的道路，立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创新能力的开放合作，不断拓展创新发展新空间。

我认为应对中国科技创新面临的五大潜在风险，要在以下五个方面发力。

第一，要打造开放性的国际化创新高地，改善科技发展的外部环境，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封锁，越是封锁越是打压，我们越要拥有开放的定力和国际化的方向。

第二，要加强基础前沿领域的前瞻预判，准确把握科技创新部署方向，及时抢占科技制高点。

第三，要坚持底线思维，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双重作用，攻克核心技术短板，构建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

第四，努力建设科技风险的监测预警评估和应急处理机制，加快研究制定与科技风险相关的政策法规、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及时识别、防范和化解各类风险。

第五，要努力探索建立科技人才安全的制度化保障体系，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活力，打造创新科技人才引进、培养和使用的方式，整体提升科技创新人才的供给能力和水平。

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低碳发展

■ 王瑞军 / 第20届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主席、韶关市委书记

王瑞军

我曾在科技战略和规划制定层面工作过多年，对于科技发展的宏观、中观、微观都有所了解，现在的工作是微观、具体的，其中也包括疫情防控和科技管理领域的工作。今天我想以如何依靠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特别是在碳达峰、碳中和大背景下，韶关应该怎么做为题与大家做个分享。

我们国家城市众多，城市间存在巨大的区域发展差距，大多数城市不能像一线城市那样集聚资源、人才、资金，但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个全国性的任务。根据 IPCC 评估报告，城市能源消耗量占全国 70% 左右，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超过 70%，如果不解决城市的问题，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很难实现。

一、扬长避短是解决韶关问题的关键

韶关是粤北生态发展区的代表性城市，也是中国三四线城市的一个代表。如何在资源要素有限、污染排放限制、能耗“双控”条件下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走出一条新发展之路？这些三四线城市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能耗“双控”、环境污染排放已经控制住了，如果不考虑发展，只考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这显然是不符合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但是如果发展，又不可比避免地要增加能耗和碳排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取舍和权衡，是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

韶关既是一个绿水青山的地方，森林覆盖率达 74.13%，又是一个传统的老工业城市，需要转型升级，既具有发展的强大需求，又具有高能耗的现实困难。扬长避短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二、打造绿色发展韶关样板的三个举措

我们按照广东省“一核一带一区”的发展定位（“一区”是指北部生态发展区），全力筑牢粤北生态屏障，打造绿色发展的韶关样板，这是我们的生产之路和高质量发展之路。

举措一，着眼于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以我们正在做的微藻固碳项目为例来讲。目前，这个与韶钢合作的项目正在做最后的项目落地，采取的是微藻固碳的方式。培养微藻需要有工业尾气，需要用到尾气中的二氧化碳并预热。微藻最好的培养场地需要用到废水，富含氮磷的水对

于微藻的繁殖和培育是非常有利的。同时一吨微藻可以固化大约 2 吨的二氧化碳，是森林固碳能力的 10 ~ 20 倍。韶钢一年 800 万吨钢产量，可以排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其他的工业废水，所以用微藻固碳是一条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之路。

举措二，我们采用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材料实验室的多孔介质燃烧技术，这是第三代燃烧技术。韶关过去的锻造、冶炼生产线用的都是煤，后来实现了煤改气。天然气虽然比煤和石油要清洁，但是它依然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而且价格昂贵。所以，我们采用了多孔介质燃烧器。现在韶关已经改造了两条线，一条线用在韶钢的生产线上，另一条线用在东阳光的生产线上。第三方的检测数据表明，过去炼一吨铅、锌需要 12 方天然气，现在只需要用 7 方；过去氮氧化物的排放在 100 毫克以上，现在降到 10 ~ 30 毫克；过去一氧化碳排放量很大，现在已实现净零排放，VoCs 也实现了净零排放。多孔介质燃烧技术的应用，给传统工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举措三，着眼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产区变园区、产区变城区。韶钢是广东省少有的大型钢铁工业基地之一。全省一共就两家，一个是韶关钢铁厂，另一个是湛江钢铁厂。韶钢作为一个老钢铁厂，技术转型升级前，产 400 万吨钢需占地 8 平方公里；技术转型升级后， 产 800 万吨钢占地 4 平方公里。钢的产能已经达到极限，应该怎么办？韶钢的煤炭消耗强度占了韶关市的一半，一定要着眼于减碳才能使韶关成功实现碳达峰。所以我们就努力做韶钢的工作，把韶钢现在富裕出来的 4 平方公里，通过产区变园区、产区变城区，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比如韶钢的焦化高楼，每年产生 5.3 万吨氢气，以前这些氢气无论是放掉还是烧掉，都会产生大量温室气体。现在我们把 5.3 万吨的灰氢提炼成绿氢。韶钢有 1500 辆重卡柴油车运煤、运钢，我们对这 1500 辆柴油车进行改造，实现了颗粒物和城市清洁的有效降低，同时也实现了减碳，实现了资源的高质化利用。韶钢的园区引进 40 家上下游相关的产业，在单位面积当中提高了它的产出高价值化，这就是我们采取该项措施的重要作用。

三、努力实现生物质资源绿色高值化利用

韶关是一个绿水青山的地方，拥有高森林覆盖率和大量优质农田，如果不在生物质资源利用上做文章，我们就无法发挥自己的优势。我们不断寻找新的科学创新技术，比如我们和华南理工大学的瞿金平院士合作，实现生物质绿色高值化利用。南方地区，在水稻割完以后，农民会把秸秆烧掉，产生二氧化碳、增加温室气体。现在不让烧，秸秆该怎么处理？答案是还田。水稻割完以后剩下来的秸秆差不多有 30 公分高，还田的速度没有这么快，如果浇水一泡又会排出甲烷，甲烷也是一种温室气体。我们现在采取复碳模式。首先把秸秆通过物理、机械的方法打成纤维，一部分秸秆排放还田；其次，把它做成有机肥，从而减少化肥的用量；最后把剩下的优质纤维做成复合板材，这个板材是高质化的，可以回收再利用。所以碳始终是固在材料当中，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充分利用生物质资源。

韶关是大湾区的菜篮子、米袋子，生猪养殖、畜禽养殖也是老百姓幸福健康生活的一部分。我们把有机和无机的废弃物，进行资源化、原料化、能源化利用，通过不断组合，最后形成多种产品，制成有机发泡陶瓷材料，现在这个技术项目正在我们韶关落地。

四、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等新兴产业

韶关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只能起到减碳的作用，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还得靠新兴产业。现在韶关正在发展大数据产业，积极创办、争创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算力数据枢纽节点，有望在明年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发展大数据产业需大量耗电，怎么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我们的解决办法是把发展大数据产业和新能源装机、绿电装机结合起来，在 800 万千瓦的装机容量中，火电大约占 53%，水电站占 27%，光电生物质发电量都很可观，韶关的电力结构已经非常优化。在今后 5 年，韶关要实现 1200 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容量，风电超过 300 万千瓦，光电超过 800 万千瓦。这样的绿电，为将来大数据产业实现复合的平衡、实现就地转化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条件。现在有很多大数据头部企业跟我们商量在韶关落地的问题，我们为此准备了将近 2 万亩的产业园。我相信韶关在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方面，一定会走在前列。

五、积极倡导绿色低碳生活

韶关在城市社区居民的生活当中，倡导低碳绿色生活。韶关是大湾区的一个工业基地、能源供应基地、电力输出基地，我相信韶关还会承担比大湾区更高的能耗强度，但这是我们应该为广东全省，为大湾区发展做出的贡献。我们注重在韶关城市居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环节中，积极打造绿色低碳生活模式。

为了做好这些工作，也为了发挥好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我们立足韶关面向广东，成立了碳中和研究院，得到了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中科院广州能源所等相关院所的大力支持。我们积极推动实施“六个一”行动，即一个研究院、一个产业园、一只基金、一个智库、一个碳交易服务平台，最后形成一个新型的电力系统。

建设国际化、产业化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 樊建平 /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

樊建平

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这一指示目前在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合肥科技岛、粤港澳大湾区四个地方落地。粤港澳大湾区主要是在光明区、东莞松山湖以及南沙的一部分。在光明区目前有两个项目是这项工作的主体——脑解析与脑模拟、合成生物研究平台。

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北京、上海有什么不一样？粤港澳大湾区比北京、上海的城市多、区域大，主要由深圳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光明科学城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湾区先行启动区，布局了九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两所研究型高校，兼具产业化和国际化特色。九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有两

粤港澳大湾区比北京、上海的城市多、区域大，主要由深圳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任务。光明科学城作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湾区先行启动区，布局了九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两所研究型高校，兼具产业化和国际化特色。

个是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承担，**一个叫合成生物研究设施，另一个是脑解析与脑模拟设施，都是现在国际上最前沿的研究，很多地方也定位在基础研究。**两所大学一个是筹备中的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一个是中山大学（深圳校区），目前一些有特点的产业特别是生命科学放在深圳光明区。

经过四五年的发展，合成生物已经形成了 800 多人的队伍，有 71 位学术带头人（PI）、13 位院士、“四青人才”31 位，在全国均是排名第一。同时我们正在建一个全球最大的合成生物重大基础设施，深圳市投资 7.2 个亿，我们在大学里设立了全球第一个合成生物学院，在光明区还成立了产业化楼上楼下创新创业综合体，科学家在楼上，企业家在楼下，共享仪器设备、共享食堂、共享科研成果，成果转化放在一个楼里。还成立了国内首支合成生物产业基金，把研究这一环作为和产业交互的一个点，构成一个“双五环”的结构。

目前已经吸引了 30 多家企业落户光明区，有个公司用微生物发酵的方式生产大麻，这个公司第二轮融资价值很高，还有改造微生物治疗癌症，治疗实体瘤进展效果良好，已经进入融资的阶段。2021 年 12 月 22 号和 23 号将召开工程生物创新大会，这个大会报名的企业相当多，已经不仅仅是吸引科学家的目光，我们要把全国的资金也吸引到光明区来，把科学引领和产业孵化融为一体进行发展。

我们在光明区搞的工程生物产业创新中心，入驻了 38 家企业，有几家是我们自己孵化的，包括刚刚说的大麻合成公司。现在有新的 DNA 重组公司，主要开发生物医药胶水，设在工程生物产创中心旁边，和一家占地 20 万平方米的民营企业产业园在一起。半年左右的时间这里填充了大概十几家企业，占据了这个民营企业产业园的 3 万平方米。光明区已经开始从合成生物里面获取税收，一边研究、一边产业化。其他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主要放在设施和共享上面，而我们主要瞄准产业化。

另一个是脑科学。大脑科学是标准的基础研究，全世界也都在设立脑的专项研究，经过几年的发展，现在形成了 700 人左右的队伍。有深圳脑创研究院，投资了 7 个多亿的设施，包括动物模型等；在深圳设立了脑科学技术产创中心；大学成立了生命健康学院；还有一个诺奖实验室，成立了国内首家脑科技产业基金。六位一体，模式差不多，一手设立科研机构、一手设立产业，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和发展。我们在科学研究方面，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自闭症的猴模型，要治疗自闭症不能直接用人，改变了猴的基因，出来以后就是标准的自闭症，价值非常高。目前，已有很多大型国际药厂跟我们合作，自主研发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精度最高的脑头骨解析仪器，这个仪器除了看脑神经，也可以看身体其他的组织。2021 年我们第一次面向全球召开首届脑与健康科技产业大会，线上观看人数突破 140 万人，吸引了大量的投资人，企业家对脑科学也有很大的兴趣。

现在我们的光明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占地有 1 万平方米，我们还在旁边准备了 5 万平方米产业园区，把科学研究和产业化紧紧连在一起，脑科学的融资已达上亿元，估值非常高。我们还有一所理工大学，主要依托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在粤的力量筹建。首批教师都已经到位，都是从全球招聘的学术水平位列世界前 2% 的顶级科学家。这个大学采用“三位一体”，即书院、研究院和学院的模式。在现有的传统大学学院和系上面设立研究机构，这个研究机构和学院是平级的，这是一种新的尝试。我们的研究机构至少有 300 多人，多时可达上千人。大学里搞科研基本上是一个老师带几个学生，而我们除了 0—1 的研究，还可以做到 1—100 的研究，坚持科教融合，同时将大学和产业紧密联合在一起，产教融合、加强国际化，并与香港合作对体制进行创新。

以上是光明科学城的国际化和产业化特色，希望成为新时期我国新兴产业的策源地，起到像麻省理工学院（MIT）、哈佛大学在波士顿的作用。

产学研用
助力科大讯飞砥砺前行

■ 杜兰 / 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华南人工智能研究院董事长

在科技创新这条路上，科大讯飞已经走了 22 年。尤其是在2019年我们被美国列入第一批实体清单之后，面临非常多的困难、困惑和思考。

我觉得科技创新要把握住逻辑，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业，在这样一个路径上，怎么样实现各个方向的转化？我认为要聚焦解决四个矛盾。

第一，深耕科学发现，解决坚持核心源头技术创新和只做短期的浅层应用之间的矛盾

改革开放前 40 年，我们的科技创新大都是跟踪式的创新，解决的是从无到有的问题；而当前我们的科技创新，要解决的是从弱到强的问题。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去做核心技术创新？老百姓不理解，抱怨这么多龙头大企业，不去做核心技术创新，却和小摊贩争抢一根葱、一棵白菜的钱。我想告诉大家这是因为核心技术创新这条路太艰难了。例如，今天在会场上大家看到，发言嘉宾的声音不但能即刻转换成文字出现在大屏幕上，而且还可以做到同步翻译。要让机器像人类一样听懂一种语言非常困难。我们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开始相关课题研发，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运用统计学分析方法后，才实现了连续语音识别。21 世纪初，我们实验室的语音识别功能已经可以听懂 95% 的人说话。但在实践中因为收音设备的限制，以及口音识别等困难，语音识别的准确率不到 70%，所以那时没有人愿意使用这个技术。直到 2010 年，在大数据广泛应用、核心算法获得重要突破下，语音识别准确率达到了 95% 以上，才逐渐受到推广使用。今天，人们坐在汽车里已非常习惯用语音控制开关天窗，用语音下达去哪里、听什么歌等指令，充分享受万物互联时代人机交互的便捷。

但是为了实现今天这一切，我们的科技研发人员前赴后继花费了 80 年的时间，因为即使是很小的一个功能进步也都是非常难以实现的。Gartner 技术成熟度曲线非常直观地告诉我们，一项技术从研发到产业化应用，最少得经过 5 ~ 10 年的时间，这是一个普遍规律。但是现在又有多少人、多少企业有板凳敢坐十年冷的精神，

杜兰

愿意也能够沉下心来做事呢？科大讯飞走到今天主要源于 8 个字：命中注定、源于热爱。但很多企业首先需要考虑的是生存问题，面对生存的压力与艰辛，兴趣、情怀等都只能暂时放在一边。所以，政府的支持与帮助非常重要，政府应该对有科技创新潜力的企业予以大力帮扶，应该设立一些专项资金推动各类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积极推动公共技术能力以及各类边缘交叉学科的融合研究，这在当下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从科学走向技术以后，解决产学研用难以融合发展的矛盾

科大讯飞是一个产学研用融合发展的创新主体。前不久西安交大的校长在一次会议上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他说最后一公里到底怎么样实现？现在有很多企业的技

术转化力量是和高校一起合作完成的，高校的基础科研、基础支持是相当牢固坚实的，一旦瞄准了方向，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跃上一个台阶，而企业的优势是对市场和产业的方向非常敏感，善于把握前沿的方向。

高校与企业的合作最重要的是抓住两点：一是要以企业为主体，因为企业对产业的方向更具前瞻性；二是企业和高校的科研力量要能够做到利益共享。从逆向创新的角度，企业可以在工业质检、在实际应用中给科研指出问题、指出方向。科研人员也可以在企业使用中发现研发的不足。比如，机器在运转过程中有没有困难、有没有问题？科研人员可能用声学成像仪来听，帮助发现问题。在产学研用的良性循环中持续发展，关键就是要把技术投入市场，要能够用起来，各类应用场景的开放是推动技术创新的关键。就像我们在广州南沙和汽车公司的合作，如果汽车公司不把最新的车型对我们开放，我们很难获知各类智能座舱的体验和场景。

第三，助力产业发展，解决系统性创新和单点突破创新的矛盾

技术发明要想从市场的应用到产业的构建实现飞跃，最重要的是要解决当下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比如传统产业的升级，医疗、养老、教育等。但是这些问题不是一两家企业或者是一个单点的应用创新能解决的，必须要通过整个产业的系统性创新才能解决。在这方面，我认为龙头企业应该发挥关键作用。为此，科大讯飞在做一些尝试，比如上个月发布了一个开放平台的 2.0 战略，联合行业中最有资源、最有能力特别是最有平台能力的一些行业龙头，共同搭建行业的基线底座，把一些开放的场景给广大的开发者免费使用，让开发者汇聚各种创意。以期达到让更多人非常方便地享受科技成果的效果。现在大家在市场上看到的各类人机交互服务型机器人，90% 是科大讯飞开发研制的，因为我们为开发者搭建了一个机器人的平台。很多开发者过去要做一个这样的交互可能花费 3 个月时间，现在只需要一天半的时间。开发者可以直接把这些方案调用、集成，一接入进来就可以具备这样的能力，只要再去做一些个性化的配置就可以了。我们认为龙头企业要发挥这样的大平台带动效用，推动技术的转化和技术的共享，带动整个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集聚各种创新思想，形成大中小企业融合发展的格局。

第四，要夯实科技人才支撑，解决机制单一化和需求多元化之间的矛盾

科技创新有技术的研发、技术的转化和产业的创业发展，各个阶段都需要不同的人才。现在人才评定存在一刀切现象，没有考虑到很多行业发展实际和所有制的差别，导致新兴行业的人才，特别是融合性的人才很难得到认可，很难得到各种政策的支持。我们建议一些人才评定权可以下放给企业，让企业通过各种量化方式来进行评定。同时我们也希望不仅关注院士、院长，还要关注各种各样的专业人才。要推动各种科研实验室进入高校，校企合作推动产业人才的培养，甚至我们要将一些人工智能的课程开放到普通高校，像培养人工智能的蓝翔技校一样，培养产业型的人才。我们也希望把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等科普课程开到 K12（学前教育到高中教育）学校，让孩子从小就树立起一种“追星就追科学家”的意识，从小就培养崇尚科学、拥抱科技的理想。

科大讯飞总部设在合肥，合肥从最初的二三线城市成长为一个科技创新的中心，我们伴随其成长并在发展过程中深刻感受到当地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今天在粤港澳大湾区，我也感受到了这里的勇敢、包容和融合。希望这里能营造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和拒绝平庸的创新氛围，让一颗颗创新的种子能够在这里发芽并蓬勃生长，形成一个富有活力的湾区生态。希望企业界、学术界、科技界等各方能够一起努力，打造一个共生共融的产业生态。

科技创新峰会学术讨论

主持人：王元丰，IFF学术委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嘉　宾：龚　克，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
王瑞军，第20届联合国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主席、韶关市委书记
樊建平，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
赵志耘，中国科技部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杜　兰，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华南人工智能研究院董事长

王元丰：我想先问龚克主席一个问题，您现在是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的主席，中国在工程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大家一直在讲中国的工程技术随“一带一路”走出去了，中国的标准怎么走出去？中国怎么通过工程促进全球化？

龚克：我自己不太赞成所谓中国标准走出去这样的思路。我是做通信的，拿移动通信来讲，中国移动通信在过去 30 年间有了非常大的进步，现在第五代移动通信中来自中国企业的专利数量，以及中国技术对第五代移动通信国际标准的贡献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但即便如此，我个人还是不太赞成“领跑”的说法，我认为至多是在“并跑”。

第一代移动通信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技术，只能被动采用人家的标准；第二代移动通信的国际标准选用的是欧洲标准，所以我们也是采纳欧洲标准；第三代移动通信开始把 SCDMA（同步码分多址的无线接入技术）作为中国的标准推向世界，但是在产业上不太成功，中国三大运营商中只有一个运营商在政府鼓励下应用了这套标准；从第四代移动通信开始，不是把中国的标准变成国际标准让其他国家采用，而是我们融入到 3GPP（第三代合作伙伴计划）的合作创新中，第四代移动通信标准的两个主要技术路线中都有我们的重要贡献。所以我觉得标准问题的思路应该是积极融入国际标准，和国际同行一道把中国的贡献、中国的智慧融入国际标准里面，而不是制定出中国的标准，然后把它变成国际标准让世界各国接受。我觉得无论是从策略上还是从效果上讲，都应该强调融入国际标准，在国际标准中体现中国的贡献。

王元丰：谢谢龚主席。接下来我想请问瑞军书记，怎么吸引更多的人才到韶关？在传统产业转型、新兴产业发展，以及更好地实现城市定位等方面，您有怎样的考虑和打算？

王瑞军：一个地方发展要靠人口、人才、人流，首先要有人口基数，这和产业发展是互为前提的，先有人才还是先有产业，就像说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讲，我认为两者要齐头并进，不能让暂时的短缺成为发展的束缚。

现在韶关在吸引人才方面有几大优势，第一大优势是韶关绿水青山环境优美。很多国外回来的人，他们在国外的家、工作的企业或者大学研究所本身就是在大郊区，所以一线大城市对他们的吸引力并没有那么大，他们回国后很适应韶关的自然环境。第二大优势是政策和营商环境，现在韶关推出“百团千才万匠”人才工程，这个工程很有竞争力和吸引力。第三大优势是科技创新支撑碳达峰、碳中和，就是要找到应用场景，把韶关打造成为最新技术研发应用最好的城市，通过产业把人才吸引过来。最近我在做一件事，就是在韶关市科技局恢复人才科，恢复外国专家科室，在这方面我们也会得到错位优势的发展。

王元丰：谢谢瑞军书记，韶关的自然环境有吸引力，政策环境也很有吸引力。赵志耘所长，您是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现在大家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像电力、蒸汽机一样的通用技术，对整个科技发展、产业发展都非常重要，未来在推动人工智能、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兴产业方面，国家有哪些考虑和打算？

赵志耘：这些年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快速发展，确实是因为各种各样场景的开拓，技术通过产业的应用迭代，应用场景提升了发展的速度。人工智能技术目前正处在从点的突破到整体提升的新阶段，这与我们国家这些年来从产业界倒逼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并不断深化拓展

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自己研发的一些人工智能芯片也已经进入商业化应用阶段，从企业整体的发展态势来看，在经过了近几年优胜劣汰的阶段以后，人工智能市场格局已经进入整合期，投融资热度也开始逐渐变冷静。在这样的方向下，政府层面要先搭建好人才的培养平台，特别是顶尖的人工智能平台。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和美国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以半导体领域为例，为什么美国能够这么有底气打压华为，就是因为任何国内的企业在做半导体企业时，基本都不可能在芯片方面绕开美国的技术和设备。美国的操作系统无论是在电脑还是在其他领域，已经占据了 98% 以上市场，所以他有底气打压我们。

我们怎么办？肯定要先突破高端人才、顶尖人才的压力，然后突破自主可控的关键核心技术的关卡。有了关键的核心技术，有了与突破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基础研究，未来我们的市场投资以及我们的产业化程度优势一定会充分发挥出来。目前中国工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和市场优势以及多场景应用非常丰富，特别是在基础设施领域。这些年来很多针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新基建，包括算力设施、实验设备，已经形成一定算力的网络，都可以支撑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未来政府在相关基础研究方面会发力，而且也会用政策去引导市场，引导企业更多投入与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研究，同时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制度优势一定会起很大的作用，形成刚才我讲到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发展的良好态势。然后，再借助我们在创新生态方面、产业生态环境方面的优势，让技术赋能场景创新，赋能产业创新。有了这些基础，有了我们整个创新生态政策，比如成果转化政策引导，一定会为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抢占国际竞争制高点做出很好的铺垫。

王元丰：谢谢赵所长。樊院长，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是综合性国家研究中心，但是产业化做得很好，这很难得，您能否简单说一下，您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樊建平：因为深圳科学城的建设资金和其他三个不一样，其他三个主要是中央政府拨款支持，深圳科学城建设的资金主要来自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的钱最终还是要产业化的。所以我们拿了地方的钱，必须要有回报，这也逼着我们走了一条和北京、上海不一样的路。

当然，作为科学家我们本不想花费时间和精力搞产业，但被迫着反而走出了一条新路。过去我们搞科学研究的模式和流程，一般是先科学研究、基础研究、技术

开发，然后再产业化，现在看来不必拘泥，完全是可以一起做的，如果脑科学跟合成生物可以这么干，我感觉其他的科研项目也可以。

王元丰：最后有请杜兰董事长，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受外部打压，科大讯飞在教育领域又受到“双减”政策影响，您简单说一下，怎么克服这两方面的挑战？

杜兰：我们基本上还是做到软件开发完全自主，不太依赖外部的力量。在美国打压之后，我们国际化的战略可能会放缓一些，把精力更聚焦在中国的语音市场。我们将主要做两方面的产业化，一是人机交互的能力；二是机器学习的能力。在教育、医疗领域的核心还是要让机器给普通人去赋能。在教育上，“双减”之后反而更加需要我们这种自主化学习，人工智能、大数据后台算法可以找到每个孩子的知识薄弱点，让因材施教离我们更近一些。

王元丰：首先我们要有自主核心技术，我们的技术是要让孩子更好地成长，而不是让他们做过多的课外作业。谢谢！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到此为止，我觉得今天的讨论非常有收获。首先在理论上，刘燕华部长讲了创新的形式和要求，赵志耘所长谈了全球创新的趋势，以及中国面临的风险和建议，龚克主席谈了现在技术发展对全球化的要求，以及我们怎么进一步做好全球化，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开放创新的信心。王瑞军书记具体讲了韶关通过创新促进产业转型，促进碳达峰、碳中和方面的实践，樊所长讲了综合性科研中心两条腿走路，科研与产业化融合发展，杜兰董事长从企业的角度，谈了在科技创新几个方面的思考，都对我们很有帮助。

企业家圆桌会议

IFF 学术委员、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执行副会长 237
柳磊：践行 ESG 理念 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云南白药总裁 239
董明：云南白药对 ESG 的探索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241
寇光武：践行 ESG 理念，实现新的跨越

中集集团高级顾问 243
吴发沛：让“报告促管理”成为一种制度安排

贝壳找房副总裁、
贝壳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245
贾生平：贝壳找房贯彻落实 ESG 理念的实践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247
尹恩刚：中国广核 ESG 管理的实践和体会

中证指数公司 ESG 业务部总经理 249
赵永刚：ESG 评价和 ESG 指数在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安永亚太区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主管 251
李菁：基于 ESG 投资新动向的管理建议

企业家圆桌会议学术讨论 253

践行ESG理念 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

■ 柳磊 / IFF 学术委员、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执行副会长

柳磊

本次企业家圆桌会议环节由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和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举办。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多家优秀上市公司代表以及中证指数公司，以“践行 ESG 理念 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为话题，共同探讨如何推动 ESG 与企业经营相结合、思考建立健全 ESG 内部制度和管理框架的路径，交流境内外上市公司先进经验与体会，展现上市公司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和履行社会责任先锋队的风采。

2020 年 9 月 22 日，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2021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深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为促进绿色转型做出积极贡献，已成为企业决策和发展的重要方向和目标。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正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企业微观层面的反映。在中国证监会的领导下，围绕“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的目标，中国上市公司协会高度重视推动上市公司 ESG 工作，通过交流、倡导、培训等多种方式，积极推动上市公司树立和践行 ESG 发展理念。

下面，我想和大家交流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上市公司正不断加深对 ESG 理念的认识。作为资本市场发展的基石、国民经济的主力军，上市公司在践行新发展理念、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战略方面先行表率，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企业认为持续经营能力会助力企业保持长期竞争力，坚持可持续发展路线，秉承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不断提升自身环境保护意识。已有部分公司连续多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救灾扶贫、公益事业等工作奉献力量。公司也更加重视并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和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制度体系，优化运行机制。

第二，在积极开展 ESG 工作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上市公司质量。30 余年来，资本市场推动了我国现代企

业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健全，增强治理能力正是实现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作为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上市公司在保护环境、履行社会责任、公司治理、ESG 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从公司实践来看，大部分蓝筹股公司均构建了高层深度参与、横向协调、纵向联动的 ESG 管理组织体系；上市公司不断强化 ESG 信息披露，提升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有效性和针对性；探索尝试国际上广泛认可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架构下的披露模式，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此外，上市公司积极加强与评级机构、投资者及利益相关方的沟通，对标行业最佳实践，持续改善 ESG 表现，这些受到了广大投资者和市场的充分认可。

第三，充分发挥上市公司协会自律服务组织作用，开展上市公司之间 ESG 工作的宣传和交流。2021 年，协会充分利用贴近公司的优势，汇编发布了 133 家上市公司的《上市公司 ESG 实践案例》，发挥优秀实践的榜样作用，将推进 ESG 工作作为上市公司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根据协会发布的《中国上市公司 ESG 发展白皮书（2021）》，2021 年披露 ESG 相关报告的 A 股上市公司超过 1100 家，相较十年前增长了近三倍。促进 ESG 工作的宣传和交流，将更好地推动上市公司履行其肩负的政治责任、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自 2012 年成立以来，始终以“服务、自律、规范、提高”为基本职责，致力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促进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切实服务好上市公司，并力求与会员上市公司共同进步。

接下来，协会将积极推进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将继续办好上市公司“关键少数”相关培训和交流座谈。在已累计培训上市公司“董监高”人员三万多人次的基础上，协会将进一步探索开展更多 ESG 等方面的专题培训和座谈会，引导上市公司“关键少数”重视 ESG 相关工作，督促公司明确自身职责、规范运作，促进公司之间交流，借鉴先进经验。

二是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协会将切实帮助会员解决实际问题，建立常态化的诉求反应机制；利用好贴近市场、贴近公司的天然优势，发挥各行业委员会的专业优势，为公司创造形式多样的 ESG 讨论交流机会。

三是持续发挥自律组织作用。作为证监会主管下的全国性上市公司自律组织，协会将继续积极完善自律管理网络，加强与各相关单位、专业机构的交流联动，形成工作合力。配合监管机构推动相关制度完善，协会将积极推动 ESG 与企业经营深度恰当结合，助力上市公司及资本市场体系持续健康发展。

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了多家优秀的境内外上市公司代表，一同探讨公司在 ESG 工作方面的先进经验与体会，接下来，有请各位嘉宾为我们带来更深入的讨论。

云南白药对ESG的探索

■ 董明 / 云南白药总裁

董明

ESG 是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它不仅体现在对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责任，它更多的是一个新型的商业设计。一个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把 ESG 的核心理念放到企业的战略规划和业务设计中，这个企业就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表现。

云南白药创建于 1902 年，2022 年就是云南白药创建 120 周年纪念。云南白药于 1993 年上市，是云南省第一家上市公司，到现在为止已经连续 16 年净资产收益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云南白药上市以来对投资者的资产回报率达到了 650 倍，总计为国家上缴税款达到 180 亿元。

除了获得良好的经济收益以外，云南白药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在 ESG 方面的贡献。

2018 年 4 月，云南白药被纳入 MSCI 的 ESG 评级，特别是在 2021 年被评为 A 级公司，是云南省第一家获评 A 级的上市公司，也是深市医药企业里获得 A 级评价公司之一。

这么多年来，因为从事的是健康行业，云南白药在发展过程中，除了注重经济效益外，始终牢记对健康产业的责任，对社会的贡献。在过去的几年里，云南白药已经把 ESG 当成公司的重要发展动力，在公司内广泛深入地讨论、学习，积极驱动共识，夯实发展基础。

作为大型医药企业，云南白药肩负着对中药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使命，多年以来云南白药一直在探索推进野生植物（中药资源、中药材）的保护和驯化，较好地保护了中药资源植物的多样性。作为云南省的国企，云南白药扎根社区，在云南省的各个市、县大力推动中医药产业，积极联系当地农民，助力云南省的脱贫工作，充分展现了大型国企的社会担当和责任意识。

在这里我想讲一下云南白药对 ESG 的理解。

我们认为 ESG 是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它不仅体现在对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的责任，它更多的是一个新型的商业设计。一个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把 ESG 的核心理念放到企业的战略规划和业务设计中，这个企业就会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表现。

上市公司协会的宋志平会长曾经建议用绿色治理给 ESG 命名，这对我们特别有启发。

首先，绿色治理是一个重要理念，它将会为公司所有人员和各个业务板块的发展提供指导和共识。其次，绿色治理也是非常重要一种制度建设，包括企业行为准则、环境类的制度，包括健康安全类和信息安全制度等，

也包括反腐败、商业道德类的制度。在这些制度的共同推动下就形成了企业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方针和保障体系。最后，绿色治理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诺，是对资本市场的承诺，也是对社会环境的一个承诺。

云南白药在 ESG 方面做了很多实践，连续 14 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2021 年首次发布了 ESG 暨社会责任报告，这个报告共有六大部分，这里不详细阐述，我只讲两个比较好的实践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云南白药建立了数字化可追溯体系。在中药领域，要想实现药到病除，除了药方开得好，照方抓药时是否能拿到高品质药材也是关键因素。为了让我们的患者或用户能拿到优质药材，首先要确保对自己品牌的药材做到质量可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云南白药在过去几年里进行了大量的、全产业的数字化建设。目前，我们能够做到对任何消费者选用的云南白药品牌药材进行追溯，追溯到购买渠道，追溯到生产线，追溯到具体生产的合作伙伴，甚至追溯到药材产自哪一块地哪一株植物，这一套体系给我们云南白药的药材质量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作为一个国有大型药企，责任和使命意识让我们认识到这一套追溯体系不应该为云南白药独有，不应该只作为自己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单独建设，这套追溯体系应该服务于更多的企业，服务于一个更大的平台，所以我们就把这套数字化可追溯体系贡献给云南省的中药种植协会。现在整个云南省有非常多的药企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药材数字化管理，基本做到了品牌药材质量可控，极大地提升了药材的质量。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同心计划”。云南有很多药农、花农、果农、咖农，有非常多的农业人口在从事跟自然禀赋相关的重要行业。但是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做事不够规范，为了在工作方面给予有效支持，云南白药在云南积极推动“同心计划 ”。云南白药把重要的资源品种，比如三七、重楼等，选出最好的种子进行种植，三年之后交给农民继续种植四年，并在四年中对药农进行种植技术辅导，四年后云南白药再把它从药农手里按价回收。这样既解决了农民不太会选种的问题，确保了对药材种子质量的把控，同时又为药农种植的药材找到了稳定销路。“同心计划”是云南白药重要的 ESG 实践，充分体现云南白药的社会贡献。

综上所述，云南白药认为以 ESG 的标准牵引企业的发展，把 ESG 的标准贯彻到企业的各种流程建设、制度建设以及更核心的企业理念中去，这其实不是额外的负担，而是一种更高使命和更大发展能力的加成。所以云南白药非常欢迎，并且十分重视 ESG 在企业中的实践，也希望未来能在这方面作出更多的探索和贡献。

践行ESG理念，实现新的跨越

■ 寇光武 /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践行 ESG 理念，实现新的跨越》。我的分享分为三个部分：万华基本情况介绍，万华对 ESG【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和 Governance（治理）】的理解，以及万华在践行 ESG 理念方面的探索和实践。

一、万华基本情况介绍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全球化运营的化工新材料公司，万华化学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为第一核心竞争力，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业务涵盖聚氨酯、石化、精细化学品、新兴材料四大产业集群，所服务的行业主要包括：生活家居、运动休闲、汽车交通、建筑工业和电子电器等。

作为一家全球化运营的化工新材料公司，万华化学拥有烟台、宁波、四川、福建、匈牙利五大生产基地，并于多地配套工厂，形成了强大的生产运营网络。2021 年前三季度公司营业收入 1073 亿元，同比增长 11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5.4 亿元，同比增长 265%。

二、ESG 对万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深远意义

ESG 来源于可持续发展理念。1987 年，联合国第 42 届大会第一次阐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2015 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通过《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被称为“改变世界的 17 项目标”，到 2030 年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问题，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

万华化学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化工公司，在企业发展不断取得跨越性突破的同时，实现了社会责任、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的“多赢”，这主要取决于万华始终坚持 ESG 理念，始终秉持绿色可持续原则。万华早在 2005 年就在第 17 届世界安全健康大会上签署了《世界安全宣言》，2007 年成为中国“责任关怀”首家试点企业，2015 年签署了《责任关怀全球宪章》，2017 年成为 Ecovadis 会员，2019 年加入 TfS 和联合国全球契约。

鉴于公司在 ESG 方面的优秀实践，万华化学于 2016 年作为发展中国家唯一受邀代表，出席第二届联合国环境大会并做可持续发展主旨发言，于 2021 年荣获欧盟 EcoVadis 颁发的全球性企业社会责任（CSR）评估金牌认证勋章。

寇光武

三、ESG 理念的探索和实践

万华始终将员工、相关方、社区民众的安全健康、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视为我们神圣的职责，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负责公司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1. 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万华化学始终坚守绿色环保的发展理念，率先提出了“零排放”的环保目标。针对废水特性，万华烟台工业园投资约 15 亿元建设了生化废水处理、高浓度废水处理、综合废水处理等废水处理回用设施，中水回用率可达 75%。针对储罐呼吸气、装卸车废气、安全阀呼吸气、污水处理设施挥发气等废气，高标准建设了废气收集输送和处理设施，实现了污染物超低排放。同时，万华化学高度关注全球气候变化这一当前人类面临的重大挑战，

早在 2018 年可持续发展规划中就提出“碳减排 2025 目标”，积极调动内、外部资源，布局投资光伏和风电项目、采购绿色电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探索并努力践行“碳达峰、碳中和”行动。2021 年 1 月，包括万华化学在内的 17 家石油和化工企业、化工园区以及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在京联合签署并共同发布《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碳达峰与碳中和宣言》。

2. 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

感恩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万华的特色文化，万华在稳步发展的同时不忘回馈社会。

在 2020 年初新冠肺炎暴发之际，万华化学勇于担当，迅速反应。向湖北红十字会捐款 500 万元用于新冠病毒的治疗研究和防护设施的购置，并持续向各防疫相关单位捐赠防护服、消毒液、护目镜等防疫重要物资。我们积极携手上下游，无偿捐赠防疫用品生产所用的相关化学材料，从火神山、雷神山建设所需的胶粘剂产品到医护人员使用的口罩调节器，万华竭尽所能，为抗疫做出贡献。

2021 年 8 月，新冠肺炎疫情突袭烟台，万华化学第一时间组织全体员工及外来人员进行核酸检测，累计检测数量近 5 万人次，在排查隐患的同时，也缓解了公共医疗资源压力，减轻一线工作人员压力。我们向烟台红十字会捐款 600 万元，用于定点医院的防疫设备采购，与烟台携手战疫。

万华建立起覆盖小、中、高、大学生等全年龄段的科普创新类公益项目，已为近万名学生带去神奇有趣的科普知识，尤其是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进行公益捐赠和授课。为改善困难家庭儿童的生活学习环境，万华化学向“希望小屋”等儿童关爱项目捐款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

3. 在提高治理水平方面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并且通过改革企业体制机制，为万华创新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和活力。

一是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万华的第一次改革是在企业经营最艰难时期，面临着破产的风险。万华以最有希望的 MDI（二苯基甲烷二异氰酸酯）分厂为主，争取到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政策，引入了烟台冰轮、东方电子等四个国有股东，启动股权多元化改革，完成了第一次所有制改革，建立起规范的“三会一层”，着力打造现代企业制度。

二是深度打造混合所有制企业。万华基于企业发展战略和留住人才的需要，先后设立两个员工持股平台，两次对外实施增资扩股，对万华集团进行了投资主体多元化改造，实现了高管人员、核心骨干和专业技术员工持股，进一步巩固了经营、研发团队。同时，万华严格标准，积极引入外资，推进国际化进程，顺利完成了收购匈牙利最大的化工公司并实现扭亏为盈。该案例被《国际金融评论》（IFR）评为 2010 年度欧洲、中东、非洲地区最佳并购项目。2018 年，万华完成了整体上市，这一举措使公司能够进一步整合国内和海外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和规模效应，有助于提升上市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抗风险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保障了全体股东的利益。

三是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企业文化。公司持续萃取、提炼、传承、发扬优良企业文化，助力公司卓越运营。在多年卓越运营、历史沉淀的基础上，万华形成了由使命、愿景、核心价值观构成的企业文化。在企业文化的指引下，我们努力在万华建立一个没有裙带关系、没有山头主义、风清气正、文化纯净的组织，这是万华可持续发展的保障。只有把优良企业文化代代传承下去，营造公平公正、有为有位、业绩导向的文化氛围，才能实现百年万华的宏伟目标。

万华一直致力于绿色化工，践行“化学，让生活更美好！”的使命，而这也正是我们的 ESG 理念，体现了公司经营的终极目标是为人类社会创造美好生活。憧憬未来，万华化学将肩负起新时代下化工行业绿色低碳发展的社会责任和使命担当，计划在 2025 年前，将 COD 排放削减 15%、碳足迹削减 20%、水足迹削减 20%，并持续围绕碳中和，开发和储备一批碳减排和利用技术、绿色环保产品技术，持续聚焦前瞻性技术研究，不断向高端化工新材料下游领域迈进，为绿色经济建设贡献力量。

让“报告促管理”成为一种制度安排

■ 吴发沛 / 中集集团高级顾问

吴发沛

中集集团于 1994 年上市，股票代码分别为 000039 和 200039，是 A+H 股。我们的下属公司中集车辆，也是 A+H 股，我们的安瑞科是 H 股，空港设备正在回归 A 股的过程，所以都和上市公司有关系。这是第一点想要分享的。

第二点我想说的是我的 Title，我从 60 岁就不做副总裁了，现在任集团可持续发展报告领导小组的组长。集团架构里有几个专业委员会，我属于其中一个。我主要讲三年来做的一些事情，就是中集怎么样用好 ESG 报告来驱动管理，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所以我的题目叫做：让“报告促管理”成为一种制度安排。

可能很多企业都在做 ESG 报告，对国内上市公司来说，原来做的是 CSR。在我接任这个管理报告之前，我们也是做 CSR，我接任这个报告的契机是香港联交所发布了一个 ESG 报告的信息披露指引，里面有很详细的要求，也就是原来的 CSR 报告已经不能够适应联交所的要求，那时我们研究怎么把它合到一起推动中集的管理。

我们的 ESG 报告做了三年，应该说获得了社会的认可， MSCI 我们最好能拿三个 B，在我们的行业里面这样的评级应该是不错的，因为在我们整个行业都不可能拿到 A。

再有一点，如果从 CSR 开始算起，我们连续 12 年发布报告，但实际上过去三年，整个中集旗下是两份 A+H 的报告，集团总部一份，中集车辆也是 A+H，安瑞科是 H 股的，还有一份是集装箱产业，在内部独立做了报告，所以我们用三年时间构建了整个集团的 ESG 报告，我们称之为 CRS&ESG 报告体系。还有一点，就是外部的认可，同时也获得了一些奖项，感谢外部很多同仁对中集做这件事情的认可。

为什么说这是一种制度安排呢？从集团角度怎么看这份报告呢？从报告本身和报告与管理的关系，我有三点体会。

第一，制度安排是有组织保障的。我这个位置在集团里面是直接向总裁汇报的，按照联交所的要求，我们

也有很多东西是要通过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再提交到董事会来进行表决，这是整个公司治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主要的工作是撰写 ESG 报告，我们集团很多人说我们是可持续发展领导小组，我说不是，我们只是可持续发展报告领导小组，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我扛不起所有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但是我可以把报告做好。这是第一点，即报告本身是一个制度安排。

第二，全集团多个上市公司怎么样协同一致。我们每年都有很多的沟通会，让所有上市公司在整个中集的可持续发展框架内表达我们自己的内容，过去两年基本上围绕着四个方面，第一是深化责任管理，第二是助力全球物流，第三是彰显企业关怀，第四是应对气候变化。我们所有的业务和业绩工作都围绕着这四个工作方向，各自讲相应的板块，但是方向、逻辑是一致的，就是所谓的步调一致。

第三，管理推动。这个报告做出来，不仅仅是给外面的人看，还给内部的人看，也做很多管理分析。我们每年都有一些根据报告得出的数据，会给管理层提供很多的分析。这个分析是我们自己的管理体系，叫战略管理、商业计划、管理报告、内控内审和绩效考核，这是中集“5S 的管理流程”。ESG 报告就嵌入到这个管理报告当中，把报告融入整个公司的管理流程来运作，这样使得我们能够真正地发挥作用。

以上说的是制度安排的内容，过去三年来，我们具体做了什么事呢?

第一，上市公司最讲究合规遵从，因为联交所数据要求得很具体，我们需要列出联交所要求的从今年开始的 A 类指标和 B 类指标，若有一个不遵守，就需要解释。我们内部的原则是力争不解释。什么叫力争不解释呢?就是遵从，去披露，刚开始很多数据是没有的，怎么从无到有，这是第一。

第二，中国上市公司有 CSR 的规范、有年报的规范，我们怎么把香港联交所的要求和深交所的要求融合在一起，比如什么报告要放到年报里面，年报怎么和 ESG 报告的数据保持一致性，怎样从无到有，从粗到细。

第一个特点，很多数据刚开始没有，那就粗一点，进行推算，每个企业不可能都能统计到含碳量，收集了 50%，剩下的就用推算。第二年，变成 60% 的企业有统计，再逐渐变成 70% 的企业有统计，当数据越来越多的时候，数据就可以从粗到细，从粗到准。我们坚持的“合规遵从”，就是严格按照要求，争取不解释。

第二个特点，始终坚持做利益相关者调研，连续做了三年。我们一直和安永，也和很多外部机构一起做调研，这个数据我们今年正在做。我们的利益相关方参与的人数已经超过20000人。这个工作指导整份报告编制的方向，实际上也指导了整个中集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第三个特点，专题分析。我们引进卓越绩效准则，里面有一条，叫测量分析、改善以及知识管理，所以写报告不是目的，目的是通过报告过程进行测量和分析，然后指导改善。比如 2021 年 9 月、10 月份的时候电力很紧张，我们就专门写了一个报告，提出了一个管理行动方案。全集团屋面光伏全面推进，以前都是各家工厂愿意推就推，不愿意推就不推，现在的方案是 300 万平方米的屋面面积全部实施屋顶光伏。

刚好因为这个项目做了一些调研，和今天的会议主题也有关系。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用罐式的船运散装的水泥解决了 PM2.5 的问题，形象一点比喻，就是过去的垃圾车或者泥头车都是开口的，现在采用密封运输方式。整个广东地区有 2 亿吨水泥，大概有一半要走珠江的水运，这些船有没有可能改成清洁能源的，这也是我们在推进的项目。用 LNG 动力，现在省里面也出台补贴政策，可不可能将所有的船（可能有一两万条船）全部变成天然气动力，包括整个珠江流域的船，这也是在报告撰写过程中发现的一些业务改进的机会。

我再简单说一下推进过程中的几个体会。

第一，商业向善。大家都讲到命运共同体，联合国很多年前也提出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企业可以在研究发展战略的时候把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进去，比如第一项消除贫困就可以和精准扶贫、振兴乡村联系起来。

第二，报告体系。在过去几年，推动 ESG 管理是不断推动企业改善的一个很重要的抓手，它不仅仅是对外讲好中集的故事，对内也让中集变得越来越高质量发展。

第三，绿色金融。如果要真正推进，我认为绿色金融将是推动可持续发展非常有力的助推器，中集未来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围绕四个方向，包括冷链、清洁能源、乡村振兴和绿水青山，我们希望在这四个方面都能够帮助社会变得更美好，也让中集越来越高质量地发展。

贝壳找房贯彻落实ESG理念的实践

■ 贾生平 / 贝壳找房副总裁、贝壳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贾生平

贝壳找房是一家科技驱动的新居住服务商，一直致力于推进居住服务产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的进程，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高效率居住服务的同时，也在包括社区公益、乡村振兴、扶贫扶弱、低碳生活等方面持续努力，助力企业、行业和社会的共同可持续发展。并将 ESG 理念融入企业经营和发展过程中，打造更加专业、更加温暖和更有力量的公益新模式。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实践：

第一，社区友好共建和谐宜居城市

对于我们来说，最突出的优势在于深植社区，我们有大量的服务者和大量的门店，都是我们重要的业务资源，也是天然的社区服务和公益资源。我们是在链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今天的贝壳，继承了链家 20 年的社区沉淀，又通过现在在做的贝壳连接行业内更多的新经济品牌，使我们能够发挥社区的优势，将线上和线下结合起来，发动经纪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共同参与打造美好的社区生活。

我们从社区便民服务、社区助老、社区体育竞赛项目等日常的公益活动发展到高考服务站、VR 博物馆等创新的公益项目，打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社区便民、社区助老和可持续社区三位一体的社区公益基站。贝壳为社区提供的志愿服务，包括爱心图书馆、大地美容、应急服务，也包括应急打印、复印等等，还有高考服务站等多项内容。为帮助老年人适应数字时代，享受智能设备的便捷，我们从 2018 年开始在全国开始推广“我来教您用手机”的项目，研发迭代教材，让经纪人成为老年人的小老师。基于社区，为有需要的老年人组织手机培训课程，并开展到店答疑，随时随地帮助社区老年人解决手机使用中的问题。截至 2021 年 11 月底，这个项目已经走进了全国 48 个城市的 1732 个社区，也希望未来的项目能够规模化，不断地迭代我们的服务产品，能够覆盖更大、更多的社区，从城市社区到乡村社区，并且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我们的公益项目中。

第二，从助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方面，介绍一下我们的实践

贝壳通过教育扶贫、产业扶贫等多种方式积极探索乡村振兴模式，助力实现共同富裕。我们为甘肃省泾源县等全国 6 个省区的 7 个国家级贫困县捐建了 11 所爱心小学，为家庭贫困成绩优秀的学生提供资助，包括在这些贫困地区建立电脑教室、爱心图书馆；我们建立“链未来”成长计划，帮助超过 6 万名学生拓展知识边界。

我们的核心帮扶地区是在甘肃省泾源县，它曾是甘肃省深度贫困县之一，现在也是 160 个国家乡村振兴的重点帮扶县之一。从 2017 年开始，我们就聚焦资源对泾源县进行精准帮扶，与当地政府签订了《关于教育产业、健康和精准扶贫项目合作协议》，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受到各级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认可。2021 年 9 月，我们又与泾源县签订了《乡村振兴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义务教育、医疗健康和产业就业等领域展开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化合作。

2018 年至 2020 年，我们在陕西省汉中市佛坪县因地制宜打造了占地约 3266 平米的精品民宿集群样板，利用

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帮助佛坪县推广营销各项民宿旅游和民宿项目，带动他们升级改造旅游民宿产品，助力当地的经济发展。

近期我们又发起了“星光家乡行动”公益项目，鼓励我们的服务者在线上组队完成任务，通过向消费者提供更高品质的服务来积攒“星光值”，当服务者队伍的“星光值”达到一定数值后，我们将以该队全体成员的名义捐赠一所儿童服务站，为留守乡村儿童提供学校和家庭之外的第三空间，帮助乡村留守儿童实现全面发展。这个活动上线 35 天，共有 138 个城市超过 7.6 万名的经纪人踊跃参与。目前我们的活动已经在落地执行阶段，通过“星光值”已经兑换了全国 17 个儿童服务站，在 10 个省及直辖市落成，惠及 600 多位儿童。

第三，绿色发展引领智慧低碳生活

当前全球范围内，能源及产业发展低碳化已成为大势所趋，中国提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我们积极贯彻响应新的发展理念，通过数字技术、公益项目的形式来推动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一方面，我们以技术创新来推动绿色交易。2022 年我们的用户使用 VR 看房累计约 12.9 亿次，省去了经纪人和用户大量的线下交通出行的距离。经过测算，一次的 VR 看房可以减少 140 克碳排放。2020 年我们通过 VR 看房，大概减少了 350 万吨碳排放。此外，从线下到线上，我们坚持绿色办公理念，通过合同在线无纸化签约的方式，节省用纸约 895 万张。

另一方面，以公益行动推动低碳环保。我们携手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发起了“蓝海行动”公益项目，旨在助力福建滨海湿地的红树林保护和修复工作，首期计划种植 32000 棵红树苗，也希望通过“蓝海行动”进一步降低用户线下看房交通出行的频次，传播低碳环保的生活理念。

以上就是我们在 ESG 领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部分实践。2021 年贝壳找房先后发布了《2020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贝壳找房 2020 年度环境、社会及管理报告》，全方位地总结和展示了贝壳在践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实践和探索，也展示了我们不忘初心笃定前行的信念。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始终坚持向上向善，继续扎根社区，以更加专业、更有温度和更有力量的公益行动助力更美好的居住。

中国广核ESG管理的实践和体会

■ 尹恩刚 / 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

尹恩刚

我在这里向大家报告和分享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广核）在 ESG 方面的一些管理实践和体会，也希望通过这次交流有所收获，以改进下一步我们相关的工作。

中国广核是一家清洁能源企业，致力于核电、核能的发展，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3 月。 2014 年 12 月在香港 H 股上市，2019 年 8 月在深圳上市，代码分别是 1816 和 003816，目前我们管理的核电基地有 8 个在运基地，一共有 25 台在运机组和 6 台在建的核电机组，总装机容量达到了 3500 万千瓦，是国内最大，也是全球第三大的核能企业。2020 年我们管理的 24 台在运核电机组，一共实现上网电量 1865 亿千瓦时，与燃煤发电机组相比，减少了标煤消耗 5697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1.56 亿吨，减排二氧化硫 3.5 万吨，减排氮氧化物约 3.6 万吨，相当于植树造林 42 万公顷。核电站的寿命一般是 40 ~ 60 年，但是考虑到前期选址和后期退役，一个核电站的寿命超过百年。所以我们从一开始，在经营管理方面就着眼长远，力求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稳健经营。

中国广核虽然注册时间是 2014 年，但是规划选址最早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每一个电站从开始建造就高度重视环境的管理、社会责任和公司的治理。那时，还没有 ESG 管理的概念，但是我们始终按照这样一种理念在推行和运作，所以 ESG 对于我们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我们的品牌理念就是善用自然的力量，也一直将 ESG 管理的理念注入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之中，通过持续的 ESG 管理助力企业保持高质量的发展。所以多年来 ESG 相关表现也得到了股东、社会以及利益相关方的认可。

首先，在环境管理方面，我们秉持与自然共生、互生、再生的理念，执行了遵守法规、节约资源、污染预防和持续改进的环境管理方针，对运营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做出相应的控制以及管理，坚持从源头进行把关，同时我们践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责任。

中国广核各个核电基地在建设之初就取本底的样本，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电厂运行多年，像大亚湾核电基地已经运营 27 年，现在的环境抽样和本底是保持一致的。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2019 年我们成立了两个公益组织（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和深圳市大鹏新区珊瑚保育志愿联合会），对大亚湾基地进行独立调查，发布了《大亚湾核电基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报告》。报告指出，由于大亚湾核电站长期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实践，在整个核电基地的陆地和周边的海域形成了物种丰富的生态圈。基地范围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6 种，周边海域发现国家二级保护的珊瑚种类 15 种，在阳江基地的电厂周边，可以看到中华白鳍豚在那里畅游。

其次，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广核将气候相关的风险，如高温化以及极端的天气纳入了经营风险评估和管理的一部分，进行相应的演练，不断地强化公司风险防范的能力，持续提升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比如 2021 年东北地区昼温突降，并伴有大量的降雪，辽宁大连红沿河核电站提前启动了机组的防冻预案，和电网密切沟通协调一致，保障了机组的平稳运行，为解决供电紧张问题做出了我们应有的贡献。

第三，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中国广核也始终秉持

“安邻、友邻、暖邻”的原则，在实现企业发展的同时，积极参与市区的公益事务，与公众展开常态化的沟通，以诚挚的服务回馈社会。因为核电站的周边有 5 公里发展限制区，限制区对周边村镇的发展还是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我们常年坚持对周边村镇进行扶持、给予回馈。

多年来，中国广核积极履行中央企业的社会责任，主动承担国家乡村振兴的定点帮扶任务，我们帮扶的对象是广西百色的凌云和乐业两个县。经过帮扶，到 2020 年，这两个县已经顺利实现了脱贫目标。除了产业扶贫，中国广核还积极参与教育扶贫，我们的教育扶贫理念是扶志和扶智。一个家庭中的孩子若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能够健康成长，可以彻底解决一个家庭的贫困问题。所以我们从 2017 年开始资助创建白露班，2018 至 2020 年间，白露班本科上线率实现了 100%。

第四，在公司治理方面，中国广核认为良好的企业管理是公司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也是为股东创造价值不可或缺的元素。企业管理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致力于构建稳定的公司治理架构；二是致力于严格遵守两地的监管规则；三是致力于公司内部的控制和风险管控。

中国广核设立了三级联动的 ESG 管理体系，在公司治理层面由公司董事会和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议有关重大事项， ESG 报告向董事会汇报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负责推动落实。在组织层面根据公司业务职能成立不同的项目组，统筹协调各成员公司的相关工作，如绩效指标的收集、分析、编制。在执行层面，各成员公司也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配置专职人员，结合自身的特点开展相关工作。我们做了 ESG 相关的复核，也聘请了第三方做相应复核。

2021 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公司的董事会审议通过了《核能产业中长期发展战略和“十四五”规划》，我们也在两个交易所进行了公告，公司的业务已从核电拓展至核能，我们将在“双碳”目标下努力贡献更多的清洁能源。

第五，在信息披露和 ESG 评级方面，公司始终高度重视信息披露评级，在 A 股上市以后，第一年就获得了 A 级的信息披露评级。中国广核通过信息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合法的披露，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

中国广核深知自身是资本密集型企业，核电站的投资额巨大，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支持，所以，我们始终保持着对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敬畏和尊重。

在港交所上市以后，我们第一年编制的年报，就是按照国际综合报告进行编制的，在报告中也设置了企业管治、环境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章节，详细地披露了公司在 ESG 方面的一些实践，第二年我们就独立编制了 ESG 报告。

这几年来，我们持续关注监管方面的变化趋势，与知名的 ESG 评级机构进行沟通，与其他上市公司交流，并及时将外部 ESG 管理的关注点反馈到公司的管理层，不断改进完善 ESG 报告内容，使我们的信息和相关指标披露更加充分。

通过多年不断努力，我们获得了民生 MSCI 指标评级、CDP、CSA 和欧洲晨星 ESG 等风险评级机构的认可。ESG、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这些概念，对应的是 ESG 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和可持续发展报告，它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对上市公司而言，实质上就是将经营过程中的非财务信息进行整合和披露，展现公司的中长期战略实施情况，向投资者提供更全面、更详细的公司管理信息，从而吸引注重企业长期价值的投资人。因此公司的各级管理层对此需要有系统性的认识，应该把 ESG 的管理以及持续改进，视为公司经营价值提升的原动力。

从 ESG 报告编制的角度来看，目前的标准和模式是比较多的，最近港交所发布了最新的气候信息披露指引，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研究，看怎么样按照新的要求进一步完善 ESG 报告。

2021 年 11 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IFRS）正式宣布成立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准备结合之前我们执行的相关标准以及机构现有的成果，制定国际可持续披露的准则（ISDS）。现在，中国广核也请了一些专家给我们进行讲解和分析，看怎么样遵循新的要求。

由于 ESG 的评级标准不同或者受到其他考量因素的影响，同一个公司的评级结果有时候会差异极大，特别是一些境外评级机构，对中国的国情不是很了解，甚至存在一些偏见和歧视的情况。中国广核希望国内的有关监管机构能够出台适合我们国情的 ESG 标准和相关准则，能够尽快完善国内的 ESG 评级方式，为上市公司的 ESG 评级，搭建相对统一的平台和环境。

ESG评价和ESG指数在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的作用

■ 赵永刚 / 中证指数公司 ESG 业务部总经理

中证指数公司是沪深交易所共同出资成立的金融市场指数供应商，目前管理的各类指数超过 5000 余条，跟踪的资产规模超过 1.25 万亿人民币。今天我想分享的是：ESG 评价和 ESG 指数在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赵永刚

一、碳中和背景下 ESG 的重要意义

在碳达峰和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下，上市公司作为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也是践行 ESG 理念、服务碳中和战略的重要力量。ESG 从环境、社会责任、公司治理三个维度反映了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情况，它是对上市公司的综合评价，不仅反映了新时期上市公司对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体现了上市公司对国家碳中和战略的落实。

在这个过程当中，ESG 主要发挥了三个作用：

第一，ESG 提供了具有共识的框架，有利于凝聚各方共识。ESG 是目前全球广泛接受的可持续发展的框架理念，而且主要的国际组织都独立或者联合发布了 ESG 相关的框架和标准，体现了全球经济向低碳转型的趋势。

第二，ESG 评价有利于促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为企业进行行业对标提供参考，更好地发挥外部和内部的监督作用，促进上市公司改善企业治理模式和能力。

第三，ESG 指数和基金产品，有利于引导资金流向高质量发展的企业，这一点与打造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目标是保持一致的。ESG 指数和基金产品为投资者践行 ESG 理念提供了重要的业绩基准和标的，从而促进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二、国内 ESG 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挑战

目前，国内 ESG 还处在发展的初期，除了信息披露的一些问题，主要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国内缺少统一的 ESG 标准。目前 ESG 评价机构比较繁多，由于机构背景、出发点不一样，所以即使对同一家公司进行评价，有时候结果也差异较大。而且国际评级机构确实存在对中国市场实际情况不够了解的问题，对于中国公司的评分呈现出系统性偏低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 ESG 评价方法，打造中国的 ESG 标准非常重要。

第二，国内 ESG 投资实践的落地性还需提高。ESG 相关产品的多样性和规模都有待进一步发展，尤其像养老金和长期资金，在 ESG 投资方面的配置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三、中证指数公司的实践和探索

基于国内 ESG 领域存在的问题，作为资本市场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力量，中证指数公司主要从 ESG 评价、ESG 指数和 ESG 数据方面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服务国家碳中和战略。

第一，基于国际的经验和中国特色，中证发布了 ESG 评价方法。这套方法主要是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等具有国际共识的框架出发，立足国内的实际和特点，

选取更适应本土市场的指标。比如“共同富裕”、国有企业股权集中度，以及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决策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议题和指标，能够客观反映中国企业 ESG 的实际水平。中证的 ESG 评价方法实施以来得到了同业、市场和媒体的广泛关注，新华社等多家权威媒体进行了报道。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吴清在接受专访中指出，中证指数公司发布的 ESG 评价方法、研究编制的 ESG 碳中和指数为国内的 ESG 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第二，中证指数公司发布了 ESG 碳中和系列指数，助力国内 ESG 金融生态的完善，引导市场资金助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中证指数公司推出了系列的 ESG 指数，目前已经形成了包括 ESG 基准、领先、策略、主题等多个系列。2021 年中证指数公司和上海环交所联合发布了中证上海环交所碳中和指数。截至 10 月底，中证指数公司发布的 ESG 可持续发展指数 82 条，跟踪产品 53 支，资产规模超过 920 亿人民币，是目前国内绿色指数体系最健全、指数数量与跟踪产品规模领先的指数供应商。这些指数为国际和国内的投资者践行 ESG 理念，引导国际资金配置中国资产，服务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工具。

第三，中证指数公司形成了覆盖全部 A 股的 ESG 评价数据，为上市公司提升 ESG 管理水平、对标同业提供了重要助力。从中证 ESG 评价结果来看， ESG 评价高的公司长期来看呈现经营比较稳健、长期持续运营能力较强的特征，而且 ESG 评级的公司在未来涉及诉讼、亏损等方面情况的比例都更低，呈现了清晰的风险盈利传导效应。因此中证 ESG 数据可以为上市公司改善 ESG 管理提供重要的参考，也为上市公司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提供支持。

未来，中证指数公司将持续加大与各方的合作，提供 ESG 评价指数数据等综合解决方案，促进上市公司改善 ESG 管理水平，推动 ESG 最佳中国实践，打造中国 ESG 标准，服务国家碳中和战略。

基于ESG投资新动向的管理建议

■ 李菁 / 安永亚太区金融服务可持续发展主管

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近期关于国际、国内 ESG 标准的一些信息，我认为特别值得各位企业家和现场及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关注。

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在 2021 年 11 月 COP26 大会期间成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为代表的监管机构，正在积极与各国政府共同搭建 ISSB 的国际可持续报告准则体系。相信在未来，ESG 报告和财报的三张报表，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整合成为统一报告。ESG 一定不是公益，不是情怀，它创造的是公司的非财务价值，进而会影响公司市值。所以上市企业的董事、高管应特别关注 ESG 信息，因为它会对公司市值产生重要的影响。

2021 年 6 月，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正式公布新版本，是有关碳足迹核算，有关气候变化范畴一、范畴二相关信息披露的。未来需要有些上市公司在某些市场去披露，比如香港联交所最新发布的 2020 年 7 月 1 日正式执行的 ESG 指引，2025 年所有在港上市企业需要报告采纳 TCFD 原则，我们需要为 TCFD 原则当中特别规定的范畴一、范畴二，以及气候变化披露相关的信息收集、整理和对外发布做准备。

香港证监会在 2021 年 8 月出台基金经理操守准则，要求在港的以基金经理为代表的投资人，要特别关注投资标的、投资项目，以及所投资金融产品的气候变化风险。也就是说投资者未来在投资的时候，ESG 会变成一个硬性的考量因素和关键业绩指标（KPI）；相应的，对生产企业来说，投资者的变化必然是 ESG 发展的晴雨表。所以我们相信证监会、上交所、深交所，以及上市公司协会将来都会对 A 股上市企业和 ESG 指引有更多的提升和要求，所以最新标准值得大家特别关注。

另外，与大家分享一下全球 ESG 责任投资的一些最新动向。

李菁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过往两年给全球经济带来了重创，但是我们发现有一些交易型开放指数基金（ESG ETF）在某些时刻表现强劲。当然，这与它们的资金投向，比如新能源产业、医药行业等息息相关，也与它们的负面清单当中剔除了火电行业、高碳排放行业等息息相关。因此在过往五年间，ESG 投资人通过对全球大型机构投资者的连续调查，发现目前大型机构投资者对于其所投项目、企业、产品和工具的 ESG 表现水平、ESG 涵盖内容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而且很多投资人在做固收投资时，会特别关注一些可持续发展类的金融产品，包括绿色债券、蓝色债券、可持续发展债券，以及业绩表现挂钩债券、转型债券等等。

当然他们也会直接去评判某些投资项目的 ESG 表现，除了采纳该行业当中一些国际指数公司的评级结果外，负责任的投资机构也会搭建自己的 ESG 评估分析模型。这些模型在一级指标的环境、社会、公司治理领域通常涵盖 31 ~ 36 个；二级指标会分行业，多达 120 ~ 180 个。所以，很多投资人通过这样的内部 ESG 评估分析模型，可以更加全面地观测和考量投资项目、企业的 ESG 表现，以及未来中长期发展价值。所以对于 ESG 领域，投资人追求的一定是能够实现八个字：风险可控、收益稳健。ESG 投资人如此关注 ESG 领域，生产型企业也要特别注意提升公司自身的 ESG 表现和评级结果。

通过对超过 500 家上市公司，涵盖上海、深圳、香港，乃至海外市场上市的企业提供的超过千份不同类型的 ESG 服务内容，我们总结了几点和大家分享。

第一，搭建管理架构。一家管理能力强、评级结果好的 ESG 企业，通常在它的管理架构上就可见一斑。比如在 ESG 的战略管理委员会、治理委员会或者是以“C”打头的高管当中，会有一个新的职务，叫 CSO，S 代表的是可持续发展，也就是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很多全球大型企业是由 CEO 兼任 CSO，彰显 CEO 本人对财务价值和非财务价值同样看重的决心和责任担当。在这个管理架构体系下，相关的战略规划、行动、方案和考核指标都可以非常好地落实下去。

第二，设立战略规划。2021 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很多大型企业除了做“十四五”规划之外，同时会特别搭建 ESG 发展规划、绿色金融发展规划和可持续发展规划。这些发展规划能够在未来五年为公司在创造 ESG 价值领域制定相关的行动方案，同时责任到人、责任到岗，每年有考核指标、考核体系，信息披露和相关说明完整、准确和清晰。

第三，加强风险管理。环境社会、公司治理潜藏着非常巨大的不可控风险，所以如何加强一个企业的风险管理水平，ESG 是个非常好的抓手，对内如何去管控，如何更好地布局环境健康安全相关信息的完善，如何更好地加强与资本市场的沟通，如何更好地与社会利益相关方加强合作，都是风险的潜在点，我们需要加强 ESG 风险管理。

第四，完善信息披露。ESG 报告不是目的，评级结果也不是目的，信息披露是以终为始，通过良好的信息披露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彰显公司未来中长期发展的价值。所以一份好的 ESG 报告必须满足几点：

1. 报告架构符合资本市场语言；

2. 信息披露能够做到定量化充分，有与往年的数据对比；

3. 定性化说明能够非常翔实；

4. 能够映射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创造不同的可持续发展价值。

所以，给各位企业家们和现场的观众们几点建议：搭建管理架构、制定战略规划、加强风险管理、完善信息披露。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碳中和。在“3060”目标提出之后，ESG 是一个非常好的管理抓手，能够帮助企业去践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不管是不是“控排”行业的企业，每一家企业都需要核查自己现有的碳排放量。

我认为实现企业自身的碳中和，应分以下几步走：

第一步，先摸清家底，准确把握本企业的各类相关数据，比如直接排放量、间接排放量多少；

第二步，针对重点排放源制订节能减排方案，提高能效、绿色办公、绿色运营；

第三步，采取抵消交易，包括购买绿电和相关的林业碳汇等等 CCER 的手段进行抵消；

第四步，可以实现碳中和。

每一位企业家、每一个大集团负责人都应推动设立企业自身的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和路线图，这样才能够帮助企业在 “双碳”目标下稳步发展。

相信在未来，ESG 报告和财报的三张报表，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整合成为统一报告。ESG 一定不是公益，不是情怀，它创造的是公司的非财务价值，进而会影响公司市值。所以上市企业的董事、高管应特别关注 ESG 信息，因为它会对公司市值产生重要的影响。

企业家圆桌会议学术讨论

主持人：唐丁丁，IFF 学术委员、亚洲开发银行合规委员会前主席
嘉　宾：寇光武，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
贾生平，贝壳找房副总裁、贝壳公益基金会执行理事长
吴发沛，中集集团高级顾问

唐丁丁：化工行业既是高污染风险的行业，也是气候变化领域的排放大户，我想请教寇总，万华在减污降碳方面有哪些举措。

寇光武：化工企业的发展除了土地资源、人力资本以外，现在很重要的就是“环评”、“能评”和“安评”，“环评”就是环境的评价，万华在这方面起步比较早。万华对环境保护高度重视，是从 2006 年开始的。2006 年 2 月 24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视察万华，因为习主席是清华化学专业出身，当时就指示万华要不断创新，做好环保工作。万华立即响应习近平主席的指示精神，在行业内率先提出“零排放”，这在当时是比较先进的。所以在 2008 年万华（宁波）就获得了国家环境友好工程奖，这是截至目前化工企业获得的唯一环境友好工程奖，而且这是环保部门发的，不是普通机构发的。

万华烟台工业园，把“三废”处理作为一个基本的投资策略。烟台工业园水的来源，一是万华全部回收利用了烟台市污水处理之后的中水；二是海水淡水化处理。这样，万华用江河湖泊自来水的可能性就几乎为零。另外，我们在园区内把 75% 的废水又进行了回收利用，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万华对呼吸管、呼吸器等全部进行回收，实现污染物的超低排放。针对废渣，万华和水泥厂合作，实现零排放。到目前为止，万华在环保方面走在了中国化工企业的前列。

习近平主席在 2018 年 6 月 13 日视察万华烟台工业园时，对万华的“三不见”进行了充分肯定。万华要求的“三不见”是：跑冒滴漏看不见、异常气味闻不见、异常噪音听不见。针对气候变化，万华于 2018 年提出了“碳减排 2025”的目标。到目前为止万华布局了风电等项目，万华和中国核工业集团签署了投资核电的协议，协议成功之后装机容量将会达到 830 万千瓦时，一年发电量能超过 600 亿度电。经过这样一个布局， 2030 年之后万华的国内用电就将全部是绿色电力。在 2025 年之前，万华公司内部根据碳足迹、碳减排，将化学需氧量（COD）的排放削减 15%，碳足迹削减 20%，水足迹削减 20%，所以万华布局新能源，为碳中和做了很多的工作。

唐丁丁：谢谢寇总，接下来我想请教贝壳贾总，贝壳企业过去更多是做社会责任方面的一些公益性服务型的工作，针对“双碳”目标，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贝壳企业有没有什么样的构想，打造你们 2.0 升级版的社会公益活动中有什么样的考虑？谢谢。

贾生平：刚才讲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很重要的一个方式，除了对利益相关方要去承担相关的责任以外，还要通过公益的方式更多地去创造价值。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贝壳希望能够利用好自身的资源和能力去创造社会价值，所以原来比较看重线下的资源，比如大量的店面和服务者，主要是在社区服务、社区助老和可持续社区方面做了一些尝试。

可持续社区方面跟环保、减碳等有些关系，比如以前做的爱心图书馆的项目，更好地利用社区的二手资源，回收二手图书，然后把它跟乡村地区的教育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我们也关注社区环境，除了一些社区环境维护以外，在环保相关知识的传播方面，比如垃圾分类等，我们与一些社会组织共同普及环保常识。

刚才提到贝壳在社区有一个很核心的公益活动，就是教老人使用手机，让老年人也能灵活使用智能手机的各种基础功能，比如在疫情期间调取健康码、行程码，查询核酸检测结果等。我们希望老年人也能通过手机更便捷地跟外界连接，并且去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现在，我们也十分关注线上工作的开拓。比如，VR 看房和“随心签”的推出，减少了消费者和经纪人大量的出行，实现减碳环保。在办公层面，我们过去都是使用纸质合同，因为每年的交易量特别大，所以用纸量也

很大。现在贝壳在合同签订流程方面进行了创新，加入了线上合同，节约了大量的纸张。

贝壳现在的业务逐渐运用 VR、AI 技术，未来希望用科技赋能公益或者赋能企业社会责任项目。贝壳现在新的业务是家装和家居业务，我们希望在新业务里面做更多的尝试和实践，履行环保减碳的社会责任。

唐丁丁：最后一个问题问一下中集集团的吴总，刚才您提到用 ESG 报告推动企业的管理升级，与之相关的，怎么样能借助绿色金融工具来助推企业的绿色低碳转型？

吴发沛：我简单讲两个小事例。最近我们在推光伏工厂，约了一个供应商，他晚了一天才来找我。他解释说去找银行，因为是与中集合作，所以银行同意给他 10 个亿的绿色贷款。这样他就可以做我们这个项目，否则他做不了，成本太高。

第二个事例，绿化珠江的项目要新造上千条新能源动力船，钱从哪儿来？传统的做法是融资租赁，资金成本大概到 9%，小老板投不起，大老板不愿意投。如果没有创新的金融手段和工具，对企业来说，有生意机会也很难做。对社会来说，利国利民的工程也可能因为缺乏资金而一拖再拖。

这两个事例告诉我们，金融，特别是绿色金融在助力企业、助力政府、助力社会推动经济转型、实现“双碳”过程中，将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

唐丁丁：再次代表我们 IFF 的合作主办方——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向能够从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参加这个会议的各位嘉宾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分享的见解。

附：关于国际金融论坛（IFF）

国际金融论坛（IFF）是总部设在中国的非营利、非官方独立国际组织，2003 年 10 月由中国、美国、欧盟、联合国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及相关国际组织共同发起成立，是全球金融领域高级别常设对话交流和研究机构，被誉为全球金融领域的“F20（Finance 20）”。

大湾区圆桌会议：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

广州市南沙区区长 257
董可：广州市南沙区的创新发展与金融示范

IFF 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新开发银行前副行长 259
祝宪：以大湾区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圈建设发展的思考

IFF 副理事长、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原司长 261
梁锦松：VUCA 时代特征与大湾区发展机遇

IFF 副理事长、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财政司原司长 263
梁维特：新时代大湾区与澳门协同建设发展的思考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 265
苏赟：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成就与发展研究

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267
邱亿通：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的广州成就与发展

广州期货交易所总经理 269
朱丽红：广州期货交易所的筹备建设进展情况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总裁 270
李彤：发展粤港澳国际金融枢纽力量，打造国际一流大湾区

大湾区圆桌会议：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

IFF 学术委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272
王元丰：打造大湾区绿色低碳金融枢纽，为实现“双碳”目标赋能

IFF 学术委员、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273
齐晔：绿色发展是未来大湾区金融枢纽建设的关键

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区首席经济学家 275
丁爽：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开创进取，争做世界金融创新领头羊

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 277
黄文涛：筑巢引凤——打造国际一流大湾区

花旗银行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279
刘利刚：自由流动是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BCG 董事总经理、全球资深合伙人 281
何大勇：把握碳金融科技建设，助力南沙经济腾飞

广州市南沙区的创新发展与金融示范

■ 董可 / 广州市南沙区区长

董可

南沙作为国家级新区、自贸试验区、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和承载门户枢纽功能的广州城市副中心，叠加国家综合保税区、国家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国际化人才特区等政策红利，正在致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交通中心、功能中心、服务中心。

近年来，南沙充分发挥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的区位优势，多重国家战略叠加的政策优势，携手港澳、对接国际的开放优势，山、城、田、江、海交相辉映的生态优势，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南沙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

“十三五”期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多年领跑全市，农业总产值、规模工业产值分别跃居全市第一、第二，固定资产投资、进出口总值、实际利用外资等主要经济指标实现年均两位数增长，实体企业数量增长 9.4 倍，累计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投资项目 217 个，成为广州乃至大湾区发展速度最快、发展质量最高的区域之一。

二、改革创新引领的示范作用凸显

累计形成 719 项制度创新成果，其中 43 项在全国复制推广，119 项在省里推广，218 项在全市推广。南沙推出的商事登记确认制、全球溯源体系、全球优品分拨中心，作为标志性的改革措施在全国被评为典型先进案例，成为全国首批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2020 年营商环境全球模拟排名第 21 名，综合创新指数排名全国自贸区第三，贸易便利化指数位居榜首，政务服务总体满意度走在前列，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更加彰显。

三、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加快建设

高规格成立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建设粤港深度合作园、港式社区、港人子弟学校、创享湾等项目，落实了“港人港税、澳人澳税”、共有产权住房试点、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等一系列政策，实施港澳青年来穗“五乐”行动计划，入驻港澳青创团队有 300 多个，累计落户港澳企业近 3000 家，投资额达 1148 亿美元，宜居、宜业、宜游的粤港澳优质生活圈示范区日渐成型。

四、创新型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构建

南沙科学城已列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主要承载区，冷泉生态系统、高超声速风洞、极端海洋科考设施、大洋钻采船等一批科技基础设施加快建设，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大湾区科学论坛永久会址等一批科创平台加速打造。汽车制造业已连续四年突破 1000 亿产值，人工智能、生命健康、智能网联汽车、第三代半导体、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在蓬勃发展，建成南中国规模最大的集装箱、汽车和通用码头群，跨境电商占全国的 1/5，平行进口汽车数量保持全国第二，大湾区现代产业新高地加快形成。

南沙金融业发展迅猛，打造金融业对外开放试验示范窗口取得阶段性成效。主要表现如下：

一、金融生态日臻丰富

形成跨境金融、航运金融、绿色金融、金融科技、

融资租赁、商业保理、股权投资、期货交易等八大特色金融板块。落户金融企业超 6630 家，持牌法人金融机构占全市的 1/4, 私募基金约占全市的 1/5，融资租赁企业占全国的 1/5、占全市的 4/5 以上，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飞机船舶租赁集聚区，初步形成全国融资租赁第三极。

二、金融平台加快落地

全国首家混合所有制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全国首个地方金融风险监测防控平台、全国首个线上航运保险要素交易平台、全国首家气候投融资特色支行、全国首个碳中和融资租赁服务平台，以及国际风险投资中心等一批重点平台项目相继落地。国际金融论坛（IFF）永久会址的核心部分——国际会议中心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初步形成以明珠金融创新集聚区为先导区、以南沙国际金融岛为远期发展空间的金融发展功能布局。

三、“金改”创新成效显著

获得“广东金改 30 条”、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政策文件支持，获批自由贸易账户、外汇管理改革、国际航运保险税收优惠、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跨境投资、融资租赁公司外债便利化额度等多项创新试点，累计落地超 50 项金融创新案例或试点。

四、与港澳合作纵深拓展

累计落户港澳金融类企业占比超 25%，正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港澳保险服务中心等筹建工作，在全国率先实现香港电子支票跨境托收，便利两地市民和企业进行贸易交易、跨境缴费及个人汇款等活动；打通内地和香港的飞机船舶租赁业务合作渠道，落地“香港＋保税港区”飞机跨境转租赁项目等多个全国首创业务，金融业合作创新不断深化。

未来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积极培育引进服务湾区的高端金融机构，推动一批重大平台、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打造金融业创新集聚区，进一步擦亮八大特色金融名片，搭建大湾区国际交往新平台，构筑国际一流新金融产业生态圈，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重要动能。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潜力巨大，位居湾区中心的南沙，前景美好。我衷心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国际金融论坛（IFF）以及即将建成的 IFF 永久会址，深化合作交流、增进彼此了解，共同分享全球新形势下的金融发展新思考。真诚期待与大家共享湾区机遇、共建伙伴关系、共商合作机会、共创美好明天！

以大湾区为代表的中国城市圈建设发展的思考

■ 祝宪 / IFF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世界银行原副行长、新开发银行原副行长

中国经济发展下一个阶段的重点，国家层面的大战略布局是在经济最为发达、市场化程度最高、竞争力最强的三个地区：一是粤港澳大湾区，即广东和港澳地区；二是长三角区域，即以上海为轴心的周边地区；三是京津冀。

这几年大湾区建设取得十足的成果，但是与国家和中央的要求和大湾区建设所应该发挥的潜力相比还有一定距离。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特别是南沙作为广州很有潜力、需进一步开发的区域，在大湾区的位置处于中心的地理地位，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第一，在大湾区建设中，要认识到制度层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建成一个开放的、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大湾区，就不可避免地要走国际化的道路。从这方面来说，香港和澳门应该有其各自的优势，特别是它们从市场惯例和经济制度上来讲，有很多做法与国际对接得更为紧密，我们应该共同学习和探讨。中国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保留了一些过去计划经济的做法。因此，从这个角度讨论问题时，特别是给大湾区各级政府献策时，应该建议在制度性开放上迈出更大的步伐，要进行主动性的改革。

大家都知道，中国已经正式加入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意味着中国经济、贸易投资要走国际化的道路。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申请加入 CPTPP，也给贸易投资和其他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大湾区的建设能够主动在这些方面提前布局，采取的举措能够得到中央的首肯，先行先试取得成功，起到比较积极的作用，将对中国下一轮的改革开放、双循环战略提供非常有益的实践经验。总而言之，大湾区应该先行一步，进行主动性的改革、制度性的开放。

第二，从金融的角度来讲，从中央到大湾区近期采取了很多金融举措，包括推出新的金融产品、开展新的金融服务。但想要成为一个国际金融枢纽，就要加快加大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要据此展开讨论怎样实现资本账户的可兑换。如果资本账户可兑换的问题不能最终解决，所谓金融开放和成为国际型的金融枢纽便打了折扣。当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保持金融稳定，肯定希望减少风险。但是与已在国际负有盛名的金融中心香港和澳门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粤如果只能做到非常有限的金融开放，那么共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实际上也是打了折扣的。当然这并不是要求明天就宣布资本账户完全可兑换，而是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步伐应该更大一点、更快一点。

祝宪

第三，大湾区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独立的关税区，相较于大湾区辖内广东的九个城市来说，其经营结构和体量不一样。按照中国的体制，深圳是计划单列市，因此在建设大湾区过程中，既要有统筹的顶层设计，同时也要发挥各个城市的比较优势。顶层设计要兼顾各个地区、各个地方的实际利益，包括它们的比较优势；同时也要避免过度竞争。在进行未来经济布局的时候，不仅

仅是广东地区，全国各地区都想下个“先手棋”，但有很多投资是同类的，一拥而上可能会造成过度投资和恶性竞争，在这方面需要进行协调，努力营造出一个多赢、双赢的局面。

其实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各个城市的政府都希望自己的城市早发展、先布局，而且现在已经不是30多年前“三来一补”的时候了，大湾区的建设开发也不是简单地圈一块地就能招商引资了。现代高端服务业对地理位置不再那么看重了，不管是在香港进行经营活动还是在广州，地理位置的差异已经不那么关键。因此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各级政府如果想引进金融业、高端服务业，更多应该在监管和服务上下功夫，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和条件，而不是简单地划拨一块地、建一个办公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

中国在过去的城市化过程中有一个误区，我把它称作“大都市恐惧症”。政策决策者害怕城市规模过大，患上“大城市病”。现在事实证明大城市有大城市的好处，城市圈可以带来信息的聚集、就业机会的增多，即使在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居住成本很高，人还是往那里汇集，就业机会多是一个关键问题，它的社会服务和政府治理能力水平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幸运的是现在国家的政策已经有所改变，不再强调一定要发展中小城市，而是开始关注大城市都市圈。因为我们要将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发达国家的知名地区进行比较，比如说旧金山地区、东京地区，还有伦敦、巴黎等大城市圈。

但中国超大城市的发展遇到了一个瓶颈，就是房地产过度开发、房价过高，令创业者和年轻人不堪重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是让他们回家乡去创业，还是继续留在一线城市奋斗？有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发展通勤交通。20世纪70年代，东京60%的劳动力并不是住在东京，而是住在东京周边的一些县。他们怎么到东京上班，是靠通勤火车。大湾区建设也应重视通勤交通。现在广州和深圳的房价，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创业者很难承担得起，但是在广州市中心的周边地区，比如南沙，还有很多“地产洼地”区域。要改变过去生活和工作的模式，就是同城生活和工作改成异城工作和生活。广州和佛山为什么能够一体化发展，就是因为有了公共交通。因为有了地铁，你可以住在佛山到广州上班，佛山的地价比广州要低很多。

同理，如果要保障更多的人，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在一线城市工作的同时，也能够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必要条件之一就是他们可以在广州和深圳市中心以外、50公里以内的都市圈居住。这是有条件的，广州还有许多像南沙这样的地区，本身地价不是很高，其发展可以吸引更多人到广州都市圈工作。现在有些地方出现了所谓的“招工荒”，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大都市生活成本过高。

希望城市规划者能就这个问题做比较系统的研究，我知道目前很多城市正在规划筹建通勤火车、城市间的地铁，但应该有一个明确定位，应该把它定位成公共交通，不要期望它的投资回报率很高。如果政府把通勤火车的票价与市场接轨，很多中低收入人士将坐不起。因为通勤交通工具必然要经常乘坐，所以定价上应该充分考虑乘客收入的可承受性。把它准确定位为公共交通，而不是把它做成一个商品。

VUCA时代特征与大湾区发展机遇

■ 梁锦松 / IFF 副理事长、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原司长

梁锦松

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是全球新形势给大湾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全球新的形势当然是错综复杂，但是未来的世界是越来越 VUCA（具有不确定性），是动荡、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

第一个，科技。科技在各个方面的进步，带来很多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在生命科技领域。

第二个，新的全球化格局。特别是中国和美国的竞争，当然中间也有合作。有些人说未来是“一球两制”，在一个地球有两种制度，我个人觉得可能有这个趋势的。

第三个，货币超发。过去几十年全球一直在印钞票，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印钞票的速度越来越快，导致全球的财富分配极端不平衡，出现了很多社会问题。但最近美联储在加快市场的收紧，对全球金融资产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其他的诸如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等都会对世界发展造成影响，未来的世界是越来越动荡、不确定、复杂和模糊的。当然，短期内我们共同的首要任务还是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因此在这样动荡、不确定、复杂、模糊的世界形势背景下，我们肯定要面临很多的挑战。但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对中国尤其是对粤港澳大湾区来讲，这其中有不少的机遇。

就此我想集中讲三点：

第一，怎么把大湾区建设好。香港和澳门大体上是西方普遍存在的法律环境、监管环境，特别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适用的是英国法律，其监管方式是西方比较熟悉的，港币也是可全球兑换的货币。香港市场长期获得国际投资者的认同，怎样用好香港的独特优势，特别是香港的股票市场和其他基金市场，怎样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用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利环境，我觉得大湾区的建设一定要抓好这个机遇。

现在美国采取一些不公平的监管措施，使不少中资、中概股遭受打压，因此很多中资、中概股可能会考虑到香港上市，让国际投资者参与到他们的公司，也参与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我注意到香港的港交所降低了在香港上市的门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机遇。

香港和澳门大体上是西方普遍存在的法律环境、监管环境，特别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适用的是英国法律，其监管方式是西方比较熟悉的，港币也是可全球兑换的货币。

我也注意到香港在考虑批准 SPAC，有些人说这是“造壳”上市。大概三年前，我就在美国纽交所的 SPAC 购买东西，的确非常方便。如果香港可以允许 SPAC 这样的空壳公司上市，也可以让很多好的公司，

包括内地的公司到香港来融资。我希望香港可以在保护投资者的同时，允许 SPAC 相对便利地上市。然后用深港通、沪港通、债券通，加上其他的一些新举措，将国内的金融市场和香港接轨，从而方便国内的金融资产和全球接轨，我觉得这是一个用好香港市场的方法。

第二，生命科技的发展。因为全球生命科技快速的发展，近年来在新药研究、医疗器械、医疗服务、AI 大数据、医疗保险、生命科技等各领域，除了独自发展之外，还有交叉学科的推动，因此生命科学的发展是全球的大趋势。

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推动了生命科技领域的投资。大湾区在这方面很有优势。香港有 4 所全球排名 100 以内的大学，有很多世界知名的优秀学者和研究人员，香港还有 16 名院士。香港市场与内地相比较小、患者病例不多，因此要做临床医学研究比较困难，而内地有庞大的市场和病例，在这方面香港与内地可以优势互补。广州、深圳也有很多大学，其科技发展飞速，特别是 AI 机器人领域本身就是世界级领先水平，将会产生很多聚合效应。

香港最近宣布要集中发展的一个领域就是生命科技。因此怎么样用好香港，特别是用好“一国两制”政策以及香港与内地的互补非常重要。我们应该考虑怎么样联合起来吸引、聚集全球的生命科技人才到大湾区，聚集人才是非常重要的。而香港的金融市场以及内地和香港的 VC 和生物基金，可以利用香港吸引国际资金，深圳可以吸引国内公司的上市，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机遇。

第三，数字人民币。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这可能会导致全球货币发展的根本性变革。深圳、香港都是试点城市之一，特别是可以帮助跨境的支付，在这方面可以多想一想，今后怎么样实现两地互动，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保证国家的金融安全。

新时代大湾区与澳门协同建设发展的思考

■ 梁维特 / IFF副理事长、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财政司原司长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疫情仍在全球起伏反复，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更多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在这个重要时刻，人类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要合作还是对抗，开放还是封闭，每一个国家都以实际行动给出答案。

2021 年 11 月 4 日，习近平主席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再次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不会变。

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强调，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这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时刻，金融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加快打造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第一梯队，当中提到以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为重点。这三大区域的发展战略，在我国经济“大棋局”中承担不同功能，金融在各区域发展中更是扮演不同角色。如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和港交所在各区域的发展中，分工明确，配合国家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中，大湾区特点尤其明显。这不仅是因为大湾区同时具有深交所和港交所这两个在不同制度下的两大交易所，大湾区作为创新的试点，还肩负着探索将中国效率、中国速度的优势与国际标准、国际规则有机结合的使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将积极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国家整体发展，以及世界共同发展。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和《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为粤港澳大湾区在新阶段实现新发展注入了新的强大动力。“横琴方案”明确指出发展现代金融产业，这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的重要抓手，并将充分发挥澳门对接葡语国家的窗口作用，打造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前海方案”也提到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支持将国家扩大

梁维特

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在前海合作区落地实施。两套方案将助力大湾区金融业发展迈上发展新台阶。

需要强调的是，随着金融科技不断创新发展，各种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不断涌现，将对金融基建、服务、人才等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把握好各种新生事物带来的发展机遇的同时，如何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值得我们予以高度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凸显粤港澳大湾区创新试点的重要性。

我认为，随着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开局起步，“横琴深合区”将为我国金融业的创新发展发挥试验田的作用。“横琴深合区”之于我国而言，是风险可控、试错成本较低的区域。如新的发展模式能在这里证明具有可行性，便能迅速将其扩大到整个湾区，服务国家战略。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不断建设，必将助力大湾区成为产业创新的高地。而在这个过程中，需

要大湾区各地根据不同的功能和定位，发挥自身所长，服务湾区所需，才能进一步加快国际金融枢纽的建设。

实现上述目标，澳门、南沙分别在标准对接以及知识产权工作上具有独特优势，彼此甚至能够通过错位发展，实现互补共赢。

澳门方面，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正加快形成，澳门作为大湾区四个中心城市之一，在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过程中，应透过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2020 年 9 月，习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世界做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2021 年 10 月出台的《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提到要深化与欧洲的标准化合作，建议澳门结合自身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定位，以及“横琴深合区”的金融创新优势，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积极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业务，并透过葡萄牙对标欧盟标准，促成双方互利共赢合作。其中，绿色金融的发展，需要形成广泛共识，做好相应的法律法规配套工作，还需要打造绿色金融专业人才队伍。使其在发展的过程中，既能为市场和企业带来商机，也能为居民及相应专业人士带来发展空间和机遇，助力粤港澳大湾区走好绿色低碳之路。

南沙方面，南沙处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地理几何中心，100 公里范围内汇集了大湾区 11 座城市以及五大国际机场，是连接珠江口两岸城市群和港澳地区的重要枢纽性节点，地理位置赋予南沙在人才、科研、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先天优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依托粤港、粤澳及泛珠三角区域知识产权合作机制，全面加强粤港澳大湾区在知识产权保护、专业人才培养等领域的合作。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步伐不断加快，创新与知识产权保护已成为大湾区创新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当下，新技术新业态蓬勃发展，南沙在粤港澳大湾区推进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合作和相向企业往来的过程中大有可为。具体可考虑结合澳门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定位，建立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的服务体系，为双方地区企业走向对方市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同时，助力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国际金融枢纽的建设，将为大湾区的发展带来新发展机遇。众所周知，大湾区是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展望未来，大湾区将更充分发挥创新引领的作用，助力我国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的发展。

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成就与发展研究

■ 苏赟 / 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

苏赟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这是我国继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后又一重大举措。建设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需要，也是推进大湾区建设、促进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客观要求，同时还是适应全球金融多中心化发展趋势的主动选择，对于我国深化金融业改革开放、优化金融空间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在各方的努力下，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已取得一些初步成效。

一是多金融中心发展水平居于全球前列。最新发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在全球金融中心城市排名中，香港位居第 3 位，深圳位居第 16 位，广州位居第 32 位。

二是核心城市金融科技竞争力处于全球的第一梯队。在全球金融科技竞争力最新排名中，深圳和香港分别位居第 6 和 7 位。数字人民币、金融科技创新监管、金融数据综合应用、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等试点稳步开展，并取得阶段性成效。香港、广州、深圳的金融科技初步形成了精准定位、错位发展与功能互补的新格局。

三是创新资本集聚能力显著提升。香港交易所首次公开招股融资额位居全球第三，成为全球领先的新经济及生物科技公司融资中心。深圳证券交易所成交金额、融资金额、股票市价总值分别位居全球第三、第四和第七位，创业板注册制改革有序推进，是全球最具活力的新兴市场之一。科创金融服务创新取得新成效，面向高新技术企业的外债便利化额度试点扎实推进，双向跨境股权投资渠道不断拓展，纯专利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知识产权海外侵权责任保险等多项知识产权金融服务成为全国首创。此外，我们还在有序推进广深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申创工作。

四是绿色金融服务能力不断增强。广州在前段时间打造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走在全国前列，香港打造区域绿色及可持续金融枢纽迈上了新台阶。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影响力持续扩大，环境信息披露试点稳步推进。国内首家混合所有制期货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挂牌成立，碳期货市场加快建设。

五是人民币资产市场发展壮大。香港作为进入中国内地的主要门户及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进一步巩固，“跨境理财通”、“债券通”、“深港通”等互联互通机制落地实施，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及账户管理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

六是金融制度创新取得新进展。大湾区的绿色金融标准、制度规则对接加快推进，粤澳跨境新型金融项目产品洗钱风险评估机制及金融纠纷调解合作机制初步建立，“珠三角征信链”建设也在有序开展。

总之，建设国际金融枢纽是大湾区一场深刻的金融变革，同时也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各方接续奋斗，现在枢纽的建设涉及“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四个核心城市”，充满复杂性和挑战。

所以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以下几方面工作还要继

续加强。

一是形成共建合力。建设国际金融枢纽是大湾区共同的光荣使命。广东、广州已在金融“十四五”规划中确立了建设国际金融枢纽的目标和定位，明确了重点任务。希望其他核心城市在制定金融规划时，能够将国际金融枢纽建设纳入考量。未来，随着国际金融枢纽建设基础夯实，可能还需要在更高层面建立起工作机制、规划、政策体系，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的有机结合。

二是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合作。坚持“先立后破”原则，对标国际高标准推动制度型开放，发挥好大湾区多金融中心的联动优势，实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努力在国内率先构建能够与新发展格局、经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金融开放新体制。

三是推动金融要素高效自由流动。推进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加快构建更加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机构体系、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金融市场的定价功能、风险分散功能和服务功能，努力实现金融要素在区域内更加顺畅地流动。

四是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金融营商环境。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持续优化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金融营商环境，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加便利、更加规范的市场环境，将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成为全球金融要素资源集聚的首选地。

五是打造与共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相适应的金融安全网。建立健全跨区域、跨部门、跨机构、跨行业的高效、协同、一体化金融风险联防联控机制，着力加强数字化金融监管能力建设，构筑金融风险事件自动化识别与高效应急处置机制，做到有问题早预警、有漏洞早补救、有风险早处置。

我们相信，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的美好愿景一定会实现。

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的广州成就与发展

■ 邱亿通 / 广州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

邱亿通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近年来，广州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机遇，扎实推进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

第一，落实规划纲要要求，构建共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规划政策体系。一是认真开展专题调研和政策研究，制定出台《广州市关于推进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实施意见》和《广州市关于推进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三年行动计划》。二是深入贯彻落实广州市《关于贯彻落实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意见的行动方案》66 条措施，其中 47 条已完全落地或正在推进。三是制定出台《广州市金融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资产管理中心、绿色金融创新中心、数字金融科创中心、科技金融创新中心、跨境投融资服务中心、金融要素交易中心。四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批示指示精神，抢抓“跨境理财通”业务落地机遇，深入谋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和资管中心，已形成初步方案。

第二，加快推进大湾区重大金融平台和项目建设。一是推进广州期货交易所注册落地并揭牌运营。2021 年 5 月，广期所未来两年产品规划获中国证监会批准，将在服务绿色发展类、大宗商品指数类、国际市场互挂类，以及具有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色的大宗商品类等四

要推进大湾区绿色金融等互联互通。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和交流合作，推动绿色金融体系、绿色产品、认证标准合作，形成大湾区绿色标准共识，促进内地标准与港澳、国际标准接轨。稳步开展碳金融创新，争取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碳排放权交易平台，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碳市场互联互通。

个领域研究上市期货品种。二是全力推动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三是协调推动在南沙设立港澳保险服务中心。

第三，有序推进大湾区金融市场互联互通。一是着力推进大湾区民生支付互联互通。推出粤港、粤澳跨境电子账单直接缴费业务，支持港澳台居民使用往来内地通行证、护照等证件自主查询、打印本人信用报告。推动粤港澳征信机构开展跨境合作，推进征信产品互认。二是探索建立与大湾区发展相适应的账户管理体系。拓宽 FT 账户辐射范围，将广州市科创企业纳入 FT 账户适用范围。稳步推动香港、澳门代理见证开立内地个人银行账户业务试点。在全国率先启动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点。三是推进“跨境理财通”和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境外投资（QDLP）试点落地。2021 年 10 月落地“跨境理财通”业务，11 月落地 QDLP 试点。

第四，深入推进大湾区金融改革创新。一是广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绿色贷款、绿色债券、碳配额现货交易量等均位居全国前列，并积极与大湾区其他城市开展绿色金融合作。二是积极开展金融科技试点。获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批准纳入国家级金融科技创新监管试点、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城市，入选广东省首批“监管沙盒”供应链金融创新试点。三是推进南沙自贸区金融改革创新。着力打造南沙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大力发展航运金融、科技金融、飞机船舶租赁等特色金融。四是加强科技创新金融服务。支持广东股权交易中心建设“科技创新专板”、“绿色环保板”、“天使板”、“青创板”等特色服务板块，运用广州市普惠贷款风险补偿机制等政策工具，降低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成本，持续推动知识产权证券化。

第五，加强粤港澳金融推介及交流合作。一是积极主动加强与港澳地区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沟通联系。二是举办第十届广州金交会等论坛展会，充分发挥金融高端论坛展会对外交流合作功能，凝聚大湾区优势金融资源并辐射全国。

加强粤港澳金融合作，推动粤港澳三地金融深度融合发展，进一步畅通经济“血脉”，对于推动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意义重大。未来广州将在以下领域积极发力，推动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取得新突破。

一要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和平台建设。支持建设完善广州期货市场及配套期货产业链，打造风险管理中心。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商业银行设立，争取设立港澳保险服务中心。

二要继续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积极争取自由贸易账户（FT 账户）实现更多突破，稳步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持续推进港澳代理见证开户试点银行扩大范围，扎实推动“跨境理财通”、QDLP 业务，深入开展本外币合一银行账户体系试点工作，推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与资管中心。

三要推进大湾区绿色金融等互联互通。深化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和交流合作，推动绿色金融体系、绿色产品、认证标准合作，形成大湾区绿色标准共识，促进内地标准与港澳、国际标准接轨。稳步开展碳金融创新，争取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碳排放权交易平台，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碳市场互联互通。

四要加强粤港澳金融推介及交流合作。发挥广州高层次金融人才支持政策作用，鼓励在穗机构积极引进港澳地区高端金融人才，加强与港澳的人才培养与交流合作，促进大湾区高层次人才便利流动。

广州期货交易所的筹备建设进展情况

■ 朱丽红 / 广州期货交易所总经理

朱丽红

一、广州期货交易所相关情况

广州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广期所）在 2021 年 4 月 19 日揭牌成立后，中国证监会正式批复了广州期货交易所两年产品研究规划。这个产品规划里面包含了 4 个板块和 16 个产品，在 16 个产品中有一半与绿色金融有关。广期所以实际行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广期所的定位，服务绿色发展，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三个服务里面，广期所把绿色发展放在了首位。在 16 个产品里，碳排放权期货、电力期货以及和新能源有关的六个金融产品，都是服务于绿色发展的，这反映了广期所服务绿色发展的明确定位。

落地广州、落地南沙，广期所非常愿意也应该主动融入大湾区的建设，我们要与深交所和港交所一起，共同搭建引领粤港澳大湾区金融枢纽建设的三个极点，充分发挥金融基础设施的作用。

大湾区应该说是中国甚至是全亚洲最具活力的经济圈，大湾区有以下五个优势：第一产业集聚，第二贸易活跃，第三航运发达，第四科技进步，第五国际融通。同时，大湾区聚集了 8000 万的富裕人口。在这样一个经济活跃的区域，我们非常有信心能够把广期所筹建好、建设好、发展好，充分发挥其在金融领域的带动作用。我们非常看好广期所未来的发展前景。

二、广期所筹备进展情况

第一，把碳排放和电力作为广期所的战略产品，这两个产品对于广期所的发展、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会发挥非常重要的战略作用。

第二，广期所从 2021 年 4 月 19 日到现在已经筹备了 8 个月，首批有两个备选产品：第一个是工业硅，主要是跟新能源、光伏发电有关的产品；第二个是综合商品指数期货，这个产品将填补中国期货市场的空白，这两个产品正在紧锣密鼓地加快研究。

一家期货交易所的建立也是非常复杂繁重的系统工程，我们在业务的规则准备、技术系统的搭建，以及人员队伍的建设方面，都在不断加快速度。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广州市委市政府以及南沙区的大力支持下，广期所将会以最快的速度做好筹建工作。按照中国证监会党委的整体部署来确定最后上市的时间，大家可以共同期待首支产品的敲锣上市。

三、关于期货市场建设的问题

无论是 4 月 19 日广期所揭牌成立，还是未来产品的上市，都很有意义、很重要。但我认为整个期货理念的普及和教育，对期货市场运行的认识和了解，以及相关的企业能够接纳和学习风险管理的方式方法，也同样非常重要。

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基础设施平台里，广期所填补了期货的空白。填补空白本身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广期所的成立对社会各界的思想、认识、理念的影响，以及对相关环境和氛围的创造。

广期所愿意跟社会各界分享大湾区的期货市场理念，加强对期货市场的认知普及，帮助各类产业学会运用期货市场这个风险管理的工具，期望能够为整个大湾区实体经济的发展插上期货的翅膀，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无论是经济产业还是金融的发展能够更加快步向前、更加势不可挡。

发展粤港澳国际金融枢纽力量，打造国际一流大湾区

■ 李彤 /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总裁

在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金融环境中，大湾区经济作为一个国家开放创新和国际竞争的重要载体，成为引领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我们看到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等全球著名湾区均具有自由开放的经济特征，而且这些地方也是世界 500 强创新公司、国际人才等资源的密集区。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增长、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未来最有希望迈入全球一流大湾区行列，成为中国参与全球高端制造业、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关键平台。

世界著名的几个湾区虽然各具发展特色，但无一不具有丰富的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源，因为湾区经济的竞争是技术、产业、人才和资本的竞争，金融中心不仅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资源，而且在吸引人才和支持创新等领域，也发挥关键作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提出共建国际金融枢纽的概念，我个人认为应该抓住三个点：

第一个点，要坚持共建的合作理念。协调区域金融资源，通过紧密合作来提升金融市场稳健运行的能力。

第二个点，发挥金融枢纽的优势。通过金融枢纽的聚集力和影响力，吸引境内外资本和人才服务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

第三个点，明确国际化的目标定位。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利用国际金融资源，并稳步提升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地位。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是传统的国际金融中心，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名列第三，也是我国排名最靠前的国际金融中心。由于香港与国际金融市场深度融合，并且是全球领先的 IPO 融资中心，过去 12 年，港交所有 7 次荣登全球 IPO 之首。香港在畅通境内外资金流，保障企业境外融资安全等领域具有突出意义。尤其在现在的格局中，香港在融通国际资本方面发挥的作用可能比以前还会更突出一些。香港已经为十余家中概股企业提供了二次上市服务。当前，港交所的 IPO 融资中有 60% 以上用来服务内地新经济企业。

李彤

深圳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也在稳步发展，特别是创业板。创业板上市制度改革，增强了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服务能力。从 2021 年年初到现在，创业板的指数上升了 17%，体现了比较强的活力。香港和大湾区的内地城市稳步增进了连通合作，恰逢深港通机制启动五周年，很有意义。深港通启动以来，深股通累计资金净流入超过了 7800 亿元（人民币），深市港股通累计净流入超过了 8100 亿元。2021 年前 11 个月，深市港股通占港交所成交的 5.8%，深股通占深交所成交的 5.4%。这个数据特别有意义，说明深圳和香港这两个要素市场互为双方重要的市场参与者。

2021 年跨境理财通在大湾区率先试点，9 月份开通首月就实现了交易总额超过 2 亿元，个人投资者的参与人数超过 2 亿人，这只是一个开端，因为现在口子还没有打得特别开，这是一个 1.0 版本。我们最近在讨论是否要建一个 2.0 版本，这样未来参与者会更多，交易量会明显上升。

当前深圳和香港的股票市值大概都是 6.1 万亿美元的水平，加在一起是 12 万亿美元。世界其他湾区，比如纽约湾区，它的市值是 50 多万亿美元；东京湾区是 6.7 万亿美元。从深港加在一起的市值体量来说，在全球也绝对属于一流湾区。

2021 年前三季度，港交所和深交所分别位列全球证券交易所新股融资排行榜的第四和第五位。合计融资表明要素市场的融资能力，这两个交易所前三个季度合计融资 500 多亿美金。美国纳斯达克和纽交所加在一起合计融资 1100 多亿，也就是说大湾区把金融资源整合之后，股票市值规模和融资能力与全球顶尖的金融湾区——纽约湾区的规模差距将进一步缩小。

展望未来，加快共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有助于发挥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资源优势。在这一过程中，为了更好地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也为了更有利地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金融支撑，我有三点建议：

第一，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应该是与科技创新活动紧密结合的枢纽。面对新发展格局，坚持科技自立自强的客观要求，面对将大湾区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进一步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为中国企业境外融资和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市场提供稳定的支撑。这也是金融方面开放的一个重点，促进科技、产业、金融高水平循环，继续优化深圳的创业板。

第二，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应该是适配绿色、低碳转型目标的枢纽。未来可以将绿色金融作为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新特色，巩固香港在绿色项目发行、融资和认证等领域的国际专业优势。另外在绿色、低碳转型目标枢纽方面，广州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南沙可发挥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市场化激励机制优势，支持广州期货交易所稳步推出碳期货等碳金融产品，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风险对冲的渠道，这是广州的重要价值。

当前，香港也在积极评估发展成为区域碳交易中心的可行性，未来可以鼓励粤港澳三地探索离岸人民币、碳交易平台，并支持三地共同研究开展跨境碳交易产品的合作。把绿色服务放到广期所服务第一点非常重要，十分期待广期所能发挥巨大作用。

第三，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应该是人民币业务和产品更加丰富的枢纽。未来大湾区跨境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或将进入到以人民币跨境流动为特色的新阶段。香港作为中国最大的离岸人民币金融中心，也在研究提升发行和交易人民币的需求，例如允许港股通南向交易的股票以人民币计价等。2012 年我们曾在香港探索过以人民币计价进行股票发行和交易，但是当时市场需求不太旺盛。下一步还要探索用双币计价的股票发行和交易，这是未来的趋势。最近成立了人民币国际化小组，重新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探索，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突破。

未来在大湾区打造一个成熟发达、境内外顺畅连通的人民币金融市场，开发包括股票、大宗商品在内的更多人民币计价跨境金融产品，有助于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设，营造以人民币自由使用为基础的新型互利合作关系。

国际金融枢纽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金融定位，2022 年是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第一个阶段性节点。相信在新的节点上，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将展示出更强的合作凝聚力，以更高水平的开放和更高质量的发展来支持大湾区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的城市群。

打造大湾区绿色低碳金融枢纽，为实现“双碳”目标赋能

■ 王元丰 / IFF学术委员、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王元丰

金融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有两大主线，一个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另一个就是数字经济。建设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要把这两大主线，即绿色化、智能化结合在一起。

支撑绿色低碳的载体之一就是建筑。因为建筑业在碳排放生命周期的占比很大，约为 40%。中国建筑业的碳排放达到什么程度呢？全产业链每年大概产生 51 亿吨二氧化碳，比全球碳排放第二大国——美国多 3 吨，是欧洲 28 国碳排放总和的 1.8 倍。

香港为了解决当地居民住房问题，新增建筑量很大。香港和澳门本身工业占的比例很小，所以消费端所占的碳排放比重相对较大。建筑这项工作特别需要绿色金融的支持。比如在北京，建设银行支持既有建筑的节能改造，以3%的低利率支持建筑节能改造，支持做碳中和的建筑。新建建筑要做到碳中和，做到低碳开发建设，需要金融从信贷、债券等多方面给予开发商支持。

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大湾区的能源大部分是从外地输入的，而实现碳中和必须进行能源转型，能源转型光靠外地输入绿色能源是不够的，很大部分要靠分布式光伏。而分布式光伏主要集中在建筑的屋面、屋顶。现在有很多新技术可以直接在建筑的屋顶上发电，所以未来一座建筑就是一座发电厂。

实现碳中和目标也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比如碳资产。现在深圳、广州都有地方碳交易所，目前建筑业还没有被纳入全国碳交易市场。但是地方交易所如深圳、北京等，已经把年碳排放在 5000 吨以上的建筑纳入碳交易报告。

现在全国实行 CCER（核证自愿减排量），将来建筑肯定要纳入。2021 年德国把所有的建筑纳入碳交易，欧盟未来的建筑也要纳入碳交易。纳入碳交易以后，每家每户可能都要有碳账户，每个单位都要有碳资产。所以，未来每个单位都会有一个碳资产管理师，这个碳资产要和光、电、储能结合在一起，根据峰谷电价灵活用电，达到节能减排。利用市场机制和金融手段，促进碳交易的发展将是一篇大文章。

澳门、香港分别要在 2045 年、2050 年实现碳中和，挑战还是非常大的，如果没有新思路，仅仅靠原来的做法很难实现。

第一，建筑要跟人工智能相结合。现在很多新建大型建筑跟物联网结合，实现了智能家居，可以很好地控制、降低建筑的能耗。碳普惠措施可以激励大众参与节能，粤港澳大湾区在交通方面采取了一些碳普惠措施。

第二，建筑要和交通结合。未来交通的主力军将是电动汽车，而电动汽车充电设备要跟建筑相结合。未来不仅仅是给电动车充电，还可能要给建筑反向充电，这样整个建筑、交通系统都会发生变化。这些都非常需要金融支持，可以形成新的碳资产管理、碳资产交易。随着 CCER 进一步开展，自愿交易市场会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希望粤港澳大湾区在这方面能走在前列。

绿色发展是未来大湾区金融枢纽建设的关键

■ 齐晔 / IFF学术委员、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齐晔

过去我们总说建筑占碳排放总量的 20%，其实说的都是建筑本身运行的能耗和碳排放，这一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排名第 3，广州排名第 32，深圳排名第 16。近几年进行的绿色金融中心排名，香港排名第 41，广州排名第 30，深圳排名第 28，香港和深圳的排名远远落后于其本身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每年有个“公共政策战略研究”的项目，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提供战略政策支持。2021 年该项目发布了一份报告，题目是《香港绿色金融中心的建立及如何支持大湾区绿色发展》。报告提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香港绿色金融中心的排名与其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相当不匹配，这显示出大湾区在绿色金融中心、金融枢纽建设中的严峻问题和今后的努力方向。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刚开始提出来时，我们理解不够、体会不深，但是这两年发生的事实，无论是疫情、经济，还是动荡的国际局势，都让我们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论断有了清醒的理解。在这种大变局之下，如何能够保持和发展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中国和西方之间，目前能够找到的共同理念之一就是绿色发展，就是应对气候变化，就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未来大湾区的金融枢纽建设该如何支持绿色发展，如何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2020 年以来，碳中和已成为一个热词。过去 33 年我一直在研究气候变化和碳循环，以前这个领域是冷门。2020 年 9 月，习主席在第 75 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力争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使冷门变成了热门，作为这个领域几十年的从业者，我内心非常激动。

实现碳中和目标，面临诸多严峻挑战，我认为主要以下有三个方面。

> *中国和西方之间，目前能够找到的共同理念之一就是绿色发展，就是应对气候变化，就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未来大湾区的金融枢纽建设该如何支持绿色发展，如何支持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

第一个挑战是技术上的挑战。从比尔·盖茨到国际能源署都在谈技术的需求，目前能够支持碳中和的技术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还没有被发明创造出来，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极大的挑战。

第二个挑战是经济上的挑战，或者说是融资上的挑战。每年大体

上需要有 2% 甚至更多的 GDP 用于能源的转型，这还仅仅是通过能源的转型来支持碳中和。听起来似乎不是很大的数字，接下来的 40 年当中，累计需要 100 多万亿。发达国家 2009 年就曾承诺，每年投入 1000 亿美元气候援助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目前仍然还有 20% 的缺口。而中国实现碳中和所需要的资金远远高于这个数字，这还只是对一个国家来讲。总之，实现碳中和，资金支持非常关键，而且所需要的资金巨大。

有不少的研究表明我们不能再指望发达国家了，而是要赶紧加快自己的行动。不能完全依赖公共资金的支持，要把私营部门和整个金融系统调动起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第三个挑战是社会和政治稳定的挑战。气候变化有两个大的风险，一是极端气候、极端天气带来的风险；二是所谓的转型风险，该风险不仅作用于金融系统，而且作用于整个经济、社会系统，这就是为什么习主席说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大湾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应该担负的使命。因为大湾区的生态足迹、碳足迹在全球来讲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是全球平均数的 2.5 倍。无论是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还是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政治社会的稳定，我们现在都有多个试点和先行示范区，都是在经济最为活跃、技术最为先进、社会治理最具有丰富经验的地区，因此大湾区的发展在这些方面应该能够起到非常好的引领作用。

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开创进取，争做世界金融创新领头羊

■ 丁爽 / 渣打银行大中华及北亚区首席经济学家

关于全球的供应链，很多国家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一些国际公司进行各种改革以减少风险，但是疫情使很多厂商认识到不可能完全摆脱中国，反而证实了中国产业链的可靠性。

丁爽

从目前全球的大势来说，主要有两个重点：一是美国和中国的长期竞争，二是国际供应链的调整。中美的长期竞争已经成为事实，对中国实施强硬政策得到了美国两党以及民间的支持，短期内难以改变。拜登政府所采用的手段更加强调联合价值观和理念相类似的国家组成一个联盟，对价值观不同的国家进行遏制。拜登政府把中美关系划分成对手、竞争和合作的三个领域，试图要建立一个护栏，防止两国关系失控，导致意外的冲突。

具体来说，在科技方面继续对中国实行遏制。典型的是在半导体设备和软件方面，企图阻止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进程。在金融方面，美国限制其一些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的产品，同时在监管方面出手，使很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面临摘牌的风险。但是美国希望在气候变化领域与中国合作。

关于全球的供应链，很多国家试图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一些国际公司进行各种改革以减少风险，但是疫情使很多厂商认识到不可能完全摆脱中国，反而证实了中国产业链的可靠性。美国和欧洲都提出要让关键的产业回归本土，美国对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施加压力，要求它们到美国建厂生产半导体。

从中国国内的角度来看，目前一个重大的挑战是人口的老龄化。中国 15 ~ 64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从 2014 年开始下降，65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占到全部人口的 13.5%，而生育率降低到 1.3%，远远低于 2.1% 的替代生育率。按照现在的趋势，我们估计中国人口的峰值可能不是在 2030 年，而是到 2025 年左右达到峰值。这将会影响中国的长远潜在增长率，也就意味着以前依靠要素投入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须通过提升全要素的劳动生产率来延缓增长下滑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的政策更加注重通过长期目标来提高增长的质量，在经济、政策方面强调跨周期的设计，尽量不使用刺激的措施来促进增长。特别需要关注的有三点，一是创新，二是减碳，三是共同富裕。

1. 创新。为什么我们要减少对美国的技术依赖，因为要创造一个独立创新的环境。增加投入，让资源实现再配置，不仅可以减少金融风险，还可以从资源配置的

角度，减少对低技术含量行业的投资，把更多的资源投向高技术产业。

2. 减碳。中国已经承诺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具体时间，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产业结构要经历非常大的调整，要减少能源的密集度，同时要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增加对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的投资。这方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发展绿色金融。中国已经建立了全国统一的碳排放市场，但是只涉及电力行业，其他行业以后会陆续加入，通过碳市场的机制来制定合理的碳价格，激励减排，投资清洁能源。

3. 共同富裕。国家的最终目的是扩大中产阶层，减少收入和财富方面的差距。所用的手段除了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外，还有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打击垄断，增加向上流动的机会。

这些国内外的趋势对大湾区究竟有什么影响？怎么样做到顺势而为？我简单提几点建议。

一是在中国整个供应链当中，大湾区能够成为非常关键的一环。大湾区是中国对外贸易投资的领头羊，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在 2022 年生效，大湾区将在建立完整的区域性供应链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是创新。大湾区可以成为全国和区域性的科创中心。其实在科创领域粤港澳地区已经在全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地位。我们研究发现，包括香港、深圳在内的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指标都有很高的得分，所以要继续吸引高质量的外资，充分发挥资金、人才、体制和市场的优势来提升产业链的含金量，特别是在半导体方面。如果在发展先进制程方面受到约束，目前可以提升成熟制程的生产。2020 年全球半导体、芯片的短缺，很多都是大于 18 纳米芯片的短缺，所以成熟制程其实有很大的机会。同时，要防止高地价、高房价侵蚀这个地区的竞争力。发挥金融市场在中概股回归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在全国碳排放交易所运行之前，广州曾经是七个交易所当中规模最大的碳排放交易所，同时香港也在研究打造成为区域性的碳排放交易中心，所以我们觉得该地区在绿色金融方面大有可为。

三是共同富裕。大湾区有潜力发展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性理财中心。2021 年 9 月推出的跨境理财通实际上是为大湾区内地和香港居民提供了便利，为投资对方理财产品提供了便利。以后大湾区可以发展成为面向全国、面向亚太区域的理财中心，促进双向的投资。目前对于富裕阶层的理财，特别是高净值人士的理财已经有一个非常成熟的机制，实际上需要推出的是适合中低收入阶层的理财产品。根据他们的承担风险能力实现多元化的投资，增加他们的财产性收入，从这个方面为共同富裕做出贡献。

最后，鉴于大湾区的重要性，渣打银行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共同编制了大湾区营商景气指数。从 2020 年开始推出，每季度编制发布一次，对 1000 多家大湾区经营业务的公司进行调查，编制指数。主要目的是为区域内的经济定期把脉，及时地掌握区域内各个城市、各个行业的营商景气情况和信贷的调节。同时我们也做一些专题性的调研，了解区域内企业面临的一些困难，以及对政策的期待，希望该指数能给地方政府和地方监管部门提供一个参考。

筑巢引凤
——打造国际一流大湾区

■ 黄文涛 / 中信建投首席经济学家

黄文涛

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中，粤港澳大湾区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历史使命。城镇化、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是国内大循环的重要载体和主要的内容，“一带一路”、对外开放和深度融合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支撑。在这些方面大湾区具有天然的优势和要素禀赋，国家也赋予了重要的政策支持，大湾区未来将承载着更多的产业升级、科技创新和内外融合的历史任务。

从纽约、东京、旧金山这些湾区的国际先进经验来看，大湾区是带动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创新的领头羊。而金融业的发展在大湾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2021 年，广州市发改委发布了《关于推进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实施意见》和《关于推进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描绘了广州推进共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的路线图。金融市场的建设成为下一步湾区建设的重点，良好的开端就是成功的一半。未来如何能够打造高水平的国际金融枢纽？如何打造高水平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

第一，要努力探索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机制。众所周知，金融和创新最重要的就是吸引高精尖的人才，但是大湾区在人才和创新科技要素流动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使得金融人才优势难以发挥作用。下一步应该建立三地人才流动的机制以及国内国际人才流动机制，通过税收优惠、补贴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等措施来促进人才的流动，并通过搭建技术共享平台实现技术的转移。

第二，要吸引金融机构进驻大湾区，打造高效率、产品全、服务优的信贷金融市场。大湾区目前进驻的金融机构总部跟北京、上海比可能还有一定的差距，未来步子可以更大一点，措施可以更灵活一点，吸引更多的国内外金融机构进驻湾区，形成银行、保险、证券、信托、期货、基金、PE（私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等金融和投资机构百花齐放的局面，并进一步充分利用深交所、港交所、期货交易所、产权交易所、碳排放权交易所等平台，为企业服务、赋能。

第三，区域内的中心城市既要突出优势，又要相互协同。发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作用，带动内地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开发出更多的离岸人民币、大宗商品以及其他风险管理工具。广州建设区域性私募股权交易市场，建设产权、大宗商品、碳排放权区域交易中心。深圳要发挥深交所的功能，加快金融开放的创新，发展海上保险、再保险等特色的金融业。澳门打造中国 - 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建立出口信保制度和葡语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同时，在区域内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规模和范围，鼓励区域内的企业跨境发行人民币的债券。扩大香港与内地的跨境投资空间，扩大两地居民投资对方金融产品的渠道，进一步完善区域内基金、保险等金融产品，以及跨境交易资金和产品的互联互通机制。

从纽约、东京、旧金山这些湾区的国际先进经验来看，大湾区是带动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创新的领头羊。而金融业的发展在大湾区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四，打造总部经济，建立一流高水平的大学等科研机构。世界 500 强中，在纽约湾区的有 60 多家；旧金山湾区有包括苹果、谷歌等在内的大企业 28 家左右；东京湾区有 60 家，包括三菱、丰田、索尼等大型跨国企业。目前粤港澳大湾区有 16 家，跟其他三个大湾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大湾区未来要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良好的宜居环境，提高软实力，筑巢引凤、吸引更多的企业总部落户到大湾区。

从大学来看，纽约湾区有 58 所世界著名高校，旧金山有 20 多所，粤港澳大湾区距离这两个湾区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打造世界级高水平的高校，意义非常重大。科研机构和大学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充足的人才、技术，大学和企业能够相互支持、相互助力、相互促进。但打造高水平的大学不是一蹴而就的，要从现在开始规划、启航，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样科研机构、高水平的大学才能够基业长青。

此外，从顶层设计角度来看，还要提倡产业兴区、科技兴区和人文兴区。大湾区有众多的产业集群，产业结构也正在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迈进，区域内的产业分工比较完善，制造业基础雄厚。所以应该摒弃土地财政，摒弃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科技发展之路，靠产业兴区，靠科技兴区，靠人文兴区。

自由流动是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

■ 刘利刚 / 花旗银行董事总经理、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刘利刚

大湾区发展潜力非常巨大，在人口总量方面它已经远超世界其他主要的湾区，如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目前大湾区常住人口总量约 7000 万人，加上流动人口可以达到 8000 万人。不久的将来，整个湾区可能会达到 1 亿人口的水平。如果今后大湾区建设非常成功的话，这应该是全球最大的湾区。同时大湾区在人均收入方面也属于中国的高水平地区，人均 GDP 近 2 万美元，超过长三角和京津冀等重要的国内经济区。虽然在人均收入上与世界知名湾区相比还有差距，但这些差距也是中国大湾区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粤港澳大湾区与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大湾区虽然是在一个国家之内，但是有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

粤港澳大湾区与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纽约湾区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大湾区虽然是在一个国家之内，但是有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大湾区协同发展需要打通“四流”，即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物流的自由流动、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信息的自由流动。在这四个方面可以采用一些技术手段，再配合以制度创新，能够使一些限制湾区融合的负面因素降到最低，这样可以使整个湾区的劳动生产力进一步提高。

第一，在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方面，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虽然香港、澳门的居民到内地没有什么限制，但是内地的居民到香港、澳门还有不少限制。建议今后双方的人员流动更加便利，特别应对一些短期访问澳门或香港的内地居民减少限制。香港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以前所谓的英联邦国家，像印度的居民短期访问香港可以停留 90 天左右，而现在我们内地居民在香港只能停留 7 天左右，这大大限制了两地人员的交流。另外，因为香港、澳门和内地的监管制度不一样，在资质的认证方面，内地对工作时间、税收的限制比较多。如果去掉这些限制，广州对香港金融人才的吸引力会更大。如果在税收方面进行改进，那么在港从事金融行业的很多专业人士完全可以来内地工作。纽约湾区曼哈顿岛是美国的金融中心，但是在曼哈顿岛工作的金融专业人才大部分都住在纽约的近郊——康涅狄格州。他们每天去曼哈顿岛工作的通勤时间很长，花旗的同事上班需要近 2 个小时，回家又需要近 2 个小时。在粤港澳大湾区，如果用现代便捷快速的交通工具，把香港、澳门与广东的 9 个城市连接得更加紧密，很多在香港、澳门工作的专业人士可以选择居住在广东，不但住房条件可以得到改

善，也可以解决香港住房拥挤和房价过高的问题。

第二，从物流的角度来看，关税不是问题，因为香港和澳门都有 CEPA，关税是比较低的。未来要解决的是一些非关税壁垒，特别是大湾区广东的 9 个城市，是否能够跟香港的关税制度看齐，减少所谓的非关税壁垒，这样可以使物流变得非常便捷。现在横琴有一个新的模式，澳门跟横琴的物流方面没关税的概念，但人员方面有一些通关限制。

第三，在资本的自由流动方面，虽然大湾区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体，但仍然在中国现有的资本管制范围内。当然，根据中国现在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金融监管、资本管制对中国的金融稳定、金融安全起到了保障作用。可以考虑用已经被验证过的、比较有效的方式来解决现在大湾区资本管制的一些限制。台湾的银行系统里有两种银行模式，这两种模式不受地域的限制。一种模式是为台湾本地居民服务，另外一种模式为台湾省以外的投资人或者暂居者服务。这样可以从制度安排方面使资本的流动变得更加顺畅。花旗在香港有机构，在大湾区也有机构，如果大湾区的机构有针对香港居民、澳门居民的服务，也可以使资本的流动更加顺畅。

虽然全球现在面临一些很大的问题，比如美国的货币宽松政策，但是不要忘记香港是一个与美元挂钩的金融市场，它的利息水平现在非常低。大湾区如果想在基建领域快速发展，应该有更多的城市像深圳一样，到香港的市场多发一些长期的人民币债券，把境外的金融市场利用好，将能大力推进大湾区的快速发展。

把握碳金融科技建设，助力南沙经济腾飞

■ 何大勇 / BCG董事总经理、全球资深合伙人

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不论是前海、横琴还是南沙，应该有各自的差异化定位。南沙的差异化定位是什么，哪些是它的制高点，是必须打赢、做好的，我有三点建议：

第一点建议：要抓住碳金融的制高点。当前大家更关心的是碳金融的产品层面，比如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蓝色债券、碳交易等，但是大家忽略了碳金融生态系统里的两个领域。

第一个是基础设施。碳金融的标准、计量、测算，包括数据处理，在整个行业里面做这些工作的人还比较少。没有这些大量的基础性工作，碳金融很难发展起来。大家都知道碳金融既是机遇，也是风险。据清华大学估算，整个能源行业的不良率可能已上升到了 20% 以上，风险的规避、风险的定价，都需要大量的数据、认证、计算和测量，这些工作其实是碳金融真正的制高点，南沙可以引进这方面的人才。

第二个，碳金融里面需要有一类专营机构。我们对碳金融九个行业进行调研，发现大量的企业其实不知道自己的碳转型应该怎样做，包括能源行业、建筑行业、汽车行业，到底发展的着力点在哪？它的特点是什么？它的风险特征是什么？它的产品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很多围绕着碳的专营机构。比如说可以在南沙设立碳金融银行，设立一些专门研究碳金融的分行、支行，让它们专注于碳金融。没有类似金融机构的加入，碳金融这盘棋只靠产品是不行的。

第二点建议：促进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科技经历了信息化、移动化，即过去所说的软件业，其实金融科技现在已经进入到第三阶段，即数据和智能化。例如很多金融机构目前都在做数字化的经营，通过手机和客户交互。在疫情期间，通过手机给客户提供投研、投股、财富管理的服务，这些服务需要大量的运营人员。

南沙在这方面其实有一些优势，一方面有很多金融机构的业务刚刚开展，另一方面是广州有很多专业的数据分析人才，尤其是腾讯的基地在广州。现在开始建设，可以吸收大量银行、保险公司的数字化经营部门进驻，

何大勇

类似于当时湛江引入的金融科技开发和信用卡中心，成都和合肥引进的后台运营中心。广州南沙可以集中力量建设金融机构的数字化数据经营中心。

第三点建议：推动金融机构的转型。周围的产业现状决定了南沙是个做金融产业的好地方，比如说汽车、生物制药、信息、消费电子，这些都是未来新经济的主要行业，这些行业里面需要很多专业的金融机构。比如招商银行在武汉的一个科技支行，信贷余额可以做到 200 亿，而南沙的金融机构可以吸引这些专营机构入驻，让它们专注于这些细分的产业，通过它们带动整个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发展。目前南沙很多的金融机构还在围绕着“三旧”改造，南沙政府应该引导这些机构去专注于新动能行业的专业化建设。

绿色金融圆桌会议

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原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283
吴晓青：绿色金融的实践与创新是推进COP15、COP26目标实现的关键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挪威前环境与外援大臣 285
埃里克·索尔海姆：绿色生态需要绿色金融及多边努力

IFF 学术委员、亚洲开发银行合规委员会前主席 287
唐丁丁：国际金融论坛（IFF）持续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

IFF 学术委员、生态环境部原国家生态环保督察专员 288
夏光：完善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普华永道中国区域经济及金融业主管合伙人 290
张立钧：中国绿色金融的现状及挑战

毕马威中国区金融风险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 291
曹劲：金融风险管理面临的挑战及路径问题

伦敦大学可持续金融与基建转型学院首席教授 293
梁希：调动和有效利用气候资金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一环

绿色金融圆桌会议学术讨论 295

绿色金融的实践与创新是推进COP15、COP26目标实现的关键

■ 吴晓青 / 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原环境保护部副部长

吴晓青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会议（COP15）以及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已成功举办，我们应如何借助金融的力量特别是绿色金融工具，推动这两次全球重要会议所达成的共识和目标的实现，尤其是如何凝聚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与金融资本等各利益相关方的力量，构建广泛、多元化的伙伴关系，以协同的方式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着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危机，由于环境污染、气候变化以及人类的经济活动造成的热带雨林收缩和物种灭绝的速度，达到了自然速度的 1000 倍。生物多样性丧失已对人类造成了直接或间接的多重风险，其中包括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生态系统退化以及粮食安全等。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0 年全球风险报告》再次发出警示，生物多样性丧失是人类未来十年面临的五大威胁之一。

作为多年从事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者，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来自大自然的神奇物种，因为人类活动的影响而骤减甚至消失，我也无法想象物种消失、生态系统崩溃，对人类福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灾难。

以我对 COP15 和 COP26 的观察，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紧迫性主要源于全球治理统筹协调各方资源的严重滞后。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评估所示，全球历经十年的生态保护成果令人失望，2010 年确定的 20 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最终没有一个目标充分实现。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意愿以及金融资本力量的支持，可能是主要原因。惨痛的历史实践告诫我们，仅有一套雄心勃勃的全球目标是远远不够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需要强大的政治意愿，以及广泛的参与和强有力的执行，其中资本和技术的参与和支持必不可少。

2021 年 10 月在中国昆明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COP15）全面启动了 2020 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谈判进程。中国政府作为会议的东道主，也为 COP15 的后续目标谈判注入了动力，宣布捐资 15 亿人民币创建“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用以号召更多的国家出资出力，支持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进程。同时，中国政府于 10 月 11 日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构建多元化的伙伴关系，创建社会化和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并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10 月 25 日，中国政府以国务院办公厅文件形式发布《关于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社会资本参与生态

环境治理的路径、方法和主要支持鼓励政策。

与之相呼应，国际金融论坛（IFF）携手世界资源研究所、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以及中国的华夏银行和兴业银行等 34 家全球金融、环保和民间社会组织，于 10 月 25 日在北京向全球发出了“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关系全球共同倡议”，呼吁全球金融资本力量包括民营和私人资本，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环境治理进程。

可以说，这些重要举措强有力地支撑了 COP15 的会议成果以及中国政府的相关倡议。COP26 取得了重要进展，经过六年的艰难谈判，各缔约方终于就如何进行碳市场国际合作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为建立健全透明和负责任的碳市场提供了必要的规则。此外，COP26 还发表了包括巴西在内的 100 多个国家签署的《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共同承诺到 2030 年结束森林砍伐。

但会议也有一些缺憾，其中就包括资金问题，这是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事关气候多边进程和政治互信。参会各方最终同意将长期资金议程延续至 2027 年，发达国家将继续完成现有义务，即每年提供 1000 亿美元公共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至 2025 年。

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推进 COP26 议程的磋商谈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 2030 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等重要文件，提出了中国政府实现“双碳”目标的 1+N 政策体系和路线图、时间表。

综上所述，绿色金融的实践与创新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也将成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包括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工具和抓手。结合上述 COP15 和 COP26 相关成果和倡议，以及中国政府有关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政策措施，我就绿色金融如何进一步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是充分借鉴过去的经验教训，加快构建金融机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各利益相关方广泛参与的多元化伙伴关系，包括抓紧创建“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关系”的工作体系，利用国际金融论坛（IFF）等国际平台优势和影响力，广泛调动各利益相关方的资源和力量，特别是金融与社会资本的支持，积极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磋商谈判，力争在 2021 年 COP15 第二阶段会议前，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投融资目标与方案。

二是结合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发展与城市化建设进程中，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积极探讨如何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与污染防治进行协同工作，目的是构建符合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治污降碳与保护生态环境”协同并举的全球环境治理新格局，使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解决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

三是进一步支持推进绿色金融实践的改革与创新，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适应性要素，纳入到金融机构投融资业务的重点和管理流程。积极促进环保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的整合以及技术工具的研发，为金融机构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

绿色生态需要绿色金融及多边努力

■ 埃里克·索尔海姆 /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挪威前环境与外援大臣

人类现在关注的三大危机是污染危机、自然危机和生物多样性危机。正如全球变暖所警示的，各种危机之间联系紧密，我们需要找到应对所有问题的对策。当然，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巨大的。好消息是，各方都在积极应对。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为低碳项目提供总计 6 万亿人民币的低成本资金支持，帮助中国企业走上更加绿色、低碳的道路，以新的方式保护自然。这是中国人民银行的一项重大投资。中国的一些银行和金融机构也已经采取了一些关键措施。例如，中国工商银行发行了绿色债券。作为 2021 年“IFF 全球绿色金融奖”的评委，我认为中国金融机构提出的方案都非常棒，在评奖时感到难以抉择。

中国如何利用其经验帮助其他国家？中国又如何学习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最佳实践？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改变我们的观念——填补巨大财政缺口，需要私营部门的投资。

正如习主席所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可以通过绿色来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制定绿色政策促进可再生能源生产，发展电动汽车、绿色旅游、绿色农业，并为所有绿色参与者提供价值。

21 世纪的发展模式是健康与繁荣并进。21 世纪是双赢的世纪，既要有利于经济发展，同时也要有利于生态保护。这意味着我们真的需要改变我们的思维模式。我认为，目前最好的国际绿色实践在欧盟，欧洲的分类方案是推动欧盟成员国投资的主要方案。中国可以从其中学到很多东西，交流观点和借鉴经验。重点是要关注绿色产业——那些为全球绿色事业做出贡献而且没有负面影响的产业。那些得到银行和金融机构低利率和优惠待遇的棕色产业和依赖煤炭的行业，将受到高利率和金融机构不利待遇的惩罚。

我相信，欧洲分类方案在推动欧洲商业绿色能源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当然，有很多问题需要讨论，如碳捕集和存储，以及近来热议的核能问题。问题很多，但所有的绿色产业都受到了欧洲分类方案的激励，也引起中国的兴趣。在这方面，中欧之间的对话至关重要。

埃里克·索尔海姆

在规范市场方面，政府需要提供引导性的措施。对于每个人来说，绿色发展在许多领域的长期优势都非常显著，如电动汽车减少了交通行业的污染，电动汽车的长期总成本比燃油车低等。

实现绿色转型需要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充电站充电桩的建设。政府需要提供一些引导性措施以促进绿色转型。在我的国家，上个月电动汽车销售数量占汽车总销售量达到了 80%，这一比例比中国高得多。当然，中国的电动车市场更大。但我的国家在这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其主要原因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例如改变税收制度，使电动汽车更便宜；向购买电动汽车的人提供优惠；让电动汽车使用者在停车和轮渡方面享受优待等。政府的这些政策，极大地鼓舞了人们购买电动汽车的热情，也有力地推动了对电动汽车行业的投资。

政府还需要与企业交流合作，目前印度尼西亚就有此类协作的成功案例。2020 年，印尼的森林砍伐基本为零，达到印尼历史的最低点。这一巨大成就的取得，要归功于政府的好政策和印尼企业强烈的责任感。

近期，印度两个行业巨头与政府合作，投入 300 亿美元 (接近 2000 亿人民币) 开展绿色氢能源项目。政府需要规范市场，进行引导，也需要与企业合作。政府在绿色经济转型中至关重要，因为通常来说，对社会整体有好处的事务往往会给某些个体带来损失。比如，中国山西省的煤矿业主可能不太高兴看到风力和太阳能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兴起。所以，政府需要实施培训计划、投资计划和制定一系列政策，以确保绿色转型的社会公平公正。在这方面，中国、美国、欧盟以及世界所有致力于绿色转型的国家和地区是完全一样的，我认为欧盟的相关最佳实践可以被中国借鉴。

中国承诺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这是 2021 年世界上最好的绿色新闻。这不仅能减少煤炭的使用，而且有助于在中国商业和工业推广太阳能、绿色氢能和电动汽车。此外，印尼、越南、南非等国也将不再获得煤炭产业的投资，而是转向绿色能源。

我们可以一起做的事很多。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停止相互指责，而是应该共同努力。在格拉斯哥举行的 COP26 会议上，一些人把全球气候危机归咎于中国和印度，这是非常不公平的。美国历史上曾有一段时期，人均碳排放量比印度多 25 倍，比中国多 10 倍。发达国家没有理由指责中国和印度不作为，中国、印度都在积极努力地实施低碳行动。COP26 会议凸显了最应对全球绿色转型负责任的是发达国家。业界和政府、中国和美国，以及世界各国如果能一起努力，在绿色金融方面的成就将不可限量。让我们一起为共同实现生态文明而努力！

国际金融论坛（IFF）持续推动绿色金融的发展

■ 唐丁丁 / IFF 学术委员、亚洲开发银行合规委员会前主席

唐丁丁

国际金融论坛（IFF）创建于 2003 年，一直高度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并创立了国际金融论坛（IFF）全面可持续发展理事会。近年来，IFF 更加关注全球的绿色浪潮，这个绿色浪潮主要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两个方面，而且都跟绿色金融有关。IFF 在这两年做了大量与绿色金融相关的工作，主要是一些基础性、专业性的工作，其目的就是要将绿色理念融入金融的行业当中，IFF 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让金融和环境、社会与民间能够进行良好的互动。

国际金融论坛（IFF）在绿色金融方面取得的成果主要有以下几项：

第一，IFF 于 2020 年创办了“IFF 全球绿色金融奖”，并连续两年成功组织和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IFF 全球绿色金融奖”评选活动。第二届“IFF 全球绿色金融奖”在第一届基础上增设了机构年度奖 10 名、项目创新奖 10 名。“IFF 全球绿色金融奖”的获奖机构和项目率先引导绿色融资流向可持续发展领域，成为绿色低碳行业的先行者、发起者和推动者。“IFF 全球绿色金融奖”在鼓励绿色金融从业者支持和创造人人共享的可持续世界、有力推动相关的机构以及企业和社会力量关注绿色金融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第二，国际金融论坛（IFF）2021 年首次推出了年度旗舰报告——《IFF 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2021 年）》，报告主要分三个部分：经济篇、金融篇和政策篇，其中金融篇的主题就是绿色金融。IFF 还与中央财经大学联合推出了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指数。这个发展指数通过 53 项指标，对全球 GDP 排名前 55 位的国家和经济体，进行了绿色金融实践与发展的排名。中国在这个排名当中位列第四，意味着我们还有很大发展潜力，有很长的绿色金融发展之路要走。

第三，国际金融论坛（IFF）在近两年的年会期间都设置了绿色金融圆桌会议。2021 年年会期间正式与高盛集团联合创建了中美绿色金融工作组，该工作组将主要关注气候变化问题，也会兼顾全球生态问题，比如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个工作组的创立可以说是 COP26 会议签署的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宣言的补充，是中美官方气候合作的一个重要辅助和支撑，是中美气候合作的民间交流平台。希望国际金融论坛（IFF）在这方面能够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

第四，国际金融论坛（IFF）联合世界资源研究所，以及其他 34 家金融、环保、社会组织、科学研究等机构，于 2021 年 10 月 25 日在北京共同发起了《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关系全球共同倡议》。

以上是国际金融论坛（IFF）在绿色金融方面取得的一些具体成果，IFF 将继续努力为全球绿色金融实践与创新贡献力量。

完善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 夏光 / 生态环境部原国家生态环保督察专员

夏光

金融对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生态环境保护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和核安全。这四个方面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污染防治可以减轻对生态系统的破坏，生态保护则可以提高环境的承载能力，发展核电是对化石能源的替代选项，同时也有利于减少温室气体和常规大气污染物排放。因此，生态环境保护应坚持系统观念，从限制和激励等多角度制定和实施对上述各项内容具有综合作用的政策。

生态保护补偿是具有这种综合作用的一项政策，通过强制性或自愿性的利益再分配机制，保障生态环境保护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对于生态保护补偿的资金，有的指定用于生态环境保护相关事项，有的也可以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民生，这样有利于统筹安排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保。

国家十分重视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全国政协主席曾亲自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商讨，并由一位全国政协副主席带队前往地方调研，时任生态环境部黄润秋副部长参加了调研。

截至 2019 年，中国生态保护补偿财政资金投入近 2000 亿元，15 个省份参与开展了 10 个跨省流域生态补偿试点，包括新安江、千岛湖、沱江、岷江等，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实现国家级生态公益林全覆盖，草原、湿地等领域生态保护补偿也在推进。中央财政资金拉动地方投入效果显著。2012 年以来，生态环境部下发的中央财政补偿资金为 70 多亿元，拉动地方跨省流域试点项目资金额约为 276 多亿元。其中，上下游地区的省级财政生态补偿资金为 63.29 亿元，中央补偿资金约占 25.46%，地方自筹资金约占 74.54%。但由于地方上相互之间进行生态保护补偿，或地方对辖区内生态环境保护做得好的单位，进行奖励等政策的统计口径不完全一致，所以目前还难以得到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生态保护补偿数据。

举一个山东省的例子，2019-2020 年，对达到水质考核目标、水质同比改善、水质类别提升的市，省级财政累计给予奖励资金 7.25 亿元；反之，考核不达标、水质同比恶化的市，向省缴纳赔偿资金 0.56 亿元。同时，全省共清算收取各市主要污染物排放调节资金 62.22 亿元，对超额完成年度减排任务的市，按照不同的比例返还 49.82 亿元；对完成年度减排任务且单位 GDP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较低的前 8 个市，奖励资金 0.52 亿元。2021 年山东省与河南省签订了《黄河流域（豫鲁段）横向生态保护补偿协议》，若两省交界的刘庄国控断面水质年均值在Ⅲ类基础上每改善一个水质类别，山东补偿河南 6000 万元，反之则河南补偿山东；刘庄国控断面年度关键污染物（COD、氨氮、总磷）指数每同比下降或上升 1 个百分点，河南省将获得或支付 100 万元补偿资金，上限达 4000 万元。目前，山东已拨付河南省 2020 年生态补偿资金 7600 多万元。

生态保护补偿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缺乏统一、权威的补偿标准，补偿数量主要依靠磋商谈判，往往受补偿方的利益补偿不足。二是补偿方式比较单一，财政资金担当主要角色，市场化资金参与不多，其他方式例如区域产业一体化布局、发展项目合作、技术转移转让等运用较少。三是相关补偿政策不健全，对于利益相关方缺少必要的强制性和规范性，难以调动各方积极性。

作为参与国家绿色发展的社会力量，金融机构在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按照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的意见》，促进健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分类补偿与综合补偿统筹兼顾、纵向补偿与横向补偿协调推进、强化激励与硬化约束协同发力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

一是拓展市场化融资渠道。参与研究发展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等各类资源环境权益的融资工具，建立绿色股票指数，发展碳排放权期货交易。积极推广生态产业链金融模式。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符合绿色项目融资特点的绿色信贷服务。符合条件的非金融企业和机构发行绿色债券。保险机构开发创新绿色保险产品参与生态保护补偿。

二是探索多样化补偿方式。支持生态功能重要地区开展生态环保教育培训，引导发展特色优势产业、扩大绿色产品生产。支持发展生态农业和循环农业，参与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项目试点。帮助地方将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等工程与生态产业发展有机融合，动员居民参与建立持续性惠益分享机制。支持探索危险废物跨区域转移处置补偿机制。

三是积极参与制度改革和政策配套。支持建立统一的绿色产品评价标准、绿色产品认证及标识体系，支持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协助对因保护野生动物造成的人员伤亡、农作物或其他财产损失，开展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积极参与生态保护补偿等有关技术方法的联合研究。

中国绿色金融的现状及挑战

■ 张立钧 / 普华永道中国区域经济及金融业主管合伙人

张立钧

普华永道有很多核心业务，其中在绿色金融和碳中和领域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以下三项。

第一，在 2015、2016 年我参加了 G20、B20 峰会金融工作小组，由两家央企董事长作为组长，我作为当时的智库成员配合制定了一些绿色金融方面的政策，包括企业端、工商界和政府端的绿色金融政策。

第二，为配合中国推出《“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2018 年普华永道作为第一秘书组，为政策的制定做了很多压力测试的模型。

第三，2021 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上线交易，同时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倡议下，成立了全国碳中和行动联盟，普华永道是发起单位之一，我本人是该行动联盟的常务理事。普华永道在以上领域，从政策制定到创建模型再到 ESG 报告等，做了很多工作。

普华永道服务很多金融机构，我对当前中国绿色金融的现状及其所面临挑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过去几年，中国在绿色金融领域取得了一些成绩。比如，针对清洁能源领域的信贷，从 2017 年几百亿发展到了 2021 年几万亿的规模。

2021 年 10 月 24 日，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这是所谓的“1+N”里面的 1。2021 年 11 月 8 日，央行推出了碳减排金融支持工具，是宏观的调控工具，这个工具是“1+N”里面的一个 N。这一结构性货币政策，就是配套的绿色金融工具。这个工具设计有以下几个特色：

第一，先贷后借的模式。银行可以先发放贷款给合格的企业，然后再到央行按照 60% 的本金贷款。

第二，这个工具的发放现在还是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及股份制银行。

第三，放贷企业要求突出小而精、“专精特新”的特点。

这个工具释放的信号更多是在于所支持的产业，这就回到绿色的定义。过去很多年，全球对于绿色的定义有很多不同的标准，这一次中国跟欧盟走到了一起。标准主要围绕三块：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清洁能源包括风力、太阳能、生物、抽水蓄能、氢能、地热等；节能环保包括新型电力系统等；碳减排技术包括碳捕集和存储技术（CCUS）等。

除了巨大资金缺口带来的挑战外，金融行业在拓展绿色金融业务的时候，还面临两个风险：一是物理风险，二是转型风险。物理风险就是因为气候变化带来的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对于直接授信客户群体一些资产造成的损失。转型风险是指因为能源政策、能源技术的变化，使企业本身经营产生很大的问题。如果现在银行只给企业所谓绿色金融项目贷款，按照中国和欧盟最近达成的绿色金融统一标准，很少有企业能够真正达到这一标准。这个时候不能搞一刀切，所有企业的转型需要时间，从棕色到灰色再到轻绿、深绿，要有一个过程。过去这两年一直在探讨，应该有一个转型金融的概念，转型金融就是目前还不符合绿色金融标准的金融，旨在支持从棕色、灰色慢慢走向绿色的过程。大家知道近期出现拉闸限电、保电供煤的问题，2021 年 11 月 17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专门推出一个 2000 亿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这个再贷款是给煤炭行业的，但是必须做清洁煤，因为它不符合绿色金融的贷款。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各国资源禀赋不一样。因为中国是少油贫气的国家，所以煤炭向可再生能源转换，需要一个过程和时间。

金融风险管理面临的挑战及路径问题

■ 曹劲 / 毕马威中国区金融风险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

当前金融风险管理面临很多挑战，在经济学研究领域里，以往认为金融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现在要照顾到生态、环境、社会、治理和气候各个方面。经济活动要考虑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简单的股东或者高管利益最大化。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TCFD）、ESG 指数等前瞻性的研究工作，未来可能成为银行业的必做工作，而且评级指数是建立绿色金融市场很重要的基础设施工作。

毕马威成立了一个很大的全球团队推广 ESG，加入很多专业的委员会。跟普华永道一样，我们也建立比较大的专业团队。两年以来，绿色的问题包括 ESG，成为了绿色浪潮。这个浪潮下有生态战略，有数百亿规模的投资市场，但是也有很现实的挑战。

这个挑战是什么？归结为两点：第一点是绿色系统外部性的需求。ESG 非常好，但对一家企业或者金融机构来说，有一个现实的问题——要赚钱、要盈利，放贷要收回，这些问题是不是变成一个内生性的问题，现在还是一个问号。第二点就是目标非常明确，但是路径不清楚，也就是远景非常美妙，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实现。

现在争论比较多的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实现绿色发展，是用计划的方式还是用市场化的方式。当然，在中国这两条路径一定是要相互支持的，不能只是市场或者不能只是计划。市场化的方式，金融是一个重要的路径，碳排放交易市场、碳税和各种各样的金融工具，比如绿色信贷、绿色基金、绿色债券、绿色保险，应该培育这样一个市场。

按照市场规律来做，就要把一个外部性的问题变成一个内生性的问题。既然是金融行为，就存在风险，因为风险是金融最重要的驱动力。风险来自于何方？它有什么特点？

第一，具有长期性。绿色减排、低碳经济，要真正产生效益绝对不是一两年的时间，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对于一个投资来说具有很强的长期性，长期性又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从长期考虑很需要一项技术，但马上投资很可能打水漂，这就是不确定性问题。

曹劲

第二，具有很强的非线性。非线性就是以前投资多少钱，有多少收益，我知道；现在投资能有多少收益，不清楚。有可能投资很多，却不会产生效益，也可能很多年以后才会有效益。气候风险就具有这样的非线性特征，温度上升 1℃，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不进行温控，任由气温不断上升，30 年后，累积升温 4℃或者 4℃以上，就有可能从量变产生质的突变，进而发生气候性灾难。非线性的典型特点就是逐步渐进到突变的过程。

绿色减排、低碳经济，要真正产生效益绝对不是一两年的时间，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对于一个投资来说具有很强的长期性，长期性又会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绿色金融的这些特性意味着，如果把绿色金融简单看成是金融投资行为的话，它具有很强的风险，因为它有不确定性、长期性和非线性。

绿色金融风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物理风险，一种是转型风险。不同的风险解决的路径也不同。物理风险是气候变化造成的干旱、洪灾、飓风等极端天气灾害带来的风险。转型风险是行业转型过程中，因技术、政策和市场的变化带来的风险。

所以选择绿色金融的路径，要在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这个问题在中国显得比较复杂，因为不仅涉及绿色减排的问题，还有经济发展的问题。不同行业有不同的政策，所以会发生很多特殊的、特定的问题，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会有不同的情景，产生不同的路径。绿色金融的路径问题可能是决定将来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国际金融论坛（IFF）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高端金融交流平台，通过国际合作，国内外专家共同努力一定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些路径发展的问题。

调动和有效利用气候资金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一环

■ 梁希 / 伦敦大学可持续金融与基建转型学院首席教授

梁希

过去 5 年，金融机构在助力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发展方面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就。2016 年 8 月 31 日，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随着这个指导意见的出台，中国成为了全球首个建立了比较完整绿色金融政策体系的经济体，有力地促进了全球金融体系系统性发展绿色金融工作。2020 年 10 月 26 日，生态环境部、国家发改委、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并在环境科学学会设立了支撑这项工作的气候投融资专业委员会，正式把调动气候资金工作纳入到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前进列车的仪表盘。我从学者的角度重点讲讲目前存在的问题和挑战，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在格拉斯哥举行的 COP26 大会上，大家特别关注如何落实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每年 1000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媒体和政客总是对资金总量感兴趣，但实际上资金取得的效果和使用的效率才是更重要的，但却一直被忽略。

首先应该对气候资金的性质和用途细分，气候资金有三大资金来源：公共资金、慈善资金、商业资金。气候工具也可以分为赠款、债务融资。贷款可以分为商业贷款、政策性贷款。如果赠款使用得当，它的减排效果远远比商业贷款和政策性贷款大得多。所以分析和披露气候资金的类型是很重要的，在 1000 亿美元里面，不同的类型有多少？每 1 美元的气候资金能够带来多少气候效益？减排提升了多少气候适应能力？关注气候资金总量意义并不是特别大，更重要的是要看效果。

第二，整个社会和金融界应该更加关注其额外性，也就是绿色金融、气候金融、碳金融能带来多少真实的额外气候效应。以珠海海域建成的金湾海上风电项目为例，媒体报道每年减排二氧化碳 45 万吨，这是广东省最早的一批海上风电项目，也是粤电的重要项目。问题是该项目为融资单位带来了多少减排量？粤电为这个项目筹集资金，按照现有的标准统计，它一定是属于绿色融资项目，但是如果项目没有绿色贷款，没有绿色债券的标签，仅仅使用常规融资就实现不了这 45 万吨减排吗？如果这个项目使用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又能够带来多少额外真实的减排量。我们对国际上的绿色债券进行过同类对标的比较，发现贴标的、不贴标的同类债券，在融资成本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绿色债券没有给企业投资绿色项目带来很大的实惠，很多企业也不大愿意去接。但是很多投资人倒不这么认为，比如我英国的邻居，他买了绿债，就认为自己减排了。这就像一种现代版的赎罪券。作为绿债的发行单位和认证单位，要更负责地准确披露，避免误导投资者，觉得买了绿债很好，就可以用来赎罪了，这一套做法是西方的，中国应更严谨地对待，要进行修正。对于绿色气候、碳金融、碳抵消指标，需要有一套非常客观的额外性评估体系和对外披露。

第三，双重计算的问题需要解决。从信息披露上讲，珠海这个项目，企业说实现 45 万吨减排，政府给了 0.85 元的电价，也可以说实现 45 万吨减排。金融机构说我们促成这个项目，实现了 45 万吨减排，工程公司对外也可以宣传实现了 45 万吨减排，加起来，貌似为社会实现了 180 万吨的减排量，甚至负责这个项目的专家亦可说自己减排了 45 万吨，这实际上是一种重复计算。宣传导致其没有太强的约束力。最近很多企业提出了碳中和，碳中和其中一个手段是购买绿电，绿电也是未来在金融市场上可以交易的一个工具，这是可再生能源项目。如果一家企业买了绿电抵消了排放，同时这个绿电项目又把发出来的核证自愿减排量出售到碳市场，这就是严重的双重计算问题，会误导很多投资者。《巴黎协定》实施细则推动各国开展碳交易，但同时也要避免双重计算，要实施相应的调节机制。企业也需要建立这种机制，如果卖了绿电能够抵消碳排放，就不能向碳市场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只能二选一。

第四，绿色金融、气候投融资，应该对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起到推动作用。上述海上风电项目，具有非常强的示范意义和技术的先进性。核证减排量的碳市场能否识别这种示范的意义，进而在政策上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绿色金融也可以这么做，可以重点支持一些有重要示范意义的项目，目前生态环境部正在筹建国家自主贡献重点项目库，其意义非常重大。

人民银行宣布了碳减排的支持工具，利率是 1.75%，这是力度非常大的一个举措。但是所有中国人民银行的碳减排项目都需要公共资金和政策的资金支持。能否再进一步提升公共资源的使用项目？比如说有较强额外性的项目给 3% 的利率，因为它本来就已经在商业上可行了，但它具有创新性，也确实需要资金，其他一般有额外性的项目给 1.75%。这样特别需要公共资源支持，而且有技术原创性的项目就可以获得接近零利率的贷款，从而更大力度地支持这些项目从原来的不可行变成可行。

最后一点，绿色金融如何满足其他的社会责任目标，过去一些绿色项目带来了二次污染和贫困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也需要去关注和解决。

绿色金融圆桌会议学术讨论

主持人：方　莉，世界资源研究所 北京首席代表
嘉　宾：埃里克·索尔海姆，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挪威前环境与外援大臣
唐丁丁，IFF 学术委员、亚洲开发银行合规委员会前主席
夏　光，IFF 学术委员、生态环境部原国家生态环保督察专员
刘　凡，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张立钧，普华永道中国区域经济及金融业主管合伙人
曹　劲，毕马威中国区金融风险管理咨询主管合伙人
梁　希，伦敦大学可持续金融与基建转型学院首席教授

方莉：夏光主任，很多话题都指向政策层面，绿色金融需要很多金融以外的努力，您能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夏光：市场有很多资金，绿色发展也需要很多资金，这两者之间目前还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为什么社会资本不能很好地进入生态环保、绿色发展领域？实际上很简单，因为不能把公共利益的那些目标，交给具有市场主体地位的机构去完成，公益目标应该是由政府来负担的。金融机构特别是一些公司，如何支持绿色发展呢？主要靠认识、发掘、深挖生态产品的价值，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和农民主体来讲，是比较困难的。所以金融机构需要把工作做到更前面去，不仅仅是在人们需要资金的时候为其发放贷款提供资金，而且要往前走，走到前面，要对当地百姓进行发展绿色产业的教育培训。当他们经过培训，建立起绿色产业体系以后，金融机构再贷款支持其发展，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我最后的建议就是，金融机构不单要在后面的贷款环节盈利，而且也需要走在前面，更多地参与建章立制，完善我们的各种政策。

唐丁丁：大家既要关注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的协同问题，同时也要考虑资本投资、融资的协同问题。

刘凡：建议中债绿色环境指标体系由多个部委评价以后，经银保监会、人民银行、生态环境部、发改委等相关部门的认定上升为国家标准。同时也希望生态环境部能够对符合真实绿色标准的绿色债券产生效益的项目，早点发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让其能够拿到市场补贴，而不仅仅是靠政府的补贴。

张立钧：最好的市场化手段，就是发挥碳交易市场的作用。现在中国的碳交易市场，不管是价格还是交易机制，都没有跟国际碳市场接轨。最好的办法是专门针对碳资产创建全球一致性的交易机制定价产品，发挥交易市场的作用。

梁希：我们迫切需要提升绿色资金、气候金融的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细分融资资金的性质和用途，识别披露额外性，保证公共资金用到真正有需要的刀刃上，避免双重计算，鼓励创新，强化其他社会发展目标的协同，这样绿色金融才会做得更务实、更高质量。

曹劲：我非常支持用金融手段来推进“双碳”战略的落地。我提两点建议，对金融机构来说，第一个是要提高认识、勇于创新、提前布局，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行动。第二个是在基础能力方面，要加大人才储备，要在专业技术、数据系统方面提升能力，以迎接绿色金融将来的挑战。

索尔海姆：现在绿色领域有这么多的工作正在推进，有这么多积极的情绪，有这么多倡议正在进行，私营部门、政府部门都在积极参与，我听后感到非常受鼓舞，相信我们能够更好地去管理危机。我的建议是需要看大宗资金，而不要紧盯小的资金来源。需要由政府资金来引领环境领域的发展，这是我的建议。在格拉斯哥举行的 COP26 会议上，讨论了每年补偿发展中国家 1000 亿美金的问题。现在美国的国会、欧盟的议会，政府部门包括各国央行都需要确保把资金投入绿色的方向。中国、欧盟、美国的政府都应该继续引领市场朝着绿色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大笔的资金进入所需的领域，才能够带来更好的效果，绿色出行、绿色循环经济，才会有机会发展。

方莉：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得不结束今天精彩的讨论，但是站在新的起点上，从意识到意愿，从心动到行动，我们都处于可以为全球创造新样板、创造新机会、创造

新模式的时候。总结大家的想法，金融机构内部要把绿色金融意识放到发展战略和工作流程里，在产品的设计中要根据不同的类型，规范其标准、测算方法，并形成大市场。金融系统之外，非常重要的是怎么帮助形成有利于生物多样性、应对气候变化以及污染防治的融资机制。金融并不是慈善，它的投入是需要回报的，只有有回报才能使投资持续下去，形成正向循环，所以我们主要的建议都是集中在这些方面。

首先是确权，没有清晰产权界定就没有办法交易，所以在 1+N 里面应该有总量指标。有了总量指标，才相当于为碳资产进行确权。确权只是第一步，是把一个虚化的全球化集体性需求，变成了市场主体实在的真实性需求。其次有了确权，才有减排的需求。供给端也需要多品种供给，如果只是单一行业的供给，产生不了价格的差异，也就产生不了交易的动力。所以多品种的加入，更多的碳品种的加入，才可能产生价格的差异，促进市场的动力。最后关于减少市场的交易成本，怎么样让信息更加公开、透明，让我们的监管也更加有力。刘凡先生刚才提到希望不同的行业能够形成统一的标准，这都是希望降低交易的成本，在执行过程中希望行政程序不要太复杂。

最后大家都提到了，希望全国形成一个大市场和国际规则接轨，推动国际合作，也通过国际合作让这种资产的价值、生态的价值、自然的价值得以体现。

后疫情下中国与世界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IFF 理事、沙特阿拉伯国家发展基金首席执行官 299
史蒂芬·格罗夫：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的新挑战

IFF 理事、全球绿色发展署总干事 300
弗兰克·里斯伯曼：金融行业助力实现净零排放承诺

IFF 学术委员、亚洲开发银行前资深副行长 301
宾度·罗哈尼：后疫情时代亚洲国家的新挑战和新格局

IFF 学术委员、亚洲开发银行前副首席经济学家 302
庄巨忠：《IFF 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2021 年）》第一章介绍

IFF 理事、巴西工业发展与贸易部前部长、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前主席 304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携手解决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至关重要

IFF 学术委员、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305
聂庆平：2022 年全球经济增长将面临的三大挑战

后疫情下中国与世界的新形势和新挑战：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IFF 学术委员、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307
夏乐：中国的政策变化对海外经济的溢出效应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308
张慎峰：聚焦国际经济发展挑战，追求贸易高质量发展

IFF 学术委员、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执行副会长 310
柳磊：中国上市公司助力 ESG 良好发展

IFF 学术委员、对外经贸大学研究员、大连商品交易所原理事长 311
李正强：坚定信心大力推进我国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IFF 学术委员、亚洲开发银行合规委员会前主席 312
唐丁丁：国际金融论坛（IFF）在全球绿色浪潮中的重要作用

IFF 学术委员、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314
齐晔：聚焦全球三大挑战，推动全球绿色发展

如何应对全球经济的新挑战

■ 史蒂芬·格罗夫 / IFF理事、沙特阿拉伯国家发展基金首席执行官

史蒂芬·格罗夫

当今全球经济令人担忧。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现在，许多国家的通胀率迅速上升，反映了与疫情相关的供需失衡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涨。

尽管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出现引起了一些迟疑或担忧，但是这些问题有望在 2022 年得到缓解。我认为，我们需要特别关注通胀可能给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挑战。根据一些国际机构预测，当前的价格压力将持续存在，因为食品价格上涨、油价上涨的滞后效应、汇率下跌，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这是我们在许多国家已经看到的情况。

面对当前经济发展的不利形势，如何在中长期继续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我认为，首先需要及时调整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疫情。我们必须提供一定的政策空间来支持复苏，应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并控制疫情对经济的长期影响。众所周知，疫情对发展中国家的打击尤为严重，其影响不亚于经济衰退，已经将数百万人推向极端贫困，并缩减了可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府资源。根据预测，全球人均收入将下降，与疫情前相比，预计全球将有 1.1 亿人因疫情陷入极端贫困。这与我们过去几十年所看到的，在中国带领下的脱贫情况截然相反。

因此，我们需要确保政策能提供额外的社会援助，给予贫困人口直接的帮助，减少经济不利因素对贫困人口的直接影响；我们需要像过去几年为可持续发展目标奋斗时那样，再次集中精力，确保我们的应对措施侧重于贫困人口；我们还需要在发展融资和保障债务可持续性之间找到平衡，既要给予贫困人口及时的援助以缓解他们所面临的困境，也要关注长期发展目标，关注基础设施投资和其他需要长期额外支持的项目。

我们需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发展中国家约有一半，甚至可能超过一半的公共支出投错了方向。所以，我们需要通过更好的经济管理来提高效率，同时加强政策和治理的透明度，让政府能够以更少的资源实现更多的目标。

最后，我认为应促进私营部门的投资。现在有很多值得关注的项目正在进行，尤其是在基础设施领域。比如，在沙特阿拉伯，我们最近与贝莱德合作推出了基础设施基金，利用政府资源促进私营部门投资，吸引私营部门参与并帮助平衡这些项目的风险，从而使我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对私营部门的吸引力，明显大于其他国家的类似项目。

挑战不仅仅存在于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也存在于发展中市场。促进私营部门的投资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将有利于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减少不平等现象。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都非常重要，结构性改革是加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韧性的关键，将助力我们走出当下的艰难时期，并增强我们有效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

金融行业助力实现净零排放承诺

■ 弗兰克·里斯伯曼 / IFF理事、全球绿色发展署总干事

弗兰克·里斯伯曼

当前，一些国家政府和利益相关方都在迅速采取行动，以尽快达成净零排放的承诺。我认为未来潜在且最具可行性的是建立净零排放金融联盟。很多金融行业的利益相关方已经承诺投资 30 万亿美元，专门用于净零排放项目。包括中国金融机构在内的很多金融机构，都在不断努力提升绿色经济、绿色债券的发行力度。

在韩国，首个大型银行新韩银行承诺要进一步努力实现零碳目标。新韩银行的总裁提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策略，不仅要尽量降低本银行的碳排放，也要与其他合作伙伴和机构共同携手，使银行组合投资类项目集中于低碳排放领域，新韩银行还承诺在 2030 年前落实 300 亿绿色零碳投资。

发达国家曾经承诺，每年提供 1000 亿美元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令人失望的是，这一承诺并没有落实。事实证明，金融行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能够发挥越来越多的作用，尤其是私有的金融机构能够做出更多的贡献。努力减少碳排放，尽力朝着零碳目标发展，尽可能加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韧性。在这方面，有很多绿色债券、可持续发展债券、蓝色债券等都已发行。例如，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GGGI）跟秘鲁合作，共同发行了可持续发展债券，秘鲁政府也宣布了首个可持续发展债券的定价为 32 亿美元。

另外，从未来的发展趋势看，还有更多的社会债券、绿色债券将在其他新兴市场中发行，比如越南、墨西哥等等。当然，还有很多此类债券会在发展程度更加好一点的国家发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警惕出现“漂绿”的情况，我们要保证这些债券是真正绿色的，还要监督这些债券收益的去处，看最终用到了什么地方。

第二个非常重要的进展，就是在格拉斯哥（COP26）大会期间，各方经过谈判，就《巴黎协定》第六条相关基本规范达成了一致。我相信在此之后全球碳市场会得到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国在净零排放等领域将有更多双边、多边合作的机会。目前，全球绿色增长研究所在和近 20 个国家进行紧密的合作。

有些国家比较感兴趣的是购买碳信用，帮助国内减排；有些国家感兴趣的是供给碳信用。要构建良好的治理框架才能够促进碳市场的发展，政府既要制定一些赋能的政策，也要进行资金投入；既要保证有适度、透明的基础设施建设，也要有完善的报告、监察和测量的机制。所以，我们预计今后会有大量的投资来部署基础设施，这对于金融行业尤其私有金融机构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参与机会和非常重要的发展机遇。因此，针对全球金融市场出现的这个机遇，我们非常有意愿展开进一步探讨与合作。

后疫情时代亚洲国家的新挑战和新格局

■ 宾度·罗哈尼 / IFF学术委员、亚洲开发银行前资深副行长

宾度·罗哈尼

当前全球主要面临三大挑战，第一是疫情，第二是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第三是不确定的、不断变化的全球格局。全球合作是至关重要的，或者反过来讲我们缺少充足的全球合作。

有一些研究认为 21 世纪是亚洲的世纪，2011 年，史帝芬·格罗夫等就已在亚开行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后来又有一些研究认为到 2040 年才能真正进入到亚洲时代。持前一个研究观点者认为全球 40% 的消费将会在亚洲，果真会如此吗？在后疫情时代，还会按照之前研究所预设的那样发展吗？ 2020 年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已超过 50%，我认为后疫情时代亚洲国家应该着重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需要加强包容性。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及其在全球迅速持续的蔓延，让我们认识到之前无论是在公共健康、减贫助困还是在消除不平等方面所作的努力都远远不够。疫情加剧了贫困和不平等。医疗保健和教育体系也都不够包容，亚洲还需要在这些方面继续努力。

第二，需要更加关注城市发展。我们总是说全球 50%~60% 的人口生活在亚洲的城市，60%~70% 的 GDP 在城市当中产生，50% 以上的温室气体排放也是城市产生的，消费也主要靠城市拉动，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我们都应该十分关注城市的发展问题。

第三，需要关注气候变化和碳中和。努力实现碳中和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有些国家承诺 2050 年前实现这一目标，有些国家稍晚一些。当前关于碳中和主要有两个议题，一个是能源转型，大家积极就消除或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展开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另一个是关于私营企业的参与，很多私营企业愿意采取更多的举措，助力实现碳中和。这两个议题对于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是非常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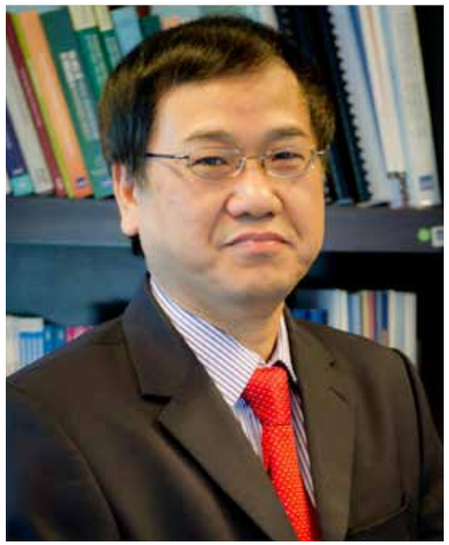
第四，需要关注技术的创新和开发。这是亚洲国家特别需要关注的领域。很多企业希望他们的供应链更加有韧性、更加灵活，考虑到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变化，一些公司希望把库存靠近工厂。同时，随着数字化发展日新月异，供应链的数字化重大转型一定会出现。当前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投资，但还存在一些不确定性，我认为亚洲需要进一步加大创新技术的发展力度。另一方面，包括能源、交通、健康食品等方面的技术开发，大部分亚洲国家目前还处于低于平均水平的阶段。所以我认为这些国家在后疫情时代有很多机会，应该牢牢抓住技术开发方面的发展机遇。

关于全球合作，我的观点是全球化并没有结束，只是突然之间变弱了，疫情期间的全球合作，尤其是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全球合作不是特别令人满意，我希望这种情况能够在后疫情时代有所好转。亚洲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强区域合作，这点至关重要，而区域化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消失，我认为应该保持开放的区域化，并继续解决全球性的问题。

最后，我认为很多亚洲国家如中国、日本、韩国、印尼等今后将会变得更加重要，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引领其他中等收入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等，亚洲就能够有机会成为一个非常强劲的区域。

《IFF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2021年）》第一章介绍

■ 庄巨忠 / IFF学术委员、亚洲开发银行前副首席经济学家



庄巨忠

此次发布的《IFF 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2021 年)》(以下简称《报告》)主要是分析和预测全球经济趋势和前景，解读金融发展和创新，探讨各国共同关注的长期挑战，以促进全球政策的讨论。

《报告》包含三章。第一章是全球经济展望。第二章发布由国际金融论坛（IFF）与中央财经大学联合开发的全球绿色金融发展指数和国别排名。第三章综述实现《巴黎协定》气候目标所需要的全球绿色转型和中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线图。

下面，我简单介绍《报告》第一章全球经济展望的内容。

第一，全球经济的近况。2021 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强劲反弹，占世界经济 80% 的 20 国集团（G20）GDP 总和同比增长 7.7%。但各国增长仍不均衡，主要的影响因素有：2020 年经济的收缩程度、疫情的演变和管控措施的严格程度、疫苗接种的推进速度，以及财政和货币刺激的力度。2021 年下半年，全球经济增长势头有所减弱，主要原因是受到了德尔塔变异病毒流行的影响。同时，供应链瓶颈开始制约经济增长。

经济反弹导致许多国家通胀抬头。全球消费价格年通胀率从 2021 年 1 月的 2.2% 上升到了 9 月的 4.6%，根据最新数据，10 月的通胀率进一步增加到了 5.3%。通胀抬头背后的因素包括商品价格飙升、供应链瓶颈、大规模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政策（尤其是在发达国家），以及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货币贬值。

经济增长促进了贸易的增长，贸易增长反过来又支持了经济的增长。2021 年前 8 个月，全球商品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30%。中国仍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 18%，其次是美国，占 13%，德国占 9%，日本占 4.5%。

经济复苏和财政刺激政策和措施有助于全球金融市场总体保持稳定。资本不断流向新兴市场，2021 年前 9 个月，新兴市场投资组合净流入达到 2240 亿美元，较 2020 年同期增长 9 倍；2021 年前 6 个月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达 2300 亿美元，同期增长 22%。

2021 年世界各国继续实施财政刺激和货币宽松政策，尽管力度有所减弱。在 G20 国家的主要财政措施（包括额外支出和减税）在两年内对 GDP 的累计贡献达到了 2020 年 GDP 总和的 14%。

尽管各国的财政刺激措施阻止了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但也引发了人们对金融脆弱性加剧的担忧。财政支持导致许多国家财政赤字和公共部门债务达到历史新高，量化宽松政策使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资产膨胀，市场流动性激增，资产价格上涨，许多国家通胀攀升。

第二，经济展望。尽管全球经济复苏势头有所放缓，但整体趋势未变。2021 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长 5.9%，其中发达经济体预计增长 5.2%，发展中经济体预计增长 6.4%。中国预计增长 8.2%。中国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 26%，仍是全球经济最大的贡献国；其次是美国和印度，分别贡献 17% 和 11%。

明年全球复苏将继续推进。财政和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复苏——尽管考虑到财政可持续性和通胀压力，支持力度会有所下降。 随着基数效应的减弱或消失，明年全球经济预计增长 4.7%，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 4.2%，发展中经济体增长 5%，中国增长 5.6%。

全球经济整体规模应该能够在 2021 年恢复到 2019 年疫情前的水平，但仍有约一半的国家要到 2022 年才能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发达经济体预计可在 2023 年将其整体经济规模，恢复到根据疫情前增长趋势推算的水平，但全球经济估计要到 2025 年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对发展中经济体的整体规模而言，这一差距将无法在短期内消除。

全球许多地区的通胀压力将持续，但 2022 年会有所缓和。全球消费价格通胀率预计将从 2020 年的 3.5% 上升到 2021 年的 4.5%。2022 年，随着供应链瓶颈得到缓解、大宗商品价格趋于稳定，以及财政和货币刺激力度减弱，全球通胀预期将逐步回落至 3.8%。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预测的数据截止时间为 11 月初，所以没有考虑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影响。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对经济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目前为止还很难判断。

第三， 经济风险。上述展望存在几个下行风险。而 10 月份公布的通胀数据和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出现意味着下行风险进一步增加。最大的风险是由疫苗接种进展缓慢或新变异毒株出现所导致的疫情大规模卷土重来。另一个风险是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的不稳定。更高、更持久的通胀可能会引起发达经济体对其货币政策的突然调整，进而导致资产价格大幅回调、资本从新兴市场流出以及汇率波动。还有一个风险是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升级。所有这些都会阻碍经济的复苏。

这场疫情将给社会和人类发展留下持久的伤痕。由于低收入家庭更容易受到冲击，疫情的爆发使减贫进程受阻，收入差距加剧。同时，疫情在许多国家还导致了教育支出的削减和绿色投资的延滞。所有这些都将减缓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并使《巴黎协定》目标的落实更具挑战性。

第四是应对政策。应对上述挑战，各国的政策重点将取决于其国内情况。为了早日结束疫情，降低全球复苏的风险，并增强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报告》呼吁世界各国通过多边努力优先推动以下几项政策：1. 加快疫苗接种的推进，消除疫苗鸿沟；2. 确保货币政策的平稳过渡；3. 结束贸易紧张局势；4. 促进绿色复苏；5. 加强对低收入国家的支持力度。

携手解决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至关重要

■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 IFF理事、巴西工业发展与贸易部前部长、世界投资促进机构协会前主席

亚历山德罗·特谢拉

目前，我们正面临着怎样的新形势和新挑战？新冠肺炎疫情使一些未能妥善解决的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比如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通货膨胀，以及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非常重要的失业问题。查看数据可知，目前在发展中国家中，只有中国失业率方面的情况还可以。失业率上升不仅会造成家庭丧失收入，还会使数百万人陷入贫困，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是陷入极端贫困。疫情同时也让贫富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当然，有一点非常明确，疫情并不是加剧目前世界局势动荡和不平等的唯一原因。在疫情爆发之前，一些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就已经存在，疫情的爆发只是使这些问题更加凸显了。

据预测，到 2025 年全球经济才会发展到疫情前预期的水平。我们必须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现在世界是否得到了充分的领导力引导，疫情跌宕反复的原因是什么？现在的世界日趋分裂，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全球携手合作，唯有如此才能够应对疫情这个全球共同的挑战。因此，现在必须再次拥护多边主义，这是唯一的前行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够摆脱疫情和解决疫情带来的种种问题。

应该把最基本的社会和卫生健康保障体系作为全球优先议题认真思考。根据医学专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很快就会有新一轮疫情爆发，所以尽快解决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迫在眉睫且至关重要。

世界需要建立一个全面的、全球统一的社会和卫生健康保障体系，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强化全球合作。现在的全球合作状况并不令人满意，有很多亟需援助的国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比如，拉丁美洲、非洲都正在经受疫苗短缺的威胁，如果我们把这个世界变得更为分裂，如何能够保证自己的国境对病毒完全封闭？我们不能把落后的地区屏蔽、隔绝、置之不理，这不是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携手共同应对疫情带来的挑战，否则战胜疫情就是空谈。

有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问题，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自己能够独立解决的了，他们的国家政策已经没有太多余地可以调整了。这些都需要全球化，需要多边主义。例如，在国际物流服务，在集装箱运输等方面出现的问题，就是严重的全球经济结构性问题，必须加以解决。

目前有些数据看起来还不错，但是很多失业率的数据还没有公布，这个数据非常重要。目前在拉丁美洲，有些国家的失业率几乎达到 14%，家庭的债务水平已经超过 40%。非洲的失业率问题更严重。失业率、通胀等问题实际上是经济结构性的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后，我想建议发展中国家仔细看看中国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方面，在疫情防控方面，都做了些什么，这才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前进的方向。

2022年全球经济增长将面临的三大挑战

■ 聂庆平 / IFF学术委员、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聂庆平

2021 年，全球经济形势相对于 2020 年整体向好。中国经济前三季度保持 4.9% 的增长，接近 5%。虽然第三季度因能源供应、能耗“双控”和其他投资方面的影响，环比增长不多，但由于相应解决措施及时出台，实现了持续经济增长。因此，2021 年的经济增长可能比大家预期的还会好一些。美国 2021 年的经济增长也达到 4.9%。总体来说，全球两大经济体 2021 年经济增长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多个研究机构预计 2022 年全球经济还将继续增长，我认为 2022 年全球经济将主要面临三个挑战：

第一，中美经贸关系。能否建立合作共赢的中美经贸关系，将对全球经济复苏、全球经济政策走向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现在的全球经济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近 60 年间来，即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每 10 年全球贸易占全球 GDP 的比重都有约 10% 的增长，现在全球贸易占全球 GDP 的比例已经达到 60%。二是中美贸易在过去的 20 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从过去的 30% 以上，下降到现在的不足 10%；而中国经过 40 年改革开放，现在其贸易总额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已达到近 20%。而且，中美贸易在格局上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美国进出口贸易对象主要是墨西哥和加拿大，以这样一个三角关系为主；而中国对外贸易的对象是全方位的。当然在世界贸易中，中美贸易额不是最大的，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中国对欧盟以及东盟的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在全球贸易关系中，中美贸易关系非常重要，然而目前显然并不稳定，这主要与中美关系有关。我认为，未来在中美之间应该打破意识形态对抗对经济贸易的影响，应继续走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如果贸易不平衡，中美之间可能会出现供应链双向瓶颈：一方面，因为有些产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在中国，如果贸易关系不平衡，有可能使发达国家供应链产生瓶颈；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芯片、半导体制造等高技术领域采用脱钩政策或者制裁措施也会造成中国贸易瓶颈。所以双向瓶颈的问题必须要解决。合作共赢的经贸关系是影响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能否建立合作共赢的中美经贸关系，将对全球经济复苏、全球经济政策走向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

第二，美国经济泡沫。我们很担心美国经济泡沫破裂，从特朗普政府到现

在的拜登政府，都在大量印钞搞货币大放水，特朗普政府发行 4 万亿国债，拜登政府的国债接近 7 万亿，如果算上欧洲和其他国家，全球货币大放水应该达到了 30 万亿美元。所以超发货币的流向，是一个极其脆弱的因素，也是一个泡沫的因素。美联储过去认为通胀是暂时性的，要保 2% 的通胀目标，现在看来可能性已经不大，因为 2021 年美国能源和消费品分别涨价 30% 和 50%，所以通货膨胀和美国经济泡沫是令人担忧的问题。虽然现在美国的股市表现很好，但是美国股市完全靠资金推动、人为拉高。有些经济学家预测美国经济泡沫有可能破裂，一旦破裂将对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严峻挑战。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如何有效控制新冠病毒及其新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很多专家认为中国的方法是最好的，实践也证明进行隔离和打疫苗是应对疫情的最好办法。奥密克戎毒株的影响还有待观察，它有可能导致全球性的旅行禁令，也有可能影响边境贸易和供应链，影响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影响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总体来看，世界主要评估机构对 2022 年全球经济的预期还是比较乐观的，预计 2022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是 4.1%，中国可能在 5% 左右，其他国家也都在 3%~4% 的水平。但如果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所有的预期也将会发生变化。

中国的政策变化对海外经济的溢出效应

■ 夏乐 / IFF学术委员、西班牙对外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

2021 年，全球经济形势相对于 2020 年整体向好。中国经济前三季度保持 4.9% 的增长，接近 5%。虽然第三季度因能源供应、能耗“双控”和其他投资方面的影响，环比增长不多，但由于相应解决措施及时出台，实现了持续经济增长。因此，2021 年的经济增长可能比大家预期的还会好一些。美国 2021 年的经济增长也达到 4.9%。总体来说，全球两大经济体 2021 年经济增长情况还是比较好的。

多个研究机构预计 2022 年全球经济还将继续增长，我认为 2022 年全球经济将主要面临三个挑战：

第一，中美经贸关系。能否建立合作共赢的中美经贸关系，将对全球经济复苏、全球经济政策走向产生比较重要的影响。现在的全球经济有两个重大变化，一是近 60 年间来，即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每 10 年全球贸易占全球 GDP 的比重都有约 10% 的增长，现在全球贸易占全球 GDP 的比例已经达到 60%。二是中美贸易在过去的 20 年间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从过去的 30% 以上，下降到现在的不足 10%；而中国经过 40 年改革开放，现在其贸易总额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已达到近 20%。而且，中美贸易在格局上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美国进出口贸易对象主要是墨西哥和加拿大，以这样一个三角关系为主；而中国对外贸易的对象是全方位的。当然在世界贸易中，中美贸易额不是最大的，但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此外，中国对欧盟以及东盟的贸易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在全球贸易关系中，中美贸易关系非常重要，然而目前显然并不稳定，这主要与中美关系有关。我认为，未来在中美之间应该打破意识形态对抗对经济贸易的影响，应继续走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如果贸易不平衡，中美之间可能会出现供应链双向瓶颈：一方面，因为有些产业，尤其是中低端制造业在中国，如果贸易关系不平衡，有可能使发达国家供应链产生瓶颈；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在芯片、半导体制造等高技术领域采用脱钩政策或者制裁措施也会造成中国贸易瓶颈。所以双向瓶颈的问题必须要解决。合作共赢的经贸关系是影响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夏乐

第二，美国经济泡沫。我们很担心美国经济泡沫破裂，从特朗普政府到现在的拜登政府，都在大量印钞搞货币大放水，特朗普政府发行 4 万亿国债，拜登政府的国债接近 7 万亿，如果算上欧洲和其他国家，全球货币大放水应该达到了 30 万亿美元。所以超发货币的流向，是一个极其脆弱的因素，也是一个泡沫的因素。美联储过去认为通胀是暂时性的，要保 2% 的通胀目标，现在看来可能性已经不大，因为 2021 年美国能源和消费品分别涨价 30% 和 50%，所以通货膨胀和美国经济泡沫是令人担忧的问题。虽然现在美国的股市表现很好，但是美国股市完全靠资金推动、人为拉高。有些经济学家预测美国经济泡沫有可能破裂，一旦破裂将对 2022 年全球经济增长造成严峻挑战。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如何有效控制新冠病毒及其新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很多专家认为中国的方法是最好的，实践也证明进行隔离和打疫苗是应对疫情的最好办法。奥密克戎毒株的影响还有待观察，它有可能导致全球性的旅行禁令，也有可能影响边境贸易和供应链，影响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影响脆弱的全球经济复苏。总体来看，世界主要评估机构对 2022 年全球经济的预期还是比较乐观的，预计 2022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是 4.1%，中国可能在 5% 左右，其他国家也都在 3%~4% 的水平。但如果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所有的预期也将会发生变化。

聚焦国际经济发展挑战，追求贸易高质量发展

■ 张慎峰 /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

张慎峰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疫情交织叠加，世界经济艰难复苏，全球跨国投资依然疲软，国际间规则的博弈也在不断升温，经贸发展充满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在这种形势下，尽管中国对外贸易数据呈现出了前高后低的态势，但整体上，其成就是非常巨大的。今年 1-10 月份，中国的对外贸易总值达到 31.64 万亿，到年底估计将达到 38.19 万亿。目前，中国同全球 23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中国是世界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外贸出口在全球的占比达到 14.6%，进口比例达到 12%，我相信中国进出口占国际市场的份额还会进一步提高。

怎样进一步实现贸易高质量发展，进而有效应对当前国际上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目前全球性的问题和挑战主要有五个。一是疫情的问题，在大家普遍认为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两年时间就差不多了的时候，前两天新冠病毒新毒株奥密克戎突然出现。全球各方面对此反应强烈，美国股市道指马上就下降了 1000 多点，尽管现在有所恢复，但整体上看，不稳定性还是比较明显。二是气候变化的挑战越来越严峻、越来越紧迫。三是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高涨，限制性规则政策越来越多。近十年来，全球贸易总量增速远远低于经济发展。四是全球债务水平高企。到目前为止，全球债务占 GDP 的比例高达 355%，这样高的债务水平使后续发展动力充满不确定性。五是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各种因素交织影响，各种产业链循环不畅。

针对这些挑战，中国对外贸易应努力做到六个坚持。

第一，坚持“一带一路”共建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8 年来，中国对外投资额不断增加，达到了 1600~1700 亿美元，涉及沿线 60 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何进一步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把“大写意”变为“工笔画”，

许多发达国家在落实贸易协定的时候，对其中的优惠政策享受得非常充分。但中国因受制于市场，经济、对外贸易、国际接轨方面的水平不高，起步较晚，企业在充分利用贸易协定优惠方面的能力还比较弱，利用率较低。发达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时，享受中国优惠政策的比例大概都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以上，而中国享受外国优惠政策的比例，平均也就是 28%~29%。

如何更精准地把“硬联通”作为一个重要方向，把“软联通”作为一个重要支撑，把“新联通”作为一个重要基础，取得更加精准的经济与社会效果，这是我们应当努力的一个重点。

第二，坚持绿色引领，加快推动经济贸易发展向绿色低碳转型。从中国的国情来看，中国承诺“3060”“双碳”目标，实际上是需要咬紧牙关、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去完成的。中国实现“双碳”的压力非常巨大，前段时间出现的“电荒”“气荒”问题也使中国的企业受到了很大影响。怎样在履行全球社会责任的同时，把中国的经济发展好？如何化危为机？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目前中国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的 30%，与欧盟、美国、日本碳排放量的总和相当，但是中国的 GDP 只占全球的 14%~15%，所以实现“双碳”的任务非常艰巨。因此，我们要承担一个与我们水平、实力相适应的责任。

第三，要加强坚持创新驱动，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特别是数字贸易。这些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成就更多体现的是货物贸易，很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顺差也比较大。但中国的服务贸易，尤其是结构层次较高的数字贸易还相对落后，排在美国、日本之后，位列第三，逆差也较大。货物贸易带来的大量顺差，都被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的逆差抵消了。因此，如何坚持科学创新，推动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的发展，降低货物贸易中的贸易摩擦，都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

第四，坚持开放合作，加入更多的多边国际组织，抓好类似于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各个协定的推广实施，提升贸易效率和贸易质量，更好地实现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中国在积极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也受到了个别国家的政治操控和阻挠刁难，包括前期的中欧投资协定以及其他的一些协定谈判，都受到了一些阻碍和拖延。目前中国签订了 19 个协定，对应 26 个国家，与这些自贸伙伴国的贸易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 40% 左右。此外，中国还应当与更多国家签订更多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比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CPTPP 有助于推动国内改革创新和更高水品的对外开放。《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承诺自由贸易的关税将有 90% 以上是零关税，而 CPTPP 可能就要达到 100%，即所谓“三零”原则，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

RCEP 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生效，所剩时间已不多。目前来看，RCEP 覆盖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最大，未来对于促进中国贸易的潜力也是最大的。应该说站在我们的家门口，是一个最大的根据地，应当抓住这一机遇。RCEP 的各成员国对 RCEP 的实施也都充满了期待，从各个方面来说我们都应该全力以赴地去推动去落实。

许多发达国家在落实贸易协定的时候，对其中的优惠政策享受得非常充分。但中国因受制于市场，经济、对外贸易、国际接轨方面的水平不高，起步较晚，企业在充分利用贸易协定优惠方面的能力还比较弱，利用率较低。发达国家与中国进行贸易时，享受中国优惠政策的比例大概都能达到百分之八九十以上，而中国享受外国优惠政策的比例，平均也就是 28%~29%。如何把我们通过艰苦谈判拿到的优惠政策让企业真正享受到，推进我们的贸易自由化、便利化结出更多硕果，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艰巨任务。

第五，要坚持统筹协调，大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大力推动自贸区战略。

第六，要坚持践行多边主义原则，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使经济全球化朝着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真正推动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更好地造福于全球人民，更好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上市公司助力ESG良好发展

■ 柳磊 / IFF学术委员、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执行副会长

柳磊

关注中国经济、研究中国经济，绕不开中国上市公司这个群体。目前，中国境内的上市公司已有 4500 多家，上市公司的总市值已接近 GDP 的 90%，总营收也已经接近 GDP 的 60%，所以说上市公司这个群体是中国经济一个很好的样本，也是很好的参照。

投资中国的经济，上市公司也是最好的标的。现在国际负责任的投资者联盟掌握了大概 30 万亿美金投资资金，在零碳排放前景的鼓舞下，大家对国际投资，对碳排放的关注越来越强烈，而在这里面主要依靠一些著名的国际组织进行评价和认定，尤其是在 ESG 方面的认定。现在，中国的上市公司这一群体在 ESG 工作方面越来越积极，越来越主动。但是由于体制、文化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一些著名的国际组织对中国上市公司的 ESG 评价打分一直非常低，我认为这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如何增进国际权威组织对中国上市公司在 ESG 方面所做努力的理解和认同，如何促进双方信息更加对称，交流更加充分？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和 IFF 可以在这方面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也希望能在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使国际组织、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的上市公司有一个更加客观、更加中肯、更加理性的评价，这样也能为国际投资者投资中国资产，投资中国标的提供很好的参照。

坚定信心大力推进我国衍生品市场的发展

■ 李正强 / IFF学术委员、对外经贸大学研究员、大连商品交易所原理事长

在回顾 2021 年全球和中国的经济形势、展望 2022 年的经济形势时，大家都认为 2022 年的经济形势会好一些，虽然仍然将面临很大的挑战。

明年全球经济虽然可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但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如地缘政治问题、疫情反复问题，以及经济自身的一些不确定性，尤其是最近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引起了全球高度关注。我们应该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应对这些挑战和不确定性。从市场方面来看，我们要运用好期货、期权互换这样的衍生工具，帮助企业应对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带来的冲击。

中国在过去 30 多年的时间里，经过不懈探索，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截至 2021 年 6 月底，已有 70 个期货品种上市，涵盖的经济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原油、生猪、玉米和大豆等农产品，油脂油料，黑色系列的焦炭、焦煤、铁矿石、钢铁，以及有色金属、贵金属、化工等领域。现在已有商品期货品种 54 个，金融期货品种 6 个；期权品种也已有 24 个，其中商品期权品种有 20 个，金融期权品种有 4 个。目前已有 7 个期货品种、2 个期权品种对外开放。经过 30 年不断探索，中国的衍生品市场已经由过去只有期货没有期权、只有境内交易者参与没有境外交易者参与、只有场内没有场外的单一封闭的市场状态，发展成为了多元开放的新衍生品市场结构。

另外，我们也建立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有效风险防控制度，包括“五位一体”的监管机制，特别是我们的期货保证金监控中心和期货“一户一码”监管制度等，都有效防范了大宗商品进入衍生品市场的系统性风险，维护了市场的平稳运行。从 1998 年以来，中国衍生品市场发展一直比较平稳，已具备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

我们要进一步坚定信心，继续推动内地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在有效防护系统性风险的大前提下，发挥好独特风险防控机制，有效防控市场风险，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际贸易，大力推进市场发展。

李正强

比较中国市场和海外市场的发展，总体上看，中国是商品大、金融小，期货大、期权小。现在的衍生品主要以商品为主，金融类比较少。期货与期权相比，期货比较多。从 2014 年开始，中国商品期货已经占据全球期货市场的半壁江山。可以说中国内地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有力推动了全球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因为半壁江山主要指的是中国内地市场。中国的基础产品衍生品比较多，指数类的产品比较少，我们要尽快补齐短板，加快新品种上市。比如当前我们还缺少外汇期货、航运期货，这对于我国将来参与全球碳市场的国际合作与竞争不利，可能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很大的压力。我国要建立健全有效的碳排放权现货和衍生品市场，必将面临重重挑战，我们须坚定信心，继续推进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国际金融论坛（IFF）在全球绿色浪潮中的重要作用

■ 唐丁丁 / IFF学术委员、亚洲开发银行合规委员会前主席

唐丁丁

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讨论目前疫情下中国和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压力和挑战，也叫全球绿色浪潮。全球绿色浪潮现在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个议题，一个是气候变化，一个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刚刚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以及 10 月 24 日结束的中国昆明《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15 次缔约方大会 (COP15)，都对这两个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值得欣慰的是，国际金融论坛（IFF）在这两个重要的全球绿色浪潮议题中都发挥了作用，在 COP26 会议期间，IFF 携手欧盟和美国专门组织了一个平台边会，讨论了重要、敏感且难以形成共识的碳定价问题，它和未来将面临的重要挑战密切相关，也就是欧盟和美国即将设计并开展的碳边境调节税。

国际金融论坛（IFF）也非常有幸与其他 13 家重要的金融机构和国际环保组织携手发出《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关系全球倡议》，它们主要包括世界银行、亚行、亚投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自然基金会、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自然资源保护协会、保尔森基金会、世界资源研究所、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等。2021 年 10 月 25 日，《生物多样性金融伙伴关系全球倡议》向全球发布，此倡议既是 COP15 第一阶段会议的重要成果，也为即将于 2022 年 5 月召开的 COP15 第二阶段会议做前期铺垫。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的挑战，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资金问题。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资金问题不仅仅是缺钱，也包括怎样让钱产生实际的减排效果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效果的问题。怎样激励、调动更广泛的社会资金参与全球绿色浪潮，怎样让金融机构在其中扮演积极且负责任的角色，怎样将气候风险和生物多样性风险的应对融入金融机构的业务流程，特别是信贷流程中去，这都是现在面临的新压力和挑战。

气候变化问题，表面上看是环境问题，其实也是经济问题。2019 年全球碳排放创下新高，由于疫情，2020 年全球碳排放比 2019 年减少了 5.4%，但是 2021 年全球碳排放又大幅回升。其主要原因之一是疫情的严峻形势稍有缓解，全球企业都在加大马力进行生产。到目前为止，2021 年全球碳排放量已超过 2019 年，创下了新的峰值。事实表明，在积极推进疫后复苏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关乎人类生存的长远问题。在疫情期间特别是 2020 年，世界很多经济体都提出要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计划中加大绿色占比。但是，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统计，这些复苏计划中的绿色成分占比并不高，只有 20% 左右。2019 年 12 月欧盟委员会发布《欧洲绿色协议》（简称绿色新政），提出欧洲在 2050 年成为世界第一个“气候中和”大陆，实现碳中和。但绿色新政实施的效果差强人意，特别是在 2020 年，包括 2021 年上半年，实施的效果都不是很好。

在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推出了两个很敏感、很重要且与全球包括中国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议题，并对其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讨论。其中一个议题是大幅减少甲烷排放。在 COP26 大会上，全球 100 多个国家承诺 2030 年前将全球甲烷气体排放量削减 30%。很多与甲烷气体排放密切相关的行业和产业，比如石油和天然气等行业，可能面临转型风险。还有由于政策调整所带来的金融风险，以及环境风险转化的非传统金融风险，可能使很多投资项目和企业出现亏损，甚至于倒闭。由于新的政策和国际形势，特别是全球绿色浪潮对经济的冲击和影响，应该纳入未来经济金融的考量范畴。

第二个议题是碳边境税的问题，它是由欧盟首先提出的，欧盟委员会于 2021 年 7 月 14 日正式颁布《欧盟关于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立法提案》，推出了全球首个碳关税政策，计划于2026年起全面实施。碳边境调节税，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对高碳排放的进口产品征收二氧化碳特别关税。

欧盟决定征收碳边境调节税有几个目的：第一，减少欧洲和全球的碳排放；第二，解决欧盟与非欧盟国家由于碳减排治理成本不同，在同类产业造成的不公平竞争问题；第三，督促欧盟以外的国家更加积极主动地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第四，希望税收收入能够填补发达国家的 1000 亿美元承诺。在 2009 年哥本哈根（COP15）会议上，发达国家承诺到 2020 年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不少于 1000 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温室气体的减排和适应。到现在为止，这个承诺也没有兑现。据统计，到 2020 年才实现了 700 亿左右，还有大概 200 亿 ~ 300 亿的缺口。欧盟国家希望从将来开征的碳边境调节税的收入中转移一部分，填补这个缺口，这样做是不是合适值得讨论，但这是欧盟准备开征碳边境调节税的重要理由之一。碳边境调节税的实施进程是，计划在 2023 年到 2025 年进行过渡期的试验，2026 年全面实施。据说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也比较认同，很有可能效仿欧盟。碳边境调节税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造成经济和投资贸易冲击。

在这种大形势下，我认为未来讨论经贸投资议题时，应考虑全球绿色浪潮因素，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力会逐步扩大。国际金融论坛（IFF）今年首次发布《全球金融与发展报告》，其中的金融篇聚焦绿色金融，将其作为一个重要议题进行了阐释。

聚焦全球三大挑战，推动全球绿色发展

■ 齐晔 / IFF学术委员、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齐晔

目前全球面临三大挑战，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气候变化的挑战，以及地缘政治危机的挑战。

首先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挑战。虽然很多国家在疫苗研发方面付出了很大努力，并采取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很多城市采取了封城的措施，但是新冠肺炎疫情看起来并没有马上结束的迹象。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每当我们觉得最糟糕的阶段好像快要结束了，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最近，新的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在短短几天的时间就蔓延到了 23 个国家。所以，新冠肺炎疫情是全球性的严峻挑战。

其次是气候变化的挑战。今年由于气候变化造成的严重气象灾害在世界各地频发，包括美国加州的大火、中国郑州和山西暴雨导致的洪水等等。我们目睹了气候变化对人类正常生活造成的恶劣影响，而且这些恶劣影响还会影响到我们的下一代甚至下下一代。

第三个挑战来自于地缘政治危机。最近，我们也看到了关于乌克兰形势和台湾形势的探讨，这些都是地缘政治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有很多危机暗流涌动，也是我们需要应对的重要挑战。

全球面临的重重危机，印证了我们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30 多年前，德国哲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教授撰写《风险社会：迈向一种新的现代性》一书，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乌尔里希认为工业社会在为人类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为人类带来风险。原材料、服务以及商品的生产、分配和销售等都是围绕风险进行的。工业社会以后，人类进入了以风险为本质特征的“风险社会”。如果说 20 多年前西方世界进入了所谓的“风险社会”，那么很遗憾，现在全球都进入了所谓的“风险社会”。

再讲讲气候变化和碳中和。自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在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以来，世界很多国家也相继做出了类似承诺，目前已经有 120 多个国家正式宣布了碳中和目标。实现碳中和，有可能是 30 多年来全球达成的最重要的共识。当然，这也是在联合国框架之下，在气候变化应对方面达成的一个共识。

在气候变化方面我们面临两个挑战，一个挑战是气候极端现象及其导致的气象灾害；另外一个挑战叫做过渡风险或者转型风险，这类风险实际上是各国政策和措施导致的。

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主要体现在技术方面、融资方面和社会政治方面。

技术方面。今年比尔·盖茨写了一本书，在书里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半的碳中和技术实际上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如果没有发明或者创新这些技术，就没有办法实现全球的碳中和目标。

融资方面。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大量资金，大概是上万亿美元。所以，在第 26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6）上，很多经济学家提议，不能依赖于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支持，因为它非常缓慢且不能及时兑现。我们必须寻求其他方法，比如绿色金融。要把私有企业的资金和政府的资金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满足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这些资金不仅可用于减缓、适应气候变化，还可以用于增强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

最后，是社会政治方面。相比技术方面的风险和融资方面的风险，社会政治方面的风险有可能会更大、更严重。因为在未来三四十年的转型过程当中，将会有很多“赢家”，但同时也会有很多“输家”。有些国家或者个人的利益会受到负面的影响，比如那些在燃煤电厂工作的人，或者依赖重污染行业谋生的人，他们必须要承受转型带来的负面影响，这有可能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产生社会政治方面的风险。

现在全球的绿色发展，是以绿色和创新为基础的发展，绿色融资将是其中的重点。开始我们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主要是被动地应对，现在则是主动进行绿色转型。希望全球绿色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在 2022 年能够取得更多的成绩。

大会闭幕演讲

美国亚洲协会会长、澳大利亚前总理 *317*
陆克文：中美在气候变化和全球金融稳定领域的合作与思考

IFF 理事、新西兰前总理、丝路国际联盟（SRIA）联合主席 *319*
珍妮·希普利：多边合作有效促进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

意大利前总理、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主席 *321*
马西莫·达莱马：全球政治和世界经济期待强有力的国际合作

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副行长 *322*
曼努埃拉·菲罗：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复苏之路

中美在气候变化和全球金融稳定领域的合作与思考

■ 陆克文 / 美国亚洲协会会长、澳大利亚前总理

陆克文

为应对全球紧迫的地缘经济挑战，国际金融论坛（IFF）成立 18 年来，召集来自全球各地的金融领袖、财经政要，共同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和框架。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种合作。

目前全球处于后疫情时代，甚至泛疫情时代，世界面临着诸多挑战，从全球通货膨胀到气候融资再到债务可持续性。归根结底，这些挑战只能由大家共同应对，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打独斗。

今天，我们的任务是找到共同前进的道路，或者用我们亚洲协会的话来说，就是“走向共同的未来”。幸运的是，在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举行了重要的视频会晤之后，中美关系有望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局势会更稳定，合作会更广泛。

中美首脑会晤中多次提到，希望架起“战略护栏”，以管控在核心利益上的分歧。正如我长期以来所主张的，此类“护栏”正是我所说的“有管控的战略竞争”框架的关键组成部分，它有助于防止意外冲突的发生。但是除了架起“护栏”之外，双方都认识到，在美方所提及的两国“利益一致”领域，重振双边和多边合作非常重要。目前已经有两个领域中美利益趋于一致，中美展开合作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两个领域就是气候变化和全球金融稳定。

气候变化当然是两国乃至全世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紧迫挑战，但它同时也是扩大有限合作的逻辑起点。我们中的很多人一直在为应对这一挑战而努力，而且与中国和美国都有过这方面的合作，对我们来讲实际上这种合作已经有很多年了。

中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达成了重要协议，给两国履行承诺并在未来 10 年扩大气候合作带来了希望。但我们还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进一步扩大目前有限的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将中美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再向前推进一步，由中美在全球气候融资这一关键领域发挥多边领导作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COP26）强调，为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全球亟需寻找新的资金来源，以及为可再生能源和绿色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这种需求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强烈，因为发展中国家对气候融资的需求最为迫切。因此，中美必须也必然有很大的合作与进步的空间。

一个颇有前景的方法就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框架内寻求合作进展，目前我本人正在 IMF 的国际顾问委员会任职。通过 IMF，中国可以选择将新获得的特别提款权中的相当一部分出借，以支持 IMF 新成立的复原力与可持续性信托基金，并且利用该基金满足全球气候融资的需求。美国也可以采取类似的行动。

如果双方都能把各自的决策塑造成共同承担领导责任、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典范，那么双方采取的气候融资行动就是现有合作自然而然的结果，并且能够合理地延续中美在 COP26 会议上达成协议所带来的合作势头。

另一个有望开展进一步合作的领域是维护全球金融稳定。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新冠肺炎疫情

的影响下累积了大量债务，给全球经济带来了紧迫的问题。但是，如果管理得当，这也是双方实现真正双赢的合作机会。当然，有多种方法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但最有希望的路径之一就是利用 20 国集团和 IMF 的现有优势。幸运的是，关于如何开展这种合作，近些年已经有先例。始于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是 75 年来对全球经济稳定影响最严重的冲击之一，它向我们证明了全球性危机是不分国界的。那场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惨痛教训就是面对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任何一个国家采取单方面措施基本上都是徒劳的，只有团结一致的行动，才能够解决此类危机。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当时的 20 国集团领导人之一，也就是我本人，与建立起伙伴关系的各成员国，共同努力让 G20 一起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稳定做出了贡献。G20拥有其他国际组织难以企及的危机管理经验和资源，这是我们所有人于 2008 年 11 月在华盛顿、2009 年在匹兹堡召开会议时所达成的共识。直到今天，G20 仍然是唯一能够将 90% 的全球经济体、80% 的全球贸易，以及 2/3 的世界人口聚集在一起的组织。组织内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比例合理，成员有不同的宗教信仰，来自世界各主要地区。G20 当中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和美国肩负着引领 G20 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及保障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的重任。

此外，我一直支持 IMF 负责全球债务可持续性管理。考虑到全球债务的累积直接加剧了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风险，这项工作有着巨大的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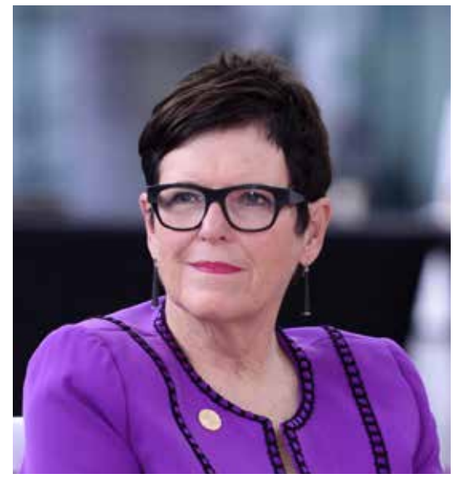
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疫情持续表现出巨大的破坏性，其破坏力与 2008-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疫情导致的公共健康危机已经演变成一场经济危机。当年，金融危机是一场经济危机；现在，公共健康危机也是一场经济危机。更严重的是，这场危机还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可悲的是，当前这场危机的大部分本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已经具备了应对全球公共健康和经济危机的基本机制。但因为种种原因，这套机制并没有真正落实。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中国和美国有机会搁置争议，携手应对关键危机，共同维护全球金融和经济稳定。在这一问题以及气候变化等其他挑战上，世界离不开中国和美国的务实合作。所幸，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的视频会晤为两国在关键问题的进一步合作创造了宝贵的机会。

中国有句古话：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此，我鼓励中国和美国的朋友们，通过 IMF 和 IFF 共同努力解决日益增长的危机，同时我们也希望中美两国能够建立一个正式的交流渠道，共同管理和维护全球金融稳定，这样做确实有助于实现一个更美好的共同未来。这不仅仅是对中美两国，对全人类而言也是如此。我谨祝福为这项事业而努力的中美朋友，也祝福为推动这一努力而做出贡献的国际金融论坛（IFF）。

多边合作有效促进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

■ 珍妮·希普利 / IFF理事、新西兰前总理、丝路国际联盟（SRIA）联合主席



珍妮·希普利

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所有人都在思考，全球挑战下的可持续发展下一步该采取什么行动。

随着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即将结束，是否会出现无法避免的资产泡沫。全球的供应链体系持续受到制约，经济体内部和各经济体之间都亟需新的投资和创新举措，寻求新的途径来应对这一问题。全球都在担忧社会不平等问题，这场全球疫情已经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现象。

众所周知，有些人并没有因为这场疫情失去任何东西，有些人则失去了一切，还有很多人在疫情中失去了他们的生命。当我们思考下一步的行动时，显然需要考虑这些挑战：我们如何通过共同努力防控未来的大流行病，我们如何努力解决问题并促进经济复苏，包括推动各经济体内部以及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以应对全球地缘政治紧张带来的新挑战，同时我们也需要将目光重新放到多边机制上来，它将指引我们找到攻克难关的方法。世界以及地球本身时刻都在警醒我们，要想实现前进与发展，就必须控制全球超 75 亿人口给环境带来的影响，以及我们的生活方式对地球的影响。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付出新的努力，还需要新的思想和合作方式。

我一直十分坚信，多边主义将是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方式，但仅仅依靠现有机构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勇敢发问，比如是否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机构，来应对疫情快速蔓延带来的影响。在过去的 50 年里，人口流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但多边机构并没有同步调整。有关改革的事宜我们已经翻来覆去讨论过很多回，我们不能再等了。我希望多边机构的负责人以及资助这些机构的国家领导人，能够积极审查现有的基础设施，推进前进道路上的必要决策。

同样重要的是，多边关系应侧重于三个领域：如何从疫情中恢复、如何促进经济复苏、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仅凭单一经济体的力量是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的，因为各国的起跑点不同，因此，合作协作、双边领导的支持，还有多边主义，将是取得进展的关键。而我最担心的是，当我们在思考应对这些挑战时，同时也面临着再次陷入贸易保护主义的风险。

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的抬头，目前已经有迹可循，这些行为背后的原因，往往都是一些不合理的解释。我们应该循序渐进以求发展，不能倒退，更不能重蹈覆辙，重复 20 世纪那一段令人惋惜的历史。

未来几年，各国政府必须找到灵活应对新挑战的方法，私营部门也必须加快步伐。我们不能指望政府做所有的事，事实上，在过去的两年里，政府已经证明他们愿意并且能够付出卓绝的努力，支持全球经济和各自国家人民的社会需求，但这并不能长久持续。所以，私营部门也需要创新，帮助共同解决这些问题。私营部门已经开始在研究领域开展大量的合作，比如制药公司能够与其他公司合作。

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情况已经有所缓和，制药公司在是否向各类经济体提供药物配方的问题上也有所让步，这些都是开展合作的重要步骤，也说明合作正在稳步推进。毫无疑问，这还远远不够。很明显，像中国这

样的经济体一直愿意支持其他经济体，中国所提供的支持，不管是多边支持还是双边支持，都至关重要，将来也会继续发挥作用。

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需要做出一些有意义的决定。比如如何促进机构间合作，监管机构要大胆地平衡科学性与灵活性的关系，以快速做出决策。领导必须做到既务实又果断，唯有如此，疫情等危机才能得到妥善的应对，并更快地给不同人群提供帮助。

如今，我们仿佛站在悬崖边缘，必须停止将可持续发展视作老生常谈的空话，而要以实际行动在经济、社会、环境、生态建设等方面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意义。这些行动需要综合协调地进行，而不是各干各的，彼此各不相关。

国际金融论坛（IFF）本次会议设定的议题恰到好处，可以帮助思考，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领导力和具体行动。与以往一样，此次会议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提上了议程，例如全球通胀、债务减免和经济风险，再比如全球税收政策，许多经济体都是围绕着公平原则及其实施细节来制定税收政策的，还有数字金融，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在任何经济体内部和经济体之间都非常重要的领域，当然还有全球碳定价和中美关系，以及我们面临的其他全球地缘政治挑战。

面对诸多困难，我感到骄傲的是，国际金融论坛（IFF）并没有退缩，而是正视困难，邀请金融行业、世界经济体的领导者，以及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共同研究解决方案。

全球政治和世界经济期待强有力的国际合作

■ 马西莫·达莱马 / 意大利前总理、欧洲进步研究基金会主席

马西莫·达莱马

虽然新冠肺炎病毒新变异毒株给我们带来了挑战和困难，但是我们完全有希望彻底摆脱这一流行病。我们要如何才能走出当下的疫情困境呢？我们面临的严峻风险是在疫情的影响下，全球化进程有可能会出现倒退，新的壁垒有可能会出现，对人员流动和货物自由流动的限制和障碍，可能会成为永久的障碍，至少在某些地区会是这样。我们必须降低这些风险，努力在防控疫情的过程中，以更加公平的方式去推进全球化进程，促进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更加密切地开展合作。

在这场牵动人心的全球流行病防御战当中，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有一些根本的价值观不能被忽视，而且必须将其视为经济增长的真正的、根本的目标。

根本价值观之一，就是我们要切实保护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这是我们在抗疫斗争当中得到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赋予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以全新的含义。可持续发展的含义，正是指经济增长必须以改善人类生活为目的，也就是说，人比物更重要。要实现这一愿景，一项基本的工作就是和谐推进经济增长和自然保护，努力实现可阻止气候变化及其灾难性影响的环境兼容性，防止各种形式的土地污染、水资源污染和空气污染，让地球继续成为我们当代人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宜居的星球。

全球政治和世界经济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发生巨大变化。毫无疑问，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公众舆论都更加意识到了这一点。各国政府的决定也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不过在我看来，步子迈得过于谨慎了一些。不少人认为，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COP26）上达成的协议并不尽如人意。对此我完全认同，特别是《巴黎协定》的目标也未能完全实现，这尤其令人失望和沮丧，其中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时做出令人失望的决定。我们必须努力了解造成这些困难和拖延的原因，避免陷入相互指责和大国之间推卸责任的局面。如果想迅速实现脱碳的目标，我们必须满足两个基本的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要确保经济发展的环境转型过程，在社会层面上是可持续的。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国际层面，即富裕的发达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上，也适用于社会的内部。毫无疑问，在一个社会的内部，较富裕的社会成员比不富裕的成员更容易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环境转型的代价必须由那些近两个世纪以来通过污染获取最大经济效益的国家来承担。

第二个条件，就是要实现新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开展强有力的国际合作。当前的紧张局势，包括发生新冷战的风险，对我们推动全球经济走向可持续性发展的共同目标毫无帮助。出现新军备竞赛、国际竞争加剧以及真正发生贸易战的风险在不断增加，也会对环境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让当前国际社会产生担忧情绪的主要原因。我仍然相信，欧洲可能会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承担特殊的责任。也就是说，具有外交传统和法律文化的欧洲，应当负起责任，重新提出和平共处和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我们当然为我们的历史感到自豪，为我们社会中建立起来的自由和民主等价值感到自豪。但是，历史也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如何与其他国家共存，建立共识、保障和平。

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复苏之路

■ 曼努埃拉·菲罗 / 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副行长

尽管经历了 2020 年的严重衰退，当今全球经济局势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和气候变化挑战的背景下，现在正在逐步复苏，但是未来仍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密切关注新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带来的影响。

2021 年 6 月，我们曾预计全年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大约为 5.6%，但现在，我们下调了预期。此外，全球经济复苏并不平衡，由于发达经济体疫苗接种率高，给予企业和家庭的政策支持更大，发达经济体的复苏速度更快。中国经济仍然在快速恢复，尽管最近增势有所减弱，预计 2021 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将在 8% 左右。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恢复速度缓慢，大约为 4%，许多低收入国家仍在挣扎。我们曾预计 2021 年低收入国家的增速为 3% 左右，但现在看来实际增速会更低，全球复苏的放缓可能会进一步加剧不平衡状况，疫苗分配的持续不平等以及有限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是主要原因。

疫情留下的后遗症如儿童失学、成人失业、技能培训缺乏、企业破产和财务状况紧张以及政府债务积压等，将会拖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疫情对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影响不均衡，反映了世界格局的不均衡。依赖旅游业的经济体，如泰国和太平洋岛国在 2020 年经济衰退严重，2021 年复苏疲软。我们预计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2021 年的经济增速在 7% 左右，但是如果不算上中国，增幅仅为 2% ~ 2.5%。不过这些地区最近在疫苗接种率方面传来了好消息，预计截至 2022 年 6 月该地区疫苗的接种率将达到 70% 左右。

另外，截至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现在的疫苗对新变异毒株的有效性如何。我们必须得学会与新冠肺炎病毒共存。疫情爆发以来，为了应对各成员国所面临的挑战，世界银行已经为各成员国调集了超过16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他们加强各自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向受到封闭和流动限制影响的家庭直接提供现金资助，我们已资助 50 多个国家购买和分配疫苗，金额总计高达 60 亿美元。同时我们支持卫生和教育体系以及其他政府关键职能。

疫情期间，我们在国际金融公司（IFC）的同事们帮助企业渡过难关，为包括医疗行业在内的创新业务注资。我们将继续资助基础设施和其他对经济复苏有关键作用的投资。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支持来避免发展持续倒退。

曼努埃拉·菲罗

令我们备受鼓舞的是，各成员国给我们提供了大力支持，以助力国际开发协会（IDA）及早完成大刀阔斧的增资。IDA 是世界银行为最贫穷的国家提供优惠贷款的机构，出资国每出资 1 美元，将会为国家开发协会额外增加 3.8 美元的资金来源。我们还将进一步整合多边银行、双边出资方以及成员国，围绕国际开发协会“绿色、有韧性和包容性”的复苏宗旨展开工作。

2021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共同的目标应当是促进全球合作，以应对我们面临的共同挑战。

然而，公共资源并不足以满足融资的需求，私营部门在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各国政府正在制定许多切实有用的提案，以便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支持下，降低私营部门在清洁能源、基础设施、数字技术，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创造新就业机会方面的投资风险。但要鼓励私营部门投资，各国政府首先需要回到结构性改革的艰巨任务上来，包括监管改革、改善投资环境和创建可行的商业模式，也包括改善对绿色复苏至关重要的可再生能源等领域。

结构性改革还涉及有限的公共资源更合理的分配，以提供关键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网络，同时减少补贴浪费。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关键挑战是使资源重新配置到新增长行业，如绿色行业和数字经济。

随着金融监管机构逐步取消债务延期，我们需要高效地解决企业和银行的债务和解问题，允许资本和劳动力从发展状况不好的企业流向效益更好的企业。健全的社会安全网对于保护劳动者和促进劳动力流动至关重要。

气候变化只会加剧结构性调整的挑战，东亚与太平洋地区正处于这一挑战的最前线。伴随着高速的经济增长、碳密集型能源系统与土地利用模式，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碳排放量自 2000 年以来增加了将近两倍，其全球排放量占比超过三分之一。东亚与太平洋地区也是最容易受到气候风险影响的地区之一，其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面临着海平面上升和极端气候的严重威胁，该地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 27%，而农业是最易遭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产业。根据长期气候风险指数，全球最易遭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前 20 个国家中，就有 6 个位于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大规模扩充公共和私人投资，用于发展低碳和气候韧性经济。此外还需要能够推动此类投资的政策框架，包括为碳排放设定一个现实的价格。它还需要更健全、适应性更强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护家庭和生计免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并帮助转型期的工人。这听起来可能令人望而生畏，但我们不要忘记：低碳转型也是一个重大机遇。

没有哪个新兴市场比中国更适合推动绿色创新。今天，中国在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就业人数已经是煤炭行业的两倍。它引领着电动汽车和电池存储技术的前沿，并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正如中国引领了新冠肺炎疫情中的经济复苏一样，我相信中国能够继续在低碳转型领域发挥引领作用。让我们共同努力实现绿色、有韧性和包容性的经济复苏。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Global Finance 20 (F20)
Finance serves the world

国际金融论坛(IFF)
全球金融F20 · 金融服务世界

战略对话 · 交流合作 · 金融创新 · 全球智库 · 金融人才
Dialogue · Co-operation · Innovation · Think tank · Training

国際金融論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Green Growth Fund (GGF)
Green growth for the future

绿色增长基金(GGF)
绿色增长 · 创造未来

绿色金融 · 绿色投资 · 绿色增长
Green finance · Green investment · Green growth

Green Growth Fund
绿色增长基金

国際金融论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IFF)
The IFF Magazine

金精不朽 融通天下

- 传播交流成果，探索学术前沿，扩展国际视野，发表权威观点，服务金融事业，满足读者需求。
- 以服务中国经济界、金融界，服务广大读者为使命，致力于 IFF 信息的全面、及时、准确传递，与社会共同分享 IFF 的研究成果。
- 为国际金融合作交流搭建顺畅的信息平台，使对话交流中的重要思路、观念、观点得以传播，服务中国经济和金融业。

国際金融论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Since 2003

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战略文库

国际金融论坛（IFF）全球战略文库是集研究成果、演讲文集、金融领袖及国际金融论坛成员著作为一体的系列出版物，根据每年 IFF 全球年会和研究成果定期或不定期出版。IFF 全球战略文库坚持独立性、客观性、前瞻性和战略性，对全球金融经济问题深入研究。

着眼宏观大局 · 关注金融动态 · 探寻内在规律

《国际金融论坛》会刊是反映国际金融合作交流的高端学术刊物，面向广大经济界、金融界的读者，以传播中国金融国际合作交流成果，提高中国金融国际化水平，促进中国金融业健康发展为宗旨。《国际金融论坛》会刊具有天然的国际信息渠道、丰富的信息资源，利用自身优势，将国外金融信息介绍给中国读者，使《国际金融论坛》会刊成为了解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窗口。充分发挥国内、国外双重信息资源的优势，以全球化的视野解读中国的金融事业，站在中国的角度对话世界金融市场，为读者展示一个完整的金融世界。

扫一扫加关注
微　信：IFFweixin

出版声明：

* 本刊仅供编辑部呈送的特定对象阅读使用，不得有任何商业用途
* 除明确提示的文章外，本刊其他文章基于已公开信息编译或选摘而成，但本刊不保证该等信息的准确性或完整性。
* 本刊所编译、选摘的文章，仅如实、客观反映原作者观点和立场，并不代表本刊编辑部的观点和立场。
* 本刊属于内部资料，编辑部对其保留一切权利。除非本刊编辑部事先书面授权，本刊的任何部分均不得以任何方式制作成复印件、复制品或收入检索数据库系统。

General Statement:

* This publication is for internal reference only.The commercial use is prohibited.
* Unless otherwise stated, the content of this publication is compiled, translated and edited from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It does not guarantee the accuracy or completeness of thematerials.
* Views in the articles of this publication are the original opinions from the authors and do not represent the views of the editorial team.
* The editorial team reserves all rights.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may be reproduced,stored in a data retrievalsystem or transmitted inany form whatsoever orby any means withoutprior written consentfrom the editorial team. Violatorsmay be subject to legalproceedings.

We are dedicated to broader and more inclusive global cooperation based in China with a global vision. We are devoted to comprehensive and extensive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y playing a bridging role between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and main financial cities worldwide.

我们致力于开展更广泛、更包容的全球合作，立足中国、走向世界。携手世界各主要金融中心城市，架起中国金融界与国际金融中心的桥梁，建立全面、广泛的全球合作与对话。

国際金融论壇

INTERNATIONAL
FINANCE FORUM

Since 2003

Global Finance F20 (Finance 20)

北京 · 广州 · 上海 · 香港 · 华盛顿